

政治经济学 与资本主义

道 佈 著

松园、高行 译

Maurice Dobb, M. A.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53

根据英国劳雷吉-凯恩保尔书店一九五三年版译出

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英) 道 佈著

松园、高行 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9\frac{1}{8}$ · 字数 192,000

1962 年 4 月第 1 版

196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02·191 定价 (七) 1.00 元

序 言

想通过短短八篇論文这样薄弱的媒介，来討論整个經濟学領域，就这个企图来看，已經足够证明，我所接触到的必然是很浮淺而又散漫的东西。要是这几篇論文的用意是这样的話，那末，我认为对于这个指責也就无可答辯了。可是，这里論述的範圍虽然广泛，那也不过是打算就这个領域的某些方面加以探討而已，因此，势必忽略了在許多人看来也許是更值得研究的广大一面。然而題材的选擇也并非漫无标准的。它是根据这样的見解，认为政治經濟学以及圍繞着它的一些爭論必須能解答某些主要屬於实际方面的問題——有关我們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經濟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的問題，并认为这一类的問題，無論对于充分了解經濟思想的发展以及經濟思想与实践之間的关系都至关重要。在一种理論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往往会逐漸把原来的問題掩盖过去和遗忘了，因而其主要意义便丧失或者看不出来了。我认为經濟思想，如果它具有现实的价值，就必须摆脱目前正在損害它的根基的种种見解，也正是这一信念才使这几篇論文具有可以称作一致性的东西，并且說明为什么在这些論文之中有这样大的篇幅偏重在注釋和批評方面。

本书当然主要是为那些对經濟文献和經濟評論已經有一些了解的人写的。同时，在論題許可的範圍以內，也极力避免专业經濟学家的那种偏重于技术性的論述，使討論內容能为更广泛的人士所接受，也就是为那些对今日世界中經濟思想与实践的

DAF 26 2012¹

密切关系具有敏感但没有时间去阅读只有抽象说明而无实际意义的东西的人所接受。如果说，这里所写的有些地方只是表示个人一时的想法，而不是成熟的思想，那末，这种思想至少不是仓卒之间，而是经过几年的过程形成的。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之中，我曾经得到丹尼斯·罗勃生(Dennis Robertson)先生和佩埃洛·斯拉法(Piero Sraffa)先生的帮助，他们阅读了这些论文的一部分，并得到乌·依·阿姆斯特朗(W. E. Armstrong)先生，埃里奇·罗尔(Erich Roll)教授和狄金生(H. D. Dickinson)先生的帮助，他们在这些论文写作过程的各阶段，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幸经他们的批评，才消除了一些含混的地方，否则这些地方恐怕还会继续保留下去。克莱门斯·达特(Clemens Dutt)先生，阿·华特逊(A. G. D. Watson)先生和乔治·巴纳德(George Barnard)先生也曾经就其中个别的几点给我提供宝贵的意见和指正。但是关于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或所表示的任何意见，他们都不应负任何责任。

摩·赫·道佈

1937年7月于剑桥

在这次修订版中，为了阐明关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某些方面，我曾经就第四章后半部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这在前一版里面，我是有所忽略的；还有第六章的最后十几页，也作了一些修改，为的是符合比较成熟的思想的要求。其他地方，虽然明知还有错误和缺点，但我的修改也只限于一些很不重要的地方。

摩·赫·道佈

1940年5月

目 次

序 言

第一章	价值論的条件	1
第二章	古典政治經濟学	29
第三章	古典政治經濟学与馬克思	47
第四章	經濟危机	67
第五章	現代經濟学的趋势	108
第六章	关于摩擦和預期：經濟学說上的某些最近 的趋势	157
第七章	帝国主义	189
第八章	社会主义經濟的經濟規律問題	228

第一章

价值論的条件

有一些人对待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态度，可以用这样一句話来表示：研究一百年前經濟学家的屬於基本性质的錯誤是毫无益处的。像这样一种极端的態度，可能还不多。但是，在学术界里面，一般流行着一种类似的——如果不是那么輕率的——見解，认为古典經濟学家，虽然富有才华，可是在技巧方面，还是处在沒有成熟的“原始阶段”，我們当代高明的、思想复杂的哲学家从这里是得不到多少好处的。据說，古典政治經濟学虽然正确地提出了許多問題，对真理也作出了某些光輝的推测，但它的分析技术并不能提供邏輯上的圓滿答案，而且某些根本的混乱不仅妨碍了重要問題的解决，也妨碍了思想的精确性。李嘉图的天才，由于拘泥于粗糙而狹隘的劳动价值論和“不了解微分学的簡炼語言”而受到限制。关于馬克思，不是有人說过，他只是粗讀了一些李嘉图的作品而未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便如获至宝似地加以引伸，于是，激于值得称贊的，但是偏頗的“对受苦者的同情心”而采取了不足为据的那种立場嗎？现代的价值論主要是十九世紀最后几十年的产物，它把今天的經濟学和一世紀以前的經濟学划分开来，正如同牛頓的原理把牛頓以前的物理学和他的继承者的著述划分开一样。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也許是經

济科学方面的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但也仅止于此而已。这种信念已经变成经济思想的这样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这方面，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即使不被譏为浅薄无知，也难逃固执成见之嫌，可是这种态度在科学判断上是不应有的。

目前有一种趋势，认为早期的经济学家，不仅思想没有成熟，而且走上了错误的研究道路。甚至效用这一概念，原来被吹嘘为对古典学派所提的问题的一个更适当的解答，而且能概括更多的实例，现在也被看作不能成立的或无用的东西而被抛在一边了。目前，愈益流行像卡赛尔(Cassel)的那种说法，认为价值理论是不必要的，一切必需的命题都可以根据经验价格论来说明。他们告诉我们说，把交换关系当作表现在人类行为中的某些偏好函数^①来研究的理论，就是真正的经济科学所应具有的全部理论，并且说，只有对价值作出正确解释的，这样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存在的价值理论。密赛斯(Mises)说，对经济学的研究说来，目的的研究，也如同实际成本的研究一样，都是不适当的；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唯一必需的价值理论是，能概括说明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稀有资财^②与一定目的之间必然存在的关系的那种方程式组^③。密尔达尔(G. Myrdal)教授最近声称，过去经济学家对价值理论的探讨，无论根据实际成本概念或是根据效用概念，都代表一种伦理的和政治问题的偏见；并且说，正是因为摒棄了这种错误的探讨，才使现代的经济学建立

① 某数的函数，意思是指随某数而变动的一个变数。——译者

② 指土地、资本等。——译者

③ “社会主义”(英译名为 Socialism, 德文版原名为 Die Gemeinwirtschaft), 第 111 页以后。

在科学的基础上^①。一位美国作家特别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说马克思没能了解价值理论的条件，并且说现代经济学说，因为具有更高度的客观性和更广泛的概括性，所以比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一种更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理论^②。

显然，要决定这样一件事情，即使要了解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也需要答复一个问题：究竟一种适当的价值理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也许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答复另一个问题：一种价值理论，对于构成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命题的结构，到底有什么关系？

克罗斯(Benedetto Croce)曾经说过，“从经济学体系中删掉价值就好比从逻辑学上删掉概念，从伦理学上删掉义务，从美学上删掉表现一样。”^③但是这个比拟还不能使人信服，除非把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加以更精确的规定。有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说明，显然不需要先假定价值原理似乎也可以提出，更不需要具备价值理论的“充分条件”。再说，关于价格行为的一些说明的提出，似乎也很可能不需要预先考虑到在形式上是否完备。如果这些说明的全部，前后一致而且真实，它自己难道就不能构成我们的价值理论么？如果认为价值理论并不止于此，难道它指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一种与经济学家当前所进行的实际的探讨无关的东西么？为什么单计较形式的完备，而不注意与事实相符合的那类经验的说明呢？

① 密尔达尔：“经济学说中的政治因素”，1932年德文版，第3、4章。

② 斯维素(P. M. Sweezy)在“经济论坛”杂志1935年春季号上发表的文章。

③ 本尼德图·克罗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第138页。

当人們提到理論形式的完备的时候,在这种場合之下,人們指的是,如果这种理論能包含某种普遍性的推論,它必須合乎哪些条件。人們指的是,問題的說明与能够建立在这种問題的說明上的推測之間的关系。这是关系人們的一套說明所具有的知識水平的問題——人們的知識能够到达怎样程度的問題。根据一般所熟知的事实,在任何一門科学知識的历史上,問題的研究都是在比較模糊而界限不清的領域內,从对事物的描述和分类开始的。根据这种分类,才能够下一阶段,加以分析,归納出某种程度的一般性原則来。但是,这种一般性原則也許在很长的时期內,只能适用于一定类型的情况或局部的問題,并不能包括对更为一般类型的預測,而这种預測却是与这个体系內的主要事件息息相关的并能使人确定整个体系全貌的。要达到后一目的,就需要不仅作到一定的綜合程度的,而且作到一定的細致程度的概括。那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抽象化。例如,化学中的化学原素的原子量的概念和物理学中的牛頓引力定律似乎可以代表这种知識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在政治經濟学方面,似乎可以正确地这样說,在“国富論”未出版以前,經濟問題的研究,还没有超出它的叙述和分类阶段;初步的概括与个别問題的研究阶段。到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問世以后,又經過李嘉图的更严格的系統化,政治經濟学才建立了統一的、用数量分析問題的原理,因而能够根据經濟体系的一般平衡作出一些假定——也就是对有关这个体系的主要因素之間的普遍关系作出因果决定論的說明。在政治經濟学里面,这种統一的原理,或者說用数量形式来表示的一般說明底体系,其中就包括有价值理論。

所以价值理論是否完备的問題,是指这一套說明,如果能决

定整个体系的平衡或运动的话，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对于这个问题的纯粹形式上的答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套说明必须具有一种方程式组的形式（或者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表示），在这个组之内，各个方程式，或各个已知条件的数目，与这个组内尚待决定的未知变数的数目必须相等——既不多也不少。可是这只是纯粹形式上的要求。要包含对于现实世界的预测，这种理论不仅必须具有形式，也必须具有内容，不仅细致，也需要有“现实性”；而当这些条件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示的时候，愈需要具体的东西，愈是不为人所熟悉，实在说，愈常为人所忽略。

所谓方程式组就是确定支配或联系这个组内所有各个变数之间的一定关系的。这些关系就是构成这个理论的一般性说明。要解这个方程式组——在已经掌握关于这种情况的充分数据的时候，“决定”各个“未知数”或者确定它们的个别数值——那么，形式上的条件就是这个组中的某些数量必须具有“自变数”的性质。当然，从整个来看，这个组不但由方程式所确定的各种关系来决定，而且也由这些“自变数”来决定。但是重要之处在于只有“自变数”才是对整个组提供数值的关键。自变数就是一些数据，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掌握了这些数据，就可以（根据方程式）计算出所有其余的情况。照“自变数”的含义，并不是说它是一定不变或不能改变的，^①而只是说，在任何特殊情况之下，它都是不依赖这个组中的任何其他变数而单独得出的一种

① 弗里胥(R. Frisch)教授指出，当经济理论是用动态形式而不是用静态形式表示，同时它所论述的不仅是一种平衡而是一种运动的时候，某些“影响系数”就会具有“一定的时间函数”的性质（“经济研究评论”，第3卷，第2期，第100页）。

数量。它必須是不依賴其他因素而假定出来的东西。它仿佛是从这套方程式所代表的事物体系以外插进来的一种数量；而且重要之处在于，总的情况就是根据这个外来的因素来决定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自变数以后，就可以完全估計出这个情况的“形势”和“地位”，因为各未知数最后都是根据它們与这个自变数的关系来表示的，而自变数并不表示为它們之中的任何一个的函数。所以就这些事物的特殊場合來說，作为独立給定的或代表常数的数量，是有决定性的，而不是被决定的。举例來說，在牛頓的物理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引力常数”，把物体的加速度（部分地）表示为质量的函数；而且只要把质量当作不受速度影响的东西，这个常数就是有效的。可是，如果（照最近的概念所提示的那样）一个物体的质量又依它的速度而变动，那末，到那种程度，这个常数就不足以作为計算速度变动的基础了。

从现实世界截取片断并照上述方式来加以分析，那就等于把这—个片断宣布为一个“孤立的体系”，这就是說，它只是通过某些可以明确規定的环节和世界上的其余事件相联系，因此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些环节上某一时刻所发生的情况，我們就能够計算出这个“孤立的体系”以外的其余部分所要发生的情况。正如怀特海(Whitehead)教授所說的，“这种只需通过一种一致的、系統化的关系結構而与其余部分发生联系的体系，是有它的眞实性的。所以一个孤立体系的概念，并不是指实际上与其他事物无关的概念，而是指不受宇宙其余部分偶然发生的个别影响的概念”^①。

① “科学与现代世界”，第 58—59 頁。

我們当然是可能抽象地創造出任何数目的“孤立的体系”的。只要按照形式上的規定，編造几个决定整体所必需的自变数，也就是說，只要假定某些东西是独立的，不管它們事实上是否如此，就可以列出关于事物的若干方程式組，使它們前后一致，并且可以解算出来。照这种方法，可以設計出相当多的价值理論来，它們除了形式上細致与否的問題以外，沒有其他区别可言。这种作法很便当，实际上，再沒有比这种办法更便当的了。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事实上并沒有完全“孤立的体系”。所以一种价值規律，虽然不仅要受形式的評定，还要受现实的評定，但我們只能希望它达到一种对现实的近似值，能包含某一类型而不是一切类型的預測，同时能达到与我們所要处理的复杂現象相符合的最高度的概括性。最后的标准必須是关于实践的要求；我們所必需解答的那一类型的实际問題，也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目标。

我們研究的問題所需要的概括性的程度越小，寻求适合于这种情况的原則也往往越容易。当前研究的問題越特殊，越不普遍，我們可以把周圍的条件当作自变数的数目也越多。因此只要我們对周圍的条件有足够的了解，那末，如何决定結果的問題，就变成相对地簡單了（在极端特殊的問題上，一般來說，人們实际上所了解的有关条件实在太少，以致无法預測其結果，所以，虽然由于表面的簡單化可以得到方便，但由于知識不充分，反而不能获得結果）。比方說，假使有人要想决定某一天某一市場中魚的出售价格，他只要知道當場魚的供給量，家庭主婦那一时刻的欲望以及她們当时需要花費的現金数量，就可以得出結果。所有这些东西，可以有理由看作彼此互不影响，而且也不受魚价影

响的东西。再者（举一个比較长期的例子），如果人們是研究与其他商品隔离开的某一商品，那就可以把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水平当作独立的因素，作为这个问题的已知数据的一部分；那就只要用一种简单的“生产成本”的說明（假定在“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的条件之下），就足以决定它的結果。可是当人們是在討論大多数的商品，或者哪怕是若干大批的商品，或者是长期而不是短期的时候，那末，这些简单的假定就会失去作用；原来在孤立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当作独立因素的东西，現在便不能照样看待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們就沒有理由再用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水平，作为具有决定性的常数，因为它们不仅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且也受商品价值的影响。由此可知，一种价值理論的主要条件，不仅要解决商品价值的問題，也要解决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要决定劳动力、資本和土地的价格），其所以必須如此，不仅因为后者是与政治經濟学有关的实际研究底一个重要的并且主要的部分，也是因为缺少这一部分就不能决定那一部分的关系。換句話說，無論分配和商品交換，都不应当看作“孤立的体系”。說得更概括些，如果只根据某一特殊价值的意义来表示价值，就不够恰当；这种决定性的自变数必須表示出和某种数量的关系，同时这个数量本身又不是价值才行。这就是李嘉图之所以擯棄單純的“供給和需求”的解釋，也就是馬克思之所以嘲笑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生产成本”理論的理由；因为这些理論，企图用某些数量去說明价值，而这些数量，只有在这一原則不能具有必要的普遍性的情况下，才能看作是独立的；就約翰·穆勒來說，他是用一定的工資水平和利潤率來說明的，但他沒有就这两个因素引证出一个独立的、因果决定論的原

理。^①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李嘉图才那样急于指出馬尔薩斯用劳动力的价值来代表商品价值的^②，馬克思才那样不客气地把培利(Bailey)的相对論抛在一边。^③

还有一个条件，因为大家太不注意，所以应该明确地提出来。一种經濟理論，从它的内容性质和需要提出的說明方式来看，必須具有数量上的形式，这一点似乎是很明白的。既然这样，那末，在一个方程式組內的决定关系或各种关系，应该是能用现实世界的数量实体来表示的。它們必須能化为可以具体理解和認識的实际維度。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但那些純粹从形式方面来創立原理的人，通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不一定是說，一种价值学說，必須把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某一单向維度或实体联系起来；虽然实际可能证明，必須这样作不可。但要提出任何充分的数量說明，这些与价格变数相关联的具有决定性的維度或实体本身必須是由某种方式联系起来的，使这些实体能化为一个公項。例如，假使我們所設計的方程式，是表示一种商品的价格为 u 和 v 两个数量的某种函数，我們就需要知道， u 和 v

① 参閱本章以后各段以及本书第 13 頁和第 116—117 頁。

② 参閱以后各段及第 75 頁附注。

③ 一位作家最近在論述培利而加以贊揚的时候，曾經提到有的“不合理的議論，是根据交换价值性质的质量上的或一元論的概念的”，并且认为遺憾的是，价值理論“沒有受到下面那种主張的影响：一种商品的客观交换价值，是存在于它能与之交换的其他商品里面（而不在某些不同的、內在的质量里面）”（卡尔·鮑特[Karl Bode]在“經濟学杂志”1935年8月号上发表的文章）。这篇評論在評述培利的时候，似乎忽略了主要論点。規定交换价值的定义是“某种物品所能交换的其他商品”，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李嘉图和馬克思就是这样規定它的定义的。但不能因此就以为能完全用这句话來說明一种确定的价值理論。

本身是怎样的关系，然后这个说明才具有切实的意义（比方说，如果我们要知道商品 a 是等于 $5u$ 和 $1v$ ，而商品 b 是等于 $1u$ 和 $5v$ ，那就非进一步了解 u 和 v 的关系，就不可能说明究竟是 a 大于 b，还是 b 大于 a）。这无非是说， u 和 v 必须实际上能用数字来表示才行。因此，一种成本价值学说，仅仅将价值表现为——举例来说——劳动和节欲的一个函数，或在生产上所使用的人力数量和自然物数量的函数，那是不够的，除非这个学说能再包括某些条件或数据，足以作为成本的两个要素的公项。而为了这个目的，用市场价值作为劳动和节欲，或人力和自然的共通物，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作，就会使这个问题中的已知数或决定性的数量由尚待决定的未知数来决定。同样，如果一种原理，把价值当作“欲望”和“阻碍”的函数，就需要包括这样的条件作为前提，即处于平衡状态中的“欲望”和“阻碍”（主观地估计）的微分系数是相等的。这显然就是马克思在被人曲解得很厉害的“资本论”开始一章中所强调的用意，他认为必须找出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而可以用来表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某种一致的数量；这显然也就是马克思给恩格斯一封信里面所说明的一点。照他的意见，“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把劳动力与劳动区分开来，^①前者是一种商品，用它的价值来表示，而后者是人的活动的客观表现，并且是能够用独立数量来表示的实体。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经济学领域中，两种对垒的主要价值理论都企图把它们理论结构建筑在价格变数体系以外的而且不依赖于它们的一种数量上面：在一种理论里面，是生产活动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3 卷，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65 页；第 4 卷，第 7 页。

的一个客观要素，在另一种理論里面，是消費和需求所依据的一种主观因素。

这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古典政治經濟学是从成本的关系上发现的。它們純粹从一个商品通常和其他商品所能交换的数量的相对意义上，来下这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定义。但是这个交换比例体系的实际的解决，是从下面的原理中找到的：即这些比例終归决定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在一定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之下）。正是这种解釋构成了著名的劳动价值学說。在李嘉图以前，这一原理还没有人用任何完整而明确的形式表述过。实在說，这种表述往往是不清楚的，甚至是含糊的；亚当·斯密曾經同时把价值指作用于生产中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① 根据李嘉图和馬克思所使用的意义，劳动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劳动是看作一定数量的人力消耗；虽然这个概念后来又变成劳动中所包含的精神的“牺牲”和心理的“痛苦”等等主观的名詞。如果客观地这样来看的話，这种决定性关系是一种技术关系，而不是一种价值关系。在任何一定的技术情况之下，它是一个特定的因素，与劳动生产率的程度是同义語，而与劳动力

① 例如，价值“是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而且“每一个东西的真正价格——每一个东西对它的需求者所索取的代价——就是获得这个东西的劳苦和麻煩”（“國富論”，1826年英文版，第34、35頁）。李嘉图在評論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当·斯密有时所說的“不是（属于）用在某一对象的生产上的劳动数量，而是它在市場上所能支配的数量；好像它們是两个等式，而且好像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有加倍的效率，它就必須得到两倍于它以前所交换的数量”（“原理”，第6頁）。在“李嘉图致馬尔薩斯书信集”（鲍奈編，英文版，第233頁）里面，我們看到李嘉图是这样写的：“你說某件商品貴，是因为它能支配大量的劳动；我說只有在生产它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劳动，它才是貴的。”

价值(也就是工資水平)无关。而且它是可以用“較大”或“較小”等等名詞来表示的一种关系。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不受需求的影响:用商品 a 和 b 来表示的劳动生产率,不管是 a 的需求多而 b 的需求少,还是 b 的需求多而 a 的需求少,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价值比例和劳动比例等同的原理,是以确定一个交换社会主要趋势的性质的条件为根据的。在一个以分工、竞争和物资流动为特征的交换社会中,竞争就会保证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間分配得使这些比例趋于相等。所以这个原理是以这个社会的某种平衡概念为基础的,而且还以同工同酬的工資水平的概念为根据,虽然这个水平不是不变的。但是这种說法要受到两个重要的限制。第一,就土地來說,这只有在边际的生产情况下或者是在当时所利用的自然条件最为不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那种生产才是正确的。在任何形式的成本学說之中,这实在非如此不可。第二,它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简单化的假定,就是在不同生产部門內所使用的劳动与資本的比例都是相等的: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机构成”的相等或后来經濟学家想把它称作“技术系数”的一致。这个假定意味着,价值只是对具体交换价值一种抽象的近似值。許多人认为,說它應該这样,乃是对这个理論的致命打击;这就是龐·巴維克(Böhm-Bawerk)对馬克思的批評的重点。但所有的抽象化都只能是对现实的近似法:这是它們的根本性质;而且仅仅說它是这样,并不能算是对价值理論的批判。究竟这样的假定是否可以允許,这是一个問題的类型——也就是問題的性质——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性质正是这个理論所企图解决的。只有在这个批判能表明,这种暗

含的假定使这个概括不能包含那些正是要用概括来包含的推論的时候，这个批評才算有效。常常有人說，李嘉图至少在他所著的“原理”的初版里面，沒有充分認識到他所暗含的假定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就馬克思來說，甚至有人认为，他並沒有注意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限制，于是又写“資本論”第三卷，来迴避他以前所沒有注意到的困难；結果他就产生了一个代替的学說，这个学說与約翰·穆勒的“生产成本”理論並沒有什么区别。^①但是这些臆断都是很輕率而且沒有根据的。如果认为李嘉图之所以在他的“原理”第一版里面对于这种有条件的假定，只約略地提到一下，不是因为他不重視它，而是因为这对于当时手上所要进行的主要探討的目的并不重要，那就要合理得多了……。現在很少有人能記得，古典政治經濟学所关心的，是我們称作經濟社会的“宏观”問題，而把像个别商品价格变动的那一类“微观”問題，只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無論如何，李嘉图並沒有自以为他的原理足以决定后一类的問題。但比起別人来，李嘉图是第一个最先关心到分配問題——就是关于社会的三大收入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变动的問題——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品价值問題的。^②

① 事实充分表明，这种意見是不正确的：馬克思在比“資本論”第1卷还早許多年出版的“哲学的貧困”一书中曾經指出，工資的提高可能对不同的工业发生不同的影响，会促使某些工业的貨物价格上涨而另外一些工业的貨物价格下降，这是由于“手工劳动对固定資本的关系在不同的工业之中是不相同的”緣故。參閱本书第63頁。

② 李嘉图曾經写信給馬尔薩斯：“你以为政治經濟学是一种对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我以为还不如說是对某些規律的研究，这些規律决定着在财富形成之中同时发生的各階級之間的工业产品的分配”（“致馬尔薩斯的书信集”，第175頁）。在他的“原理”的序言中，他写道：“决定調整这种分配的規律是政治經濟学的主要問題。”

所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个别商品的价值，而是若干商品的大类，例如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或者是关于商品与货币两方面之间的問題。关于这一类的問題，他认为他的近似法是适当的，而且可以为他所处理的問題的範圍提供所要求的普遍性的程度。就馬克思來說，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所包括的問題的範圍以內，也是如此。当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用更进一步的近似法，通过他的“生产价格”理論，来进行个别商品价格的研究的时候，他的理論与約翰·穆勒的生产成本理論，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馬克思曾經批評后者，因为它沒有說明“生产成本”本身：它把生产成本解釋为使用劳动而付出的工資，再加上平均利潤率，而沒有对决定利潤率本身的原因提出任何說明。^① 在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論里，利潤表現为他在第一卷所提出的、用第一近似法的規律来决定的一個数量；这种利潤是由劳动力价值与成品价值之間的剩余或差額来决定的。在具有决定性的这方面，第二近似法由第一近似法来决定，这在本质上並沒有矛盾（正如同在物理学上关于抛射体規律的逐步求近法一样）^②。这种“微观”問題的解决要由“宏观”問題的解决来决定，因为微观現象是受宏观規律制約的（加以适当的修正）。我們不能仅仅因为要解釋飞机和飞船能升入高空的理由，而需要对引力理論加以相当大的修正，

① 参閱本书第 116—117 頁。

② 物理学里面的抛射体規律，关于一个抛射体的路綫，首先是假定在一种真空情况下进行的，根据这个假定所作出的計算就是第一近似法。在以后的計算之中，就需要把现实世界中的更复杂的情况，如大气压力、風的抵抗力以及无数“摩擦因素”等等估計进去，这就是第二近似法、第三近似法等等。本书作者把“資本論”第 1 卷的分析方法比作第一近似法（对資本作最一般的和最抽象的分析），而把第 3 卷比作第二近似法。——譯者

就认为这个理論是不合理而且是无用的。

这种劳动理論的根本重要性，就在于能用来决定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在某种一定的条件之下)。照李嘉图和馬克思的看法，关键問題就是：劳动力价值与一般商品价值之間的差額是由什么决定的？比方說，假使工資上漲，这个差額是否就会縮小，还是商品价格也会根据同一速度上漲？利潤——因此利潤率——就是以这个差額为轉移。如果这一点能确定，那就不仅解决了分配的問題——也就是階級收入的变动——而且也决定了約翰·穆勒的“生产成本”和馬克思的“生产价格”的基本要素。

也許有人会說，这依然是从形式上来解决問題。任何理論，在充分抽象化的水平上，总可以使它在形式上自圓其說；但这并不是說，它有现实的价值。劳动只能认为是財富生产的各个要素之一，为什么根据劳动的成本价值学說，就應該說是比別人所提出的其他成本学說——例如把資本或土地作为决定性数量的那种原理——高明呢？单单着眼于劳动这个要素，无疑地是一种任意的武断。这不就是在最初的假定中先暗含一个后果，而沒有提供任何独立的理由，可以使人相信这种后果是确实的嗎？的确，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一个形式的問題。一种經濟原理的正确性，必須看它将問題的某些方面加以抽象化的时候，究竟目的是否集中注意在一些特征上，而这些特征事实上就是这个原理所要适用的现实世界那一部分的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特征。

就土地和資本來說，要拿它們作基础，显然是有严重而实际的反对理由的；这样做的困难可能超过在攻击劳动价值学說方面所遭到的任何困难。古典政治經濟学已經集中注意在土地性

质的不一致上面，并且用土地的质的差别和它的稀少性，作为古典地租学说的基础。耕地比劳动的工时更不一致。就资本来说，那就更有严重的反对理由，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要由其他各种价值来决定，特别是要由它所能赚得的利润来决定。那末，怎么能用这样一个数量作为利润的决定性的说明基础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这个名词看作代表一种价值，而看作资本价值所代表的具体东西，像机器和建筑物等等，那末，在这种场合之下，它们只能具有作为“积蓄劳动”的那种数量意义。至于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综合成本原理，那就产生另外一个反对理由，就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公项，可以把这些性质不同的数量联系起来；而且这样一种原理，也会由于它是本质的二元论而归于无效。比方说，即使假定耕地好坏是一律的，可是我们怎么能把工时、耕地同各资本单位联系在一起呢？

但是还有一个实际的理由比这个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为劳动构成独一无二的成本，这当然只是一个假定。但是这个假定是由有关经济问题本质的一种特殊见解产生的。照这种意义来看，它并不是一个武断的定义，而是叙述实际事物的主要形势的一种尝试；而且必须看它是否能作到这一点，才可以作最后的判断。任何价值理论，必须对它所决定称为“经济的”领域的一般形势和性质，构成一个暗含的定义。照这个理论所表明的人和人们传统所了解的意义，经济问题的关键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生产方式下，为了争取生存而对自然所展开的斗争。正如配第(Petty)所说的，自然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其父。人类的活动与自然过程之间的对立就是这种关系的基础；人类活动天生就具有变动和增殖的创始者和生育者的那种根本

意义。如果当我们說到經濟問題的时候，我們指的不是它的表面性质，而是它的实际內容，同时目的是要表明某种要素，这种要素是这种經濟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取的各种方式所共同具有的，那就很难看出，能提出什么样的說明，而不包括这种劳动和自然之間的經常变动的关系，并且不以这两个因素的根本对立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再者，如果我們要想用某种数量来表示这种关系——人对自然的控制——我們也很难发现，除了产生某种結果(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下)所必需的人力消耗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簡單的概念可以应用。在政治經濟学上，最早的几种区别之一，是“财富”和“价值”的区别；这个对比的关键是：虽然自然和人类活动都能产生财富或財貨，但价值因为是一种社会关系，就应该是人类活动的屬性，而不是自然的屬性。換句話說，和财富来对比，价值的本质就是成本，而成本的本质就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劳动。把劳动客观地看作人的精力的产物，就是李嘉图所謂“生产上的困难或便利”的尺度和要素。这种劳动和自然的对立，作为与价值和财富的对立相并行的一种概念，显然是一个根本的概念，而另一种意見，认为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并且能制造器具来加强对自然力的控制(从而产生从事創造器具的劳动和从事使用器具的劳动之間的区别)，对于上面的概念來說，只是次要的。所有这些都是最根本的概念。同时，对于任何一种价值概念來說，如果忽略了这些簡單概念，就只能具有非常有限的力量，来支持有关现实世界的主要演进过程的断語，这似乎是很根本的問題。

所以，究竟人的劳动是否就是具有唯一意义的成本，这是一个实际的問題，要用判断力，而不是用邏輯去决定。事实上，人类

活动本身是分解为体现在工具和器具里面的劳动，以及从事使用这些器具来进行直接和当前商品生产的劳动。但是虽然这些器具的制造及其以后的维护和修理，代表着具有这种决定意义的成本，可是在这些器具的单纯的使用上（与消耗不同），或在使用时间的单纯的延迟上，却没有和这种情况类似的成本。^① 龐·巴維克曾經这样說过（在他批評利息底使用学說的时候）：“正是把可用的精力轉移到工作上去，人們才能获得貨物的‘使用’；除了‘使出身体的力量’或精力以外，‘使用’就没有其他的意义；而且除了貨物的自然的物质劳务以外，不論在现实世界上或在邏輯的思想界，都没有任何‘貨物的使用’的余地。”^② 因此，建立在这种經濟活动的简单而根本的特征性上的劳动原理，不仅提供了一个形式的概念：它还給經濟問題的性質作了一个重要的质的說明（一种质的說明往往与倫理的說明相混），同时将其中的含义傳給它的推論。实在說，效用学說也是这样，虽然它所作的质的說明是属于完全另外一种性质的，它与生产关系无关，而与商品对消費者的心理关系有关。当它把价值表示为效用的某种函数的時候，它是在說明它所确定为一种特殊平衡的那种平衡的特征的，这种平衡以某种方式与效用的“最大限度”保持着比例关系（这种說明有它的独立的意义，与任何道德和倫理的假定完全不同）。劳动学說所包含的說明，认为交换价值与人的精力的使用和消耗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名詞，这个名詞使总产品与純产品的区别以及剩余价值具有某种意义，而且也

① 把“实际成本”主观地看作某些心理的东西，因而也就是所謂“节欲”的問題，那是另一回事，将在后面另外討論。

② “資本与利息”，1890年版，第220、231頁。

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標準，來區別一種收入和另外一種收入的不同。這樣，就可以在這些名詞之中，把代表轉移等价物的交換關係與不代表這種轉移的交換關係區別開來：比方說，勞動力的出賣，就代表所得與人在生產上所消耗的精力的交換，而與這種交換對比的是，出賣使用稀少資財的財產權利，並不代表等价物的轉移，因此這種出賣的所得，在根本意義上，決不像維持生活的所得對於勞動那樣“必要”，也不像抵償一架機器操作（在物質的意義上）所耗費的代價那樣“必要”。而且，如果有這樣根本的區別存在，那末，這種區別在決定各個收入一階級的行為以及經濟變動對於這些階級的反應方面當然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沒有這樣一些價值概念，這一類的根本區別在經濟理論上就不可能有它們的地位。可是在另外一種價值原理里面，就沒有這些區別；而且（後面可以看到）在現代的主觀價值學說里面，這種和成本相對立的剩餘概念失去了任何重要的意義，而不同階級收入之間的任何根本區別也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了。

李嘉圖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識到價值學說的條件。至少沒有東西可以證明，他的學說是根據任何進步的方法論的。但是似乎很明顯，他的健全的分析思想的本能，基本上是正確的。可是，沒有疑問，馬克思對於方法論的問題，比他同時代的人和大多數後起的人，是更充分敏感的。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是從一般歷史哲學的觀點來進行的，這種觀點可以說就是把歷史學派所注重的敘述和分類的方法同抽象的政治經濟學所注重的分析和數量的方法二者結合起來。本質上，他甚至比李嘉圖更關心社會主要階級收入的運動，把這種運動作為了解他的分析最初所要揭露的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的鑰匙。對於這種研究，他

认为他的价值原理是十分适当而且必要的。他和恩格斯都很明了他所应用的抽象方法的条件与限制。这可以在下面几段文字里得到启示，在这些文字里面，关于抽象方法在思想和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理论。“对我们所处世界体系的确切思想反映的形成，这对于我们以及对于所有时代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样人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在其所有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他方面，人们以及世界体系的本性永不允许人们完全解决这一任务。……世界体系在思想上的每一反映，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条件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其作者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状态所限制。……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的形式和数量的关系——这是非常现实的资料——为对象的。这些资料表现于非常抽象的形式之中，这一事实只能表面地掩盖它的来自现实世界的根源。可是为要能够在其纯粹状态中去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那末就必须完全使它们脱离其内容，把内容放置一边作为不相干的东西。”^① 恩格斯在给史密特(Conrad Schmidt)的一封信上，曾经特别讨论到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他写道：“某一种东西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好像是两条并行的渐近线一样，虽然彼此经常趋于接近，可是永远不能相合。这两者的差别，就是使概念不能直接立刻成为现实，并使现实不能立刻成为它自己的概念的那种差别。如果我们不把所有思想的结果，都宣称为想像，那末，它(指概念)除了单纯的想像以外，还含有某些东西在里面。”^②

但是“资本论”出版后还没有很多年，就出现了一个和它对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第527页。

奈的价值学說，而且沒遇到什么阻力就征服了这个領域。这就是效用学說；它似乎是同时在几个人的思想上萌芽的；英国的耶芳斯(Jevons)以及奥地利学派的門格尔(Menger)、維賽尔(Wieser)和龐·巴維克，都作过同样的闡述。这个新的学說，不但具有新奇的感觉，而且也具有巧妙和細致的吸引力(虽然和大多数的思想一样，以前也并不是沒人提过)；但是这种发明，一部分是利用了微分学的概念，着重在数量的增量和增量率方面。似乎可以看到，无论如何，龐·巴維克是重視古典学說所寻求解决的問題的。虽然他吝嗇得連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這個問題的功劳都不肯提，但是所有的現象都表明，他所以提出这个学說，正是为了直接对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准备一个代替的答案。至少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实；在“資本論”第一卷发表以后的十年內，这个和它对垒的效用学說，不仅已經由若干作者独立地加以闡明，而且这个新学說的不脛而走，也是其他同样的新奇思想所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否定作用，馬克思对十九世紀經濟学說的影响，可能比一般所承认的更深刻得多。

看作有点屬於个人的和主观性质的效用，就是这种新学說使价值所寄托的数量。价值是用消費边际上效用增量底函数来表示的，而不是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效用底函数来表示的。这就是把商品和个人的感觉之間所存在的主观关系，作为这个方程式組的决定性的自变数，来代替生产所依据的客观的成本关系。就像庇古(Pigou)教授所說的，这些“經濟的常数”是看作“由人的意識来决定的”东西。^①用这种方法，据說就可以达到比古

① 庇古：“福利經濟学”，英文版，第9頁。

典政治經濟学所达到的更为广泛的概括性。不管生产各要素的技术結合怎样，都可以应用这种常数；因此也不受关于“資本有机构成”各种假定的限制。由于这个理由，它就足以同时完全决定經濟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两种形态。許多人还认为，人类意識的基本本能既然沒有改变，那末，这个原理也可以对任何类型的社会适用。照魏克賽尔(Wicksell)的說法，这对于作理論研究的經濟学家來說，仿佛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同时，它也包含着对于它本身的某些限制性的假定，与环繞着古典經濟原理的限制性的假定在性质和意义上完全不同。尤其是，人类意識状态既然只能用价值項目——通常是用貨幣——来表示，就必须把不同的个人底不同的收入地位加以抽象化。而且要把消費者从他作为生产者的那种性质分离出来，加以抽象化，同时反过来也要如此。价值問題不得不看作好像不必去考虑收入分配对于需求的影响就能获得解决似的；否則一种需求曲綫表就不能完全当作效用的函数，而且不受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影響。这就使得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原理只能完全适用在收入平等的社会，換句話說，只能适用在已經沒有分配問題的社会。而且它还使得魏克賽尔把“自然价值”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要实现的交換比例。还有一点，它既然把个人的自覚意識作为基础，它就不仅把他作为消費者的屬性，同他作为生产者和收入者的屬性隔离开来，而且也把社会对于个人性格的各种影响加以抽离——也就是把个人所参加的社会和他所結成的各种經濟关系，对于他的欲望和厌恶、他的快乐和痛苦所发生的各种反应加以抽离。这种抽象化的意义，以后还要更充分地討論；但这样一种原理的推論，显然很难避免个人主义的偏見，因为在它的各种假定之

中，包含着从个人主义观点所描写的一种社会。究竟这样一种描写，是否合理，这不是一个形式或邏輯的問題，而是一个事实的問題。

这样一种意义的效用是否能真正当作一个数量，过去对这个問題曾經有一些爭論。我們沒有参加这个問題的爭論的必要，因为它对当前的問題，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这里面的真理，很可能是这样：效用虽然是一种心理的事实，却可以明确地解釋为康德(Kant)所說的那种“內含量”，使它能用“較大或較小”的意义来表示。^① 究竟照这样一种定义，它是否就是存在着的一些东西，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就目前來說，它是否有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問題，不需要我們关心。即使存在的話，它也只有通过个人在市場上的行为客观地表现为具体的买或卖的行动的时候，才能具有經濟的意义。在这种购买行为背后的当时的内心活动，有时称作“欲望”（心理学的行为学派可能会称之为行为反应），以别于用滿足或效用来代表的那种更基本的自觉意識。在这一方面，主观价值学說长期以来一直呆在一个異常脆弱的山形牆上；它脆弱得使馬夏尔(Marshall)只好把它藏在一個注脚下面。它的确是一直呆在那样的地方；令人惊異的是，似乎始終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它的前提就是把“欲望”和“滿足”看作等同的东西。正如同馬夏尔所說的：“我們依靠經濟学所提供給我們的衡量行动的动机或动力的标准；尽管这种标准有許多缺点，我們也要使它為我們服务，不但衡量促成行动的欲望，而且也衡量

① 參閱“經濟研究評論”1934年6月号所載兰格(O. Lange)的一篇文章；同一杂志，1934年10月号，对这篇文章的答复；阿姆斯特朗在“經濟学杂志”1939年9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由欲望而导致的滿足。”^① 庇古教授曾为这两个东西的等同作辯护,认为这是充分的近似法,而且适用于“大多数的商品,尤其是普遍消費的东西,像食物和服装方面所需要的物品”^②。沒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假定,就沒有理由可以把需求表示为效用的函数;因此也沒有理由可以把价值現象同这样一个数量联系起来。下一章所作的批評的一部分是:即使在近似法較低的水平上,我們究竟能把它們看作有多少联系?

前面已經說过,現在有一种日益流行的見解,主張拋棄效用概念,认为它是一种空虛的或多余的东西。“滿足”或其他一类的、更深的心理状态,都被投到心理学或倫理学的范围里去,而只把欲望、实验的、偏好曲綫表和行为反应等比較不屬於感情的东西,作为基础材料。价格是某些需求价格曲綫表,也就是由实验观察所得到的、某些市場开价的共同結果;而且經济学,作为一种“交換經济学”的科学,是具有絕对的、超道德的純洁性和科学的客观性的。但这种迴避,是不是正当的迴避方式呢?这是不是符合价值学說的条件的一种迴避呢?当然在純粹形式的水平上,是可以使这种方程式充分完善的:那些必要的“常数”是能够明确地称为“常数”的;而且也可以获得这个问题的邏輯結論。但是究竟这些方程式,如果用具体的东西来解釋的話,是否真能一致地包含它們所需要作出的推論,那又是另一个問題。我們究竟还有什么不由价值运动来决定的数量,可以作为我們公式的基础呢?如果需求不是效用的函数,它究竟凭什么决定的呢?凭实验观察所得的偏好曲綫表吧,但这又有一种可疑的形迹,它

① “原理”,第92—93頁。

② “福利經济学”,英文第1版,第25頁。

似乎是同样的实体，只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这些偏好曲线表并不是一定根据任何本能或任何基本的理性。我們有什么理由可以保证，它們是市場价格的創造者，而不是它的創造物呢？反对单纯用“供求”来解釋的理由，这里是不是也有許多可以适用的地方呢？这和企图构成一个“引力常数”，却没有质量的概念，而要用某些实体，像某一物体的“吸引的傾向”^①来代替，不是有一种可怕的类似之处嗎？如果这个批評是正确的，那末，我們只剩下一个形式的技术，可以用来探討某些定义的含义，并为某些类型的价值关系提供一种叙述的說明和分类；这在对某些特殊問題作孤立的、分別的处理的时候，是能够假定出某些现实趋势和现实預測的。但关于經濟社会的“宏观”現象，它就沒有能力作出判断。一种經濟的規律，并不只是一个条件語句，說如果一种情况可以确定为某种意义，那末，它就一定会有某种屬性。这只是一种同义語的重复而已。正如凱南 (Cannon) 在討論“報酬递减規律”的时候所說的，^② 一种經濟規律或趨勢，必須說明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某些实际发展途徑的概然性。而一种价值規律，正是为了有可能作出这样的說明，所以才必須滿足所提出的条件。否則不問它的形式如何优美，也沒有資格用这个名詞。

我們曾經提到，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类型的需求學說，不管它的根据充足不充足，要作为解釋經濟事物的基础，似乎总不及成本原理来得好。这就是說，只有用成本来解

① 凱恩斯常用“傾向”(propensity)一字。此处作者用“吸引的傾向”(attractional propensity)这个自拟的物理名詞，来嘲笑凱恩斯的荒謬。——譯者

② 凱南：“生产与分配學說”，第168頁和以后各頁。

釋，才能使剩餘概念具有一種意義；如果沒有它（或與它類似的東西），那麼各階級收入之間，似乎就不能有劃分的標準。這裏面的理由就是，成本原理主要是關於生產活動性質的一些說明，也就是關於生產活動方面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需求學說是關於消費和交換——也就是作為消費者的人與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关系——的一般性的說明。任何一種包括剩餘概念類型的問題，就是關於一定的所得與生產活動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因此事實上就含有成本的概念；成本和剩餘在這裏表現為相關的名詞。一種純粹用需求來解釋價值的學說，只能根據最後所獲得的價值，來確定一個人或一個階級在生產上的“貢獻”；它不能根據產生貢獻的活動或過程，來確定這種貢獻，因為它沒有包括這一類的任何生產關係的說明。這樣，凡是參加生產而且獲得一種價格的，也就是說，凡是出現在市場上的任何生產要素，事實上一定已經作出了貢獻，這和消費者對於他的勞務所直接間接支付的价值是同義語。不僅紡織工人的勞動，織機所用的羊毛，機器的損耗，就是稀少資財^①的貸放，都代表着對於生產過程所貢獻的價值。甚至像“字號”，時間和擔當風險這些東西，也都可以代表價值的貢獻；因為所有後者都包括在對於生產極其重要而又稀少的一切條件裏面。如果一種東西獲得一個價格，它在事實上就提供了一種服務；所有貢獻出來的各種價值的總數（至少在競爭的情況下），必須等於最後所獲得的價值；而關於“剩餘價值”的全部探討，也就變成沒有意義了。

但是這種探討之所以變成沒有意義，是由於問題說明的形

① 指土地、資本等。——譯者

式，而不是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某些实在的东西没有关系。实在說，成本和剩余的概念，不只是抽象的范畴，某种思想方式的产物，而是当政治经济学还在它的纯粹叙述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包括在我们经济研究中所遇到的、最早而且也是最基本的概念里面了。只要成本和总产品都可以用同样的东西来代表，即使不用价值学说，这种概念也是容易表示出来的。在一个农场上，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谷类，是用作人和动物的食粮的，还有一定数量的种籽播种在地下。到了季节完了的时候，谷类的收获超过生产上已经用去的谷类的数量。这个差额表现为剩余生产物或纯生产物，这就是重农学派把它看作是社会的鲜血和一个特定社会所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的决定因素的那样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用在织机上的羊毛和供给纺织工人的面粉，以及结果所得的布匹的话，最初和最后的数量的差额，就只能用价值来表示。这就立刻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价值差额的存在，而且如果它继续存在，它的原因又何在？为什么竞争没有能提高各组成元素的最初价值，使它们等于最后的价值，或降低最后的价值，使之等于最初的价值呢？^① 这种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处理的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因为的确对于任何分配学说来说，都必然是这样。劳动价值原理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生产过程所作的最初的价值贡献^②，赋予这样一种数量的意义，使这种价值和产品的最后价值有所不同。作

① 例如，龐·巴維克在討論資本的“剩餘價值”的理由的時候，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為什麼競爭對於資本家份額的壓力，總不能強到一種程度，來壓低這個份額的價值，使它等於資本本身的價值呢？……如果會有這樣的事，那末，剩餘價值和利息都會歸於消滅”（“資本與利息”，第171頁）。

② 指勞動力的價值。——譯者

为一种成本原理，它用一些精力的消耗，来估计一种生产的贡献；这种消耗了的精力，是必须用人的活动来补充的。^① 如果补充消耗所必需的劳动或活动，少于包含在总产品中所体现的劳动，就会出现剩余。那末，这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剩余是否按照生产参加者在生产上所作贡献的比例（按每个参加者在所耗成本中的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还是某些阶级，虽然很少或没有对生产作出贡献，却能攫取这种剩余；如果是这样，究竟是如何攫取的，又是什么原因？这并不是在严格的科学定义范围以外的伦理的探讨。可是这种探讨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全部抹销掉。以后各章的论证的一部分，就是要说明，抹销这种探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重要原因的：这就是主观经济学，由于局限于需求和交换范围以内，除了假定某些必要的和稀少的生产要素的存在以外，对于生产活动的研究并没有作出什么假定。

^① 因为精力要用食物来补充，而食物的制造则有赖于人的活动。——译者

第二章

古典政治經濟學

古典政治經濟學曾經震動一時，而且對傳統的观念和傳統的實踐都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這是不足為奇的。在社會科學的思想史上，它的產生是劃時代的，因為它建立了一種概念，把經濟社會看成一種因果決定論的體系；這意思就是說，這個體系由它自己的規律支配着，根據這些規律，可以對各種事物作出計算和預測。這第一次證明，在人類事物方面也存在有決定論的規律，可以和自然界決定論的規律相比擬。政治經濟學在強調經濟事物的根本統一性的同時，又着重指出構成這種體系的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如果在這個體系中任何一點上導入一個變動，它就會在這個體系的其餘部分引起一系列相應的變動；這些變動可以根據最初沖量的大小而確定是具有一定形式和一定數量的。這些互相關聯的變動形式和數量（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就表現在古典派價值論實際上包含的各個公式所說明的一系列函數關係里面；因此，價值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的，而不只是附帶的特征。

這個理論不僅假定了相互依存的事實，並且還假定了某種形式的相互依存，它的意義在實踐上是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在消極方面，它意味着：某種方式的說明，並不足以解釋一種實在

的狀況，而政府的某種行動，也並不能達到它所預期的目標。在積極方面，它意味着：對現象的正確解釋，只限於和這些現象有直接關係的某些特殊原因。

在過了一個半世紀以後，現在關於這種經濟決定論的概念對於當時思想的巨大影響，以及它在經濟學說發展上所佔的決定性地位，都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忽視的趨勢。目前有一種傾向，就是忘却這個古典結構所包含的基本真理和這些真理在今天已經成為傳統的簡單推論基礎的重要意義；或者甚至作為經濟領域內任何決定論的思想和預測的基礎的重要意義。最近幾年來，我們發現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批評又已恢復，在某些地方甚至有破壞偶像的那種急躁情緒，要想把這個古典的結構完全推翻。對於已經僵化成教條主義並且成為辯護士思想體系支柱的概念所產生的這種反應，也有很多是活潑而健康的。沒有批評，思想就會停滯，而觀念也會萎縮為煩瑣哲學；在經濟思想的遺產裡面，確實也有許多是需要鏟除的。但是就某些現代的批評來說，急躁情緒似乎已經驅逐了辨別的能力；而且好像潛伏着一種危險，想拋棄所有古典的概念，認為都是不現實的假設的產物，同時對經濟的真理也加以排斥，而這些真理不僅對某一套的結論，而且也對經濟領域的任何預測，都可能是基本的東西。特別要指出的危險是，確實可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的某些持久真理，很容易與這些概念後來被更迂腐的人或更堅決的辯護士所篡改成的說法混淆起來。當這些古典的基石還沒有具有同樣價值的東西可以代替，而這個裂口甚至還沒有被人注意到的時候（似乎是很常有的事情），我們有理由擔心，這只是為一種經濟神秘主義掃除了障礙，使它在一種機會的領域之內統

治一切，在这个領域之內，只要制造必要的心情和期望的魔法師能出現，簡直任何奇跡都有發生的可能。這當然不是說，對古典學說的任何批評，只要它有用懷疑的態度來代替武斷的肯定傾向，就必須加以譴責。其實，這必然是任何批評在開始的時候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說，批評有兩種類型，它們雖然被解釋成相似的東西，却是應該加以區別的。有一種對政治經濟學的批評，不但保留了古典結構中代表着真理的重要成分的某些骨幹，同時也強調了另外的關係，因為這些關係能改變全部結構和它的要素，革新它們的實踐意義。我們就會看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屬於這一類型的。馬克思曾經引證古典政治經濟學，來駁斥蒲魯東(Proudhon)的各種曲解。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批評系把擯棄全部古典結構作為它的主要內容，而看不到有創造新的基本原理來補充它所清除的空隙的必要。這在大體上就是一種虛無主義的趨勢。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同時代的人來說，政治經濟學所假定的規律底統治力量，是使人難以置信的。對於無生命的東西所能相信的原理，到了社會的領域里面就難以想像了，因為各種事物都是人的活動和無拘無束的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認為一種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體系，可以不用集体的規制或單一的計劃，就能自己活動，乍聽起來似乎難以置信。顯然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體系，却說它是受一種規律的支配，這似乎是奇怪得使人難以相信的奇跡。無數獨立自主的意志之間的衝突，怎麼能產生一種秩序呢？經濟學家所提供的答案，是以競爭的事實為根據的。當賣主是在市場上活動的許多人中間的一個的時候，他的行動對於整個市場的情況來說，只能發生微不足道的影響。因此，他

不得不接受已經規定出來的市場價值，並根據眼前的價值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分開來看，每一個人都被市場價值所統治，而不是市場價值的統治者。所以如果他們都受到一種動機的驅使，就是要根據每人所處的情況，來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那末，他們就會照同一的方式，對價值變動作出反應。在整個市場上產生的結果，當然還是各別行動的總產物；但是這種個人行動，是在一種情況之下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個人的意志是沒有關係的，這不但是因為分開來看，它是無能為力的，也是因為就整個情況來說，它是盲目的。就是為了這個理由，市場才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支配着，這只無形的手強使每個人的手都為某一個目的服務，因而獲得的結果，與個人意志當初所想像和企圖的完全不同。這就是各個人的不道德的行為會綜合成公共利益的一種點金術。^①

但是這個學說所包含的還不止這種意義。它不僅含有一種假定，認為每一個市場上的個人是很多的，又是彼此互相競爭的，而且還假定各個人和各種物資都是流動的，各種價格也是具有伸縮性的（至少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和充分長的時期以內是這樣的）。因此，交換價值本身可以說是照某種方式行動的，也就是說，它們能遵守某些一致性並符合某些主要的關係。^② 這些支

① 本句含義是：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個人行為集合起來，就會對社會產生有益的結果，這正如點金術家能使普通金屬變成金子一樣可笑。——譯者

② 事實上，所有在這個情況之中的因素，都可以說是彼此“互相決定的”（馬夏爾在批評龐·巴維克的時候，就曾經着重指出過）。但是宇宙間的每一種東西，在某一刻的時間上，都可以說是這樣的。（像我們在前一章所說的那樣），這並不妨礙下一觀點的正確性，就是根據我們對於這種情況的知識和實踐來看，在這種情況之中，有某些因素是對所有其他變數的“關鍵”，因而

配的关系，就是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人和他所处理的生产物资，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流动，来寻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这种事实不仅可以保证，工资和利润会在整个工业范围之内趋于一致，而且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比例，也会和它们实际成本的比例趋于一致。后一种的一致，就代表它们的“正常的”或“自然的”价值。所以，交换关系反映着生产关系并且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于是，政治经济学主要地就成为生产的学说了。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表示的：“在原则上，那里没有生产物底交换——但是，那里有在生产中合作的劳动底交换。生产物底交换底方式依靠诸生产力底交换底方式来决定。”^③

这个观点中含有几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在古典经济的讨论中占着中心的地位，而且也是近来批判的特殊目标。第一，它意味着，从货币作为价值的标准和交换的媒介来说，它的数量和决定这些主要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无关。货币所代表的，既然只是为了计算或作为交换媒介的一种便利的交换技术，所以它和基本的生产关系无关，因此归根到底，也

可以单独提出来，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否则所有因果的说明，都将成为不可能。使人感觉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原因和结果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它们作为概念来说，只在应用于特定的个别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们如果从它们对于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上去研究这些个别场合，那么这些概念就混合起来，并溶化为普遍的交互作用的那种概念”（“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页）。这并不妨碍他指出（比方说），把历史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在历史上某一特殊场合的解释和预测基础的“优越性”。承认相互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作出因果的说明：这只是承认，任何这些说明，必须单独提出某些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在一定场合之下的最重要的因素。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页。

不能影响交换比例的体系。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既然最后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影响各种价格，所以就会使它们中间的关系保持不变；它只会一致地提高或降低所有东西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基本设备器材），并使它们之间彼此交换的比例保持不变。这个原理特别是被李嘉图用来驳斥过去认为利率决定于货币的充斥或缺少的概念（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也被萨伊(Say)用来驳斥“资本可以借信用的活动而增殖”的见解，他的理由是“资本是由物质要素中的实在价值所构成，而不是由绝对不能积累的非物质的产品所构成”^①。在说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命题的时候，可以将货币和需求的货币尺度加以抽象化。实在说，如果不能照上面的原则加以抽象化，古典经济学家至少要能另外介绍某些关于货币行为的充分条件作为数据，他们才可以作出像交换比例底平衡的那种假定。^②

第二，还有在萨伊的有名的市场规律里面所包含的那种原

① 萨伊：“政治经济学”（1812年版），第2卷，第145页。在这部书的第一版（1803年）里面，他曾经攻击过洛克（Locke），因为洛克说过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来决定的话。

② 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第13章里面，对于这个学说的否定，当然可以对还有资源未加利用的那种情况适用，因此在需求增加的时候，就有可能改变生产的数量。在他的第14章的附录中，他说，假定有“适应性的货币工资”（flexible money-wages）的话，它可以对长期的平衡适用。应该注意到，照他的命题，即 $M=L(r)$ （这里 M = “货币总额”， L = 灵活偏好， r = 利率）， M 的定义是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也就是和劳动力的价格成比例），所以这个公式包含工资和价格与 M 成比例地上涨的那种情况。这个公式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当生产要素的供给具有弹性的时候， M 的增加就能通过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来改变产量，而不是价格。但李嘉图学派也有忽视这种可能性的充分理由，因为那时工厂工业还在萌芽时期，生产设备的长期储备尚未具有像今天这样的规模。

理。虽然历史曾經赋予这个規律以薩伊的名字，可是这个原理的闡述，可能和詹姆士·穆勒 (James Mill) 也有同样的——或者更多的——淵源；它是由李嘉图倡导起来的，因此在李嘉图学派的著作里都貫穿着这个原理。^① 主要的意思就是說，既然交換是一种双方面的程序，所以根本上可以看作是兩組生产者之間的一系列的交換，其中的一組用它的产品和其他一組的产品来交換，因此永远不会发生产品的普遍或全面过剩的問題。可能会有某种产品的过剩，因为吸引到这方面来生产这种产品的社会劳动力量已經相对地太多了，这也是事实。这种情况会在这些商品的价格跌落到“正常价值”以下和生产者向其他工业轉移这两方面表現出来。但是如果生产的增加普遍到各工业，那就不会有什么过剩（假定这种增加能有“适当”的比例），因为生产者之間所有两方面交易（交換就是通过这种交易）的双方都会用同样的速度增加，而且一方所增加的交換产品的欲望，会和另一方所增加的欲望取得平衡。詹姆士·穆勒把这件事說得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商品的生产，为它所生产的商品創造了市場，而且是創造这个市場的唯一的普遍原因。……一国的购买力，可以由它的年产物精确地衡量出来。你所增加的年产物越多，你通

① 在薩伊的“政治經济学”第一版(1803年)里面，論市場那一章(第1卷第22章)所占的篇幅不过三頁，这是集中来駁斥重商主义认为市場在于貨币的充足，以及财富的增加是依靠輸出的增加的那种見解的。这个学說的未来发展的萌芽包括在下面一句話里：“使銷售容易的，并不是貨币的充足，而是其他一般产品的充足”(第153頁)。該书第二版到1814年才出版，在那里面，他又重写了这一章，并把它扩充到16頁(第1卷第15章)。同时，詹姆士·穆勒的“为商业辯护”一书已經在1808年出了二版，在那里面对这个学說又作了更詳尽的發揮，并且強調它对生产过剩問題的意義。但是李嘉图总是把这个学說归功于薩伊。

过这个行动所扩张的国家市场也就越大。……一国的需求总是等于一国的生产物。”^① 薩伊曾經說过：“为产品創造需求的，就是生产。……說銷售的停滯是由于货币的缺乏，那是把手段誤为原因。……銷售的停滯，不能說是因为货币的缺乏，而是因为其他产品的缺乏。……某种产品一經創造出来，从那时候起，它就根据本身最大的价值为其他产品提供了市場。因此，这个仅仅創造一个产品的条件，就立刻为其他产品开辟了一条出路。”^②

初看起来，这样一种論点，似乎是很武断的教条，和实际事物并没有什么关系。供給和需求永远不会不等，因为它们下了使它們能够相等的这样一种定义！可是只要这个原理意味着描述具有这种特殊类型的相互关系的經济社会，它就不是一种同义語的重复；而且就这种性质来看，它可以說是李嘉图学說体系的精髓。正因为我們认为货币在决定交换价值上是无关重要的，所以根据同样理由，我們也不把“需求量”（作为一个絕對的数字来看）看作决定生产和交换过程的一个因素。我們只要把經济过程当作一个統一的整体来看，那末，作为这个问题之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的“市場”就会立刻消失。这样，需求就成了一个因变数，而不是一个自变数。当然，如果分开来看，每一次交易总是有两个項目的：供給和需求、貨物和货币、生产者和市場。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結論，认为这同样的两个項目，在从整体

① “为商业辯护”，1808年版，第81、83頁。

② 薩伊：“政治經济学”，佩林賽尔譯，1821年版，第1卷，第165、167頁。薩伊甚至說（这是完全另一回事）：“如果生产能任其自由发展，某一种的生产便很少会超过其他的生产，并使它的产品价格不成比例地跌落下去。”他的譯者又加上一句：“只要消費是自由的，就没有可能使生产超过消費”（“政治經济学”第169、178頁）。

来看的情况之下，也必定表现为独立的因素，那就犯了以分立概括结合的錯誤；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单一的交易只是一对交易的一半，在这一对的交易里面，用货币表示的“需求”或“市場”是以一个公項的資格出現的。照馬克思后来所說的^①，交換主要是一系列 C—M—C（商品——货币——商品）型的交易，其中系以货币作为各个交易之間的簡單媒介，因为这些交易基本上只是一个。

第三，还有約翰·穆勒的“对商品的需求并不是对劳动的需求”的論断。史蒂芬（L. Stephen）认为“对于这个論断的充分理解，也許就是对一个經濟学家的最好的考驗”。約翰·穆勒本人把它說成是“一种和一般意見不同的說法，这种說法甚至在具有声望的政治經濟学家里面——除了李嘉图和薩伊以外——也很少有人能始終注意到”。“商品的需求决定劳动和資本应该用在哪一个生产部門；它决定劳动的方向；但不是决定劳动本身的多少，或决定对于劳动的維持或报酬的多少。这些都决定于直接用以維持或酬报劳动的資本或其他基金的数量”^②。“对劳动的

① 馬克思說，这对于“簡單的交換社会”（即小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來說，是与事实相符的。我們将会看到，他还說过，到了資本主义經濟，就引进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动；这种經濟的特点表现在有一个階級的存在，这个階級所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按 M—C—M'（其中 M' 大于 M 的数量等于利潤率）公式把資本投入一系列的交易。这就把一个障碍物引到交易过程的表面的統一性里面，因而有可能造成破裂，把这个过程分裂为两个部分。

② “原理”，亞胥黎（Ashley）編，第 79—80 頁。耶芳斯曾經攻击这个学說（“經濟学原理”，第 126—133 頁），认为它系由李嘉图的“原理”第三版創始的。但李嘉图在这里所說的是，对劳动的需求系决定于消費者的支出方式（由于在不同行业之中，劳动对資本的比例有所不同）。这是对約翰·穆勒意見的修正，而不是在穆勒之前說了这句话（見李嘉图：“原理”，第 3 版，第 476 頁）。

需求”这句话，照约翰·穆勒的意思，自然并不是指用货币来表示的需求，而是指用商品来表示的需求；换句话说，他所想到的是决定实际工资的需求，而不是决定货币工资的需求。如果说，作为消费者货币开支总额的“商品需求”不能永远影响交换价值的比例，包括劳动力交换价值的比例，那就等于重复上述两个原理的前一原理，虽然是用某一个实例来表明的。约翰·穆勒在他的命题里面显然还包含着别的意思；而且当他说到“对商品的需求”的时候，他指的纯粹是一种相对的意义——就这个场合来看，这是唯一可能有的另外一种意义。如果是用在这种相对的意义上的话，他的目的显然不仅包含一种意思，就是某种商品的需求和另外一种商品的需求比较起来，并不会对工资水平发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也包含一种意思，就是消费者用在购买一般商品的货币数量，如果和他们所节约的数量比较起来相对地增加的话，这并不会增加劳动者所获得的那部分产品，而会适得其反。这两种意见的前一种，是大家所熟知的古典学说的重述，就是认为需求的情况对于产品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没有关系的（除了它可能加速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因而提高生活费用的那种关系）。像李嘉图的很多理论方法一样，这是根据一种特殊的假定的：就是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在各工业中都是相等的。如果没有这种假定，这个说明就失去了它的效力。但可以认为它含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除非需求的转移对于使用劳动较多或较少的各生产部门（也就是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或较低的那些工业）有加强原来趋势的重大影响，这种变动是不能认为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决定有关的。

可是第二个意见（关于所得的用去部分与储蓄部分的比

較),是与对于資本的性质和劳資双方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的一种特殊見解有关的。这里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将在后面一章另行討論。但是既然古典經濟学家慣于把資本当作主要是“对劳动的墊支”,那末,这个意見就有一种簡單而且(在它的範圍內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工資水平是由当作工資基金来看的、与劳动者供給量成比例的資本数量来决定的。既然增加所得的被用去部分会使資本积累减少,那末,正确地来看,对劳动者的需求也势必因此减少,而不致增加。①

最后还有一种原理,李嘉图曾經把它看作是他的价值学說的突出的推論。这个原理被总結在一句話里面:“如果工資上漲,利潤就会下降。”孤立地来看,這句話常常被人嘲笑是同义語的重复。这个說明原来所要包含的事实,在李嘉图的另一个說明里面有更充分的解釋,就是“利潤是由工資的高低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其他东西来决定”②。換句話說,利潤只由劳动力价值与一般商品价值的比例来决定,而且这两个数量可以不受彼此的影响而独立地运动。这种关系虽然不是精确地等于(由于地

① 当然,这种在用錢上的变动,有可能造成“积蓄”金錢方面的相等和相反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造成資本积累的变动。但这种积蓄,古典經濟学家显然(他們很少这样說)只当作从流通中撤回貨幣,它所产生的影响等于貨幣数量的变动;就是对所有价格有同样程度的影响。

② 李嘉图所用的“高工資”和“在全部生产物当中,必須用来維持工人的那一部分所占的百分比比較高”是同义語(“关于馬尔薩斯的筆記”,賀兰特尔和格里高雷合編,第134—135頁)。詹姆士·穆勒說,如果利潤是用来“指明价值的比例(即利潤率),那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意义上的利潤是完全由工資来决定的”(“政治經濟学”,第58、59頁)。我們稍后将会看到,馬克思用“資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加以修正的,就是关于与利潤总额有别的利潤率的后一說明。

租关系),但差不多等于社会上必须用于生产工人生活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劳动力量。^①这个命题不仅对于李嘉图由他的经济学說里面所得出的結論來說,而且对于今天实际上看作是已經确定的原則的某些补充命题來說,显然也都是很基本的东西;要是沒有这些命题,经济学家就好像阿丽斯在鏡子里所看到的那种世界一样。它的含义是,利潤率(作为“各种价值的比例”)既不能靠貨幣数量的增加(除非是暫时的),也不能靠消費的增加而提高,像馬尔薩斯所說的那样。李嘉图用这个理論来論证(和亚当·斯密的說法相反):只有在国际貿易的擴張能使工人生活資料低廉,因而降低工資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利潤率。^②馬克思曾經用这种說法,来駁斥蒲魯东的主張,蒲魯东认为工資的上漲将会引起商品价格同样程度的上漲,所以工会主义只是自己追自己的尾巴,永远追不上。它和許多其他的論点,在經濟理論中比較,究竟占什么地位,可以从这个事实来判断:如果它是不正确的,那就沒有理由可以作出結論,认为工資水平的提高势必鼓励机器的使用,而工資下降就会不鼓励人們使用机器。^③因为如果劳动的价格可以上漲,而不致引起利潤率(当作資本的报酬来看)下跌的話,那末,机器的成本将和雇佣劳动的成本一同按比例提高(由于用来制造它們的劳动力的漲价);而且机械化方法的成本,将和完全依靠直接劳动的那种方法的成本照同样的速

① 当庇古教授在他的“失业論”里面,用他所謂工資貨物的工业和非工資貨物的工业中的劳动量,作为基本的决定性关系的时候,当然他所用的概念,和李嘉图的概念是非常相似的。

② 参閱本书第 190—191 頁。

③ 魏克賽尔:“讲演集”,第 1 卷,第 100、167 頁。

度增长。但是这样的結果，需要物价和工資同时增加，而古典經濟学却假定这样一种情况：工資提高并不会引起物价同样的上漲，因而促成利潤的下降。事实上，它还假定：由于工資上漲，某些价格实际上将会下跌，虽然其他的价格都在提高。跌价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包含很少的直接劳动，而需要比較大量的資本來制造的那些商品；而且这既然是节省劳动的机器底主要特点，购买和使用这种机器就会得到特别的鼓励。^①

但是这些原理，主要是附屬在政治經濟学的一个中心論点上的，这就是放任主义的大原則。作为一种理論体系的政治經濟学的显著統一性，在这里轉变成一种实用学說的一貫体系。这里抽象原理被用实际政策裝飾起来，同时世界事物的系統解釋同具体建議和行动溶合在一起。政治經濟学已經創立了一种經濟社会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受它自己的規律的統治。这些規律發揮着作用，这个体系“自发地进行着”，而不受政府的照顾以及君主和政治家的任意支配的影响。过去认为要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国家的管理是主要的，現在則认为不必

① 凱恩斯曾經說过（“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第191頁），在这些古典的問題的說明当中，有許多是以“充分就业”的假定作为必要条件的，因此不能适用于产量变更或失去平衡的情况。所以有一些問題的說明，在資源尙未利用的情况之下，需要加以相当大的修正，这的确是正确而且重要的；例如，貨幣需求的变动就能改变总产量，而不单单在物价的改变上发生影响。但似乎不能就因此推断，这些古典的問題的說明，不能应用在现实的世界，除非假定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资源的供給都永远具有无限的彈性。看来似乎很清楚，古典經濟学家所要假定的，是走向充分就业的那种趋势的存在。因此，他們认为他們对問題的說明，是能确定长时期經濟发展的限制因素的。这些古典的問題的說明中的某些說明，也是由其他假定——影响这个体系的稳定性的假定——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們在第6章里面还会讲到。

要了。这种假定的理由是，政府的管理绝对有害，因为它会阻碍经济力量的正常作用，会使本来可以实现协调的地方产生不平衡，但它不能证明它所得到的结果会更符合一般的利益，而是适得其反。一种关于这个体系如何运动的假定，事实上变成应当使它怎样运动的一种假定。的确，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最后证实，放任主义会在人类幸福上产生最圆满的结果。这到半世纪以后，才由效用原理用享乐主义的词句(十分荒谬地)表达了出来。这些经济学家满足于这样一种主张：作为生产和增加财富的一个条件来说，放任主义是最优越的；这是他们特别喜欢采取同国家补助的垄断企业或国家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相对比的方式来证明的一种主张。人们很容易相信，如果一种体系能凭它的各因素的内在一致性获得平衡，那末，放任的结果一定比无知的干涉为佳。总而言之，在深信凡是表现为受“自然规律”所统治的任何东西都是半出天意的一个时代，这是必然会受人欢迎的一种信念。

与这种实用的学说有密切关系的，是批评底刀锋的另一面；政治经济学就用这一面转过来攻击当时的政策。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生产学说，所以含有一种意思，就是一个对于物质商品生产没有积极关系的消费阶级——这个阶级只会提取收益，而没有作出生产贡献(指负担作为等值来看的一些“实际成本”)——在经济社会上，也不会起积极的作用。这种阶级的存在，是对财富的消耗，而不是创造财富的助力；而且只要它的势力支配着国家的议事机关，它就会成为一种桎梏和障碍。至少在李嘉图的传统之内，政治经济学是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地主利益集团的，因为地主利益集团支配着当时尚未经过改革的议会，又用济贫区

制度^①和工資補助稅制度限制了勞工的移動，並且維持谷物法，來保護谷類的價格和地租。除勞動以外，生產上唯一積極的要素就是資本，因為它用資力來促進技術和分工的進步。^②工資養活了工人和他們的後代，而利潤就是勤勉階級的資本積累的源泉和刺激；這個階級和工業密切聯繫着，並且在工業當中找到它的興趣和名利的中心。地租則不然，它是稀少的自然資源的產權價格；也就是從生產的果實中，攫取一部分來維持一個消極的和生產的階級。李嘉圖說過：“在任何情況之下，地租都是原來由土地上所獲得的利潤的一部分。它決不是新創造出來的一種收益，而總是已經創造出來的收益的一部分。”^③只要這個階級是節儉的，並能積累它的地租作為工業的資本，那末，這種支出雖然可能未加利用，也沒有害處；它將作為新的資本而被投入生產，來滿足新的生產循環的資金需要。但從它的本質和傳統來看，這個階級是不會像工業資產階級那樣願意這樣作的。如果他們進行投資，他們很可能會更願意投向政府的公債或壟斷的貿易公司而不是工業上面（不是有一個像勞德達耳[Lauderdale]勳爵這樣的一個作家，曾經為國債的存在辯護過嗎？理由就是能為這些資金作穩健的投資）。而且既然地租是用來維持這個階級的安逸以及家業和奴僕，它就代表着一種維持不生產的消費而

① 濟貧區制度是指十八世紀英國所實行的濟貧法，根據這個法律，凡是失業或赤貧者，當局有權強迫他回到原出生地區，由該區保衛局負責他的生活，雇用他勞動或把他介紹給當地僱主。——譯者

② 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3版）里面談到“兩種生產要素：一種是主要的，另一種是次要的”，這就是勞動和資本（第84頁）。但地租“完全可以認為是資本和勞動的生產活動的報酬以外的某些東西”（第68頁）。

③ “谷物價格的降低對於資本利潤的影響”，1815年版，第15頁。

压在生产体系上的重担。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类的实际解释——即使是用更抽象的分析方式——究竟注意到什么程度，我想也是很少有人正确理解的。威廉·斯宾司(William Spence)——詹姆士·穆勒就是为反对他而写了“为商业辩护”这本书——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前提，所以消费的支出有利于国家的财富，他就拿这个作为主要理由，来为地主阶级辩护。在1808年，他这样写道：“因此可以明白，地主阶级的责任就是消费，而不是极端的节省，而且国家财富的生产就是由这个阶级能否尽这种应尽的责任来决定。……为了维持社会繁荣的经常增长，绝对必要的是，这个阶级应当不断地增加消费。”^① 马尔萨斯也倾向这个意见；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学说显然指向一个结论，就是不应该把地主看作是不生产的消费者而加以谴责，而应该看作是健康社会的必要平衡中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工业家的积累本能和消费阶级为它的产品所提供的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和这个观点相反的原理，则认为需求与价值的决定无关(因此也与利润的决定无关)，生产过程能创造它本身的需求，而且这种创造的行为是极端的节省而不是消费；这就针对上面的意见，直接提供了一个争辩的武器。而且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年代里，被每一个经济学教师所驳斥的，就是这个认为富者的消费对于工业有利的古典邪说。同样的情形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许多其他争论也都和这个中心问题有直接关系。马尔萨斯所写的“关于地租性质和发展的探讨”(1815年)这篇文章，主要就是为了否定“某些现代作家”的如

^① “英国不依靠商业”，第36、37页。

下見解，这种見解认为“地租在它的性质上和它受制約的規律上，都非常近似价格超过生产成本的余額(此即壟断的特点)”，同时也是为了表明高額地租(或者产生高額地租的那种情况)是改良土地的一种助力。^①在他們討論农业进步对地租的影响的时候，李嘉图提出的理由是，农业进步会使地租下降(因而違反了当作一个階級来看的地主利益)，另一方面，馬尔薩斯却认为这会使地租上漲。^②

作为同时反对专制国家的独裁主义以及地主貴族的特权和势力的一种批判，政治經濟学在它的初期，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作为一个原来缺乏一貫原理的科学部門內的思想系統化者来看，政治經濟学的来临是一个惊人的启示；而作为經濟領域內的一个自由維護者来看，它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影响，并不亚于大陆上燃起自由火炬、倡导政治权利的那些哲学。只有到后来，在李嘉图以后的时期，它才从譴責特权和限制轉而为所有制辯护。在政治經濟学的概念之中有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价值关系是由作为生产者的人們的关系来决定的；另一个是，分別什么对生产需要和什么对生产不需要，这是應該由人类的具体活动来决定的。这些生产上的制約关系就是在一定的需求和技术的情况之下，社会分工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究竟这些关系是否可以正确地看作基本的关系，当然完全是一个实际的問題。但是新兴工业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所以強調这一点，是

① 馬尔薩斯：“关于地租性质和发展的探討”，第2頁和第27—30頁。馬克思曾經把这篇文章称作“一个辯护地主，反对产业資本的小册子”（“剩余价值學說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頁）。

② 參閱“李嘉图致馬尔薩斯书信集”，鮑奈編，第94頁以后；馬尔薩斯：“原理”，第205頁以后。

可以由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所負的任务获得明白的历史解釋的，这个阶级观察社会变迁过程的观点使它必然会获得这个基本而现实的概念。但是这个历史的理由同时也含有一种限制。包括在社会上人們生产关系里面的，还有資本家和劳动者之間的阶级关系。这种政治經济学只是假定有这种关系而沒有进行深入研究；只止于叙述这种阶级关系并把它包括在政治經济学条件之内而未进一步加以分析；把阶级的划分不是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是只当作在自由社会中分工所自然形成的一种形态，而不是作为特种类型的历史产物。这些經济学家并沒有考虑到，这个独特的关系的特点可能会影响它們的經济規律的运动方式，而且可能会根本改变根据这些規律所作出的解釋和預測，因为他們沒有認識到这种关系的本质。我們將要看到，他們的后继者更远离了而不是更接近了这种認識，他們的傾向是，把作为生产者的人們之間的那些关系愈来愈棄置一旁，或者至多保留着这些关系的前身的虛幻鬼影而已。

第三章

古典政治經濟学与馬克思

在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經濟学家所进行的分析，只揭露了問題的一半。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某一重要段落里所說的，他們只是表明在和資本主义以前时期对比之下的它的积极的一面。在說明放任主义規律的时候，他們对以往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批判，但他們沒有对資本主义本身提出一种历史的批判。如果不把資本主义当作一种稳定的、永恒的自然秩序，或是当作社会发展的、不变的最后阶段，那末，后一任务还是需要完成的。这一任务之所以需要完成，就是因为要在历史的进化中給資本主义一个适当的地位，并且为未来的預測提供一把钥匙。恩格斯說，現在的經濟科学“从批判封建生产形式的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們为資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的必然性，然后从正面——就是說在其还是有利于社会的一般目的範圍內——闡发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换形式的規律”。同样必要的是，按照“社会主义的观点，去批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辯证地完成政治經濟学；就是說从反面闡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規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本身的发展，迅速地接近这样的一点：就是它自身不可能再存在下去”^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頁。

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對於當作一種收入范疇來看的利潤作出精確的解釋。這些經濟學家假定了調節商品交換價值的各種條件。他們用成本學說來加以說明；而且他們也提出了實際上就是關於勞動力本身價值的一種成本學說。利潤於是就當作一種剩餘的數量，它的大小是由其他的特定因素——產品價值和勞動力價值——來決定的。如果單就這些來說，這種說明似乎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但是事實上，它是非常不完全的，因為利潤只是當作一個剩餘的要素，而沒有加以說明。利潤的性質和它作為收入的一個范疇而存在的根本原因，還是一個秘密；在這個秘密沒有被揭開以前，不僅重要的實際問題沒有得到答復，就連這個關係中的各個項目，雖然說可以決定利潤（即工資和產品價值），但究竟能否看作是獨立的因素，也還是不能確定。在地租理論方面，可耕地的有限來源以及因而產生的缺乏現象，被他們拿來作為地租的產生和由地主占有的理由。古典學說並沒有引證相似的理由，來說明利潤的產生以及被資本家所占有的原因。他們只是假定了它的必然性。有一個問題依然存在：即使可能在產品價值和生產費用之間存在着一個差額，為什麼這個差額應該歸資本家和他的同伙所有，而不歸其他人所有呢？為什麼在一個經濟自由和競爭的制度里，這樣一種剩餘不會消失在地租或工資里面呢？如果它的繼續存在，可以用成本學說來說明，它又怎麼能和勞動價值學說相符合呢？或者它是否可以用類似地租學說的論點去解釋呢？我們從這種研究所能解決的這類實際問題的重要性來看，就知道這不是一種多余的研究：比方說，假使對利潤課稅，或者撥作別用，或者假使工資上漲，侵占了利潤，再或者假使利潤率由於某種理由而趨於下跌，究竟會有什麼

影响？是不是維持資本家階級，會變成對工業的一種非生產性的負擔，正如李嘉圖學派對地主階級的存在所斷定的那樣呢？這個階級既然對利潤感到興趣，它會不會和地主對地租感到興趣一樣，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呢？

這些經濟學家，特別是李嘉圖的繼承者，看到了他們論點的這種漏洞，所以就從兩方面來發展對利潤的說明：一方面，他們發明了“實際成本”這個新的範疇，作為利潤的等價物；另一方面，又用他們所臆斷的資本特殊“生產力”來作解釋（因此從歸屬方面來說，當然就是它的創造者資本家）。正是這些膚淺而矛盾的學說，才是政治經濟學在李嘉圖以後趨於衰落的主要證明，雖然許多評論家都不承認有這種衰落；也就是這些學說，才使馬克思加給它“庸俗經濟學”的稱號。正是對這些概念，馬克思集中他的火力進行了猛烈的攻擊，特別是龐·巴維克稱作馬克思對資本生產力學說的那種“有力的攻擊”^①。馬克思認為產生利潤的原因，並不在於這種資本本身的固有性質，也不在於資本家所貢獻的任何實際成本或生產活動（並不比根據自然特性或地主的任何活動來解釋地租的方式強），而是在於現實社會的階級結構。——這就是說，在政治經濟學各種規律所由以構成的平等、契約自由和“自然價值”等等詞句背後卻劃分成無產者和被剝奪的階級。

根據馬克思的歷史觀點，不同的階級制度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進步階段，每一種制度都產生過當時的技術條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同時又被它們所制約。根深蒂固地建立在

① “資本與利息”，英文版，第173頁。

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当时生产资料的关系上的阶级冲突，一直是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动力。从对它的根源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也是一种阶级制度，虽然在各主要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但是它还是一种根据二分法——占有的主人和被剥夺的隶属者——的制度。马克思从这种阶级关系的特点上找出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有规律的运动的关键——就是要在单纯分析自由市场交换关系时似乎感有的经济协调的薄幕后面找出不平衡的所在、运动的趋势以及在它的基础以内而不仅在它的基础之上的运动趋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和权利平等比起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和契约自由比起来，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的依赖和强制。

很明显，利润的产生关键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必然同以前的阶级社会形态中的所有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奴隶主和奴隶，或封建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基本的类似之点。在这些前期的社会形态之下，关于这种关系的强制和剥削性质，或者关于占有阶级的收入的性质和来源，都没有什么疑问。这个占有阶级，凭借法律和习惯，侵吞了超过它的劳动者底最低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这种关系也曾经根据实际情况见诸明文记载。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不是这样。这种关系完全成了一种价值的形式，并没有剩余产品而只有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可以假定，是被竞争市场上起着作用的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在这个市场上，正常的交换都是等价物对等价物的交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呢？既然价值理论本身也是自由竞争市

場活動的一種抽象說明，又怎麼能使剩餘價值符合這種學說呢？自由市場的交換公式是：C—M—C（商品——貨幣——商品）。似乎沒有人可以不先提供一種商品，作為某些相等的商品價值而能換到一種貨幣收入。買主和賣主在一個市場之內以及在各市場之間的自由移動的可能性，保證在這個交換循環的任何一半上——既不能在C—M（商品——貨幣）的一半上，也不能在M—C（貨幣——商品）的一半上——不會產生任何剩餘價值。那末，一個階級又怎麼能從貨幣出發，也就是從一定數量的貨幣資本出發，並把它加到交換的循環裡面，而能提出比它原來更大的價值，像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呢？馬克思說道：“要說明利潤底一般的性質，必須從基本理論出發，就是平均起來，商品是按着它們的真正的價值出售的，利潤是按商品底價值出賣商品得來的。就是說，以商品中所實費的勞動量為準則出賣商品得來的。你們如果不能在這種假定之下解釋利潤，那你們就完全不能解釋它。”^①對於別人勞動的都德王朝的壟斷或封建留置權^②，已經不能再用來說明，一個階級究竟用什麼方式取得收入而不提供任何生產的活動了。靠機會或個人欺詐手段所得到的利益，不會在一種“正常價值”的制度內發生永久的影響。在契約自由的秩序之下，生產者普遍地、永遠地受不

① 馬克思：“價值價格與利潤”，三聯書店1950年版，第45頁。他在这里也說到奴隸制度與工資制度的比較：“在工資制度的基礎上，即使無償勞動，好像也是有償勞動。與此相反，對於奴隸來說，即使那有償部分的勞動，也好像是无償的。”在前一種情況之下，“整個交易的性質，完全被合同的介入和周末所發的工資掩蓋過去了。”

② 都德王朝的壟斷指都德王朝往往把某種商品的專賣權給予和朝廷有關係的人。封建留置權指封建主有權扣押欠債人的財產。——譯者

生产者的欺騙，似乎是不可能的。这至多只能說明整个資本家階級中的个人得失；某一个个人的获利，就是另一个人的損失；它并不能說明整个階級的所得。所以像西斯蒙第 (Sismondi) 那样簡單地把利潤說成是“对工人的敲詐”，企业家取得这种利潤“不是因为企业的生产多于他所用于企业的，而是由于他没有全部付出他所应付的，因为他没有付足工人的充分报酬”^①；或是像勃雷 (Bray) 对利潤的叙述，把它看作“不相等的交換制度”的产物^②，这都是不充分的說明；它没有对中心的问题提出答案，而且也仍然没有解决其中的矛盾。

詹姆士·穆勒的确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工资制度与奴隶劳动的类似性。他提出了一个疑問，“那种依賴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占有奴隶）而从事活动的人，他的情形与奴隶主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他同那些借着奴隶来活动的工場手工业的业主一样是劳动的占有者。唯一的不同，就是购买劳动的方式不同。奴隶主一次买进一个人以后所能操作的全部劳动，而那支付工资的人，只购买一个人在一天或任何規定時間內所能作的那些劳动。既然像奴隶主是奴隶劳动的所有者一样，他是用工资所购买的劳动的所有者，那末，这种劳动所制成的产品，以及他的資本，也都是屬於他的了。”^③ 但詹姆士·穆勒对此問題只討論到这里为止。在馬克思看来，这只是一个重要問題的開始。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在于劳动和劳动力之間的那种他认为十分关键性的区别。資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根源，正是在于把人的生产行为本身也轉化为一种商品。劳动力成了某种分离出来的、可以买

① 西斯蒙第：“新原理”，第1卷，第92頁。

② 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助的方案”，第50頁。

卖的东西，而且它本身也具有一种价值。既然无产者已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工具，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途径；而且迫使他为别人劳动的合法强制虽然已成过去，可是阶级环境的强制却依旧存在。既然劳动者个人（至少在沒有組織和团体的时候）已經沒有可以选择的第二个价格，或“最低拍卖价格”，他所售出的商品，也同其他商品一样，获得等于創造这种商品所消耗的劳动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資料的时候所需要的劳动来决定的。因此，利潤产生的原因，不应归于資本在本质上的任何增殖性，而应归于历史所决定的一种事实，就是活动中的劳动能够实现一种价值更高的产品，它高于（以所包含的劳动量为定）人們对劳动力本身当作一种商品来估計的价值。所以劳动者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易既是而又不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換。在劳动力被看作是商品的那种社会基础上，就发生了一种等价物的交換，它滿足了价值規律的条件：資本家預付給工人生活資料，然后获得市場价值相等的劳动力作为报酬。資本家获得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在交換中得到足以补充他自身由于为資本家劳动而产生的物质損耗。經濟的公平固然是滿足了，但如果沒有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存在着仅仅为了生活就必须將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工人阶级，使資本家有可能得到这样一种有利的

③ “政治經濟学原理”，第 21、22 頁。并参閱理查·琼斯(R. Jones)：“政治經濟学讲演集”，1833 年版，第 58、59 頁。但这个“唯一的区别”既可以使雇佣劳动者在經濟上比奴隶的地位稍好，也可以使他在經濟上比奴隶的地位更坏，因为如果劳动者不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对劳动者的保养，就沒有长远的兴趣（劳动的損耗以及由于貧穷而引起的贬值并不是像雇主的机器損耗那样当作他的成本来看）。所以雇主对待一个自由劳动者很可能不如他对待一匹馬或一个奴隶那样关心。

交易，那末，資本家就不能將這種剩餘價值據為己有。

勞德達爾和馬爾薩斯根據資本生產力所提出的相反的解釋，不是陷入神秘主義的復轍，就是回到馬克思和李嘉圖所共同譴責的單純用“供求”來說明問題的膚淺作法。^①馬克思從來就沒有想否認資本——或不如說體現着積蓄勞動的具體工具——是能創造財貨或“財富”的；如果把它否定了，那就会大錯而特錯。事實上，他還明白指出：“把勞動說成財富的唯一來源是錯誤的。”^②李嘉圖也同樣沒有否認過，即使未耕種過的土地也能產生各種效用。但這並不是說，土地或資本是能生產價值的。事實上，自然賦予土地的果實越豐富，這種果實的价值就会越小，而土地產生地租的機會也就越小。馬克思曾經着重指出，價值不是各種物品的神秘的內在屬性；它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係的表現。它是通過在整個社會的勞動分工過程中，生產各部門之間所發生的支配人類勞動的形式和方式，而賦予物品的一種屬性；而且這種社會勞動力的支配並不是用任意武斷來決定的，而是以通過亞當·斯密所謂的競爭力量“無形的手”而形成的一定生產費用規律為根據的。所以用一種對象（資本）的某些性質來說明剩餘價值，是重踏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李嘉圖以後的“庸俗經濟學”愈陷愈深的萬物有靈論的一種——的復轍。這就是把交換關係的原因，照萬物有靈論的說法，歸屬於抽象的物，而實際上這種交換關係只是人與人之間的各种社會關係的共同結果。這等於完全用木偶的性質和行為，來說明一出木偶戲的演出過程。“那只是人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

① 參閱本書第8—9頁。

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頁。

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采取了物間一种关系的幻想的形态”^①。“从表面看来，其存在是和潜在的关联及媒介的中項相分离的。因此，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資本成了利潤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資的源泉”^②。照这种意义來說明問題的政治經濟学，把那些从各个人以及这些人的階級条件抽象出来的各种对象的特性，作为經濟学的常数，就只能处理表面現象，只能对現象作出部分的分析，因此它所假定的規律和趨勢，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自行矛盾和虛假的。在这样一种抽象化的水平上，就不可能有区别性，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区别事物的性质系包括在这些假定里面。生产的各要素，完全看作是各个对于全体以及各个与各个之間，在技术方面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抽象化就产生一种假設的证明，表示在它們之間存在着基本的协调。毫不奇怪，在这样一种水平上的推理，是不可能产生地租和剩余的概念的，而且等价物一定会和等价物交換的，因为情况既是用这种方式來說明，所以結論必然如此。

也許可以引证一个最近的例子，說明如果使交換关系脱离作为生产者的人、脱离人和社会制度背景之間的关系，而加以抽象化，就可以使某些基本概念失去任何意义。巴列托(Pareto)曾經指出：“人用于生产或改变經濟財貨的活动”，与“用于占有別人所生产的財貨的活动”是有显著区别的。显然，如果我們把經濟問題只是当作交換关系的一种形式来看，而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沒有联系——把参加交換的个人只当作履行某些“义务”的若干 x 和若干 y ，可是把他們从他們和生产資料的具体关系(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頁。

②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8頁。

如究竟是有产或无产，是消极的食利者还是积极的劳动者)中抽掉——那末，巴列托所作的区别，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場中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占有别人所生产的财货的活动”只能是壟断的侵占行为或经济行为以外的欺詐或强制手段的结果。根据自由市場的定义，就可以把上述情况排除在“正常的”交换价值制度以外。实际上这也就是庇古教授所給的答复。庇古教授在引证巴列托的区别以后說道：“單純的占有行为”，可以被下面的假定所排除，就是“当某人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财货的时候，他这种获得的过程，并不认为是强占的过程，而是在公开的市場上的交换过程，在这里面，交易双方都是有資格讲价的，而且相当了解情况的。”^①可以說，这个結論完全符合所探討的範圍。但是这个探討範圍所要求的答案本身不正說明这种限制的不现实，而且这样一种有限的分析至少在政治經濟学的根本性問題上是不会有什么結果的嗎？但是从李嘉图以后的經濟学家起，經濟学的整个趋势就一直用这种方式把經濟研究的範圍縮小；而且他們虽然这样作，同时却又在类似古典經濟学家所关心的根本問題上，繼續发出各种議論。

假定通行稅关卡是一个普遍的制度，是根据习惯或古代的合法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說掌握通行稅的階級底收入是代表“占有别人所生产的财货”，而不是用来偿付“旨在生产或改变經濟财货的活动”，我們是否有理由否认这句话也有它的重要意义呢？但通行稅在可替换的通路的竞争中終会給固定下来，因此也可以假定它是“在一种公开的市場上所确定的价格，在这里

① “福利經濟学”，第130頁。

面，交易双方都是有資格讲价的，而且相当了解情况的”。那末，关卡的开放或关闭，按照生产要素的最流行的定义来说，是不是也会变成生产的一种基本要素，至少和今天企业资本家的许多职能照这样分类一样有理由呢？这个要素还可以同别的要素一样，說成具有“边际生产力”，而且它的价格也可以当作是它所提供的劳务的尺度或等价物。总而言之，在通行税关卡和一般稀少物资的所有权之間，究竟怎么划一条邏輯的界綫呢？也許有人會說，这种区别要看这个关卡的所有者本人是否曾經建筑了这条通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正是要想打开抽象交换关系所限定的范围，试图根据这个人的生产活动，来找出一个定义，表示这与关口的开放和关闭无关，而且比开放与关闭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但局限在純粹交换关系以內的观念，显然不会超过李嘉图同时代的一个評論家的智慧，这个人在攻击魁奈(Quesnay)和斯密的时候，直捷了当地表明：既然沒有人能不提供劳务而向別人討酬，那末，凡是获得收入的各階級事实上就是“生产的”，而且它們的收入也就可以衡量它們对社会所贡献的价值。^①也許可以說，这些区别并不屬於經濟学的范围。但是如果接受这样一种指示，那末經濟学不仅失去它的大部分的实际成果，而且将会变成和这門科学的創始者原来所計劃的目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但是不应当认为，馬克思在批評这种类型的抽象化的时候，

① 乔治·潘佛斯(G. Purves)：“所有的階級都能生产国家的財富”，1817年版。这位先生开始就說：“整个統計科学或多或少必須作为根据的根本大問題”，就是“究竟是所有階級都能生产財富呢，还是其中有某些階級是不生产財富的”。

他是从一种粗糙的實驗主义的观点,来攻击所有抽象的方法的。他所攻击的只是抽象化的一种特殊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抽象的要义,把映象誤作实质,又把假象誤作现实了。当然任何概括,从它的根本性质来看,必須要把一种情况中的某些要素加以抽象化;而且在这种程度上,“理論”和“事实”必然是不一致的。像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所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同古典經濟学家一样的抽象方法。馬克思从古典政治經濟学继承下来的、在某些要点上加以发展的价值学說,就是一种抽象法,它不仅是根据任何交換經濟所共有的某些特点,而且还根据作为商品生产制度的資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当人們批評馬克思,說他在“資本論”里並沒有給他的价值学說提出充分的“論证”的时候,似乎大家都忘記了,他并不是提出一种新奇的、大家所不了解的学說,而是采用了屬於古典政治經濟学已經确定的傳統的組成部分的一种原理。他认为沒有这种原理,任何因果关系的說明都是不可能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沒有意思在开始分析資本主义生产的时候,除了給某些像价值、交換价值和使用价值一类的基本概念下定义并加以比較以外,还要叙述其他的東西。这些概念和其他同类的概念是大家都公认的抽象化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上只有或多或少不完全的代表性。但他在这里所用的方法的抽象程度,和他的前人比較起来,却是半斤八两。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产生“正常价值”的“完全市場”也是同样抽象的东西。同几何学上欧几里德(Euclid)的点和直綫一样,“正常价值”在现实世界上只能看作是具有“极限情况”的东西。

引起馬克思的批評者叫囂最厉害的两种抽象化——同质的

“简单劳动”的概念和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关于一切生产部門都具有相等的“資本有机构成”的假定——既是以前的和同时期的經濟学家都具有的概念，也是他們許多最重要的推論的根据。我們已經知道，后一假定在李嘉图的学說中表現得很突出。例如，在国际貿易的学說方面，它就是这种問題的說明的基础：一国工資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貿易的条件，而只会在利潤的水平上，引起一个相等或相反的变动。^① 我們也看到，这种假定是約翰·穆勒武断主張的根据，他认为，“对商品的需求，并不构成对劳动的需求”。一个生产要素各单位是具有同一性的，这种假定在經濟学的方法上直到現在也还是很普通。如果没有这种假定，“正常”报酬的概念就沒有意义了。不論是暗含的或是明显的，它都是关于“工資一般水平”或“正常利潤”学說的任何討論的一部分。虽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里承认，第一卷中价值原理所根据的、相等的“資本有机构成”只是第一近似法，可是龐·巴維克却竭力夸大第一卷的第一近似法和第三卷的近似法有“重大的矛盾”，而且利用这点作为有力的武器向馬克思进行攻击。他得意揚揚地宣称，由于这个重大的矛盾，整个馬克思的体系已經被推翻了。最近有位作家曾經說，在任何出版物上，沒有像馬克思体系那样混乱異常的东西了。^② 但是任何演繹的推理都經過一种近似法的过程，而且在所有用逐步求近法进行演繹推理的例子中，或任何近似法与事实之間的演繹推理中都能

① 因为如果“資本构成”在各工业中都是一样的，那末，工資的变动就不会影响可比成本的比例。但是如果这个假定是不确实的，那末，工資的变动，对劳动比机器在資本上占較高成分的工业，就会比对劳动占較低成分的工业有更大的影响，因而会改变可比成本的比例。

② 參閱葛雷(A. Gray)：“經濟学說的发展”，第301頁。

够指出类似的“矛盾”。問題要看这种近似法是用在什么上面。重要的关键在于：从这种近似法所能演繹出来的推論，究竟是不是由于更精密的近似法所需要的修正而归于无效；在“資本論”第三卷所提出的修正，究竟是不是和从第一卷的假定所发展出来的結論有重大的差別。

和李嘉图一样，馬克思也特別注重分析階級收入的变动。正是因为李嘉图太注意財富的分配方面，所以激起加萊(Carey)这位作家的憤怒，他說：“李嘉图的体系是一种不協調的体系。……它制造了階級間的仇恨。……他的书是为煽动家所使用的一种手册，这些煽动家想通过分配土地、战争和掠夺来获得权力。”^①同样，还有一位作家說，馬克思是用一种带着預言語气的那种正义的憤慨，織成一套“經濟的謬論”，目的就是要“表明階級仇恨是有正当理由的”^②。这种歪曲的判断可能听来有些奇怪。但是他們着重之点，就下面这个範圍來說是对的：就是馬克思集中注意表現在階級收入上的階級关系，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确定資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有規律的运动的关系，而且是对未来的任何推測的關鍵。同时，如果认为他的兴趣只限于分配的範圍，把他的分析看作基本上是一种分配的理論，那也是錯誤的。生产、交換和分配，虽然可能是多面体的不同部分，但不能看作是各自分离的經濟关系底范疇；而且正像他在“政治經濟学批判”里面所坚持的，它們是具有基本統一性的。^③

① 加萊：“过去、現在和未来”，1848年版，第74頁。參閱“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頁。

② 加尔(E. Hallett Carr)：“卡尔·馬克思”，第277頁。

③ “政治經濟学批判”，凱尔版，第291頁等。

价值規律是包括劳动力在內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关系底一种原理。它同时也是劳动在一般社会分工里面如何分配在不同的工业之中以及产品如何分配在各个階級之間的決定因素。我們說，商品有某些交換价值，換句話說，也就是，社会的劳动力量是通过某种方式而分配在各种职业之間，而且（也包括在前面那句話里面）这种社会产品是以某种比例划分为劳动者的生活資料和資本家的收入的。（例如，关于谷和絲的价值的說明，同时就是劳动在谷和絲的生产中的分配比例的說明。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谷和絲两种，前者为工人所消費，后者为資本家所消費，那末，說明劳动是以某种比例分配在絲的制造和谷的培植之間，就等于說，社会的所得是根据相应的比例分配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同古典經濟学家一样，馬克思在他的第一卷里，也采用了一种簡化的假定，就是“純粹的”資本主义經濟或“純粹的竟爭”經濟以及以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簡單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后者担任全部主要的生产活动，而前者只是以資本家的資格，即作为财产权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雇用者而出現的。^①这已經足够为所有現在存在的資本主义社会，提出一个一般化的典型形式（“純粹的”資本主义概念，当然只是一种近似值的概念），正如同欧几里德的点、綫、圓和方已經足以代表所有实际的三維度空間关系底主要特征。这一卷的指导主题，是要分析这两个阶

① 馬克思在1858年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經說明为第1卷的目的而作的假定：“假定劳动工資常等于它的最小量。……还有，地产被认为等于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不致在一切关系中时常涉及一切問題。”在这些假定上，价值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表现为“这个抽象的、未发展的形态中的价值”，和它的“更具体的經濟決定”是有所不同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4、365頁）。

級的收入关系以及資本家利潤的起因和性质。

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馬克思指出：當我們考慮到，勞動和機器（或者更精確些，在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間）在不同的工業里面有不同的比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明白，商品的交換不是按照第一卷所提出的原理，而是按照他所說的商品的“生產價格”（即工資加上平均或“正常”利潤）進行的。但是，他認為第一卷所提出的原則仍舊是從全部來看的商品底價值的決定因素，因此也是利潤率 and 生產價格本身的決定因素。他作這樣的表述，並不像龐·巴維克所攻擊的那樣，^① 犯了愚蠢的錯誤，而只是認為一個總數等於一個總數。顯然他心裡所考慮的乃是从全部來看的製成的商品底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关系——这就是他和李嘉图一致認為的確定利潤的決定性关系。他是說，全部產品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從而利潤量和利潤率）系取決於這兩個數量的关系；而且這種決定性的关系，還是可以認為是根据第一卷的簡單方式來決定的（如果可以假定，“資本有機構成”在生產生活資料的那類工業里，並不和整個工業的一般情況有很大的出入）。倘若如此，那末，關於剩餘价值和決定剩餘价值的各種影響的分析，便不會因為第三卷所作的修改而歸於無效。資本家階級的收入和這種收入的變動，還是受同樣原因的支配，即使這種收入在各種工業間的分配，和第一卷用第一近似法所估計的情況有所不同。^② 舉一個類似的例子，讓我們假定，我們所要

① “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結束”，第 68—75 頁。

② 十分明顯，馬克思充分了解第 3 卷所提出的各修正點的性質和意義，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會影響到從第 1 卷的假定所得出的推論。恩格斯在“僱傭勞動與資本”（1891 年版）的序言里說：“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者一樣簡單地說，商品底價值是決定於它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的

闡述的地租學說是根據所有土地質量相同的這個假定，因而說地租等於谷物的售價和生產成本之間的差額（谷物的價格是由集約邊際上的生產成本來決定的）。如果谷物的生產成本，大體上照舊不動，並與谷物價格保持同樣的比例，那末，作為進一步的近似法而提出土地差異性的事實（因而提出每個農場和每畝耕地也有不同的生產成本），並不會使那些根據比較簡單的假定而作出的推論基本上有所不同。而且從前一近似法所得出的推論，還是包含着關於地租的性質和決定的某些基本真理（關於我們可以稱為形成地租的稀少性方面——與地租的級差性方面有別——的那些真理）；任何地租學說的系統說明，如果不涉及平均成本和平均售價之間的這種關係，就不可能包含這些基本的真理。^③

這些沒有受以後修正影響的推論是多種多樣的，而且對於他當時所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即發現“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

話，那麼我們在這當中總是依馬克思所作的附帶條件為條件的。”在這更早以前，馬克思曾經嚴厲地批評過蒲魯東，因為他說，提高工資會引起物價的普遍上漲。“假使每個工業都拿工人和固定資本或使用的工具底關係作標準，來雇用相等數目的工人，那末，工資底一個普遍的高漲會引起利潤底一個普遍的下跌，而物品底流通價格不致於受變化”。“但工人和固定資本底關係在各種不同的諸工業中間並不同樣，所以那使用較多固定資本和較少工人們的一切工業，遲早不得不減低他們底物品底價格”，而“在比例上使用較少的固定資本和較多的工人的工業，則情況正相反。……這樣，工資水平的提高，不是像蒲魯東所說的那樣，會引起物價的普遍上漲，而是某些物價的實際下落，也就是那些大部分靠機器製造的貨物價格的下落”（參閱“哲學的貧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40、241頁）。

- ③ 奇怪得很，龐·巴維克在創立他自己的資本學說的時候，也曾經利用了大致同於他所攻擊的馬克思的假定作為第一近似法，即“同時在資本的各項用途上，可能會有同樣長的生产時期”（“資本實證論”，第382、405頁）。

律”的目的——來說是屬於最重要的推論之列的。李嘉圖的“如果工資上漲，利潤就會下跌”的學說，以及與此有關的工資提高會鼓勵資本家用機器代替勞動的結論，都沒有受到影響。使利潤率改變的那些影響，包括馬克思關於“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說明在內，也沒有變動；這我們在後面還要講到，而且對於這一點，很明顯，馬克思在明確解釋資本主義社會長期趨勢的時候，認為具有重大的意義。可是也有一個大家比較不熟習的推論，在今天看起來，似比在他寫書的時候具有更突出的重要性，這就是關於壟斷的影響。馬克思曾經指出，壟斷除了有降低工資的影響之外並不能提高一般的利潤率（和某部分提高而其他部分降低的情形不同）。除非壟斷影響了勞動力價值與商品價值之間的比例（也就是改變了剝削率），否則，它就沒有力量來提高整個利潤率。壟斷除了有壓低實際工資到正常水平以下的那種影響以外，它的增長“不過把別一些商品生產者的利潤的一部分，移轉到這些有獨占價格的商品上面來。在剩餘價值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配上，因此會間接發生一種局部的擾亂，但這個剩餘價值自身的界限照舊不變”^①。我們將在後面的一章里看到，這個結論對帝國主義的某些問題特別有關係。

所以馬克思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剩餘價值理論。如果它的意義不是在倫理方面，那末，它的實際重要性究竟在哪裡呢？顯然，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基礎，它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相當於李嘉圖學派地租理論對地主利益集團所作的批判。地租理論曾經是下面這種意見的根據：那些會使利潤率降低因而延緩資本積累和工業進步的政策，同時會增加地主階級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28—1129頁。

的收入而且会对国家财富增加非生产性的消费负担。^① 剩余价值理论含有这样一种意思：利润和工资这两种阶级收入，在它们的基本性质和决定方式上，既然是这样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意思就是说，它与自由市场上普通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关系有着质的区别。资本家阶级的切身利益就是要巩固和扩大阶级社会的各种制度，使无产阶级永远处在一种依赖的地位，并创造出作为一种收入范畴的剩余价值，其处心积虑的程度实不亚于过去地主利益集团维持谷物法的情况；而无产阶级的相应的利益则在于削弱或破坏这些基本的财产权。既然利润是属于这样一个阶级的所得，所有工业的活动都依靠着它的决断和预期，所以利润的任何变动对于经济制度的影响和任何其他价格或收益的变动完全不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区别与马克思的危机学说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资本家的利益很可能就在于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和鼓励有害于财富生产的政策，只要这些政策能扩大剥削的机会并增加它的收益。正由于工业资本主义所据以建立的那种技术基础的性质，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一种概然性。以动力机器和大规模技术为基础的累进的资本积累过程，总是不断地扩充和扩大这个基础；这个过程既然鼓励了资本的不断积聚和集中，它就不断为壟断铺平了道路。马克思对这些发展的叙述是众所熟知的。随着壟断的增长，阶级冲突就更为尖锐化而不是趋于缓和；有产阶级的所得愈来愈

① 李嘉图学派的论点是这样的：土地收获递减的事实，会在进展的过程中，造成地租的上涨，而由于提高了工人生活资料的费用又促成利润的下降。要避免这种情形，并维持资本积累和工业扩张的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开放国际贸易和允许进口的农业品的竞争。

愈明显地变成壟断政策的結果而不是什么别的結果。但是，这种使生产过程日益形成“社会性质”的同一过程，本身就成为了破坏“私人占有”所造成的桎梏的一种工具。“在资产階級社会結構内部发展着的生产力，同时就为这种矛盾的解除創造了物质的条件”。它也为作为一个階級来看的工厂无产者創造了同一性、紀律性和統一性；直到这个階級，由于看到自己与已經显然成为生产障碍的所有制关系的制度日益处于尖銳化的敌对地位，而起来要求剝夺剝削者，来解放它自己和整个社会。一种大規模的技术和复杂生产关系的制度既然不能回复到小所有制以及連帶产生的小規模生产的地位，那末，剝夺的消极行动必然会采取社会化的积极形式，而把土地和資本都轉变成工人国家的集体所有。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的有組織的工人的革命行动，事实上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义所曾梦想而未能获得的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宪章。这是个人权利的惟一真正的宪章，因为（用“共产党宣言”的話）“在资产階級的社会里，資本是独立的并且具有个性，但是活着的人却是附屬的并且缺乏个性”；因为只有通过对土地和資本私有制的镇压，来镇压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階級剝削另一階級的权力，广大人民的真正自由才能获得实现。

第四章

經濟危機

毫無疑問，在馬克思看來，關於經濟危機性質的分析乃是對於他的學說的最重要的應用。當時認真研究這種現象的工作尚處於開始階段。西斯蒙第對於競爭和為廣大市場進行生產所引起的破壞作用，已經作了一些豐富可是缺乏系統的觀察；馬爾薩斯和李嘉圖之間對於供過於求和經濟蕭條是否由於消費不足而引起的問題也已經進行了歷史上有名的、重要的討論；在德國，羅貝圖斯(Rodbertus)已經發展了若干消費不足的危機理論。但是就李嘉圖學派和他的遺產來說，可以說經濟危機在他們的思想體系里面實際上是沒有地位的：如果發生蕭條，那就認為是由於經濟力量的自由活動或資本積累的進展受到外來干涉的緣故，而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任何內在痼疾的影響。即使這個學派的后繼者也一味認定這種說法，而在自然的原因中（如收穫的豐歉），或在“貨幣的薄幕後面”，去尋找說明，但是在馬克思看來，似乎很清楚，危機是與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基本特點有關係的。這種經濟的兩個基本特點就是他所說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方面的決定系分散在無數獨立自主的個體企業家之間——以及這種生產制度不是為了有意識地計劃出來的社會目的而是為了追求利潤。就是由於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特征，古

典的市場規律才具有支配力量和這些規律事實上所採取的那種特殊形式。^①但是馬克思認為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才發生一種趨勢，不但破壞了古典經濟學家所特別強調的傾向平衡的那種趨勢，而且也破壞了平衡。就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二個特征，剩餘價值的追逐以及有利於它的增殖的情況才具有支配的意義；因此，作為統治階級收入的利潤一有變動，就會產生不是任何其他階級的收入變動所能比擬的影響。不僅如此，馬克思顯然認為，危機並不是偶爾脫離了預定的平衡的現象，也不是從原來的發展路綫上隨便游離出來以後還會服服帖帖地回到原來路綫的現象，而是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运动形式。研究危機事實上就是研究這種制度的動力學；而且只有把這種研究看作探討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底运动形式以及表現在市場上的階級收入底一部分，我們才能正確地進行這種工作。

這個問題有一方面在某一個時期內的确使經濟學家們感到煩惱而且引起了一些互相對立的解釋。這就是他們所說的資本利潤率的下降趨勢。隨着情況的改變，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動。在十八世紀的時候，這種利潤率的下降常常是受人

① 也許應該弄清楚，馬克思雖然把私人的生產稱作“無政府狀態”但并不一定有意地把它當作混亂的同義語。他是照實際的意義使用這個名詞的而且着重指出，雖然它要對破壞的影響負責，可是它也是一種媒介，通過這種媒介，市場的“無形的手”才得以發揮它的統治力量。在蕭伯納（G. B. Shaw）和威爾斯（Wells）之間最近所展開的討論里面，前者認為威爾斯只看到資本主義缺乏系統而急切要加以系統化；但是事實上資本主義是被它自己的規律和強制所統治的一種非常有系統的東西。我想馬克思應該會贊成這個見解（參閱“新政治家”雜誌，1934年11月3日）。

欢迎的，他們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现象，这显然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资本贷入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盛极一时的時候，于是就由赞美轉为忧虑。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討論变成这样突出，甚至馬克思也說，“亞當·斯密以来不同各个学派就是因为它們对于这个秘密的解决，有不同的尝试，所以存在着差别”^①。

休謨 (Hume) 在提到货币借貸的利率和更一般性的名詞——利潤的時候表示，“只要在國內有地主士紳和小农階級的存在，借貸的人就一定很多而且利息也高”，理由是“地主的怠惰”和淫佚。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工业必然停滞而且进步很小。……在相反的一方面，商人构成了“最有用的人种之一，他們推动着工业，像运河一样，把工业运送到国家的每一角落。……广泛的商业，因为使生产扩大，所以就降低了利息和利潤，而且在降低其中之一的时候，常常由于另一个也按比例下降而得到好处。我还可以加一句，当工商业扩展而使利潤降低的时候，低利潤又使物价更趋低廉，消費受到鼓励，工业更加高涨，因而又促进工商业的增长”^②。和休謨一样，在亞當·斯密看来，高的利潤水平是資本积累落后的标志；而随着資本积累的增长，通常是可以估計到利潤率的下降的。关于他根据供求关系对于这方面所提出的理由，后来李嘉图学派曾經激烈地爭論过，这与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0頁。馬克思在1868年写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上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在社会的进步中，利潤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对于向来为一切經濟学的蠢材不容易了解的问题，是最大的胜利之一”（“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5—56頁）。

② 休謨：“論文集”，第1卷，第2篇，第4章，1809年版，第316、318、320頁。

他們以后对于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解释问题的极端蔑视有不少关系。亚当·斯密曾经这样写道：“資本的增加虽然能提高工資，但却会降低利潤。当許多富商的資本轉入同一行业的时候，它們的相互竞争自然降低了利潤；而且在同一个社会里面，所有不同行业都同样增加資本的时候，同样的竞争也一定会在所有的不同的行业里产生同样的影响。”^①

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观点改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有所不同。在谷物法的争论中，和地主利益集团的冲突达到最尖锐的阶段；而且利潤——資本家阶级的收入，因此也是資本积累的源泉以及进步和发明的刺激——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来说，利潤是他們集中注意的焦点。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收入的下降怎么会成为有利于进步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制度，通过它本身的发展，就会产生利潤下降的趋势，那是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某些难以理解的矛盾呢？是否因此就可以确定它是一种暂时的制度，正在为它本身的阻滞和崩溃播下了种子呢？^② 这些暗含的而不是明显的问题似乎就是后来发展为对亚当·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所进行的激烈批评的根源。这个批评并不否

① “国富論”，第3版，第89頁。

② 参考馬克思所說的話：“像李嘉图那样认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絕對的生产方式的經濟学者，在这里，也觉得这种生产方式自己創造了一种限制，并且因此不把这种限制归因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因于自然（在地租学說上）”（“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7頁）。在另外一处，馬克思又說：“单纯的可能性（利潤率的逐漸下降）已經使李嘉图如此不安这件事，恰好表示了李嘉图对于資本主义生产的条件的深刻理解。……使李嘉图不安的事，是：利潤率——資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将会由生产的发展自身受到危險”（參閱“資本論”，第3卷，第310頁）。

認這種趨勢，但他們不是從這個制度或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某些內在特點，而是從一個外來因素去探求對這種趨勢的說明。他們所找到的說明就是有名的“報酬遞減規律”。

在“國富論”出版的十年以前，司徒亞特(J. Steuart)已經預示過這種對於進步的外來限制，他說：“根據生活資料所規定出來的價格，當自然的收穫已經不能抵償農業發展所需要的新增加的費用的時候，……生活資料價值的增長必然就會提高所有勞動的價格。”^① 1815年威司第(West)在批評亞當·斯密的理論的時候，曾經利用這種說法來解釋農業生產力比工業更為有限的事實（亞當·斯密認為是由于分工在農業上的可能性比較小的緣故）和利潤下降的趨勢。亞當·斯密的理論認為使利潤率不僅在某些行業而且也在各行業普遍下降的原因就是由於資本的競爭；威司第則認為這是一個錯誤。他也認為不可能“完全用勞動工資的增加來解釋資本利潤的逐步降低”。這種降低主要不是因為工資隨着進步而提高，而是因為農業中的資本生產力的降低。“這個原理不過是這樣：在改良耕種的進展當中，農產品種植的費用愈來愈大；換句話說，就是土地純生產物和總生產物之間的比例正在繼續縮小。……這種論斷就是：投入資本的每一個增加量都只能產生在比例上更小的收穫，因此所費的資本越大，利潤對資本的比例就越小。”^②

李嘉圖甚至說得更為明顯，他把這個論點發展到使它足以

① “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1767年版，第226頁。重農學派杜爾閣(Turgot)也曾經在同一年提醒人們注意這個事實。參閱凱南：“生產與分配學說”，第147、148頁。

② “土地投資研究”，倫敦大學一位研究教授著，1815年版，第2、3、19、20頁。

成为批判地主利益集团的支柱的程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之中，有一个論点是，价值既不依商品的需求也不依商品的充足为轉移（他把商品称为“財富”或“財貨”，以与价值相对立），而是依“生产的困难或便利”为轉移；因此利潤或“純生产物”的价值既不决定于“总生产物”的大小，也不决定于資本的生产力，而决定于取得劳动者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也就是产品价值与工資的差額。^① 所以他所断言的“如果工資上漲，利潤就会下降”^② 这句话，初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它的更充分的含义远超过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这意思就是說，利潤只由这两个数量来决定（生产生活資料的成本和生产一般产品的成本）。而且資本既然主要是当作对劳动者所“墊支的工資”，这种論断又被解釋作利潤率（也就是利潤对原来付出的总資本的比例）也单独由这两个数量来决定。任何影响利潤率的因素只能在它变更工資与总生产物价值之間的比例的範圍內才会有这种影响。“資本积累不会永远降低利潤，除非有某些使工資提高的永久性的原因”^③。

李嘉图虽然采用了馬尔薩斯的人口規律，可是他似乎沒有看到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充分原因——至少沒有看作是长期的因素——乃是劳动供給量的缺乏。劳动群众倒是很願意赶上資本增加所提供的任何扩大就业的机会的。所以在他看来，在資本和劳动的关系上，似乎沒有理由可以說明，为什么投入額外的資

① 这就是李嘉图对薩伊的主要批評，說他混淆了“財富”和“价值”；他对斯密还有一个次要的批評，即說他“經常夸大一国从大的总所得而不是从大的純所得所能获得的利益”（“原理”，第 18、24 章）。

② 參閱第 39 頁。

③ “原理”，第 19 章，第 398 頁。

本基金，來增加生產勞動的供應和不斷地擴大生產的循環，卻不能繼續提取至少和以前一樣的利潤率。因此在資本積累進行的過程中，利潤率下降的唯一充足的理由，只能說是由於勞動者生活資料價值的提高而促使勞動力價格上漲的某些因素的作用；而這種因素，他以為就是土地報酬遞減的規律。他在“原理”一書上寫道：“如果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能夠同樣容易地不斷增加，工資或利潤率就不可能有永久性的變更，不管資本積累到什麼數量。……亞當·斯密似乎沒有看到，在資本增加的同時，資本所利用的勞動也在以同樣的比例增加。……究竟生產的增加以及隨着發生的需求會不會降低利潤，這完全要看工資是否會上漲，而工資的上漲，除了短時期以外，完全要看勞動者的食物和必需品的生產是否容易。我說除了短時期以外，因為最肯定的一個論點就是，勞動者的供給量最後總是和維持他們的生活資料成比例的。”^① 在給馬爾薩斯的一封信上，他寫道：“我認為除了在食物和勞動力價格比較高的時候以外，不管資本怎樣充斥，也沒有原因會使它的需求在任何一段時間內減少，這就是說，資本數量的增加不一定会使利潤下降，因為資本的需求是無限的而且同樣受人類規律的制約的。它們二者都受食物價格的上漲以及隨着發生的勞動價值的提高的限制。如果沒有這種增長，有什麼東西能阻止人口和資本的無止境的增加呢？”^② 因而他就得

① “原理”，第2版，第398—404頁；同時參閱第133—134頁“關於利潤率降低的自然趨勢”。

② “李嘉圖致馬爾薩斯書信集”，1810—1823年，鮑奈編，第101頁。當馬爾薩斯說迅速的資本積累一定會導致生產過剩的時候，李嘉圖評論道，在馬爾薩斯所描寫的特殊情況下（利潤的降低和需求的不足），“特殊的需要應該是對人口的需要”（“關於馬爾薩斯的札記”，第169頁）。

出下一結論，這就是他反對地主利益集團的論點底重要部分：他說：“我想可以充分地證明，在財富和人口正在增進的每一個社會，如果農業不能改進，或穀物不能以較低的价格輸入的話，那麼一般利潤必然就會下跌。”^①既然這些條件都和地主的利益相反，“結果地主的利益當然總是和社會任何其他階級的利益相衝突。他的處境永遠不會像食物缺乏而又昂貴的時候那樣得意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却都會因為獲得低廉的食物而得到很大好處”^②。

就是這種對地主利益集團的非難，才引起他的朋友馬爾薩斯的批評，而且正是在利潤率下降趨勢這個論題上，才形成了他們意見分歧的中心點。^③馬爾薩斯所堅持的是，利潤不會由於工資提高而下降，只會因商品價格由於需求不足的下降而下降；而且，如果資本積累進展得過於迅速的話，特別是如果這種積累是在減少消費的情況之下產生的話，那末這種情形多半就會出現。與薩伊的市場規律相反，他認為如果生產設備是在犧牲消費的情況之下增加的話，那就可能使生產超過消費，這也就意味著，使價格和利潤下跌，因而發生商業的“供過於求”和蕭條現象。“如果能使收益增加在先，那就可以實行節約或轉化收益為資本而不使消費減少。……（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由於經常減少消費來積累資本而致富，因為這樣的積累既然大大地超過了需要，為了對產品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中有一部分就會很快地

① “穀物價格的降低對於資本利潤的影響”，1815年版，第22頁。這就是馬克思所敘述的“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勞動力價值，與產品價值比較，相對地降低）。

② 同上書，第20頁。

③ 參閱馬爾薩斯：“原理”，第293—336頁；“李嘉圖致馬爾薩斯書信集”，1810—1823年，鮑奈編，第186—191頁。

失去它的用处和价值，不再具有财富的性质”^①。与薩伊和李嘉图相反，他认为随着积累的扩大，所有的商品在和劳动力比較的时候，它們的价值就会相对地下跌，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怎样使这个見解符合他自己的学說，即人口会不断地扩大到生活資料的限度。他写道：“某些有能力的作者认为，虽然可能容易发生个别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却不可能发生一般商品供过于求的現象。……但在我看来，这个学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商品总是要和商品来交换，这并不是事实。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直接和劳动——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相交换；而且很明显，这部分商品在和与之相交换的劳动比較的时候，可能因为供过于求而价值下跌，正如同任何一种商品，假使和劳动或货币相比較的話，在供給过多的时候，它的价值也会下跌一样。”^②

这与曾經提出过十分类似的批評^③的西斯蒙第的著作結合

① “原理”，第 369、370 頁。

② “原理”，第 353、354 頁。馬尔薩斯与李嘉图在价值学說上的分歧和这个問題有密切的关系。馬尔薩斯想确定价值的意义为“一种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而李嘉图則坚持他自己的定义，认为价值在于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照馬尔薩斯的定义，利潤不論下跌多少，都会表明它本身是一种商品价值的下跌，但是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只有当改进能使人們用比以前更少的劳动来生产这些商品的时候，商品价值才会降低；而且只有当商品中仅仅劳动力这一項的价值沒有下跌的时候，商品价值的下落才会使利潤率下降（参閱“李嘉图致馬尔薩斯书信集”，第 233 頁）。

③ 在格罗斯曼(H. Grossman)的“西斯蒙第及其經濟学說”一书里面，他认为西斯蒙第并没有把消費不足看作是危机的原因而是看作它的結果（第 55 頁）。但很难看出这种解釋能被“新原理”，第 1 卷，第 120 頁和第 320 頁各节，以及“政治經濟学研究”，第 1 卷，第 60 頁以后有关各节和第 2 卷，第 233 頁各节所证实。再参閱段君(M. Tuan)的評論，見“經濟学家西斯蒙第”，第 68 頁以后。

起来,就成为今天又占着論战中心的各种消費不足学說的根源。随着李嘉图的傳統在維多利亞时代的英国的胜利,馬尔薩斯的这种学說除了用来例证奢侈創造就业,儲蓄不如浪費的那种謬論以外,就长期地默默无聞了。在德国,大約过了三十年,这个理論又被罗貝图斯用一种新的形式提倡了起来,而且通过他和他对于拉薩尔(Lassalle)与杜林(Dühring)以及正在兴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派的影响,这种理論就开始相当深刻地移植到社会主义思想中来。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学說当初創立的时候是为了替地主和債券持有人那些“不生产的消費”辯护用的,可是現在却成了无产階級手中的武器,用来批判那种把贫困和限制消費强加在大部分生产者身上的制度。近年来这种学說也活跃了起来,甚至到今天还是我們所謂时髦的东西。这大部分是由于霍勃生(Hobson)的多年倡导,他用一种新穎的方式来闡发这个学說,但是基本上还是因襲着傳統的路綫。最近,它似乎得到柯尔(G. D. H. Cole)的支持,^①而凱恩斯則声称馬尔薩斯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原理”是对經濟理解的一个重大貢獻,但是这个貢獻却被人忽略了。^②这个学說虽然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駁斥^③(至少在它的罗貝图斯形式上),可是在馬克思主义的

① “經濟計劃原理”,第50、51頁。

② 見“經濟学杂志”,1935年6月号。

③ 參閱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1—330頁。馬克思写道:“說危机是起因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的缺乏,完全是一个重复語。……商品不能卖出,就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或消費者(無論商品在結局上是为生产的消費而购买,还是为个人的消費而购买)。但若有人說,这是因为劳动者階級在他們自己的生产物中所受的部分过小,其弊害,只要他們在生产物中被給予較大的部分,把他們的工資提高,就可以除去,想由此使这种重复語在表面上有更深的論据,

团体里面还是很流行而且曾經被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造成“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变种。卢森堡曾經批評馬克思，說他对这方面的忽略是不應該的。^④

在未为博学的詭辯术所影响的普通常識看来，究竟是李嘉图的学說更近于真理呢还是消費不足学說更近于真理，这是不会发生什么疑問的。生产的目的是可以假定就是为了消費。生产者的利潤的實現要看銷售市場是否存在。如果在各工业之間有一种不合比例的发展——生产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需要——那末似乎可以像馬尔薩斯那样有充分理由假定：在全部可消費的商品之間，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关系來說，可能会有一般比例失調的現象。有一种学說（我們已經提过）^⑤，认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生产和交換完全可以当作貨物对貨物的一种連續交換过程，因此全部需求会用同样的速度和全部供給一道增长，因为它们是相同的東西，这似乎是对实际問題的一种抽象的迴避。如果全部所得事实上确是用于消費財貨上，那么全部所得就足以抵偿所有生产出来的消費財貨的費用。如果那所得里面有一部分沒有用去而儲蓄起来，这儲蓄起来的一部分所得用来购买

我們就不过要指出，每一次危机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在前面，在这个时期，工資通例会提高，年生产物中决定充消費用的部分，实际也有較大的一份，归劳动者階級。”在这一节的附注上，他說：“提倡罗貝图斯恐慌学說的人，这是应当注意的一点”（“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07、508頁）。

④ “資本积累論”，1921年德文版，特別是79頁以后和第299頁以后。卢森堡自己也批評了消費不足学說的某些傳統的說法，但认为馬克思太不重視她所謂通过市場的銷售而“實現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不够注重社会的消費能力。这就引导到她那有名的“第三方面”的学說，即資本主义經常需要一个居間的“中間”階級，或者就要有殖民地来處置它的剩余的商品。參閱沙尔志(Salz)：“帝国主义的性質”，英文版，第40—44頁。

⑤ 參閱本书，第34—37頁。

的則不是消費財貨而是生產財貨，而且它們又會在將來再增加消費財貨的流量。那末，如果儲蓄繼續下去，除非把物價降低到利潤下降或甚至消失的一點，那增多的成品流量的市場又在哪儿呢？不管生產過程多么“長期”而“迂迴”，制成的財貨最後還不是用在消費上嗎？資本的利潤和勞動的工資，大家不是都承認是從消費財貨的價值上面以及由消費者對消費財貨的需求方面“得來”的嗎？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幻想里面才可能有這樣一種世界的存在，在那裏（用克拉克 J. B. Clark 的一句不恰當的話）^①“他們會建築工廠，再由這些工廠建築更多的工廠以至於無窮”，而且不會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見解作了兩個答復。第一個是李嘉圖對馬爾薩斯所作的答復。在他的“關於馬爾薩斯的札記”上，評論到我們所引用的那幾節文字的時候，他寫道：“我不認為一般消費者的欲望會由於節約而減少——它們是隨同消費的能力轉移給另一部分消費者。……用收益來增加資本這句話的意義就是增加生產工人的消費，來代替非生產者的消費。”^②亞當·斯密曾經在他有名的段落上寫道：“每年所儲蓄的數量是同每年所用去的一樣，經常地被人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內消費掉的；但它是被另外一部分人消費掉的。”^③這個答復的正確性顯然要看這個簡單化的資本概念是否包括“對勞動者的墊支”為定。所以如果一個資本家或地主“儲蓄了”，那末就可以認為他是把所得的一部分移作工資，來擴大生產過程；他所

① 他為羅貝圖斯的“生產過剩與恐慌”一書的英譯本所寫的序言。

② “關於馬爾薩斯的札記”，第 164、174 頁。再參閱詹姆士·穆勒：“為商業辯護”，第 78 頁。

③ “國富論”，1826 年版，第 319 頁。

放棄的消費被新增加的工人的消費所代替。所以儲蓄並不具有消費需求絕對減少的含義。只有一點不能立刻看得清楚，就是如果一部分投資所採取的形式不是“流動資本”而是“固定資本”——這種投資不是直接用來僱傭勞動者而是用來購買和裝置機器，結果是否也會一樣。但是經過更仔細的分析以後，就可以弄明白，在這兩種情況之間，關於這一點並沒有根本的不同：因為機器的購置也是把用錢的能力轉移給其他的人，和直接僱傭勞動的投資形式是一樣的，不過在這種情況之下，是轉移給製造機器的工人和僱傭他們的資本家（雖然我們將會看到，這種投資情況對於勞動的需求以及利潤的後果是會沒有影響的）。

第二個答復是對消費不足論者之謎的另外一半而發的：就是那種額外機器和額外勞動者所生產的額外財貨，到底會發生什麼情況？這個問題的答復是：或者社會的所得會因生產機構的擴大而擴大，來吸收比以前更多的工人（因而擴大了用工資和利潤的形式所分配的收益）；或者如果投資所採取的形式是將勞動者轉移到製造機器上面，那末所增加的財貨產量，由於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果實，必然會促使生產成本降低，因此貨物雖然更豐富，售價還是可以低廉而不致賠本。^①

西斯蒙第和羅貝圖斯的著作所代表的消費不足學說（認為投資本身會造成貨物充斥），也許可以稱為這個學說的粗糙形

① 參閱端爾平(E. F. M. Durbin)：“購買力與商業蕭條”，第75、76頁。在那裏面，他着重提出了這個論點。這個論點答復了像馬爾薩斯所堅持的意見，就是“節約”會使商品產量增加到找不到買主的程度，即使找到，“價格也要落到使價值降低到生產成本以下”（“原理”，第353頁）。端爾平指出，商品的生產成本也會由於投資的結果而降低。至於是否按比例地降低，那是另一個問題。

式。这在馬克思看来，似乎是过于肤淺，以致不能成为对古典的市場規律的一个充分答案，因为他們把需求看作好像是一个孤立的因素，所以就忽略了需求与生产之間所存在的关系；他們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社会作为消費者，和它一定的总购买力，只是社会作为生产者的一面。馬克思曾經評論过西斯蒙第說，“他适切的判断了資產階級生产的諸矛盾，但沒有掌握它們，从而也沒有理解它們的解决过程”，特别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分配的条件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之下来看的生产条件”^①。而且西斯蒙第曾經指明，对于資本积累的过程，需要进行一种比过去更为认真的分析。不幸，他自己的分析，在我們看来，也还是不尽完善的。但是他所留下的这种不完全的东西已經足以开辟一个新紀元，而且他已經这样充分地討論了并且超过了以后的經濟学家在同一个題目上所作的工作，这就使人对于学究式經濟学家忽視这个問題的程度的确感到惊讶。

馬克思研究这个問題的出发点可以說是在两个有决定性的而且被人忽略的概念上面：其中一个是对李嘉图学說的修正，另一个是对它的扩充。第一个是把資本划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第二个是他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的概念。前者是关于把資本单纯地作为“对劳动者的垫支”这个概念的重要修正。过去經濟学家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意思非常不清楚。的确，他們对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区别是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的（像馬克思所指出的，相当于重农学派的原始垫支和年垫支），至于这两个要素在不同的生产部門有不同的配合这一

① 參閱“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頁。

点，他们的概念也是相当清楚的。李嘉图很了解固定资本的經久性的重要，并指出“固定資本按經久性降低的比例而接近流动資本的性质”，因为“它将在較短的时间內被消費掉”。但当这些經濟学家的观点从一个单独的工业轉到整个經濟制度的时候，他們好像总是又回到“所有資本最后都可以分解为对劳动者的‘工資的墊支’”这个概念上面去。这个見解的意义似乎还没有清楚地确定出来。可以推想得到，他們沒有意思說这个名詞是指所有資本都可以在一定的生产周期里面分解成这个形式。但这种說法却使李嘉图显然要把利潤率(利潤对总資本的比例)和利潤对工資的比例等同起来并使約翰·穆勒认为利潤率是单独由劳动者所消費的那部分生产物来决定的(可是麦克洛克 Mc Culloch 已經約略地看到，而朗福特 Longford 看得更清楚，这是由利潤对总資本的比例来决定的)。馬克思指出，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区别，不在于資本流轉所需要的时间，而在于劳动器具和劳动对象在生产上所担負的具体任务。前者是在机器的損耗过程中“零碎地”逐漸周轉，后者則整个地一次轉入产品(“供役用的牲畜是固定資本，如果是供育肥，那就是原料，最后将作为商品而进入周轉，換句話說，它們是流动資本而不是固定資本”^①)。但他认为这种区别并不像两种类型的“积蓄”劳动或死劳动与

① 參閱“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9頁。同时參閱“这样固定的价值会不断減少，一直到劳动手段消耗干淨的时候。所以它的价值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間內，分配在一个生产物总量上，这个总量，是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同上书，第176頁)。在討論固定資本的过程中，馬克思費了相当時間考虑維修的問題，他引证了拉德納(Lardner)关于铁路的例子，来說明“在真正的修理与替換之間，以及在保存費用与更新費用之間，限界多少是流动的”(同上书，第203頁)。

主动的“活”劳动的区别那么关系重大，因为后一区别，从整个经济来说，相当于由过去继承下来的生产能力与当前纯价值或新增价值的生产的区别。马克思把投入设备和储存原料的资本称为不变资本，把用于购买劳动力作为当前工资基金的资本称为可变资本。他因而指出，利润率（利润在某一时期内与总资本的比例）并不完全由他根据对比方法称为剩余价值率（利润与工资的比例或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①的那种东西来决定。如果现有的资本数量被分成这两种形式以后，在比例上（就是他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动，那末即使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也还是能变动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改变这种比例，一般总是（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因此工业进步的趋势是会降低利润率的，虽然剩余价值率并没有下降。这是他对李嘉图认为只要根据土地收获递减的作用就足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那种意见的答复。

但是马克思紧接着指出，还存在有“各种反作用的趋势”，它们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提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展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以致劳动力价值和一般的商品价值同样地低落下来。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因为事实上只需要较小一部分的社会劳动力，来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因

^① 马克思慎重地指出，和年利润率的决定有关系的不是利润与工资在每一周转中的比例，而是“年剩余价值率”；年剩余价值率是，根据可变资本的周转时期而与那单一剩余价值率有关系的。所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时期变成决定利润率的另外一个因素。（参阅“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2—382页；并参阅“资本周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一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70页）。

此“純生产物”在价值上和数量上都增加了；或者像馬克思那样更直接的說法，是由于在劳动者的工作日里面，事实上只要用較小的一部分来补充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而較大一部分可以留下来为資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李嘉图曾經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沒有繼續加以探討。他对土地收获递减的危胁所抱的偏見，显然使他忽視了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意义，而只把它看作是开辟国外市場和輸入廉价谷物的結果。但是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效果之一，而且这种提高不仅有扩展到工业而且有扩展到农业的可能性。这就是馬克思之所以否认把收获递减看作影响利潤率和发生經濟危机的重要因素的另一个理由。我們現在就要回过来談这种影响和它对“利潤率下降趋势”的关系。

“資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既然表明“积蓄的”或过去的劳动与“活的”或現時使用的劳动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以后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或“資本强度”^①等概念的先声。但是有些人常常批評馬克思，說他缺乏关于時間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概念而且混淆了資本的流量和資本的存量，好像这些問題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二篇並沒有討論过似的。馬克思明白指出，“投入的資本的周轉时期”不仅由“劳动过程”所占用的時間长度——也就是直接用以制成产品的劳动時間——来决定，而且也由“在制

① 这些写作的日期的先后是很有趣的，而且我想还没有被經濟思想史家提出过。“資本論”第2卷出版于1885年，而龐·巴維克的“資本实证論”出版于1889年。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馬克思沒有讲到資本周轉的不同时期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这就是龐·巴維克所最关心的一点，也就是他企图使剩余价值“合理化”的理由之一。在馬克思看来，只有不变資本的价值和可变資本的周轉才会直接影响利潤率。

造过程中的财货”由于技术理由而正在成熟所需的时间来决定。他还引“冬季谷物[它]大约需要九个月的成熟时期”，而培植树木，“种子也许需要一百年才能变成成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却只需要很少的劳动贡献”——作例子。他也没有把这种概念只限制在魏克赛尔式的“流动资本”上面，而且还明确地用在劳动器具上面，并指出固定资本既然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将它的价值传给产品，它通常要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时期长，但是正如树木的例子所表明的，并不一定是这样。^①他和以后的经济学家所不同的，就是他始终一贯地坚持着第一卷所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不管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如何，总剩余价值还是单独由劳动力价值与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他的理论结构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的剥削关系——来决定的。

但这些不过是对第二卷第三篇的一种引言，他在这一篇里集中分析资本积累对于生产力在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之间的分配的影响。对于前者的需要是由当时的不变资本的更新率和不变资本(或“积蓄劳动”)现有数量的增加率来决定的；所以资本积累的速度或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如果有突然的变动，就可能会使这两个部类失去适当的比例。他认为这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而且他对这种交换所作的分析代表着他对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贡献。马克思的分类表，对于产业革命所引起的更复杂的

^① 参阅“由此可见……为了运用同样数量的、生产上的流动资本以及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同样的剥削强度，就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周转期的长度垫支数量大不相同的货币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页)。

經濟程序的重要性，實在可以說是相當於魁奈的經濟表對於十八世紀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的重要性。二者都企圖用敘述實際程序的一種圖表，作為更進一步的分析和概括的基礎；而且馬克思自己所擬訂的圖表，顯然是從經濟表得到很大啟發的。在這方面提一提下面的事實是會使人感覺興趣的：就是他在1863年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上已經提出這些分類表的要點，作為他自己的經濟表；他把這些分類表首先應用到他所稱的“簡單再生產”或沒有新的資本積累的靜態的資本補償上面，以便發現如果要使這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進行無阻，究竟在它們之間以及在每一部類中的不同收入之間，需要怎樣的平衡。^①在70年代的后半期，當他體力衰弱的時候，他發展了這個論題，但在他逝世的時候，他只留下了一些筆記和引文：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初步說明”是“片段的”，而且“在許多地方是不完全的”。恩格斯就是把这些沒有完成的遺稿拼湊起來，寫成“資本論”的第二卷第三篇，在1885年出版的。後來發表在第三卷里的討論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遺稿，則寫得比較早，那是在60年代的中期，但仍然只是“一種初稿”，而且是“很不完全的”。

這些分類表的主要目的是雙重的。第一，它們清楚地表明總產品和純產品的區別以及商品交換總額與個人收益或所得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68頁以後。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達成平衡的條件就是在第二部類（生產消費用品）的一定時期內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在價值上應等於第一部類在同一時期內的可變資本加上剩餘價值。這就是從下面的原理所得出的簡單推論：第一部類的總產品在價值上應等於兩個部類所用去的或耗費了的不變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平衡條件和這種情況類似，但比較複雜（參閱“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9頁以後）。

區別。馬克思既然討論了亞當·斯密的如下命題，即“構成一個國家的勞動底年產物的所有商品……它們的交換價值本身一定會分解成……三個部分，並且分配到這個國家的不同居民之間，或是作為他勞動的工資，或是作為他們資本的利潤，或是作為他們土地的地租”，所以他才設計出這種分類表，部分地就是為了表明為什麼如下兩種情況都是正確的：每一種商品的價值等於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力的價值，加上剩餘價值，再加上消耗了的不變資本的價值；而整個經濟體系所生產的純價值只是等於工資加上剩餘價值。^① 第二，這些分類表在一方面假定了生產資本財貨的工業和生產消費財貨的工業之間所必須保持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假定了各工業對於設備和原料的補償需求以及工人和資本家的所得在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分配。^② 這意味着對那膚淺的消費不足學說提出了一個答復：它表明只要能保持這些關係，資本積累就能增加而不致在交換的範圍內引起任何問題。

可是馬克思接着補充說：在個人為市場而生產的情況之下，只能“偶爾”維持這些必要的關係，而且他明白指出，在資本主義之中，由於缺乏充分的機構來保持必要的比例，交換過程會在運動的情況之下有不斷遭到破壞的危險。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中的任何重要變動，特別是技術或資本積累速度方面的變動，都會使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2頁以後。樊弘在“經濟研究評論”1939年10月號上曾經指出，凱恩斯對使用成本(user-cost)和要素成本(factor-cost)所作的區別同馬克思的分析有相似的地方。

② 卡萊斯基博士(Dr. Kalečki)曾經指出，馬克思在這裡說的話與近來把“儲蓄”和以後的“投資”等同起來的某些命題實際上是同樣的東西(“論經濟波動的理論”，第45頁)。

平衡破坏而且会使破坏成为一种正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現象。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乃是由于各生产部門虽然彼此互相依存，可是却被无数分散的、不相联系的而又独立自主的决定所控制。在执行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不了解其他方面同时所作出的与之相关的决定的。^① 市場沒有能力在事前而只能在事后調整这些决定——这种調整只能完全通过价格变动的压力来实现，而价格变动正是由平衡的开始破坏所引起的。危机的出現好像是一服泻药，也好像是一种报应：一旦平衡遭到广泛的破坏以后，它便成为在这种經濟制度下能够强迫恢复平衡的唯一机械作用。

显然，在資本积累迅速发展的时期，两大工业部类之間的这种比例失調可能采取两种形式，而且我們有理由认为，当馬克思說到这两个部类发展的“比例失調”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就有这两种失調的形式。积累方面的增加，如果是一个不連續的增加，它将会形成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內，消費財貨的需求（作为当时购买力的百分比的一部分）势必减少，而劳动和其他物資将会轉移到制造生产資料方面。如果随着資本积累而产生資本有机构成方面的剧烈变动，那就更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事实所表現的就是，消費品工业的利潤趋向下降，結果造成失业。初看起来，这似乎沒有理由触发全面的危机，而且这一部类的利潤和就业的下降会被另一部类——生产資料的生产——所增加的利潤和就业抵銷。可能有人会問，为什么这样一种变动，不仅产生暂时和局部的影响而且会产生比消費者需求方面的变动还

^① 这个問題与发生經濟波动的关系，在后面将作更充分的討論（本书第6章和第231頁以后）。

要大的影响呢？这种消费需求的变动——例如，需求从棉布轉到人造絲，从磚轉到水泥，从煤气轉到电气等等——不是經常在发生而且使消费行业范围内的各种不同工业的“比重”經常在移动嗎？但是消费品行业方面的活动的普遍下降也会产生特殊的后果，因为制造生产器材的行业是依賴制造消费品行业的，而对前者的需求，就某种特殊的意义來說，是从后者“得来”的。这就构成对前面所說的“对商品的需求并不是对劳动的需求”那句話的一个重要的修正；正如端尔平先生(Mr. Durbin)最近所着重指出的，^①这也含有一种意思，就是消费品在和生产資料比較之下的需求变动要比消费品之間的需求变动有更根本的意义。当利潤下降发生在消费行业的时候，这可能意味着对生产資料需求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普遍的危机。这就是消费不足学說所抓住的真理的一面。这是比例失調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形式，它的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在任何具体情况之下，在任何一定的時間內，資本总是凝結成多少比較經久的形式，来适应特殊的用途而且只适应那些用途。約·倍·克拉克所說的建筑“工厂，然后再建筑更多的工厂，以至于无穷”是永远不会實現的，因为在现实的世界，工厂的专业化总是为了适应与最近将来的消费有关的个别需求流量而不是为了适应扩展到无限未来的需求流量。因此，在消费发生变动的时候，这种变动的影响就会沿着需求的趋势反应到原来与它有联系并与之相适应的那种中間貨物^②的

① 見“购买力与商业蕭条”，第83頁。

② 中間貨物指还能加工制造成其他种产品的貨物，例如棉紗可以制成棉布，棉紗就是中間貨物。——譯者

制造和基本建設的过程上去。^①

虽然这种比例失調的形式可能是普遍危机发生的因素，但是也并不一定如此。平衡的破坏也可能来自相反的方向，首先表现在制造生产資料工业方面的利潤和活动的下降。的确也有一些事实可以证明，这是危机发生的最常见的形式。約·摩·克拉克教授在分析他所能利用的美国数据的时候指出：“就我們所能作到的观察來說，都是趋向一个結論，就是一般消費者的需求并不是引导而是随着消費財貨生产的变动而变动，这就是說，需求的上下波动主要是因为生产率的变动增加或减少了当时工人的购买力。……开始的变动是在离开消費者更远的阶段，这就是生产的阶段而不是零售的阶段。”^②“工資总数”（即工資支出）在繁荣的后期比在前期增加得更快，而工业的生产，特别是基本建設財貨的生产，却随着擴張的进行而呈現不断降低的增长速度。^③

但是讓我們回到馬克思所拟的“扩大再生产”的分类表上来：注意一下他在处理这些分类表的时候所包含的假定是有益处的，因为研究这些假定就立刻会引导到馬克思危机学說的另外两个——而且在某些方面更为基本的——要素。第一，他似

① 的确，这里所說的只适用于对原有資本的利潤。这并不是說，投在新的、（由于扩大生产生产資料的工业）跌了价的生产資料上的新資本也不能获得以前的利潤率（除非有各种力量起着作用，促使一般利潤率下降）。当消費品的需求下降的时候，这些新的生产方法还未能加以利用；而且消費品工业的衰落会抑制对基本設備貨物工业的需求和擴張，从而阻碍了对这些新的生产方法的投資。

② “商业循环的关键因素”，第 48、53 頁。

③ 同上书，第 50—53 頁。

乎曾經假定过，新的投資結果并不会引起資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这就是說，所有的投資完全用于郝特雷 (Hawtrey) 最近所說的資本結構的“加寬”而不是“加深”那一方面。^① 他在写第三卷开始部分的时候心里所想到的就是不发生这种情形的情况。第二，他开始就假定“扩大再生产”(或新的投資)是照一个不变的速度进行的。一旦放棄了这个假定而采用这样的例子：或是再生产的速度增加或者是儲蓄之風大为流行而同时沒有任何投資的行为^②，那就会产生卢森堡的主要論点即所謂剩余价值的“实现”問題。馬克思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釋这个問題的。如果資本家决定积累(或儲蓄)他們过去用于购买消費品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末，消費品的卖主就会有卖不了的存貨留在他們手里。这样，消費品的卖主又从哪里去得到錢来投資呢？如果銷售这些財貨不能使货币“从流通中撤回而形成一种儲蓄或实际上新的货币資本”，那末，对新的資本財貨的需求就不可能发生而积累的程序也就会中断。用某些現代經濟学家的話來說，这就是“儲蓄的冲动結果沒有生效”。这是“一个新的問題，这个問題的存在对于当时所流行的、认为某一类商品(經常?)是与另一类商品相交換的那种意見來說，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③。馬克思把他对这个謎語的答案一直保留到第二卷的最后一节：这就是消

① 我要感謝卡萊斯基博士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假定不一定包含在馬克思的图表內，因为在这些例子里面，不变資本对可变資本的比例是指消耗了的不变資本而不是指它全部現有的数量。但当他举出数字的例子，說明新的投資如何分配在这两类資本之中的时候，显然他是有这种假定的。

② 他所謂“片面的銷售而沒有相抵的购买”意味着“货币从流通中撤回而形成一种相应的积蓄”(參閱“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5、626、633—636頁)。

③ 同上书，第638頁。同时參閱沙尔特莱(Sartre)：“馬克思危机学說的研究”。

費品工业可以通过財貨对货币的单方面的交换从黄金的生产者那边为它們的財貨找到一个市場。加速的“扩大再生产”，只有在經濟体系开始运用新的货币的时候——但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順利地实现。虽然这个答案在表面上有点近似卢森堡的答案——积累必須有外界的市場，使資本家所希求积累的剩余价值能在銷售的行为上得以“实现”——但是馬克思的答案和她的見解有两个基本不同的地方。我們已經說过，困难只发生在儲蓄速度增加的情况之下；而且馬克思所說的是，用黄金抵償銷售的財貨是解决这个問題的一个办法，她所說的則是財貨出口来和其他財貨交换，这并不一定能为国内无法脫售的剩余消費品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①

可是认为积累可以长期进行而不致改变“資本有机构成”的想法是一个很抽象的假定。一則，这个假定意味着，如果可变資本能用同样的速度随着全部投資的进行而增加的話，就会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劳动后备軍，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在資本的“加寬”还没有前进到很远以前，劳动后备的耗尽就会造成工資迅速上漲的趨勢，而这种工資迅速上漲的趨勢本身就会促使利潤率下降。^② 因此随着資本积累而发生的正常現象就是資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而且如果不是被“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所抵消，

① 應該注意到，資本輸出(伴以出超的貨物)也会为馬克思所指出的問題提供同样性质的解决办法——一种单向的交换行为，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对有价证券而不是对黄金的交换。馬克思沒有明显地說出，使扩大再生产能够順利地保持在不变的速度上应当具备哪些条件。但是从他的图表上，似乎可以看得清楚，那些条件就是在第一部类的可变資本加剩余价值($v+s$)底用去部分應該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資本(c)加剩余价值(s)底積蓄部分。

这种变动就会促使利潤率下降。似乎很清楚，馬克思把这种利潤率下降的趋势，不仅看作是形成长期趋势的一个原因而且也看作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也就是为什么积累和扩大的过程会有打銷自己的后果而不可避免地又引起危机复发的根本原因。

但是馬克思自己所提示的相反趋势又是怎样的呢？有人說，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一种邏輯的基础可以假定，究竟这两种趋势之間哪一种会占优势；认为他只列举了这种“相反的趋势”，把它們放在他以前的分析的一边，來說明为什么在事实上“这种下降（利潤率）不会更大，也不会更快”^②。似乎沒有疑問，馬克思曾經充分預料到，随着資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进展，利潤率在事实上是会繼續下降的。至于他沒有預先証明，究竟哪一組的影响会超过另一組的影响，那是一个遺漏，它的原因我相信不是因为“資本論”第三卷沒有写完而是有意的，其所以有意是因为，如果认为可以抽象地提出任何答案或者关于孤立地来看

② 某些現代的作者认为，当劳动后备用尽的时候，貨幣工資的上漲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这种情况，而是通过整个制度陷入急剧动蕩的状态同时促成“高度的通貨膨脹”而破坏了这种情况（參閱罗宾逊 [J. Robinson]：“就业学說論文集”）。但是似乎很清楚，馬克思是坚持李嘉图的意見的，就是貨幣工資的上漲，通常会导致实际工資的上漲和利潤的下降；在某一节里面，他还批評过一些人，这些人认为貨幣工資的上漲，会引起物价的同样的上漲，而且他还认为，对工資財貨的更大的需求会促使物資从奢侈品的生产上轉移出去，因而增加前者的供給，同时减少了后者的供給。

③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4頁。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相对剩餘价值的增加以外，馬克思在他的“相反的趋势”里面还包括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他所謂“不变資本各要素的跌价”；还有“相对的人口过剩”的形成，这种形成可能对工資水平有一种压低作用；最后就是国际貿易的影响（后面有一章会讲到）。

待的技术改革的数据，认为由这些数据可以机械地演繹出任何普遍适用的結論，这都是与他的整个历史方法不相符合的。沒有疑問，馬克思所想像的情况是，实际的价值变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技术改革以及在一定时间和阶段上的阶级关系的特殊情况底相互影响的結果。他的研究方法的全部重点是在一定时间和阶段上的阶级关系在形成“經济社会运动規律”方面起着支配一切的影响。（与这个决定性的阶级关系有关系的因素包括劳动力的供給条件，工人是否在工会組織以內等等。）这个运动規律不能单纯从技术方面去解釋；不能看作是对生产技术变动性质的概括底一种简单的推論。这些互相冲突的要素的相互作用可能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之下发生不同的实际后果。現在常常有一种傾向（斯特拉彻[J. Strachy]对于这个问题的近作^①我认为也难免这种傾向），就是对于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解釋得过分机械，把它說成好像这种看法所根据的是預測利潤会沿着一条不断向下的曲綫下降，直到某一点上，这个制度就会突然停止活动，正如同引擎因为活塞后面缺少充足的蒸气压力而停止活动那样。正确的解釋似乎應該是，馬克思已經看出，趋势和相反的趋势就是冲突的要素，而这个制度的一般运动就是由这些冲突的要素产生出来的：先是各种力量的冲突获得平衡，于是出現一个平衡的运动——只是“偶然地”出現——然后又引起平衡的剧烈破坏以及附带的波动，这些平衡的破坏和波动在資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之下所表現的就是危机。底基图样——事物进程

^① “資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另一方面，有的作者把馬克思的学說描写得好像完全是一种关于比例失調的学說而忽略了利潤下降的趋势。参閱鮑尔恰特(J. Borelhardt)所著“人民的馬克思”一书中特别是关于危机的評述。

中的限制因素——可能就是技术条件，就像骨骼对于軀体的限制一样，但是骨骼并不是全部的形式。

那末，是不是有人能說得更明确一些，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这种趋势会压倒那些相反的趋势呢？

讓我們假定有“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存在的一种情况，这也就是在原有的就业人数之外还有很多剩余的劳动者。^①这可能是由于以下的几种事实：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大于資本积累的速度；或者是因为劳动被机器所代替的程度比新工业方面的投資所能吸收的更快；或者是因为属于这个經濟体系的某些区域还在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积累”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或小生产者正处于被剝夺或无产階級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就是李嘉图所描繪的資本主义前进的康庄大道：資本积累的每一个新高潮都可以用来重复和扩大原有的生产过程，用不超过过去的价格吸收新增加的劳动力阶层，同时照以前的剩余价值率剝削这些新阶层。換句話說，就是剝削的範圍可以与資本积累用同样的速度扩大。^②因此，不一定会发生利潤率的降低；由于同样的理由，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也就沒有原因会使資本有机构成发生任何改变。^③每一次的生产周期会比以前大，但資本分为不

① 这就是今天的經濟学家所說的，所謂劳动供給对于一般工业具有无限彈性的一种情况。我們也假定，原料和食物的供給是完全有彈性的。

② 參閱馬克思：“假設已經有充足的資本积累，在剩余价值率，从而劳动的剝削程度为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創造就不会在劳动人口以外，再遇着什么别的限制”（“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頁）。

③ 这里面的理由可能是，企业資本家原来已經按他們所认为的最有利的比例，把資本分配成两部分，一部分购买劳动力，一部分购买机器、原料等等。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沒有变动，就不会有使資本另外按其他的比例来分配的动机。

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的比例还是没有改变；同时只要工业中生产生产資料和生产消費資料的比例能繼續与社会货币所得用于投資（包括修理和补充）和用于消費品的比例相适应，就不会发生“处理”产品的問題。

如果有某些新技术方法的发明冲击了这种情况，使机器更有效率或者創造了机器的新用途，那就会有改变資本有机构成的动机，造成在比例上用更多的資本投在不变資本方面，用更少的資本投在可变資本方面的趋势——也就是用机器代替工人，或以“积蓄的劳动”代替“活劳动”的趋势。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变动并不一定会造成利潤率的下降。如果我们假定，这种新的方法能应用到所有的企业上面，包括农业和生产生产資料的工业在內，那末，利潤率还可能上漲而不是下降。因为，假使没有会使实际工資提高的影响（这是假定由于劳动市場的过剩而造成的一种情况），那末，劳动力的价值将会随着生活資料价值的下落而下落，从而增加了“剝削强度或剩余价值率”；①同时

① 柴田敬(K. Shibata)教授曾經在1934年7月号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經濟評論”上引用了杜岡—巴拉諾夫斯基(Tugan-Baranovski)的論点(“英国商业恐慌的理論和历史”，德文版，第212—215頁)，来表明有机构成的提高，必会促成利潤率的上漲。这种論点所根据的是一种特殊的假定，就是(在他所举的例子中)由于这种变动的結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一倍。所以能得到这种結果是因为把总的实际工資数减到原来的一半(总产量相同)；在这个特殊的假定之下，当然会含有这样的結論。这个假定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是相似的，但是与下述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是不合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变，而成品的价格却用同样的速度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落，同时剩余价值率也照旧不动。我曾經获得特殊的机会，看到狄更生(H. D. Dickinson)尚未发表的、关于这个問題的数学札記。他提出了一个证明，說明即使在前一情况之下，利潤也还是会下跌。这个問題的关键在于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有机构成变动之間的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将在不同的程度上降低了机器和原料的价值。換句話說，促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和“不变資本各要素跌价”的相反趋势，可能会压倒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之間的比例的最初变动中所潜伏的利潤率下降的趋势。而且，节省劳动的新发明对于增加“相对过剩人口”的那种趋势，还可能会引起更进一步的影响，把工資压低到原来的水平以下。^①

現在讓我們假定劳动市場的另一種情况，就是“相对过剩人口”不多，而且正在被工业的擴張完全吸收进去，同时中間社会阶层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較比緩慢或已經中止；或者是另外一種情况，工人有了充分坚强的組織，能够抵抗降低貨幣工資的任何压力，甚至会迫使雇主在对劳动力的竞争所許可的範圍內提高工資。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資本积累的擴張以及市場所能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的接近枯竭（只須接近而不必达到），資本家对劳动力的竞争就会造成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这不一定是普遍的上漲，但至少会发生在某类劳动和某种工业里面。这是在工业繁荣接近“頂峰”的时候一种常見的情况。換句話說，在这种情况之下，資本积累势必超过剝削範圍的任何可能的扩大；而且既然缺乏某些加强原有範圍的剝削方法，資本的单位利潤率也就必然會下落。这种新的資本，由于碰到了有限的、廉价的后备劳动力，必然會更加轉化成不变資本的形式，也就是轉化成新的技术方法，以致提高了資本有机构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不

① 如果这个新增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話，它就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倒轉原来提高不变資本对可变資本比例的趋势。換句話說，它会轉移平衡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即劳动力的价格），并且像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技术上有新的发明，可是退回到更原始的技术方法仍然有利。

变資本与可变資本之間的比例的变动是与利潤率的下降有关系的，因为这种变动就是由劳动市場上相对缺乏的情况所促成的，而这种情况又使利潤率的下降不能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态获得任何迅速的或至少是相等的“补偿”^①。

馬克思对于这种利潤率下降趋势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他对薩伊和李嘉图的答复的重点上面看出来，他强调指出，他們忽略了資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生产”（为社会目的所推动）的制度，而是一种为利潤而生产的制度。因此，应当考虑的不是对于交換的抽象限制，而是在某种利潤率上对于生产和投資的限制。他譴責古典市場規律，因为这个規律完全着重在生产 and 消費，也就是

① 在这里所作的区别，相当于希克斯(J. R. Hicks)对于“自发的”发明和“引发的”发明所作的区别(“工資論”，第125頁)；前者构成一种新的知識，后者是原已知道的技术方法，但以前由于还能用相对的低廉价格获得劳动，所以使用起来无利可图。应该注意的是，另一类型的“补偿”，也就是不变資本的跌价并不足以抵消在这种情况下之下的利潤下降的趋势，因为假使这种跌价等于机器之类的东西和劳动之間的比例的变更，那末，不变資本对于可变資本的比例，用价值来计算，是不会发生变动的。这种发明，严格地说，并不属于“节省劳动”的类型，而且如果早已知道的话，采用起来就会有利可图。端尔平先生(在“购买力与商业蕭条”一书中)认为以往的利潤率可以繼續維持，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与投資的增加成比例，这种論点似乎是由一种特殊的假定来决定的，而这个假定又包含着这样的結果：就是“发明的速度”与“儲蓄的速度”成比例。因此他所获得的成本按比例下降的結論是儲蓄加上新发明的共同結果。他在后一章所說的关于儲蓄速度的增加的结果，是不是确实可以同样适用于不变的儲蓄速度和靜止状态的技术呢？当然無論是端尔平先生的假定，或我在上面所說的两情况中的前一情况所包含的假定，都与一般所說的“充分平衡”不相符合，而且假使劳动市場的供給情况，足以保持实际工資的不变(彈性的供給)，同时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足以使生活資料和其他商品一道按比例跌价，那就根本不会有“引发的发明”的动机。

着重在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面，以致把它們看作实际上是等同的东西，因此遺漏了在这些要素之間能造成不平衡的真正因素。在他們把交換解釋成只是一種C—M—C(商品——貨幣——商品)的過程的時候，他們就忽略了資本主義生產是以M—C—M'(貨幣資本：商品、勞動力：貨幣資本加上利潤)的关系作為它的特征的；而且也忽略了，如果在这个連鎖的交易內實現預期利潤的條件受到阻礙，那末，這種交易就會停止，結果就會破壞一大串的其他和附屬的交換活動。馬克思寫道：“李嘉圖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或更確定的說，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當作生產的絕對形態來把握，從而，在他看來，它的生產關係的確定形態，決不致與生產一般的目的相矛盾，或妨礙生產一般的目的——富裕……。在我們論價值和富時，我們應只把社會全體放在眼·里。但若我們是說資本和勞動，那就不待說，‘總所得’只是為要創造‘純所得’才存在的。”“既然否認了危機，他們(李嘉圖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會把包含着相反和對立的東西說成是一致的。……李嘉圖和其他的人對於生產過剩的一切反對理由都有同樣的基礎：他們把資產階級的生·產，看作是在購買和銷售之間沒有區別(直接交換)的一種生產方式；或者他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社會的生·產，在這種生產之中，社會是按照整個計劃，根據滿足不同需要所必需的比例，來分配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資源的。”但是正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利潤而生產，所以“資本的生產過剩”就成為可能，這意思就是說，資本積累的数量已經不能維持原有的利潤水平。^①“但為了要把勞動手段和生活資料，

^①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5頁；參閱同書第2卷，第594頁以後。

当作劳动者的剥削手段，依照一定的利潤率来发生机能，劳动手段和生活资料是周期地被生产得过多……不是所生产的财富已经过多。但周期地，有过多的财富，在它的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态上，生产出来了。……由于这个理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生产规模上就会遇到障碍；这种生产规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是不足以应付这种障碍的。生产在某一点上停顿了下来，这一点是由生产和利潤的实现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需要的满足来决定的。”①

利潤率随着基本设备现有数量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这个观点在最近某些关于商业循环的学说里面占着显著的地位（例如凯恩斯和卡莱斯基）；它和危机的因果关系不需要在这里详述。但是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明利率会同时提高（或至少是不易变动的）而不会降低，它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利潤率的下降会促使投资减少。有的人甚至认为，与其说危机是由于利潤下降，还不如说是因为利率的不能下降；强调这种说法的实际含义可能是认为，困难的原因不能归之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可以用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的，因为这种政策在投资进行的时候可以允许利率照同样的速度下降。的确，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白地指出利潤、利率和当时各项投资决定底数量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把这两方面（利潤和利率。——译者）的各自影响分别得很清楚——这种分别，正如哈耶克（Hayek）教授所说的②，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错

① 参阅“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8、309页（重点是另加的）。马克思承认，也许把这种生产过剩称作相对的（与某种阶级关系和某种利潤水平有相对的关系），而不是绝对的要比较恰当。

誤地拋棄了——而且他在以後討論利率的一章里曾經說明為什麼他認為，當危機正在醞釀的緊急期間，利率會有上升的趨勢。至於馬克思的着重點是否正確，我們這裡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就是認為利率的變動對於抑制貨物暢銷的作用比許多作者過去所想像的要小得多，這種說法是不無理由的^③，而且有充分根據可以懷疑貨幣政策具有足以影響長時期利率的能力。^④

如果馬克思的學說在各要點上和大部分消費不足學說的說法有所不同，那末，前者和後者到底有什麼一定的關係呢？總是有人把他的學說解釋為消費不足的學說，究竟有什麼道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是很難作答復的，因為這樣一個答復需要對消費不足學說的各式各樣的說法，作出比過去所已作的更為嚴格的分析和分類。他的學說當然不是下面三種意義上的消費不足學說：他既不是說，如果在消費的需求上不出現某些新的來源，投資必然會引起生產過剩；他也不是說，較高的工資就足以防止危機和挽救蕭條；他更沒有說，消費不足總是促成危機的原因，所以危機是從生產消費財貨的工業中開始的。同時也很清楚，他決沒有認為作為實現利潤的一種限制因素的消費水平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曾經看到，馬克思在一個地方認為危機不是“在生產範圍內”發生的，而是在流通或交換範圍內的一個不

② “利潤、利息與投資”，第5頁。馬克思認為利率有一部分是受（從長時期看）利潤率制約，但隨時也受貨幣資本或貸放基金的供給和需要的制約。（參閱樊弘在“經濟研究評論”1939年10月號和亞歷山大(S. Alexander)在同一雜誌1939年2月上發表的文章）。馬克思否認有“自然利率”這樣的东西——指由“實際的”要素或生產要素來決定的利率。

③ 參閱卡萊斯基：“論經濟波動的理論”。

④ 參閱哈羅德(Harrod)：“商業循環”，第168—170頁以及其他有關各頁。

平衡的要素上发生的。这就是指儲蓄的速度增加，以致消费品工业中发生供过于求的那种情况。但是还有几段文章好像意味着，他在比上述一点更为基本的意义上，把消费需求看作一个限制的因素。以下两段是那些把他的学說解釋作消費不足学說的人所最常引用的文字。“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在这里：人民大众是貧困的，他們的消費是受着限制的；但与此相反，資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这样去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它的限制。”^①这是出现在馬克思一篇批判性的文字里面的，他批判了认为經濟危机是由于缺乏資本而引起的那种見解。紧接着这段評論的上下文似乎不很明确，对于它的意义的确并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孤立地看，这句话无疑地是容易被解釋作一种简单的消費不足学說的，它好像与馬尔薩斯和罗貝图斯的意見相似。但由馬克思在所有其他地方所說的說来看，特别是由他对罗貝图斯的見解——即认为“危机是由于缺乏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而且“这种弊病可以用提高工資的办法来补救”^②——的直率的批判来看，显然我們又不能作这样的解釋。第二段的文字是这样：“直接剝削的条件和它的实现的条件，不是相同的。它們不仅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开；在概念上，它們也是分开的。一个仅受限制于社会的生产力，別一个却受限制于不同各生产部門的比例性与社会的消費力。但后者既非由絕對的生产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决定，而是由那种在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消費力决定，这种对抗性的分

① 参閱“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2頁。

② 这后一段(引自第2卷)比前一段(引自第3卷)写作的日期晚。

配关系，会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减到一个只能在比较狭隘界限内变动的最小限度。”^① 马克思在写这几段文章的时候，究竟心里想的是什么，下面的意见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今天我想是会有相当广泛的人接受这种假定的。在原有资本上所能实现的利润量，不仅经常要看这种资本在与当时的投资和消费结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分配在资本财货工业和消费财货工业之间的，而且也要看当时的消费加投资的总量多少为定。增加消费将是增加利润的最持久的办法，因为除了它的暂时影响以外，它还会增加对未来的资本财货（它提供“扩大”资本的余地）的需求，因此对新的投资（由于用尽投资机会）可能降低利润率的趋势，产生一种延缓的作用。^② 但是通过提高工资的办法来增加群众的消费，只是一手得来，一手失去而已；因为它使需求增加，可是也同样使成本增加。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使消费按比例地同劳动生产率一块增加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另一方面，增加投资虽然暂时可能在增加需求方面有类似的影响，却会发生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因而引起在最近的将来发生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是整个布局中的一个附带事件——一个重要的附带事件；而且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危机的一面和矛盾的一个要素，这种矛盾由这个制度的周期破坏而表现了出来。但是同时，它仍旧只是一面；似乎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90页。

② 既然消费水平限制着消费行业的规模——因而限制了这些行业内原有类型的设备数量——所以消费的数量越小，一定数量的投资势必更快地加深资本结构，或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用后面一章的话来说，消费水平越低，一定速度的投资就会更快地达到“资本饱和点”。

明显，^① 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範圍內的矛盾——就是由于資本积累而引起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与資本获利性的不断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才是問題的本质。

但是如果消費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限制因素，显然首先劳动的供給是創造剩余价值的一个决定性的限制因素，而且馬克思就因为这样才把它看作是基本的。馬克思认为危机并不是临时的失調，而是在形成这一制度的长期趋势方面所发生的一种积极的作用——它会对这个制度在危机以后所安定下来的那种新的平衡发生反作用；而且他抱有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危机对于他所謂“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軍”方面所引起的影响。“危机常常只是現有矛盾之暫时的暴力的解决，暴力的爆裂，由此暫時地，把已經破坏的均衡再形成起来”^②。危机的主要影响，就是再創造或扩大这个“产业后备軍”。这又会影响到劳动力价格的跌落：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是多大或多快，那就要由工人抵抗工資跌落的力量的各种因素来决定。的确，这些削減工資的直接影响可能加深危机，因为工資跌落对于消費財貨的需求和价格会有貶低的影响。但是既然它代表着劳动力的实际价格的跌落，它也就能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創造条件，因而为投資过程的恢复鋪平道路。这种劳动力的跌价，也会在某种程度

① 例如，瓦尔加在他的“大危机及其政治后果”一书中，把馬克思对于危机的定义解釋为“生产能力”和“消費能力”之間的冲突，因此显然是照卢森堡的意义把恐慌解釋为市場和商品处理的問題。他承认这是用“大大簡化和不完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問題的。在哥萊(Corey)的“美国資本主义的衰落”一书中，特别是在第 66 和第 71 頁里，也显然有类似的傾向。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96 頁。

上反应到原来的提高資本有机构成的趋势上面：它又会使比較原始的技术方法成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因而延緩了技术改革的过程。

所以这种“产业后备軍”的周期的征募好像是这个制度的一种杠杆，用来抵抗对資本价值的任何严重的侵蝕，并使資本积累所引起的利潤率降低的趋势获得补偿。这就是馬克思所謂“資本主义自己的人口規律”；它說明失业和貧困的存在，不是因为人的生产能力不足以向自然爭取生存，而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剝削条件限制了就业和工資；并非因为人口在任何絕对的意义上是过多了，而是因为从資本获得預期的利潤率的可能性來說，是相对地过多了。所以危机作为資本家对預期利潤的失望的一致反应，它的作用就好像使資本家階級必須采取一致的行动，像壟断資本家那样，来和工人对抗。我們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等到接近了充分就业的情况，一等到投資将原有技术方法的利用扩充到一定的边际以外，一等到生产者剛剛可以从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上得到相当好处的时候，这种果实就会立刻从他們的手中搶夺过去，而劳动市場的铁則又会使他們再度淪入卑微的地位。

我們在上面已經区别了投資范围的粗放的发展和集約的发展。我相信这个区别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帮助解釋了危机本身的历史，也就是危机所由发生的环境和危机所造成的新发展，而且也因为它关系到馬克思的工資学說，因而关系到无产階級斗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在資本主义竞争的黄金时代，产业后备軍的周期征募是一种方法，完全可以用来加强不断增长的資本积累的剝削范围。这也許可以看作是資本主义保持利潤率的公认的标准方法。但到了十九世紀的

最后25年，随着劳工组织的加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劳动市场的“刚性”^①的情况，这个公认的标准方法就失去了一部分效力，而70年代和80年代进口食物的落价，使工人在提高实际工资方面所获得的好处，似乎和使资本家在降低劳动力的货币价格方面所获得的好处一样多。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工资学说和李嘉图的一样，都是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的，这种说法真是太普通了。^②但是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否认过这一点。而且很明显，马克思认为工资是保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上的假定，不过是一种“第一近似法”而绝不是适用在劳动市场上任何情况的普遍的“铁律”。的确，当他在第一国际的大会上和威斯登（Weston）先生辩论工会问题的时候，他曾经明确地驳斥过这种说法。^③如果他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并不是拿这种人口规律作根据的，那就似乎他的理论并没有提出过任何理由来说明何以劳动力的价格不会上涨到和产品价值相等。是什么东西阻止资本积累——和它所引起的、不断增长的劳动需求——去提高工资水平，直到剩余价值消灭，以便使资本主义凭它自身的动力，来消除它所依以成长的阶级的不平等呢？我们已知，这个问题——剩余价值继续存在的理由——早就是政治经济学史里面的一个中心问题，许多肤浅的辩护士的答案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想出来的。在这里发生作用的决定因素——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这个制度制止它本身消灭的预防机构——在于双重的反应，通过这种反应才能周期地征募到产业后备军：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倾向采用

① “刚性”指劳动力价格的不变。——译者

② 例如罗素（B. Russell）就是这样说的。见“自由和组织”，第231—232页。

③ 是以“价值、价格与利润”这本小册子形式出版的。

“节省劳动”的改革的趋势^①，以及在利润率出现显著下降的迹象时会发生的延缓积累和缩减投资的趋势。有两个因素不断起着作用，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使剩余价值仍有获得的可能：这在一方面就是劳动后备的内在的征募——这仿佛是劳动市场在需求方面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而在另一方面，就是靠着人口的增加，社会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或扩充投资到未经开发的殖民地区而进行的新的劳动供给的外延的征募。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两个所发生的作用就是资本主义继续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进步的受阻和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工资“太高”；这就是在经济文献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说法。但这种说法和一个假定有密切关系的：某些最低限度的收益对于资本是“必要”的，而且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个假定上，才有任何意义可言。正确的说法不如说是，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利润和利息过高的缘故，因为这样的说法可以使人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和“社会生产”的制度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就是资本的本身”^②。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产业后备军”还比较容易征募，不会由于需求而对劳动市场发生任何巨大压力。“原始积累”的过程，通过对小生产者、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剥夺，不断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因此，这种初期的危机虽然可能是尖锐的和猛烈的，可是多半是短期的而且容易挽救。但是一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那种萌芽时期的顺利情况就消逝了。劳动者的供给不能再依靠掠夺小资产阶级而扩大，至少不能像以前那

① 参阅希克斯：“工资论”，第123—125页。

②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7页。

样規模。随着劳工組織的发展和階級关系的尖銳化，剝削範圍的強化就遇到更多的障碍。构成資本主义經濟初期和后期危机的主要区别的，似乎就在利潤率下降的基本补偿方式的难易之間的区别。扩大剝削範圍——把它扩充到原有界限以外的新的和未經侵入过的阶层——的新方法不得不加以发掘。当这些範圍也接近枯竭的时候，又要发明更新的方法，来加强国内的发展，就像現代历史照着无情的邏輯方式所显示的那种情况。今天資本家已經在本国和殖民地地区激起了斗争，而收获果实的将是各国的人民。

第五章

現代經濟學的趋势

当一种学說的内部一致性的形式問題已經解决以后，人們对于这个学說的采納或是拋棄，就要依它所根据的特殊抽象方法是否适当为轉移。这必然是一个实际問題，要由情况的性质、問題的特点以及这个学說所要牵涉的活动来决定。我們时常听到有人称赞一种学說，认为它比和它对立的公式具有更大的概括性；从表面上看，这种解釋似乎是足以使人信服的。但对这样的說法至少在沒能确定这种更大的概括性不是以牺牲现实性的很高代价得来以前，最好还是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要对某一种情况的特殊因素作抽象的分析，广泛地說，有两条道路可以遵循。第一，人們可以把存在于任何实际情况中的某些特征排除于他們的抽象方法之外，这样做，或者是因为这些特征比較容易变动，或者是因为它們对决定事物的发展，在量上比較不重要的緣故。在分析的时候，如果沒有把它們列入，虽然会使計算的結果只能成为一种对现实的不完全的近似值，但是这比忽略主要因素而只估計次要影响的作法，总还是一种可靠得多的指南。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創立一种投射体在真空內运动——这是在现实中永远見不到的——的抽象方法，以便估計哪些是当投射体在具有阻力的媒介物中推进时控制它的軌道的主要因素。至

于所選擇的某些假定是否正确，只有由經驗来决定，也就是需要了解实际情况如何演变以及各种不同因素的存在与否究竟会引起什么具体差别。总的說来，这个方法是能够产生有效的結果的（如果所選擇的假定是适当的話），只要在后来的近似值中所导入的次要因素的效果，只是在原来的公式上添上某些附加的参数，而不是变更公式本身的結構。^①

第二，人們的抽象方法也可以不根据哪些特点在某种情况中是主要的，哪些是非主要的事实证据，而只是按照一种形式的程序，将龐杂情况中的共同点加以合并，然后从类比中加以抽象化。这就像早期的一位科学著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按照事物的普遍性质得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一般定义……（依靠）沒有充分知識基础的一般名詞”，并且往往从“不是完全根据事物本身的充分資料而搜集的題材中，作出最巧妙的結構”。^②当然，在一定的限度以內，这样的方法不但完全有效，而且是任何概括的一个要素，但是除非它所概括的是它所指的現象中的一些共通的东西，那末，这种概括就不成其为概括而不过是一种虛构的假設罢了。这种方法的危險性在于把它推进得太远，以致超出了限度，使它所包含的因素已經不再是决定当前問題性质的主要因素了。对于那成为注意中心的特殊情况来讲，这好比是抽象化在寬度上所得到的利益，在深度方面却完全丧失而有余。还有一种更大的危險性，就是可能已經超过了这种限度而还不知道它已經超

① 我相信，这就是約翰·穆勒所謂适用原因組成原理的一种情况。为了进一步引证，請參看本书第六章前段。

② 霍格彭（Hogben）教授在“科学与社会”第1卷第2期中摘引斯普賴特的一段話。

过。这种逐渐提炼类比的方法，往往是除了引到使人发生混乱的、似是而非的理論上面去以外，不会得出什么結果。在概括采取数量形式的領域內，这种方法可能有比較合理的表現，而濫用的可能性显然也就少些。而且情况可能是这样：这种方法即使用更抽象的形式，也会产生某些真理的成分，因为只要它所使用的抽象方法能保存实际情况所共同具有的任何要素，它所假定的关系就必然能代表每一特殊問題里面的某些方面的真理。我們也許可以举概率論作为例子，因为这种理論可以应用到一切博奕性活动所共同具有的特点上面；或者可能是更徒劳无益的例子，有人企图发展能适用到一切語言上的一般規則。我們还可以再举一个更是徒劳无益的例子，就是經濟学家拜朗 (Barone) 所企图制定的一套公式，来证明同一个規律如果能支配放任主义世界，一定也能支配集体主义經濟。但是在所有这些抽象的体系里面，都存在着如下危險，即把一个人的观念看作是现实存在；把假定的关系看作是任何实际情况中的决定性关系，而不是偶然的并为其他特征所决定的关系；因此也就过于輕率地断定它們会适用于新的或不完全了解的情况，結果就成了抽象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危險，那就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会采取一种純屬想像的或者甚至自相矛盾的假定，而且一般地不会注意到，从这种抽象的問題說明所演繹出来的推論的意义必然是极为局限，同时也不会注意到，在出現其他具体因素的时候（这些因素也許就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的主要影响）可能引起的修正。尤其常見的是，照这种抽象方式所提出的問題的說明，除了形式的意义以外，別无內容可言，而至多不过是向人說明，表示某种关系的式子在人們的任何方程式組里都可以找到它的

适当的位置。^①但是利用这些問題的說明，并在这些問題的說明上建筑推論的人，却很少注意到这种局限性，而把它們当作现实世界的“規律”来应用的时候，总是想从它們实际的空洞內容中找出比原来所能具有的还要多的含义。

在政治經濟学这样一門牵涉到錯綜复杂的实际問題的學問上，为了要作到脚踏实地，即使因此而牺牲了定义上的一些邏輯細致性和代数公式上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但往往会引起誤解的精確性，似乎也不是一个坏的办法。一般說来，古典經濟学家和馬克思所使用的抽象方法就是屬於我們上面所讲的两種类型中的第一种。所有完全的市場，同一性的劳动以及相等的資本有机构成等概念，目的都是要概括实际上决定交換价值的最重要因素。巴登 (Patton) 曾經指出，李嘉图主要是一个实际的思想家^②，而馬克思所特別关心的則是使他的理論能包括資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任何其他社会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虽然他們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中的其他或被忽略了的因素会发生扰乱的影响，甚至一种反射影响，但是在决定实际事物的主要形勢上，他們认为这是次要的。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关系的一种特殊制度所特有的东西上面，即使因此而牺牲了更广泛的，但也許是更无用的概括性，也在所不惜。可是从他們那个时期以后，如果說人們在經濟分析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趋向于上述第二条路綫，我认为这样說法也沒有什么不正确。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把交換現

① 有时根据这样一种理由为这些探討进行辯护，认为这些探討是对以后分析的“工具制造者”。也許这确实是它們的主要用途。但即使是工具，在制造上也要相当适合原来所拟定的用途，才能造得更好。

② “經濟学季刊”，1893年。

象从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财产所有制和阶级制度等方面分离出来，加以抽象化，企图得出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的普遍性原则。馬夏尔曾經提到約翰·穆勒，认为他似乎把交换规律看成“很像数理的普遍性一类的东西”，虽然他承认分配是同暂时的社会制度有关系的。^① 我們从抽象市場的普遍关系轉到更完全的抽象化，而今天又被引到凡是在“稀有資財具有交替用途并为一定目的服务”的情况里都一定可以适用的那种关系上面。即使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定义上，无疑地也还是保留着现实世界的某些东西。但却很难使人相信所得出的命題，能掌握解决现实世界的問題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经济规律是要說明实际上将要发生的事物，而不只是說明意义不明的某些变数之間的关系的話，那末，这些說明当然不能作为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指南——或者說，要想用这些說明对任何其他問題作出经济上的判断，也都是不可靠的。

馬克思的观念論里有一个重要的要素，那就是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由一定的社会所形成的抽象观念往往帶着一种虛幻的或拜物教的性质，这意思是說，由于抽象观念被看作现实的代表，它会把实际的社会用顛倒的或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它們不仅把人們的眼睛蒙蔽住，使它們看不见社会的实际性质，并且还把它加以曲解。他所引用的例子，主要是从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概念里找来的。因此，思想和概念，在当时作为对前一个时代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武器，可能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可是到后来就变成反动的和落后的东西了。正是因为它

① “原理”，第 824 頁。

們被看作是構成當時社會的真正本質而不僅是它的抽象的和局部的反映，結果就把現實掩蓋起來了。在經濟思想的領域里（在這方面，初看起來，人們很少會懷疑），不難看到同樣的趨勢也正在發展。也許有人認為，把交換關係的某些方面加以抽象化，以便與社會生產關係隔離開，單獨地去分析，這並沒有什麼妨礙。但實際的情形所表現的是，這種抽象化一旦形成，就被賦予一種獨立的存在，仿佛它代表了現實的本質而不是現實的偶然的一個片斷。概念變成實在的東西，引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抽象化取得了一種拜物教的性質。這個方法的嚴重危險和使現代經濟思想發生混亂的秘密似乎就在這裡。今天我們不僅把交換關係規律和更基本的社會生產關係脫離而加以抽象化，並且把前者說成是支配着後者，甚至純粹從交換關係的主觀方面去研究——從個人欲望和選擇的心理反映方面去說明——因而就把支配實際經濟社會的規律顛倒地描寫成適用於這種神秘領域內的抽象關係了。

十九世紀經濟思想史的分水嶺，一般都按耶芳斯和奧地利學派的新效用學說的出現而劃在70年代內。但如果我們不專注意形式的變更，而更多留心朝向主觀概念和脫離社會基礎而抽象地研究交換關係方面的轉變，那末，我們就會發現主要的轉變還是發生在這個世紀的更早的一些時期，或者無論如何，這種趨勢的開始是發生在那個時期，而到後來才形成更完全的狀態。的確，馬克思曾經提出過以1830年作為“古典經濟學”的最後階段的結束和敞開通向“庸俗經濟學”^①的門徑，以及李嘉圖學派盛名衰落的開始的年代。這就是新的工業資本主義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已經發展成獨立的體系的時期，同時（30年代的許多事

件可以证明)也是无产阶级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第一次以一种团结的社会力量出现的时期。从那时候起,关于经济制度性质的任何论述,都不能再保持“中立”了^②。经济学家们因为愈来愈纠缠在辩护上面,所以就有愈来愈忽略探讨基本社会关系的趋势,而只讨论市场的表面现象,把他们的思想局限在“商品拜物教”的范围以内,并把“交换经济”的规律加以普遍化。到了最后,这些规律竟变成可以决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体系,而不

① 马克思当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把这个名词仅仅当作一种轻蔑的同义语来使用,而是照大陆哲学所习用的一种形容的意义,作为与“古典”相对立的名词来使用的。他说,“我所说的古典经济学是指从配第以来这一切的经济学,他曾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的联系;相反的,庸俗经济学却只在外观上的联系上面打转转……局限在学究式的系统化工作上面,并将陶醉于自己世界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陈腐思想宣称为永恒的真理”(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页附注)。马克思的意思,似乎特别指的是麦克洛克(Mc Culloch)、西尼尔(Senior)、巴斯夏(Bastiat)等人;此外如果萨伊不在内,无论如何他的“注释者”和继承者应该列入。哥莱教授认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也包括在“庸俗经济学”的名义之内,这显然是错误的(同上书,第322页)。

② 对于利润的理论,当然更是这样。这里有一点使我们感到兴趣,就是庸·巴维克把亚当·斯密在利息这个论题上的立场,说成是“完全中立的”;并且说“在亚当·斯密的时候,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还容许这样一种中立,但对于他的门人就不再许可了”(“资本与利息”,第74、75页)。另一方面,照凯南的说法,认为“詹姆士·穆勒……想证明利润存在的合理性,借以加强资本家反对劳工的地位”(“生产与分配学说史”第2版,第206页),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更值得怀疑。詹姆士·穆勒对资本主义生产性质是能够作出一些非常坦白的叙述的,可是如果在25年以后要写出这样的叙述就不能想像了。这种态度的改变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李嘉图在他的第三版的“失言”以后,人们对他的态度。李嘉图是很够坦白的,他在这一版加上关于“机器”的一章,在那里,他说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机器的采用对于劳工的利益是有妨碍的。这种说法吓坏了麦克劳,而他的门人就赶快(在这以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年月里)把这件扫兴的事掩盖了起来。

是被这种体系所决定的规律了。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1873年）的序文里說，英国政治經济学是“属于（无产階級）階級斗争未发展时期”。关于1820年到1830年这一时期，他說，这“在英国是以政治經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見著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不但使李嘉图的学說庸俗化和扩大化，同时也发生了这一学說与旧学派的斗争。曾經有过精采的論战。这种論战的不偏不倚的性质……可以由当时的情况得到解釋”。但是虽然这可以使人回忆到法国在1789年以前的思想蓬勃发展的情况，可是只不过是曇花一現而已。1830年以后，“階級斗争在实践方面同在理論方面一样，都愈益采取公开和威胁的形式”。这就“响起了科学的資产階級經济学的丧钟。……辯護士的厚顏无耻和居心叵測，代替了純洁的科学研究”。即使是忠实的研究者，也被一股歪風所限制而趋于采取模稜两可的妥协和折衷的办法，“来調和資本家的政治經济学与不能再忽視的无产階級的主張”。它的产物就是“肤淺的調和主义，約翰·穆勒就是最出色的代表”。至于这一世紀的最后25年在經济思想上的那种新的轉变，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过約略地提到，或者不大注意到。^①假使他們充分注意到，他們大概会把它看作已經潛伏在“庸俗經济学派”里的原有趋向的繼續，而不是象一般所认为的

① 恩格斯在他为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所作的序文中，附帶地提到：耶芳斯和門格爾的新学說是蕭伯納用来建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費边社教堂”的“基石”（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頁）。但除此以外，他們似乎沒有提到过它。鉴于这种学說对于新的費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就恩格斯只提到这一点來說，他是完全明了这个重要性的。耶芳斯的“原理”发表于1874年；馬克思死于1883年；“費边論文集”出版于1888年；恩格斯活到1895年。

經濟思想上的革命的新事物。归根到底，这种转变，像馬夏尔所經常着重指出的，与其說是本质的改变不如說是形式的改变。在十九世紀的最后 25 年之中，居然有这么許多經濟学家会把他們的貨色夸耀为划时代的崭新东西，并把他們的矛头那样凶恶地指向他們的前輩，似乎可以有一个明显的虽然是不中听的解釋，那就是馬克思后来对于李嘉图的概念的带有危險性的应用。我认为有一件事很可以表明当时經濟学家的情緒，这就是福克斯威尔(Foxwell)有一次在当选皇家經濟学会会长以后，拒絕发表关于李嘉图的演詞，原因是，如果他对这位提出劳資利害冲突邪說的作者加以攻击的話，恐怕就会太激烈了^①；而想反駁社会主义者的願望，在奥地利学派的倡导者方面比在英国还有一种更深的成見。

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认为主要問題在于对剩余价值的說明；正因为李嘉图的后继者不是完全迴避這個問題就是只提供很不充分的解决办法，才引起馬克思的指責和蔑視。在他看来，約翰·穆勒的“生产成本”学說就是对這個問題的肤淺的迴避。把价值当作由劳动价格(即工資)加上平均利潤率来决定的东西，这不是对李嘉图学說的加工，因为既然沒有包括利潤的說明，那就表示放棄了李嘉图体系所曾經提出而从沒有解决的那个关键性的問題。这个“生产成本”的价值学說并未解决任何东西，因为它沒說明“生产成本”又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②。但也有

① 參閱凱恩斯在“經濟学杂志”1936年12月号(第592頁)上发表的文章。

② 关于約翰·穆勒的态度，凱南曾經說过：“至少應該給西尼尔这样一种功績，就是他看到了还没有人对利潤作出滿意的說明。……另一方面，約翰·穆勒似乎完全不知道究竟还缺少什么东西”(“生产与分配学說史”，1893年

其他的人，不像約翰·穆勒那樣不懂得這裡面的根本困難所在而企圖對利潤加以說明，雖然這種說明是膚淺的而且是難以成立的。這些企圖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主要類型：一方面，有些人想用資本所固有的某些創造性，即資本的生產率去說明利潤；另一方面，還有些人想用資本家所貢獻的類似勞動的某種“實際成本”去說明利潤，認為利潤就是這種成本的一種等價物，而不是剩餘價值。

企圖用資本對於生產所提供的“服務”來說明利潤的，在李嘉圖的時代已經有人這樣作了，特別是勞德達爾和馬爾薩斯，還有薩伊，就是龐·巴維克稱之為“愛用矯揉造作的詞句的那位先生”。勞德達爾說，靠機器幫助的勞動，比沒有這種幫助的勞動，在一小時內能生產出更大的價值。“當一個人投入一部分資本而獲得一把鋤頭以後，他利用這把鋤頭在一天之內所播種的土地顯然能夠抵得上50個人用自己的手指甲所播種的那樣多。”^③ 這個差別就代表着資本的“生產率”。馬克思曾經指出，我們反

版，第214頁）。龐·巴維克把約翰·穆勒（再加上耶勞斯和羅雪爾 [Roscher]）歸於利息學說的折衷派，因為穆勒只在西尼爾不能令人滿意的學說上加上一個或兩個要素而已（“資本與利息”，第286、498頁）。穆勒有一個功績，就是他否定了利潤的生產率學說，認為“唯一的生產力就是勞動的生產力”（“政治經濟學一些未解決的問題”，第90頁）。在他的“原理”一書中（第2篇，第15章），他似乎採用了西尼爾的節欲學說，而沒有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或進一步的分析。

- ③ 勞德達爾：“公共財富性質的研究”，第163頁。但勞德達爾承認，利潤可能“在某些情況之下，更適當地稱為獲得的而不是生產出來的”（第161頁）。薩伊說過：“貸款的資本家，是出售他的服務也就是他的器材底勞動”（“致馬爾薩斯的書信集”，李希特編，1821年，第19頁）。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第1卷，配林賽爾版，第60頁里，他不但說到“自然底勞動或生產性的服務”，而且也說到“資本底勞動或生產性的服務”！

对这种說法也正如我們反对任何形式的生产率学說一样，主要在于，它包含一种不合法的联系，把某一个人所占有的物的“生产率”归屬於这个占有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的关系的荒誕形式”；不仅把物的行为說成由于某种固有的性质而变成有灵的，并把这种行为归于那些对物行使其所有权的人的影响。照这个标准，一个資本家的“生产率”和一个地主的“生产率”之間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区别了——虽然这个理論的原意似乎有一部分是要否定地主的生产率的。可是“自由”劳动的雇主的收入和奴隶主的收入之間，也不能再有什么区别了；实在說，后者的“生产率”还可以假定比前者的生产率大，因为这是不仅从他的有生命的财产而且也从他的无生命的财产得来的。凱南还提出另外一种困难：“如果英国的收入在沒有任何資本的情况之下由一百变为一，那也不一定就得出推論，认为那全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目前的利潤。劳德达尔和馬尔薩斯对利潤的說明的弱点是，虽然他們已經很清楚地說明資本的使用对生产是一种好处……但他們沒有說明，为什么这种好处必須是有偿的，为什么資本的‘服务’不像太阳的‘服务’一样是无偿的。”^①关于利息的生产率学說，龐·巴維克直截了当地總結如下：“生产力所能做到的事情只是創造一定数量的产品，也許同时也創造一定数量的价值，但决不会創造剩余价值。利息是一种剩余，是以資本的生产品为被减数，以消耗了的資本价值为减数，二者相减得出的余額。資本的生产力所造成的結果也許是增加被减数。但即使是这种情况，它也不能只增加被减数而不同时按同样的比

① 凱南：“生产与分配学說史”，第205頁。

例增加減數。……假如，把一根木桩投入洪流中，木桩下面的水平就会低于木桩上面的水平。如果有人問，为什么在木桩上面的水会高于木桩下面的水，是不是有人想到洪流就是其中的原因呢？……洪流对于这种水平差別的关系，就像資本生产力对于剩余价值的关系一样。”^① 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如果有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对于某种結果同屬必要，那末比較这些因素对創造財富的“必要”程度，就恰如問是父亲还是母亲对于嬰孩的出生更为必要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有可能給予各个分开的“生产率”以某种意义，这对于价值的产生也沒有必要的关系。关于后者，人們势必要从影响供給的那些特点上去探求，因而凡是各种收入間的差別都必須从成本的說明中去寻找而不能从“服务”的說明中去寻找。

关于为利潤寻找一种解釋，使它类似用以抵償生产中耗用的必要成本的工資而同时不同于土地租金的这种企图，可以拿西尼尔的臭名昭彰的“节欲”論为代表。这在經濟思想的发展上构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它提出了純粹主观的一种“实际成本”，因此轉变了全部討論的意义——这种轉变比当时或后来人們表面所認識到的更为剧烈。“节欲”的定义是能够用所节制的东西来加以客观說明的，这也是事实；但是这样一种节制并不包含有成本的意义——和自由交換中的任何其他行为并沒有什么分別——除非有人能肯定认为放棄这些东西对所有主是一种特殊的“痛苦”，而且如果“节欲”作为利潤的主观等价物是从一种心理上的意义去理解的話，那末，劳动也一定是照这样去理解

^① “資本与利息”，第 179、180 頁。

了；劳动作为所支付的工資的成本，可以不当作包含一定体力消耗的人的一种活动，而只当作心理上厌恶劳动的力量来看待。这就是要把人的活动、它的特征和关系都加以抽象化，而仅仅把那些在心理上的反映作为經濟分析的数据。

在以往的作家当中，已經露出一种企图把“实际成本”概念理解为某种主观而不是客观东西的傾向，只是不很明显而已。亚当·斯密曾經使用过“劳苦和麻煩”的詞句；而麦克洛克也提到，凡是需要付出同等的“劳苦和麻煩”的代价而得来的东西，就会包含“同等的牺牲”，因而就要得到同样的“估价”，而且應該“具有恰恰相等的实际价值”^①。自从西尼尔的“节欲”說提出以后，我們可以肯定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轉变已經发生。因此，無論問題和答案，都微妙地轉移到完全不相同的一种意义上去了。但作为利潤的說明，即使在它的有限的范围以內，这个理論也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困难。馬克思很快地就指出，在資本家的“节欲”与他所获得的利潤之間，并沒有什么可以发现的联系，即使它們之間有什么联系的話，那显然也是一种相反的关系。他只消把一个罗斯伽特(Rothschild)^②的利潤和“节欲”对比一下，就会认为这种所謂“說明”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駁斥。

这个缺点是企图从主观意义上来建立一种成本学說所面临的根本困难的一方面。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后面还要討論。除非“节欲”包括了一切财产的出让或出租，因而把“实际成本”归屬於交換社会內任何可借以获得收入的資財，否則的話，我們怎么能确定这种“节欲”的界限呢？如果一个資本家占有从继承遺

① “政治經濟学原理”，1825年版，第216、217頁。

② 罗斯伽特(1777—1836)是十九世紀英国銀行家。——譯者

产得来的一座工厂或占有一座船塢或一条运河，我們承认有“节欲”的存在，那又有什么理由否认为收租而出租其财产的地主也有他的节欲呢？这种困难西尼尔是知道的，因为他曾經指出，如果船塢或运河的所有者的收入是作为他不出售他的船塢或运河并把卖价花费在享受方面的那种节欲的报酬，那末同样的說法也适用于每一类可以轉移的财产，而“所有政治經濟学家称为地租的，它的大部分都必须称为利潤”^①。因此，他决定把所有繼承来的資本，都排除到他的定义之外。但是这种作法当然只有使人陷入另一种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之下，节欲就根本不能用来說明利潤了。正如凱南所說的，西尼尔的理論結果是把“所有政治經濟学家称为利潤的，大部分都算作地租了”^②。

馬克思对于西尼尔的駁斥，一直沒有遇到挑战，直到将近十九世紀末，为了要使經濟概念具有更大的精确性而提出了边际增量的概念，这是从微分学里面借来的概念。耶芳斯的“負效用”和馬夏尔的“努力和牺牲”，不过是麦克洛克或西尼尔的主观的“实际成本”加上更精細的粉飾而已。馬夏尔的确很謹慎地擯棄了已經不受人重視的“节欲”一詞，而采取了“期待”这个比較中立的名詞；但作为主观的“实际成本”的一种表示，这个概念似乎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它的老祖宗的性质。^③但由于采取边际增量的概念，于是这种新的論述方式就有了这样的不同点。“努力和牺牲”及其价格之間的关系只有在边际上才存在，而所付的利息及其所包含的牺牲，既然认为趋向于和所供給資本的边际单位相一致，那末無論就个人或整个階級来讲，資本家所得到的总收

① 西尼尔：“政治經濟学”，1863年版，第129頁。

② 凱南：“生产与分配学說史”，第198頁。

入及其所遭受的总牺牲之間，就沒有必要的关系了。一个富人继承了一笔财富除了供自己随便花費之外，还有多余的把它儲蓄起来，就能得到一笔和他所忍受的任何“牺牲”完全不相称的收入。虽然如此，可是在資本的价格与在現有資本数量上所投入和追加的边际金鎊在儲蓄上所包含的負效用两者之間会获得一种相等的趋势，因为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資本的积累就会增加，反之，如果前者小于后者，資本积累就会减少，直到恢复相等为止。因此，利息是为了維持必需的資本供給的必要价格。对于劳动和工資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工資也会和一定的劳力供給量之中的最繁重的单位所包含的負效用趋于相等，虽然那热爱劳动而厌恶閑暇的工人可以很幸运地沒有从他每日的劳动中

- ③ 馬夏尔(“原理”，第 232、233 頁)，由于注意到馬克思反对节欲的概念，因此把“期待”这个名詞明确解釋为不适用于“飲食的节制”而是指一种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为了增加他的未来資財而节制他有力量消費的任何东西”。这似乎是暗含着，这个概念并不受西尼尔的修正的限制，而把继承的财产排除出去，而是同样可以适用到土地上面，就是地主将土地出租給別人，自己并不享用这块土地，或自己耕种直到“耗盡”地力为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实际成本”的范畴，它显然已經广泛到失去了任何明确的意义。如果并不是要使它含有由于延緩的行为而存在的任何心理的“痛苦”，像“节制飲食”这句话所表示的那样，那末，这似乎仍然只是对投資行为的一个叙述，并未对利潤的性质和原因增加任何知識。虽然，在另一个地方，馬夏尔說道，“延緩滿足的获得，对延緩的人來說，一般都含有一种牺牲，正如增加的劳动对于劳动的人也含有一种牺牲一样”，这种牺牲就有理由使“利息成为报酬，以便吸引人們繼續牺牲”（同上书，第 587 頁）。最近有一位作者，在“經濟学季刊”上說，馬夏尔“在实际成本的名义之下，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但他认为在馬夏尔的劳动或期待的概念里面，都无意使享乐主义的要素——积极的“痛苦”——占主要的地位（帕圣斯 [T. Parsons]，第 XLVI 卷，第 121、123 頁）。但是不論他是否有意使它占主要的地位，从若干节的内容来看，它似乎总是在馬夏尔的价值和分配学說的背景里面占着重要的部分。

感到心理上的痛苦而且还可以得到正常的工資。^①可是地主仍然屬於另外一个范疇，因为可以推想得到，土地的供給，即使在边际上也是不包含什么負效用的，因为根据假設，土地是自然的贈与，它的存在并不依靠人的意志或行为。但即使土壤的自然力也会因消耗地力的耕作而枯竭，并且土地还可以用填筑海边的办法加以扩展；另一方面，在資本的供給上，也会有馬夏尔所謂“儲蓄者的剩余”那个重要因素的存在。因此，資本的報酬和土地的收益之間的差別，不过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別罢了。馬夏尔有一句名言：“地租并不是自成一类的东西，而是一个大屬中的一个种。”^②

这个学說在半个世紀之中所起的影响无疑地是要詆毀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并把利息解釋为和工資一样的一种“必要”的收入范疇，而且它的来源基本上也是相似的；虽然有像霍布生

① 參閱：“在商品的生产上直接間接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劳动，加上为生产积蓄資本所必需的‘节欲’（或不如說是‘期待’）；所有这些努力和牺牲，都要称作商品的实际生产成本。为这些努力和牺牲所必須支付的貨幣數額都要称作生产的貨幣成本或生产費用。它們是为了吸引努力和期待在生产上的充分供給而必須支付的价格，換句話說，这就是它的供給价格”（“原理”，第339頁）。馬夏尔在1876年的一篇文章上，承认这个成本学說的二元論的性质。他提到一个事实，就是只有“通过某种人为的方式来衡量它們”，也就是通过它們的市場价值而得出的“某种共同单位”，才可能衡量“一种努力和一种节欲”（“双周評論”，1876年，第596、597頁）。他认为衡量“两种不同的努力”也有这种困难。虽然这个困难，要远远小于两个大不相同的东西，如“努力”和“节欲”的衡量，但从主观上去了解努力，比从客观上照体力支出的意义去了解时会更成問題。如果这两种类型都由同一个人供給，那末两种不同类型的主观实际成本的比例，就只能认为等于它們的貨幣衡量的比例。

② “种”和“屬”是生物学上的分类名詞。——譯者

先生那样一位作者，曾經企图对这个学說加以另外一种解釋，使它成为精心研究出来的“社会成本”和“剩余”这种概念的基础，而且某些人士曾經吹嘘这是給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加上一件現代外衣的一种嘗試。但西尼尔学說，並沒有因为采用了負效用这个更广泛的概念而避免了它所遭遇的困难；似乎只是由于它的說明的某些含糊不清的意义才使它的缺陷沒有更早地和更普遍地被人注意到。如果給予这个概念以严格的定义，那又太狭窄了，以致不能提供任何完整的說明；如果給予更一般的解釋，那又过份广泛而不能使主观的“实际成本”具有任何意义。如果要使“期待”所包含的“牺牲”具有任何意义，至少具有类似劳动所包含的主观成本那样的意义，那末，它就一定只能适用于推迟消費的那种行为，因为和这种推迟行为有关的，是一种实际的心理上的損失或痛苦超过了被放棄消費的那些物品的暂时損失。也許可以这样說，一个人为了让子女能够受教育而使自己挨餓，或者凡是為了較小的未来效用，而牺牲較大的眼前效用，这种情况都牽涉到上述的某些額外損失。但是在大多数儲蓄和投資的行为里面，既然一般都是用目前的效用交換至少同样数量的未来效用，如果說也包含有这种損失，这是很难理解的。照那样說，等于承认推迟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損失，这种損失只和時間上的選擇有关，而不与任何其他選擇有关。但是根据人們的經驗，会不会单单因为等待自己的水果而感到絕對的不舒服呢？（除非人們不能肯定会得到水果，要不然就是在这段時間以內忍受了飢餓的痛苦）。① 除非“期待”确实含有“节制飲食”的意

①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一定会和下一問題的答案相同；如果让他自由選擇，究竟他是決定現在就要水果，还是願意等待著它？

思，那就使人很难理解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牺牲”所代表的不过是推迟而已（像馬夏尔的說明在某些地方所提示的那樣），那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划分这条界限，才不包括凡是牵涉两种取舍的任何选择行为，因为不論怎样选择都要“牺牲”二者之中的一个。正如馬克思在反駁西尼尔和穆勒时所指出的：“人的每一行为，由它的相反方面来看，都可以认为是‘节制’。”^① 無論如何，如果消費的推迟发生在一种新的儲蓄行为上，那也必須看成是发生在現有的資本和繼承的資本底消費的推迟上；而且如果在財產系从历史繼承来的情况之下是这样，那末，为什么在財產既是从历史又是从自然繼承来的情况之下——例如土地——，就不是这样呢？地主出售自己的土地并靠这种出售的所得过活与資本家依靠他的資本生活，同样会减少社会总資本，虽然土地本身的供給並沒有受到影响。的确，这里馬夏尔似乎采取了单凭經驗的一种解决方法，把事实上是个人要求报酬的一切推迟，和包含有“牺牲”的那种行为等同看待——从表面現象去看个人对于儲蓄的态度，并认为抗拒推迟行为这个經驗事实，是这种行为里面存在着实际的“牺牲”而且是抗拒的根本原因的证明。^② 这种区别的方法可能是既方便而又似乎合理的，但根本的困难仍然存在。如果要在抗拒推迟的单純經驗事实后面，还假定有“某种其他的东西”，人們也很难指出它的精确意义，或者甚至很难相信它的存在。如果另一方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7頁附注。

② 但是馬夏尔承认，沒有理由可以假定，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的实际成本的比例会和它們的貨幣衡量的比例相同，甚至沒有理由可以假定（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在“实际成本”的数量上会具有任何意义（“双周評論”，1876年，第596、597頁）。

面，除了抗拒这个經驗事实之外，不再假定有其他的東西，那末，这个解决方法就会使“实际成本”的概念完全失去任何內容：使它无从和后来称为“最有利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那种東西——即被牺牲的交替物的成本——相区别（端尔平先生称之为“算术的自明真理”）。①这样一种数量，不能凭它自身提供任何說明，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独立的而是由整个情况来决定的一些東西。因此，这个定义所做的不过是使研究重新回到同时造成利潤与这个所謂“成本”二者的总情况底性质上面。究竟某一个人对某一种行为是否要求付偿（即有沒有一种“供給价格”），决定于他能否要求付偿；而这又取决于他也是其中一部分的总情况。采取这个标准，就使“牺牲”的存在或不存在，不取决于行为的性质，而取决于有关的个人或階級的周圍环境的性质。只有在一个人幸而有交替物可以放棄的条件之下，才能承担一种“牺牲”。沒有机会也就沒有牺牲！只有赤貧的乞丐，才沒有东西可以牺牲；而亿万富翁既然拥有一切丰足富裕的东西，因此他每天都可以牺牲，以致洗清人类所有的罪惡。如果从主观方面来設想，任何成本概念，在无一不是选择和取舍的情形之下一定无法确定其內容，因为每一选择的一面是效用，而另一面就是“牺牲”或“最有利的成本”，因而負效用除了作为被放棄的效用以外，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了。

① 在下面这个程度上，实际成本的概念还是可以在形式上和經常所說的“最有利成本”学說区别开来：后者一般是用一定的数量来表示生产要素的供給，而前者則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給（一部分）是价格的一个函数（因此它們有一个“供給价格”）。但無論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对于它們的供給或不供給的更基本的原因（在实际成本“不得不”需要報酬的形态上）並沒有再作出任何假定。

我們姑且假定，只要是一種推遲行為就附帶着一種主觀的損失或痛苦。即使這樣，似乎也沒有一種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把這樣一種實際成本和利息收入等同起來：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成本的歸宿是落在以利息為收入的那個階級身上（除非照極膚淺的解釋，以致使它失去了任何意義）。通常為這種等同看法進行辯護的理由是：利息的收受者也就是直接對“儲蓄”行為負責作出決定的人。但現在人人都知道，決定儲蓄量的主要因素是儲蓄的能力（表現為一定大小的收入形態）；而往往正是那班把富人說成是“節欲”的承擔者的人才極力強調這樣一種說法，認為如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再小一點，窮人的消費再提高的話，資本積累就要減少了。如果後一說法是正確的，那末，這種儲蓄成本的最後歸宿，似乎並不是落在富有的人身上，而是落在窮人有限的消費上面，因為只有窮人這種有限的消費才能賺得為大量投資提供來源的高額收入。如果我們是說明在一種無私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投資結果，那我們就不會發生疑問：我們一定會承認，投資的一個結果就是目前消費會受到相對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將落在社會的全體身上。可是在今天的不平等的社會之中，那些節欲論的販賣者却要我們相信，由這種投資而發生的目前消費的限制是落在富人身上而不是落在窮人身上，但前者的高度儲蓄能力却是依靠限制後者的消費而來的。即使節欲可以看作一種“實際成本”而存在，那也必須看成是由受痛苦而得不到補償的無產階級去承擔，而不是由以限制別人的消費作為收取利息的代價的資本家來承擔的。那末主張相反的說法，不是肯定犯了循環推理的錯誤嗎？他們認為資本家的所得在某種意義上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來說明資本家從收入中提出作

为投资的那部分乃是个人约束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自己所有的东西的唯一结果。

除了主观实际成本概念上的这些根本困难以外，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属于这一类型的成本学说都不能把利息当作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现象来解释。在现实世界中，资本积累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同时生产并不是在一种固定不变的资本数量之下进行的，因此这个资本数量的利息收入也不是与一定的“期待底供给价格”保持“平衡”。如果真有这样一种平衡，那就不会发生新的资本积累。因此利息中的“剩余”因素，即使根据使用“储蓄者的剩余”这个名词的有限意义，实际上也会比马夏尔的学说在表面上所表示的要大得多：就现有的资本数量来说，事实上甚至资本的报酬也不会等于边际的“期待底供给价格”。^①

在庞·巴维克的利息学说里面，既没有这些含糊意义，也没有这些特殊困难。他明确地放弃了任何用成本说明价格的企图；在他看来，成本总是一个被决定的而不是决定的因素；它只是代

① 参阅兰赛(Ramsey)：如果利率超过对未来的贴现率，那就“没有平衡，而只是储蓄；而且既然在短时期内，不能储蓄得很多，也许要有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达到平衡，或者永远不能达到，而只能像渐近线那样的接近。……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利率主要是由需求价格来决定的，并且会大大超过为引诱节制最后所必需的报酬”(“储蓄的数理理论”，见“经济学杂志”，1928年12月号，第556页)。也参阅庇古：“静态经济学”，第259、260页。当然在边际上是有一个平衡的，但是这只对新的投资适用，目前收入为“储蓄”所蚕食，直到受限制的目前支出和(贴现的)预期的未来所得之间达成平衡(在边际上)为止。这就是庇古教授所谓“次要的平衡”。但是目前所获得的利息与现有资本存量的“边际的供给价格”之间永远不会相等，否则就不会有新的投资。

表依賴需求之間競爭強度的一種最有利的成本或被移換的選擇物。因而成本最後都可以追根到需求和效用。所以他並不關心在那種形式之下他認為沒有意義的問題，就是主觀實際成本是否會牽涉到資本供給的問題。他所關切的問題僅僅是，一方面推遲消費的行為，也就是時間上的選擇行為是否具有一種特點，使一定數量的現實效用一般地可以看作等於較大數量的未來效用；另一方面時間究竟對勞動生產率又有什麼重要性。他的結論是，時間上的選擇有這樣一種特點：由於人類的一般心理特徵，也就是意志和想像力的模糊，當人們把時間距離較遠的目的物和事件，與近在眼前的同樣的目的物和事件主觀地加以比較的時候，總是要給前者打一個折扣；而在另一方面，時間對於生產的關係在於：消耗在需要較長時間的生產過程的勞動（“迂迴的”^①或長期的或間接的生產方法），一般總是比直接消耗在生產直接產品的勞動具有更大的生產力。主要就是由於這兩種影響，所以競爭市場在把目前的財貨和未來的財貨對比的時候，總是要給前者一種補貼，這不但因為在個人的判斷上對前者的估價較高，而且也是因為掌握了目前的財貨（例如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就可以把勞動用在“迂迴的”或長期的生產過程，因而比在直接的或目前的生產中短期使用的勞動會產生更多的成品。這兩個因素，一個在供給方面起着作用，另一個在需求方面起着作用，如果其他情況不變，就會使任何東西的未來“價格”比它的“現場”價格要打一個長期的折扣。這種對目前財貨的貼補或貼

① “迂迴的”(roundabout) 生產指需要經過無數道加工過程的生產。例如煉鋼需要經過采礦、煉礦、軋鋼等程序。貨物生產的迂迴愈長，它的價值也愈大。——譯者

水，就是曾經引起“剩餘價值”問題的利息現象。不是“人的預期獲得性”——照馬夏爾的說法——而是人在預期獲得性方面的普遍缺點，或者是庇古教授所常稱作望遠機能的缺陷，才是使經濟學家迷惑了半個世紀的秘密所在。

不能否認，在這個別出心裁的理論里面含有積極的因素，這些因素為資本積累過程的某些方面提供了敘述和分析的知識。雖然時間或“迂迴的生產方法”，顯然並不是技術過程的生產率的唯一的或甚至是主要的條件，但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既然時間的先後不能改變，因此不同生產過程的時間幅度，在決定這些過程的連續採用的先後次序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再者，用增加的時間幅度來表示的“積蓄勞動”這個概念（就是原來計劃積蓄的勞動所需要的時間長度），是不依賴於主觀價值論的一個客觀概念，雖然這個理論的其餘部分還是根據主觀價值論的。但從整個來看，作為剩餘價值的說明，這個理論的正確性仍依主觀價值論是否正確為定，而這個理論只不過是主觀價值論的一部分及其特殊的應用而已。如果這個比較廣泛的理論具有充足的理由，那就似乎意味着利息理論本身也具有充足的理由，因為它說明利息也同任何其他價值一樣只是一般的主觀估價的結果；不過在這裡是指對那些在時間上隔離開的東西的主觀估價。如果前者作為一般的價值的說明是有效的，那末後者作為特殊的價值的說明也是有效的，如果前者無效，那末後者也一定無效。^①

① 龐·巴維克的确自以為他所提出的每一個因素，都是以單獨說明利息的現象。由於這個理由，也許可以認為，他的學說並不依靠主觀價值論，因為對未來的主觀的低估，只是作為產生利息的一個理由。可是，如果沒有這種主觀因素的影響，單是“迂迴方法的技术优越性”，顯然不能說明利息是一

但是奇怪的是，作者在对以往的利息理論作了值得注意的批判以后，竟看不出他自己理論的缺点——无法說明主要的問題，而尤其奇怪的是，他竟认为它的理論已經对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作了充分的答复，因而认为这是对馬克思所作的答复的一个反駁。究竟在哪一种意义上，他的理論說明了利息的現象呢？無論在哪一种意义上——就利息的根源，或就它的决定的性质或它的作为收入范疇的普遍“必要性”——来讲，都不能把利息和工資等同起来。这种說法实际等于用为特殊用途而使用的劳动底相对稀少性或有限应用——就是体現在較长“生产期限”的技术过程中的那种积蓄劳动的应用；基于人类的近視天性而存在的一种稀少性——来解釋。由于生产资源的开发不足，于是占有貨幣資本也就具有利用这种稀少性进行榨取使用費的权力，因为在目前的社会里，貨幣資本的占有为进行漫长的生产过程提供了惟一的手段。正如地主能利用客观自然界所造成的稀少性来勒索代价一样，資本家似乎也可以利用人的主观天性所造成的稀少性来勒索代价。如果在这个学說的范圍內，这样的类比有任何意义的話，岂不是应当說是利息和地租之間的类比，而不是利息和工資之間的类比嗎？同李嘉图和馬克思一样，龐·巴維克也曾經指謫单靠“供求”來說明問題是不足使人信服

种持久的現象，因此也不能說明它是經濟問題的永久要素的必然后果。单就这种技术优越性本身來說，它并不会比龐·巴維克自己所譴責的任何其他生产力的說法高出一等。在沒有理由說明何以劳动在这个用途上的利用会受到限制，因而会相对地缺乏的时候，“迂迴方法”的更高的生产率并不足以說明应用在这个用途上的劳动会产生一种剩余价值。由于建造这种具有更大生产力的迂迴方法所需要的时间，它可能足以說明剩余价值是暫时的、正在消灭的現象，但不能說明它是与充分平衡相符合的現象。

的。^①但是他自己的理論，既然主要还是局限在与更基本的社会关系相分离的生产要素之間的交換关系底有限範圍之內，难道他自己的理論就能作出更充分的說明嗎？固然他曾在自己的理論中提出了关于生产的一个重要假定：与時間幅度有关的一种技术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单独选择这个技术情况，而不注意决定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人同技术之間的联系的社会关系呢？根据他的理論，資本供給的决定因素就是对于未来的主观的过低估价。这个因素不仅在个人主义社会以外不一定存在，甚至在个人主义社会以內，它的存在也被某些人所否定，而且这种主观的过低估价的程度本身也要由收入的分配来决定，因此也要由社会的階級关系来决定。所以利息由后者决定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和資本家階級經常的消費标准成比例的收入大小，决定着他們对儲蓄和投資的态度；同时人民大众的貧困又决定着在什么价格之下他們願意为当前的收入而出卖他們的劳动力。因此利息正是为历史所制約的——而不是普遍存在的——那种社会关系和制度底类型来决定的，这也就是馬克思所最关心的問題。我們在后面一章会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沒有理由对未来作过低的估价，使利息成为永久的現象，也根本沒有理由会产生利息作为收入的一个范疇。如果按照上面所說的問題的意义提供解决利息問題的办法，那末，这个理論不但內容空洞而且容易使人誤解。此外也不能說，这个理論的作者不打算把他的理論說成是具有这种更根本意义的一个解决方法，而目的只是要

① “当人們問什么东西决定某一个价格的时候，回答說是‘需求和供給’的人就等于用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来代替一个实质的东西”（“資本与利息”，第66頁）。

在他的學說里面用敘述的方式羅列一些任何因果關係的說明都必須包括的有關的變數。龐·巴維克在他的“資本實證論”一書中明確地提出下面的理由，作為他的理論的重要推論：“利息的實質並不是剝削”，而且相反，利息是“一種完全正常的現象，的確還是經濟上一種必要的東西”，它“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和法律的範疇，因而只能出現在我們的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甚至在社會主義社會，它也不會消滅”。^①

但就在這種效用概念的應用上，也可以看出一種很突出的矛盾，使我們一下子接觸到主觀價值論問題的核心。即使從形式上看，也必須把效用看作表示人類心理的相當持久而又一致的現象，才能作為具有決定性的價值論的可靠支柱。這並不是說，人的偏好必須假定是不能改變的，而是說這種偏好不應當是那樣變化無常，以致使它們會受這個體系之中的其他變數的影響，而這些變數正是要由這些偏好來決定的。^② 如果把效用照享樂主義的意義當作一種根本的“滿足”來看的話，那末，照我們所了解的，我們有理由認為它是能符合這個條件的。因此從各種選擇對象中進行理性的挑選這個過程，可以看成能使經濟的選擇符合人類心理的某些基本特徵。雖然這種選擇變成經濟行為還是要由收入的分配來決定，可是實際選擇本身也許可以看作是不以市場價格為轉移的。但如果人們不能再使“欲望”（眼前

① “資本實證論”，第361、371頁。

② 約·摩·克拉克教授曾經提出他的意見，認為“這類學說只要包括一些前提，說明實際上選擇是怎樣作出的，它就具有它的意義”（“約·倍·克拉克紀念論文集”，第54頁附注）。但是為了這個目的，只用選擇作為前提還是不夠；必須還有一個前提，就是這種選擇行為（或它所依據的某些決定因素）是不以市場價格的變動為轉移。

的决定或选择行为)和“满足”(更基本的心理结果)联系起来,那末,这种假定的独立性究竟是否有效也就很值得怀疑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行为反应”不断为它们所遇到的市场情况所影响和改变呢?龐·巴維克并不打算这样说:他的利息論所根据的对眼前财货的偏好是表示眼前财货含有一种更好的“满足”:明年的一个假日会使我们感到和下个月的一个假日同样的快乐,只是在我们的想像中,把前者看得比较模糊而已。如果我们把现在看得比将来更可貴,那只是一个想像力的问题,一个有缺陷的理性和轉瞬即逝的欲望的问题。的确,庇古教授特别提出这种对眼前效用主观地过高估价的情形,认为是“欲望”与“满足”相分歧的、因而使经济幸福受到损失的最重要的例子。照一种极其直接的意义来看,这种对目前和未来的主观态度,是由市场价格的結構来决定的,而不是与市场价格的結構无关的,也就是说,肯定地是根据某一个人或阶级的收入情况而有所不同,因为后者决定着目前欲望的迫切程度及其刺激和影响想像力的程度。下面的事实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一个集体或社会由于极端重视目前,以致愈来愈没有能力为未来作好准备而日益陷于贫困境地。所以根据主观态度来说明问题,就无法作出肯定的假定或预测。而且主观态度,可以因种种的影响而表现出种种的不同,因此使人怀疑它的普遍性的程度也和怀疑它的一致性的程度一样大。主观态度显然可以因出售商品的类型和商品的推销方式而有所不同;也可以根据这个人容易受外界影响的青年还是更老练的人而有所不同;也可以根据某一个人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还是作为家庭中父母的身份,还是以高等学校、俱乐部或商业公司成员的身份,作为一个集体的

人，来进行选择而有所不同。但龐·巴維克所选择的主观概念的应用方式正是这些概念的弱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他想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剩余价值这个关键问题。可是主观概念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弱点正可以使我們看到这个属于整个理论结构的缺陷。

当培利說，价值的含义是指“由意志的决定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或心理状态”的时候，他所說的概念就是十九世纪末被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的那个概念。效用論是以商品在滿足消費者的欲望方面所提供的服务，来解釋商品的价值，并由此引伸出关于制造这个商品所必需的一切組成因素的价值。但关系并不是直接在于价值与总服务（或总效用）之間；照早期經濟学家的看法，两者之間常常形成反比。直接的关系是在价值和边际效用之間；决定因素在于一定供給量的最后或边际增量对于消費者所增加的滿足。一个家庭主妇如果她的动机是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就会这样分配她的用款来达到她的目的，就是使每一方面所花費的最后一个便士所产生的滿足都能够相等；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均等，她就会减少某一方面的支出而增加另一方面的支出，这样才于她有利。这就是耶芳斯所說的无差別原理的例子。因此，从这一简单原理又引伸出另一原理，即市場上各种商个品的价格，必須和它們的边际效用——即每种商品的最后一单位或边际单位对于消費者所产生的滿足——成比例。如果价格不合于这种比例，則消費者将增加某些商品的需要（即边际效用对价格具有較高比例的商品），而减少其他商品的要求（即具有較低的这种比例的商品），就会于他有利，直到达到平衡为止。

但是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边际本身的位置是凭什么确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凭现有的供给量来决定的；但又产生另一个问题：供给的限度又是凭什么决定的呢？如果所有东西的供给都是没有限制的話，那就沒有未滿足的欲望，沒有边际效用，也就沒有价格了。因此，价格的产生，只是因为商品供给的限制，而商品供给的限制是由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的限制而造成的——即以成本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限制。

从这种学說的倡导者根据主观价值論对于如何决定这些限制所作的假定来看，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說法。一方面，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假定，在任何一定的条件之下，这种最后生产要素的供给量是固定不变的。^① 这些要素既然受不可改变的（当时的）稀有性的限制，所以也和其他商品一样，能够获得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等于它們在生产上所提供的边际服务；这些价格就是成本的組成因素。另一方面，耶芳斯和馬夏尔則假定这些基本生产要素（自然资源除外）的供给量是能够变动的，但它們的变动是决定于創造这些要素所引起的負效用或“努力和牺牲”。因此在平衡的情况之下，它們一定要得到与它們在供给上所包含的（在边际上的）負效用相等的价格。照耶芳斯的說法：“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决定最后一級的效用（或‘边际效用’）；最后一級的效用决定价值”；又认为“劳动也决定价值，但只是間接的，也就是通过供给的增加或限制来变动商品的效用以决定价

① 严格地說，奥地利学派的人并没有假定，或不需要假定，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是不变的；不过，它們的数量，是决定于市場以外的条件，因而可以认为是独立的。

值”^①。巴列托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观念，就是价值是欲望与阻碍——即阻止欲望获得充分满足的障碍——的相互冲突的结果。但双方面的力量——也就是馬夏尔所謂“剪刀的两刃”——的最后决定因素系被认为是性质上属于主观的东西，即一种心理状态的产物。

这个理論結構似乎是根据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假定：即个人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这就是說，它可以不受个人所参与的市場关系或所屬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当然也没有人会否认对个人意志的这种影响至少是有一些。如果这是属于次要的性质而只限于少数特殊类型的影响，那末我們还可以加以考虑而无需质問把个人意志及其特征当作經濟关系的决定因素是否正确。但如果这种社会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很大，那末，这种假定的有效性就会发生动摇，而这个采用无数个体的分析方法也就必然归于失敗。这样，不仅从个人推論到全体的任何企图都会造成以分立概結合的錯誤，而且意志或心理的状态也不能当作决定事物的“自变数”来看。

沒有疑問，在个人主义的时代，这样一种假定看来是很自然的，而在今天对于那自詡为不受社会影响和不依賴社会的孤立的資產階級个人來說，似乎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只要不是单从表面去分析社会組織，我們就可以看出，个人的意志不仅不是自主的或独立的，而是恰恰相反，不知在多少种的方式之下都要不断地受到他所参加的社会和經濟关系复合体的影响。首先，个人所表現的各种偏好的实际性质以及这些偏好轉变成货币的形

^① “政治經濟学理論”，第165頁。

式，都要受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他所取得的收入的影响。例如，我們已經知道，一个人是把現在看得比未来更重，还是把閑暇看得比商品更重，因而他是在工作方面还是在儲蓄方面忍受“牺牲”，都将取决于他的收入状况；由此得出这样的循环結果：影响商品价值和生产要素的报酬的基本成本，它的性质又被收入的分配所决定。一个沒有土地的人，当他把自己雇佣給一个主人的时候，对自己的“牺牲”或“負效用”所作的估价将比一个自己占有土地和工具的农民所作的估价要低得多，因为前者的貧苦处境使得他降低了根据生活必需品对自己的劳动所作的主观估价。有工会支持的工人同沒有組織而且傳統生活标准很低的工人相比，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对任何正常价值的假定，都需要以一定的收入分配，因而也要以一定的階級結構的假定为前提。要确定一定社会的交换关系的精确形式，不仅需要以抽象的个人的心理傾向为依据，而且还需要以具体的个人所屬的制度和社會关系的复合体作为分析的資料。在探求一种虛构的普遍性原則的时候，现代的价值論对于下面这些因素都是“假定有的”：从形式上解釋，那就是你可以任意假定你所喜欢的因素。这似乎最多也只能比作制定物理学或天文学的定理，而不需要“引力常数”一样。但当这样一种假定被用来作为对现实經濟社会的一种說明的時候，实际上就会产生一个更是不容置疑的錯誤。正因为这种假定的片面性，如果把它作为肯定的說明，那就是虛假的了。这等于說，經濟現象是受一群独立的个人所自由結成的一系列契約关系的支配，而其中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他自己的需要，而且都知道所有可以得到的選擇物并且都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既然用巧妙的手法將一致性引入前提之中，于是結論也

就产生了一致性。

可是我們已經說过，人們可能认为，构成人們选择的主要因素可以撇开收入的分配以及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单独地假定出来。实际的偏好曲綫表，也就是巴列托所說的基本的“无差別曲綫”，可以不受个人情况的影响，不管他是富有还是貧穷，是飢餓还是滿足。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主观态度可以看作是决定价值問題的一个独立基础。但是首先需要指出，即使是这样，单是这些因素本身也并不足以决定这个問題；如果我們要知道这些基本态度是怎样变成实际选择和实际需求的——从已知的各組无差別曲綫能构成什么样的需求曲綫^①——那就需要就有关个人地位方面另外再作一些假定。其次，除非对于效用采用享乐主义定义，或某些类似的假設，似乎就不可能对这些基本心理态度作出假定。否則，这些表明个人对任何一組想像的选择物（不管他是否有过这些选择物）的态度的偏好曲綫表——仿佛这些偏好曲綫表是刻划在内心里的某处，只要用内省方法去发现它們，它們就会告訴我們，假如一个百万富翁淪为乞丐，他将如何来估价閑暇和收入，或者假如一个申請救剂金的失业工人忽然发了一笔財，他又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照最初的效用概念的含义，是指促使眼前选择行为的“欲望”与选择对象所产生的更基本的“滿足”互相一致的話，那末对于这样一組固定不变的心理态度的假定也許具有某种意义。但

① 这只是在馬夏尔的有名的物物交换的情况中所表示的那种事实的一个例子：已知一組无差別曲綫，在某人能构成足以确定議价过程的实际需求曲綫或供給曲綫以前，必須先假定每人在这个平面内开始进行交换行为的位置。馬夏尔用每一种商品的現有量来确定这个位置，但这个原理可以适用的范围比这个简单的例子更为广泛。

是，如果“欲望”和“满足”分离，那末后者即使存在也不能支配行为，因而和经济问题也就不发生关系；单独的“欲望”既脱离了它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更深的根源，当然就不能看成具有这种一致性或独立性了。

我們由此又可以提出第二个理由，来駁斥个人意志是独立的这种假定：这就是傳統习惯和宣傳的影响。从这两个因素对选择行为所产生的极其明显的强大影响来看，它們造成“欲望”和“满足”的分歧，似乎比經濟学家傳統上所承认的要大得多。前一因素的影响应当包括別人的欲望和嗜好对于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各种复杂影响，包括凡勃侖竭力使人注意的階級标准和社会时尚的影响。后一因素应当包括所有那些广告方法、暗示以及推銷技术，这些已經成为現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方面的成功要看这些方法能够改变和制造欲望的程度；并且根据这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消費者的选择就变成以生产者的行动为轉移的一个变数。而且消費者的欲望，显然在各方面都可能受到暗示的影响。如果把供应品适当地陈列出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单是这种供应品的存在，就会引起原来不存在的一种欲望；而銷售者的宣傳程度和技巧也会左右人們在圣诞节送給亲友的礼品是书籍呢，还是手套、手帕、洋伞；决定公众的飲食中多添些香蕉呢，还是多添些魚类、牛乳；是选择“英格兰的干燥地带”，还是科尼什的利維拉^①作为假期游覽中心。这种宣傳一旦能够影响社

① 在二十世紀30年代，英国各铁路公司竞争剧烈，控制英国东海岸避暑胜地的公司，宣傳东部为“英格兰的干燥地带”，而控制西南部的公司則宣傳西南部为“科尼什的利維拉”，因为“利維拉”是法国南部有名的避暑胜地，铁路公司用“利維拉”的名字是为了吸引顧客。——譯者

会群众的习俗，那末，这些影响结合在一起就会对个人选择的决定产生加倍的力量。个人成为时髦的奴隶就是一个充分的例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很难說个人还有自己的意志。在今天世界貿易的领域中，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人們都可以看到宣傳对于需求的愈来愈大的影响。“請购英国貨”，“請购大英帝国的商品”，“請购德国貨”这类宣傳运动，使消費者养成和他們原来胃口不适合的那种类型的嗜好。向国外傳播本国文化显然是一种极其重要而被人所忽視的經濟影响，那是为了造成对本国一貫大量消費的商品的嗜好，因为国内有特殊便利来生产这些商品。当人們充分估計到今天世界上所有这些影响的范围的时候，人們将不会怀疑，除了食物和住所等主要必需品以外，这种影响几乎对每一种商品需求的决定來說，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傳統习惯的影响也不能认为是次要的。人类的嗜好除了最原始的水平以外，显然是經過一个教育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傳統习惯和風俗以及社会环境的其他因素，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們所能假定的那种“自然”人所固有的东西，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什么差别的某种最初欲望和傾向罢了。在每一个人的历史上，当他达到成年的时候，他在生活上所表現的那种复杂的偏好曲綫表（即使假定有这样一种实体）的明确形式显然是受他周圍社会的影响的，而且以后还要为这种影响所不断改变。人造絲成了廉价品，于是每一个工厂女工把絲袜看成自己生活上的必需要素，因为別人都穿这种絲袜。照身材定制的服装对紳士們是一种必需品，缺少它，就会感到很大的不滿足，因为服装的一定标准和式样傳統上代表着生活的一定地位。房屋裝飾、家具以及社会娱乐等方面的大部分开支，显然也为某些社会标准

的要求所支配。人們習慣用午茶或飲雞尾酒，如果某些個人必須戒掉這些東西，他們就會感到一種不足。人們穿上非常不舒適的硬胸襯衣和漿洗的硬領而感到愉快，因為這種作法合乎社會時尚的要求。為了表示資產階級的高貴，他們的妻子購置餐櫃上的銀器，而在前幾年，則購置裝飾客廳用的紗帘、棕欖葉或百合。甚至希望有一部小汽車，常常也是一半為了它的用途，一半為了它所代表的地位。幾年以前，在“經濟學界”雜誌上，曾經舉行過這樣的一次討論：假定一個紳士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情願付出也許是10英鎊、20英鎊或30英鎊的代價來購買一雙皮靴，而不情願赤腳跑到辦公室或俱樂部去，根據他所付的代價來衡量這種皮靴的“總效用”，問這究竟具有什麼意義。提出的答案認為這個問題根本沒有意義，因為假使所有的皮靴都普遍定價為每雙10英鎊或更高一些的話，那只有最有錢的人才會穿皮靴，而普通人就是穿草鞋甚至赤著腳給人看見也不會感到難堪，因為這時所有他的鄰居或朋友也都已經習慣這樣做了。

認為這是效用論所包含的一個重要推論就可以證明，這個理論的目的是完全採取不以社會關係為轉移的、自主的個人意志的假定作為對經濟社會的說明的。在強調這個推論的時候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熱情，表明這些經濟學家對於假定的選擇顯然不是沒有帶着很大的辯護士的偏見的。這個推論曾被贊揚是對放任主義的主張的一個有力的支持，它的主要內容就是證明自由交換的制度可以使各方面都獲得最大限度的效用。照這個論點所暗示的假定來看，它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論點；甚至在今天雖然它的錯誤有一部分已經常常被人指出，但是這種錯誤似乎仍然很難消滅而且不斷地改頭換面重露頭角。它的最明顯的說

明形式就是在甲乙两种商品的两个卖主之間进行交换的一种簡化的例子。这是前面所讲的一种原理的另一种說明方式，照这个說法，双方之間的交换会繼續进行，一直达到两种商品(拿出去的商品数量与交换来的商品数量)的效用对每一方都相等的交换率为止。在未达到这一点以前，每一方都能从繼續交换甲乙商品中获得大于他所放棄的效用。超过这一点的任何交换率都必然会使一方或双方所喪失的效用超过他从交换所得来的效用，因而就不可能有一个使双方都滿意而彼此同意的交换率。因此，这一物物交换中的平衡点——也就是自由市場所要建立的交换率——(照耶芳斯的說法)，也就是“双方都感到滿意”，而且“每一方都得到一切可能的利益”的一点。所以，如果这一价格是使每一方都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价格，那也一定是使全体获得最大利益的价格，因此在自由市場的条件下所建立的价格，必能使有关各方都获得最大限度的效用。这个推論虽然已經包含在耶芳斯所提出的理論里面而未加以明确的說明，但华拉斯(Walras)和巴列托以及奧斯庇茲(Auspitz)和黎培恩(Lieben)在他們的“价格学說研究”一书中却更清楚地着重指出来了。①

当后来的討論指出，事实上符合上述这种条件(即两种商品对双方中的每一方都有相等的效用)的交换率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許多个的时候，对这种最大限度的意义就发生了一些疑問。照耶芳斯所举的簡單的物物交换条件，在这些点中的任何一点

① 的确，华拉斯对經濟理論的兴趣，似乎是由于和圣西門学派的討論以及要提出一个簡單的证据的願望——证明自由交换在竞争市場上能产生一种最美滿的結果——而引起的(參閱魏克賽尔：“讲演集”，第1卷，第73、74頁)。

上都可以达成平衡，这要看在交换的最初阶段中对哪一方有利；因此，这些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同样可能成为“满足”的位置。但任何这种“满足”的位置，显然与进行交换时的个人情况有关。在任何一定的情况之下，个人可能得到的资源和选择的机会都是有限制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明显的是受个人所属的阶级的限制。在这个个人所处的一定情况之下，也许有一条符合于他的最大利益的、因而如果加以采取就会对他有利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是由外界的情况替他决定了的，假使情况两样，他所采取的也许不是这条道路。只有假定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以自由选择的机会，并且在研究和估计现有的选择范围以后才决定他所采取的道路，这种相对的最大限度才接近于具有绝对意义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最大满足。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假定；而正是这种假定的不存在——真的，实际存在的是它的反面，即阶级划分的存在——才是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特殊性质的必要出发点。可是这正是效用学派的创始者偷偷引进来的假定。今天在经济著作中关于竞争和垄断体制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底比较，大部分仍然是以这个假定作为默认的根据，这一事实表明这种假定仍然易于瞒过人们的注意。^①

由于了解到效用概念所存在的这些困难，近年来经济学家的愈来愈大的倾向不是放弃效用的概念，就是从纯粹经验的意义上新提出解释。他们假定了这样的经验事实，即个人欲望

① 庇古教授说：“凡是分析各种租税和各种垄断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而进行比较的时候，所有这些比较都暗含着如下的假定：需求—价格也就是满足的货币尺度”（“福利经济学”，第24页）。也参阅“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编。

从市場上可以观察到的选择当中表现出来，然后把这些选择作为数据，构成决定经济事物的平衡公式，至于这些选择的心理根源或社会根源究竟如何，他们概不过问。因此，巴列托最初采用了效用概念，到后来却放棄了这个概念而代之以欲望的满足。^①而喜欢用新鲜的字眼来玩弄熟悉的观念的卡赛尔则完全避免使用效用这个名辞。罗宾斯 (Robbins) 教授否认效用可以在两个人中间进行比较（特别用这种理由来反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关于财富的不平等使经济幸福受到损害的某种含义），而且肯定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实际的科学”所能提出的正确假定，不过是每一个人都按照某种偏好曲线表来安排选择的对象而已。^②这样，经济学就成了一种“交换科学”的理论，在那里，“对于平衡理论并无认可的意味。平衡只不过是平衡而已”^③。

看来，这好像是要躲到纯粹的形式主义中来回避基本问题，如果一种理论用这种方式来下定义而又如此缺乏实际内容，那末，照它所达到的抽象水平来说，是不能对实际情况作出任何重要判断的；无论如何不能对经济社会的一种特殊制度所特有的问题作出重要的判断。如果全部假定的内容只不过是人们进行选择而已，根本不说明他们怎样进行选择以及什么支配着他们的选择，那末，似乎经济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只不过是关于人的选择的一种代数学而已；它只能表示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某

① “政治经济学手册”，1909年版，第157页。

② “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第2版，第137页以后。罗宾斯教授认为现代经济理论对李嘉图体系的优越性，就是前者已经“进到对个人估价的地步”（同上书，第20页）。但是人们难道不能埋怨只是进到对个人估价的地步为止而没有更深入一层吗？

③ “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第2版，第143页。

些很明显的形式，而不能向我們說明实际情况将如何演变。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表”不是看作基于某些最后的或根本的东西，它就不能成为市場平衡体系的一种十分巩固的支柱。如果需求会因市場上的每一陣風的吹动而引起变动，如同我們只假定經驗欲望作为先决条件那样，那末，我們有什么理由认定这些欲望不是完全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呢？实在說，如果照这个理論，“平衡只不过是平衡”，那末，它所提供給我們的就好像仅仅是平衡的一般化的定义而已。規定这样一种明了的定义也許是很有用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但从有关实际經济社会問題的研究及其所提出的問題的类型这个意义來說，这样的定义除了提供政治經济学理論的一个空洞的外壳之外，还能說明什么呢？罗宾斯教授在他的“論經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的初版中指出，經济理論的推論，不在于經驗或历史的事实，而是“暗含在我們对于整个經济科学內容所下的定义里面”^①；这种說法似乎可以充分表明这个理論特点只是一套同义語的重复而已。在他那本书的第二版里面，他放棄了这种坦白的承认而提出一种解釋：认为經济理論并非“只是形式的”，它所根据的假設事实上就是关于所有一切类型的經济活动的基本概括，并认为經济理論的推論所代表的“不可避免的含义”，决不是属于“与历史条件相对的”性质，而是适用于一切类型的經济社会的。^②但是当許多人知道了这些普遍应用的規律所根据的那种薄弱的事实基础仍然不过是关于个人选择的一种假定的时候，他們一定很难因为这个重复的說明而发生信心。当

① “論經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初版，第73頁。

然，这里选择并不限于傳統上所謂“經濟的”那一类型的活动；而且可以看出，他們所提供給我們的是那樣一种普遍的抽象化，它完全可以包括任何类型的人类活动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这一点，罗宾斯也坦白地承认。“凡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牵涉到時間因素和稀少資源的行为，都包括有为达到另一目的而放棄使用这些东西的意义，因而这种行为都具有經濟的含义”^③。密賽斯教授甚至說得更为明确：“把‘經濟的行为’看作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确定的范围，而与其他行为的范围严格划分界限，这是不合理的。經濟的活动就是理性的活动。……經濟活动的范围与理性活动的范围是有相同的界限的。”^④因此，这里所說的原理及其“不可避免的含义”，是指而且仅仅指每一类型的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不仅指一般所謂生产和交換的特殊問題，而且也指烹飪和家务、游戏和娱乐、假日的安排以及想作哲学家还是想作数学家两者之間的选择的問題等等。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认为經濟原理只是这样脆弱的一种抽象化，只是把人类事物的一面孤立起来，看作和其余部分完全无关——那末，人們当然有理由怀疑，从这样一个理論所能得出的推論，它的拘束性是否能对各种类型的經濟社会特征所引起的特殊問題具有高度的重要性。

② “論經濟科学的性质与意义”，第2版，第80、105、121頁。汉德生(H. D. Henderson)也认为經濟理論所假定的規律，“不論是商业冒險家、公司或托拉斯，都得受它們的統治；行会、政府和苏維埃可能換来換去，可是規律却在这些組織之下发生作用。如果必要的話，即使这些組織要想對它們加以阻撓，它們也是会发生作用的”(“供給和需求”，1932年版，第17頁)。

③ 同上书，第14頁。

④ “經濟学概論”，英譯本，第124頁。

为自己的論題寻找邏輯上的簡明定义，这在今天虽然很时髦，但一般地說，总是徒劳无益的，而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必然会使思想变成毫无实际內容的东西，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教条主义而已。这种趋势似乎不仅是一时風气的产物，而是由于更基本的一种缺陷所造成的。今天許多人显然忽視的一点，就是馬夏尔在他的“原理”第一版的著名序言中重复申述黑格尔的連續性原理时所最关心指出的一点(对比之下，許多現代的經濟著作就显得肤淺而幼稚了)^①；在现实的世界，并不存在着像在思想上所存在的那样硬性而严格的界限，而且連續性和不連續性必然是交織在一起的。固然，在馬夏尔的著作中，曾經对連續性的某些方面加以夸大和片面的強調——他所着重的天道循序渐进的格言是偏于保守意义这一方面的。但与大多数的現代著作比較起来，他对思想問題的研究方法，至少带有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的性质；在他的批評者看来是属于折衷主义或含糊不清的地方，有很大部分我认为正是这一优点的表现；而这应当說是由于他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因而能充分認識抽象观念与现实之間的关系底某种复杂性，而且力求做到脚踏实地。只有牺牲任何可以与上述现实主义相比拟的那样的

① “如果这一本书有它自己的特点，那也許可以說就在于它給予連續性原理的应用以重要的地位……。……总是有一种引誘力，把經濟財貨划分为明确的类别，然后对它們就可以作出簡短而精确的命題，这样既滿足了讀者对于邏輯精确性的要求，又滿足了一般对于教条的爱好，因为这些教条具有深奥的气味，而又易于处理。但屈服在这样的引誘之下；而在原来沒有一定界限的地方，硬划出一道广闊的、人为的界限，这种作法似乎已經发生很大的害处。經濟学說越簡單越絕對，它所引起的混乱也就越大，……。……如果它所指的界綫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找到的話”(“原理”，第1版，第8—9頁)。

东西，才会得出今天所流行的那一类型的精确的定义。很明显，有关经济学这样一門學問的任何现实的定义，首先必須用它所選作內容的具体問題來說明（也像任何科学一样）：它必須是根据問題的类型而不是根据界限的划分而作出的定义。經濟学的定义必須根据它所处理的那个片断的现实世界來規定，而经济学所提出的概括性的說明，如果是充分的，就必須能代表它的实际情况的主要特点。它是否能圓滿地把这种概括性与现实性加以适当的融合，这是一个事实的問題。用崇拜警句的方式只將事物的某些方面加以抽象化，使它們和其他方面脫离，当作神圣的东西单独地供奉起来，这样也許可以达到表面上非常吸引人的概括性，但是却牺牲了现实性。精确性对于思維过程也許是最需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正如鋼的銳利对于切削一样，但如果把工具的銳利和产品的銳利混为一談，如果把精确性看成思想的目的，当作真理的試金石，那就会使思想变成貧乏无味，而观念也就成了缺乏生命实质的空壳。

但是，即使最抽象的經濟学家，也还是要对现实世界提供更多的說明，而不是仅仅提出人类所进行的選擇而已。正如罗宾斯对我们所說的，还有各种“补充的假定”；而且他承认（有些勉强地）这些假定是“出于对往往可以正确地称为历史相对材料的研究”。实际情形似乎如此：政治经济学正是从这些“补充的假定”出发。无论如何，經濟学家所得出的现实的推論就是根据这些假定。人們决不能指責罗宾斯教授，說他沒有注意到經濟理論的实际含义，不管他对后者所下的定义是如何抽象。但正是由这些“补充的假定”里面才暗含着提出了关于經濟社会的假定，它們在本质上类似早期經濟学家的那些假定，也就是属于我

們前面所提到的个人的独立自主意志的那种类型。实在說，正是关于个人选择所提出的抽象假定的方式，才构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经济现象的实际力量的一种歪曲的叙述，除非根据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个人选择和区别阶级选择的社会关系的说明，对这种假定作重大的修正。只要缺少这样的修正，那末所谓个人进行选择这一说明，如果把它具体化为个人按照某种方式进行选择的形式，那就变成个人自由地进行选择这样一种与事实不符的说明了。这就是說，由于个人的这些行动而形成的事件，都可以不受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那些基本生产关系——与经济财产所有制相联系的阶级关系——的影响。隐蔽的假定是很頑固的，尽管魏克斯梯德(Wicksteed)希望数理的说明能够起一种化学试剂的作用，“把我們一般冗长的論述中所包含的假定变为沉淀”，可是今天愈益数理化的经济学实质上还是建筑在同样的基本前提上面。就它的辯护的影响来看，所不同的，只是現在变戏法人的技巧更高明了，因此，他喋喋不休地大談其“倫理中立性”，用頗为巧妙的手法造出一种推論，在观众看起来，仿佛是从普遍有效的科学原理演繹出来的推論一样。可是秘密的假定依然存在，隐含在对问题的系統說明里面；虽然过时的“效用”可以由前台撤走，可是那种自由行动的个人底欲望，却仍然被看成是統治着市場的东西，而这种自主的消費者的“主权”(有位作家最近这样称它)①，仍然是所假定的任何規律和所作出的任何預測的根据。这样，经济学家們就会繼續把資本主

① 哈脫(W. H. Hutt)教授在“南非洲經濟杂志”1934年3月号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宣称，这个原理对经济学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也參閱他的“经济学家与公众”一书第257頁以后。

义制度下消費者的自主权与社会主义經濟下的“經濟权威主义”相对比^①。当然，这个事实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場估价代表着极其高度的权威主义。今天支配主观經濟学的这个假定——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偶然的“附加的假定”来支配它，而是通过为解决整个問題所必然采取的那种形式来支配它——是与傳統的政治学說和国家学說所依据的类似假定相并行的：国家是由无数自由平等的个人的独立意志所形成的某种总意志的表现。在經濟領域內也如同在政治領域內一样，階級社会的事实证明这种美丽的图景是虛伪的。資本主义的报刊在这一方面的势力正可以比之于广告在經濟方面的势力。在这一方面的階級势力也就如同在經濟方面的階級习俗的势力一样。在这两方面，經濟地位的差別以及无产者对有产者的經濟依賴性都是主要的因素。而且在經濟領域方面，“复投票权”^②是常規而不是例外；这种多数可以多到一千票一万票对一票。但在大多数經濟著作中却称之为消費者的統治，就因为有那么一个市場的存在。这种說法的

① 下一段話就是一个特別天真的例子：“富者的消費比較貧者的消費，在天平上有更重要的分量。……它本身就是一种表決的結果，因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財富的获得和保持，只有依靠符合消費者需要的反应。所以成功的商人的財富，总是消費者共同表決的結果，而且在获得以后，他只有把这种財富使用在消費者认为对他們最有利的方式上面，他才能保持这种財富”（密賽斯：“經濟学概論”，第21頁）。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許可复投票或請代表投票，并且有一撮野心的紳士用正当或卑鄙的手段积累了过半数的票数，他們在以后的各次选举中也都投票贊成維持复投票的办法。密賽斯教授大概会声言这是彻底的民主，因为全部过程是一个“表決的結果”，同时会认可这些自封的統治者的行为，因为它们反映了什么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一种公民投票的决定。

② 指富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多买产品。如果每买一件东西代表着消費者的一个投票权，那末富有者的投票权就占絕對多数了。——譯者

天真可笑，正如希特勒把他的极权国家說成是公众意志的产物，因为他已經举行了公民投票一样。

也許有人会认为，为辯护目的而提出的抽象概念的最直接的证明，只有在所謂分配論里面才可能寻到。如果說現代經濟学并不包含有值得称为分配論的东西，这种說法也沒有什么不妥。但这并不等于否认曾經有过自命的分配論者。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边际生产率的理論。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个理論非常明显地带着数理方法的标志，而且作为对資本主义制度的批評者的答复，曾經提供了最实际的貢獻；虽然这个理論的主要意义——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釋——目前一般都承认是屬於純粹形式的性质，但却被用来并且还要繼續被用来作为答复馬克思的剩余价值論所要解答的那一类型的問題，从而作为对后一理論的反駁，或至少是一个充分的代替物。这个理論显然是和旧的資本生产率學說一脉相承的；不过去掉了旧理論中較为显著的粗糙部分，把微分增量的概念应用到不同要素的“生产率”上面而已。可是經過这番加工，連那原始生产率說中可用以答复剩余价值的实际問題的微弱东西也不存在了。单是說竞争市場上某一生产要素(不論是土地、劳动或資本)的价格，会同因增加这个要素的一个边际单位所造成的对于总产量(用价值来計算)的差額趋于相等(因为一个成品的价格等于一个边际单位的效用)，这只是对傳統的供求論提出一种更精确的說明罢了。正如馬夏尔所急忙指出的，这并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分配論”，因为它仍然沒有答复各生产要素的供給如何决定以及它們的性质如何的問題。实际上，它表明不仅进一步地把商品，而且把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也当作市場交換的对象，甚至把它們从具体生

产活动中完全抽象出来，更不必說从它們所結成的基本社会关系中完全抽象出来。但这个理論却立刻被吹嘘是对有名的利潤問題的一个圓滿答案，使李嘉图和馬克思的学說变为陈腐无用了。約·倍·克拉克把它捧为新发现的“自然規律”；虽然今天的經濟学家很少会同意他的这种輕率的說法，但是我相信，其中也还有相当多的人会同意这样的見解，就是认为这个理論可以表明：竞争的規則“会使每一生产要素获得它所創造的等价物”。这种說法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无論如何，不管职业經濟学家們个人的想法怎样，但如果說，他們的听众有百分之九十九会理解他們的話中所含的类似上述这样的結論，这也不見得不正确。

这个新理論的批評者，由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那被证明为属于純粹形式的問題上，即所謂“加在一起的問題”上，因此最初他們的行动与其說是逐步达到澄清，不如說是引起更大的混乱。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每一生产要素是根据它的“边际生产率”所确定的意义来决定价格的話，那末，把所有这些要素的价格加在一起，是否等于总产品，既不多也不少呢？他們追求这个主要属于学究式的研究，旨在說明，如果事实上能符合这个条件，这个理論就具有分配論的重要意义。当霍勃生声称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和它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价值付予报酬，而必須按照它的平均生产率付予报酬的时候，这就是他所采取的批判路綫。除非后者是正确的，各生产要素的收益总额就不会等于总产品。因此，要答复这个批評，只消用更精确、更抽象的說明来确定这种情况，并证明当竞争的意义被充分肯定以后，“正常的平衡”必然包含每一企业的边际成本同平均成本都相等的意义（在平均成本是最低的一点上），这样，只要照竞争价格的定义，就符合

上述关键性的条件了。

对于这个理論的很多数理加工曾下过功夫的魏克斯悌德，主要用它来攻击李嘉图的地租学說并且证明任何剩余价值概念都不能成立。我认为这不是沒有意义的。他所沒有注意到或者显然沒有認識到的，只是这种說明方式不仅使剩余概念变得沒有意义，同时也使那些使它有理由称为现实主义的分配論，以及他显然认为暗含在这个理論之中的实际推論变成沒有意义了。魏克斯悌德曾經指出，李嘉图的地租学說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剩余論”。如果用数理名詞来表示，那就是“全部产量是 $F(x)$ ，而 $F'(x)$ 則是滿足資本加劳动的每个单位的报酬率，資本加劳动所提取的总数是 $x \cdot F'(x)$ ，而剩余部分 $F(x) - x \cdot F'(x)$ 就是地租。因此，这只是說，当其他各生产要素都已經付偿以后，‘剩余’或余额就可以归地主所有”^①。如果 $S = x + y + z$ ，而 $x + y$ 为已知，那末結果必然是， z 便等于 $S - (x + y)$ 。据魏克斯悌德說，这样一种数学的自明之理，应用于 z ，也能同样有效地应用于 x 和 y 。根据同样的推論方法，資本的价格或劳动的价格，也能作为一个“剩下的余额”来处理；問題完全在于把哪一个要素作为“已知”，哪一个作为所要决定的剩下的变数。但是魏克斯悌德（也同現在他的門徒一样）沒有能注意到，把地租論說成数学自明之理的正是他所采用的那种純粹形式主义的說明方式；只要竞争的概念充分明确以后，这种形式的說明方式同时也会使作为一种分配論的全部理論都成为自明之理。^②当然，在純粹形式的平面上，是不会显出各生产要素之間的区别的； x 、 y 、 z 不过代表一些

① 魏克斯悌德：“生产規律与分配規律的协作”，第17、18頁。

符号，除了它們的符号不同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区别。辨别地租和利潤与工資的不同并不是根据代数的規則；如果要区别它們，那就必須根据从现实世界中所形成的那些特征——也就是与这些价格現象背后的实际活动有关系的那些特征。魏克斯悌德并且声言，他所闡明的理論，“并不是从几个要素的各种服务的特殊性质而是从所提供的服务的共同事实中去寻找”^③分配的規律。这显然等于承认各生产要素的主要的区别性质已經在假設上予以排除，因而这个理論只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就是这些要素对于生产是重要的，因而位于需求之列。要在这个基础上断定階級間的利益的根本調和，否认“剩余价格”和“剝削”等等的存在，只是以待证明的原理作为論据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而已。^④

② 魏克斯悌德显然不是这样想的。他以为这个学說“对于我們在分析壟断組織以及在分析关于生产的真正社会化的时候所应采取的攻击路綫，能够提供一些建議”。这些建議具有“远大的希望”（“生产規律与分配規律的协作”，第38頁）。在別的地方，他认为指出“根据边际工业效率的計算，壟断組織在产品中所获得的多于它們的分配份額”，是对壟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批判。实际上，照这个学說对“边际工业效率”所下的定义，这种說法等于說，壟断者所获得的多于在竞争下所能获得的數額，除此以外，并不能有更多的意义。

③ “生产規律与分配規律的协作”，第7頁。

④ 把生产要素的差別已經純粹形式化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魏克斯悌德除了建議把鋤头、肥料、馬匹以及呎磅功率，也必須当作单独的生产要素以外，还建議（为了要求形式的完整起見）把“顾客的集体及其欲望”，甚至“商业上的推銷”、“字号”和“坏声誉”也包括在生产要素之內，每一項都照它的边际生产率定价（“生产規律与分配規律的协作”，第33—35頁）。罗宾逊夫人认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就是同任何其他生产必需品具有技术差別的东西，也就是沒有完全代替品的某些东西。罗宾逊教授曾經贊揚这个定义，說是具有形式的优美和簡炼（參閱“不完全竞争的經濟学”，第108、109頁）。这些定义确实是优美的，但它們也是很脆弱的。

追究一个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大于还是小于它的“边际生产率”同追问市場上是否存在着竞争的条件，实际含义是一样的（并没有更多的意义）。而且只要重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义，这个概念也可以适用在壟断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的估价了。^①

这里所提出的批判，并非否认数理经济学在使含义精炼和假定明确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也并非否认个人的主观态度作为经济事物的連鎖中的环节起有一定的作用，因而在经济现象的任何全面分析中占着一定的地位。但这里所要說的是，只要数理的技术继续受某一特殊思想方式的奴役，那末，它所形成的概念就是有意要掩盖现实而不是揭露现实。因为主观价值論中这种偶像化了的思维方式，首先为我们創造了这样一个領域，那里脱离了軀体的思想与精灵化的选择对象发生了神交，然后不顾这个抽象世界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企图把这个領域中所发现的关系說成是既支配着现实经济社会中所存在的关系，也支配着所有社会制度体系下的事物所必然具有的形态。这只能造成思想混乱和对现实的歪曲。这是要使一切本末倒置。把经济思想从这个傳統中解放出来，是我们老早就应该实现的一项任务。

① 参閱罗宾逊在“经济学杂志”1934年9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第六章

关于摩擦和預期：經濟學說上的某些最近的趨勢

晚近以來，特別是最近十年間，經濟思想上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舊的教條主義的衰落，懷疑思想的加速發展以及論戰的再起。幾年前認為已經確定的學說，只需在它的含義上以及對特殊問題的应用上加以改進就可以了，而現在卻從它的基本假定上發生了疑問。思想體系，它的最後形態原來認為已經達到了完善的地步，所差的只是一些細微的加工而已，現在却要回爐重鑄。不難看出，就在這些思想的動態之中，反映着過去二十年間現實世界的驚人事件。這種懷疑思想的加深，實際上就是放任主義作為一個學說體系的最後解体；人們大致上可以這樣說，所謂學說的轉變主要是繼現實世界中放任主義的衰落之後而產生的，而不是在這以前。今天這種放任主義學說，至少按照它的傳統形式來說，即使還有值得注意的擁護者，那也是相當少了。但是還不能說，代替舊的信念和對這種信念的肯定性的，目前除了混亂和折衷主義以外，幾乎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最近這些觀點的轉變，我相信主要是集中在傳統假定的兩種重要修正上。這兩種修正，似乎都與新的壟斷時代的特征有關，一種是直接的关系，另一種是間接的关系。其中第一種修正

是對傳統的競爭概念的一種批判，或至少是一種重新的探討，並且試圖根據壟斷組織或壟斷因素的存在對平衡條件重新加以說明。第二種修正着重在於對於傳統的平衡分析即關於經濟規律和趨勢的說明，在個人預期能夠對事物發生重要影響的情況之下，所必須作出的修正。我們已經看到，傳統的放任主義學說不論是按古典經濟學用成本規律的形式來說明，還是按主觀價值論用邊際效用與成本相等的形式來說明，都是以競爭的協調與自動調節的作用為根據的。如果事實上不是這種平衡而是另一種平衡在支配着，那末，實際的放任主義的結果，一定和原來所想像的不同。再者，按古典學說的實質，原來認為最後所產生的結果，並不以個別企業家的主觀願望或預期為轉移。如果情況並不是這樣，如果主觀的願望成了結果中的不受其他影響的決定因素，那末“無形的手”將告失效，而實際的放任主義的結果也一定和原來的推論有所不同。

這兩種改變，都與通常所謂“摩擦”的那些因素的重要含義有關。傳統上已經承認，在競爭為絕對的壟斷或接近壟斷的東西所代替的場合，價格就（在一定的限度內）為壟斷者的意志所決定，因而成本的原理也就不再適用於這種所謂有意造成的稀有性的情況。但在賣者（和買者）人數很多的一切居間狀態的場合之中，使市場成為“不完全的”並使它脫離競爭的抽象理想的那些因素，只是當作摩擦來處理；這些摩擦或者會推遲到達平衡位置的時間，而不改變最後所要到達的位置的性質，或者會由一定的地域差別而形成價格上的差別——這些差別本身就是摩擦因素的簡單而直接的函數。例如，認為對市場情況的缺乏了解，或者由於生產者的惰性會延緩競爭力量的作用，因而使價格

更长期地脱离正常情况，但并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就是如果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这种价格仍然能达到平衡，虽然会比在其他情况之下更加迟缓。另一方面，当人们远离供给来源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同一个市场之内被时间或空间隔离开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移动成本会在价格上造成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各自与化为价格的移动成本构成精确的比例。这种比较新近的学说的新颖之点在于：某些因素——如缺乏了解、惰性、或移动成本等因素——的存在被看成不仅具有这一类型的摩擦影响，而且还会改变平衡力量和最后所达成的平衡的性质。

那末，根据什么标准，摩擦才不算是摩擦或者不仅是一种摩擦呢？我们怎么能知道是否某些“扰乱影响”只会在某些很小的、可以计算得出的数量上，干扰近似法的“精确性”呢？还是它们的出现会使情况发生质的变化呢？初看起来，仿佛完全是一个关于程度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扰乱性摩擦的大小与其他发生作用的力量的强度相比较的问题。但这也会牵涉到一种性质的区别——一种和这个情况（摩擦因素就是被引到这里面来的）有关的摩擦因素的性质的区别。

当一种新的要素导入某种情况的时候，它对这种情况的影响可以有几种方式。第一，虽然它对某些决定因素的作用可能发生削弱或延缓的影响，因而在开始位移以后，会推迟这些平衡力量的作用，但这种情形可以认为和最后所达到的平衡无关，因为那些决定性力量的性质并没有受到影响。根据旧学说，所谓缺乏了解和惰性的影响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新的因素可以认为没有改变那些确定平衡的方程式中的任何变数。这好比把连接两个貯水箱的水管缩小并不会改变

两个貯水箱的水仍旧达到同一水平，虽然会延緩达到这种平衡的过程。

第二，新的要素可能在一个简单的、可以計算出来的数量之内造成这种情况的位移。在这种情况下之下的摩擦，就不仅延迟而且还会轉移所达成的平衡。但它在这方面的影响是简单的和外加的。在这个情况中的新因素，好像是被看作一个附加的常数，照一定的数量，改变在决定性的方程式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变数价值；就像照旧的看法，移动成本对于价格的影响实际上是被看作对供給价格的一种增加，或者是对需求价格的一种减少。所以它的影响与任何其他数据的影响是属于同一类的。如果加减数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比这个学說在它的第一近似法里面所包含的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小，那末，就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单纯的扰乱因素，只削弱原有概括的精确性而并不妨碍它的基本的正确性。总之，虽然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可以改变这些方程式所得出的价值，却不致改变这些方程式的基本形式。

第三，新要素的加入还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剧烈的方式来轉变这种情况，这意思就是說，它还能改变各个数量之間的实际关系的性质。因此，沒有理由再把它的影响看作只是一种延緩或位移摩擦的影响；不如說是一种新的化学原素的影响，它的出現改变了其他要素的性质和作用，因而改变了整个成份。它的影响就不再是简单的和附加的；而它的存在照道理就只能看作是实际上改变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方程式（表示一定的条件或假定数量之間的关系）。但是如果能使方程式的数目（或关于这种情况已經知道的各个关系）等于因变数的数目，这种新的情况就有可能变成具有和原来一样的确定性。这就是关于“不完全的

竞争”的某些新近学说中如惰性或移动成本这类因素所引起的那一类型的影响。^①

上述头两个类型的差别，有一部分似乎是属于程度上的差别。我们指的究竟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事件，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平衡；某一摩擦要素能否看作只是一种延缓，还是一种位移，这往往是属于我们对于时间的考虑的问题。而且，如果人们的说明是属于动态性质的，指的是一种移动的途径，而不仅指的是静止不动的状态（那就是说，如果某些方程式是把变数表现为时间的函数），那末，凡是削弱或延缓任何力量的作用的一种摩擦，事实上就会改变以后事物的进程。

我们目前所讨论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第二两种类型和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类型之间的区别。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延缓或位移的那种摩擦，其影响的强烈，足以完全消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影响；正如连接两个貯水箱之间的水流，如果阻碍变成很严重以致完全阻塞了水流，那就可以使两个水箱的水平彼此完全脱离了关系。最近在对旧的竞争概念的批判方面具有决定的重要性的是市场上摩擦的出现，例如缺乏了解、惰性和移动成本等等，即使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应该看作会引起我们所讲的第三种类型的变动。这些摩擦的出

① 第三类型的例子，似乎就是不能适用约翰·穆勒的“原因组成”原理的例子。它们也似乎就是约·摩·克拉克所指的变动的导入将引起“质的或化学性质的差异”的那种情况，而与纯粹“数量的”差异有别（“约·倍·克拉克纪念论文集”，第46、47页）。但我不懂，他说在平衡的分析中，这种“平衡力量”必须限于“在性质上是自动限制的而非累积性的那些东西”（第18页），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所谓“自动限制的”或“累积性的”，只能应用在总情况的性质上面，而不能应用在其中的各别因素上面，难道不是这样吗？

現，不仅可以使市場上不同部分的价格根据和摩擦大小相等的数量脱离“正常价格”，而且能使整个市場的“正常价格”水平不同于其他情况之下的水平。这种摩擦对价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种直接的影响会引起地域的差别，一种間接的影响会改变平衡水平的本身。关于完全市場的“正常价格”的傳統說法所根据的假定是：既然个人不过是多数人中間的一个，他自己的任何行动对市場价格只能引起微不足道的影响。个人在扩大或縮减购买或銷售时只能根据当时的市場价格，并且把它看成是不以自己的行动为轉移的东西。因此，作为一个卖者，他永远不能靠限制产量的办法来获得更大的总收入或淨收入（只要价格高出他的边际成本），而扩大产量直到售价（因而从扩大銷售額所增加的收入）和他的边际成本相等的一点对他总是有利的。如果他是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完全的市場买进生产要素，也可以适用类似的道理。这等于說，对于个人銷售的需求和对个人购买的供給都有无限的彈性。如果存在着某些类型的摩擦因素，这个假定就不再适用，因为这种摩擦的存在会发生一种影响，使得对个人銷售的需求和对个人购买的供給，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彈性。比如由于到半哩路那么远的另一家零售商所需要的費用，或者甚至因为惰性或者不了解这家所提供的便利而宁願向附近熟悉的一家杂货商去购买，即使他的定价比較高些；又如工人宁願从某一雇主那里接受較低的工資而不願到另外一个县或市鎮去找工作，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这种缺乏彈性的程度相当大，就会造成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使个别卖主能靠限制銷售額来增加他的淨收入，即使当时的价格水平是高过他的边际成本；而且个别的买主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来限制他的购买。因此认为

价格趋向于同边际成本相等的竞争原理，已经被罗滨逊夫人所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理所代替。^①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将以减缩产量到可以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这个壟断原理作为他的行动指南。因此作为一个补充原理，一个企业家的活动规模所代表的生产单位，势将小于他的最有效率的规模，而不会照传统竞争学说的含义，等于最有效率的规模（照当时的市场价值估计）。所以就这个观点来看，竞争的原理只能适用于完全没有摩擦的一个市场，换句话说，只能适用于现实世界中最少见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最“人为的”一种情况（例如有组织的销售生产物的市场）。一旦这种摩擦的存在已经达到显著的程度，则不仅在市场的各个不同部分会发生价格的分歧，而且这种平衡水平也会由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同时也是根据壟断原理来决定。^②

就英国来讲，斯拉法先生在1926年“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具有创见的文章，似乎把思想引导到这些方向；虽然这篇文章所包含的暗示有一个时期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③ 这

① 参阅“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

② 改变分析方法的一个好例子，似乎可以由马夏尔对他的“边际流动性”的重视上面看出来。照以前的说法，只要能在边际上存在着某些流动性，移动的障碍并不会阻止最后达到竞争平衡的状态（例如只要在市场上能有少数精明的家庭主妇和少数善于看风头的流动工人）。现在这个新见解的含义是，如果其余买主或卖主的流动性等于零或很小，这种边际流动性并不能阻止整个市场的壟断价格的规定。

③ 在1925年，本书作者曾经引用过斯拉法为一家意大利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原稿，并且提到斯拉法所说的每一生产者的“私人市场”，指出他对“字号”在利润理论上所起的作用的论述是恰当的（“资本主义企业”，第88页）。但作者绝未认识到——更不必说着重指出了——它的充分含义。马夏尔的确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把私有市场看作是一个在跌价的市场对削价所起的限制因素。但他似乎认为它只具有短期的意义。

篇文章认为，既然大多数工业产品的市場事实上是大致被各公司分割为或多或少的“私有市場”，那就應該按壟断理論来处理，而不应按傳統的竞争理論来处理。文章又說，这种壟断限制占优势的情形成了資本主义工业的一般的而不只是例外的一个特点，即使在表面上竞争占优势的地方，这种情形也是使工业不能充分利用大規模經濟或“收益递增”的好处和生产資源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一个因素。这个观点在以后的著作中得到发展，特别是为罗濱逊夫人和張伯倫教授所发展，他們各自提出“不完全的竞争”和“壟断的竞争”，来代替竞争平衡的傳統分析。

这个新的概括的实际含义显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从利潤里已經可以看出含有直接壟断利得的重要成份（即依靠限制所获得的利得）：的确，在所有商业估价中，“字号”这个重要因素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只是看作代表这种壟断要素的資本化。当放任主义应用在现实世界而不是应用在抽象竞争的理想世界的时候，就会造成生产資源可能长期地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現有的經濟也沒有受到注意；同时生产单位，即使照放任主义本身关于經濟和效率所确定的有限意义来看，也还是維持在一种缺乏效率的規模上面。^①但是一旦达到这个程度，更大的想像的景象，甚至对原有概念更为扰乱的景象，也都立刻

① 庇古教授和另外一些人已經在放任主义傳統論点的說明方面，打开了一个裂口；他們认为，即使根据“純粹竞争”的假定，在具有“外部經濟”*的“收益递增”的某些情况之下，生产还是限制在最飽和的程度以下。但是“不完全竞争”的学說，又加上一个“例外”，而且它还有一种含义，就是这种“例外”事实上已經成了一种通例。

* “外部經濟”是馬夏尔所用的術語，指某一工业部門的經濟，以別于某一公司的“內部經濟”。——譯者

显现出来了。如果市場上这些“摩擦”因素的存在能够为壟断利潤造成了机会，并且能作为商业上的“字号”而加以資本化，那末这些摩擦本身不是也能被企业家制造出来嗎？在經濟学家眼前展示出来的那种阿丽斯在鏡子后面所看到的奇異的世界里面，“摩擦”几乎已經成了一种商品，可以有它的生产成本，也会产生一种利潤，因而获得一种价格。虽然摩擦能化装成商品，但它們能否說成是效用，却是大可怀疑的。的确，从社会的观点而不是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应当把它們看作“禍源”而不是“財富”的因素，是卢喜富 (Lucifers) 的限制而不是賈普利 (Gabriels) 的創造^①。可是它們似乎克服了这种矛盾，就是凭借它們占有財產的便利来打击作为消費者或作为工人的交易对方，使他們为了获得各种实际效用而在壟断价格的形式之下对这种摩擦的存在付出代价(用貨幣或劳动力)。

張伯倫教授在分析广告和銷售成本的意义及其对价格的影响的时候所特別注意的正是这个問題的这一方面。广告和推銷技术通常就是用来对市場因素(例如，缺乏了解、惰性或空間和時間上的近視等等)产生作用的方法，并且利用这些材料使消費者对某一公司的产品发生更突出的兴趣和爱好。^② 現代流行

① 隱喻引自英国詩人密尔顿的一首著名的詩。这首詩根据聖經創世紀的故事，描述善良的天使賈普利和邪惡的天使卢喜富之間的斗争，最后卢喜富被貶入地獄。这里用卢喜富来比喻壟断資本，用賈普利来比喻生产者。——譯者

② 在劳动市場上与此并行的，我們还可以看到使工人更穩固地依附在某一个公司的許多不同的方法，包括目的在于减少“劳动周轉”的各项福利工作等等以及“公司工会”的办法。其意义就是破坏工会組織和集体議价对于工資的影响，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要“压低工資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来增加“剩余价值率”。

的喜欢购买名牌貨和专利品的風尚就是这方面的突出的例子；而在現代世界里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經銷机构和經銷成本就是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換句話說，“竞争的力量”照古典学說的說法，认为是能够作为社会利益統治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执行着一种积极的社会机能，使产品价格下降并促进技术的革新，而在今天反倒主要成了阻碍代表社会利益的“无形的手”的作用以及制造具有限制性的壟断权利的一种代价昂貴的工具。

所有这些壟断竞争方法的意义，在于兼用强制、欺騙和宣傳暗示的办法，以期提高某些个人或者甚至整个市場的需求和减少它的彈性。^① 根据这些方法所达到的范围以及通过这些方法为某一卖主或一群卖主(或买主)所創造的一种专利市場这方面来看，这些方法是“合算”的。这里我們似乎有了一种新的神秘性的“供求”机构，不仅能使需求引起供給，而且也能使供給創造需求。这里我們显然有一种新的費用类型，一旦这种費用变成普遍以后，就成为“必要”的了；它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生产成本沒有区别，但还是完全与产生这种費用的壟断竞争有关而且与竞

① 常常有人为这种宣傳辯护，理由是：它可以起着建設性的职能，告知消費者他所不知道的、可以选择的貨物的消息。（而且，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之下，它还可以鼓励扩充，并促进生产上的經濟，虽然根本没有理由可以假定，它一般地会鼓励“收益递增”最占优势的那些工业，因为它也同样可能会鼓励其他工业而使上述工业遭到損害。）当然，这种“消息”的根源，大部分还是由广告方面得来的。但“消息”（即能使市場更为完全而不是更不完全的那类消息）必須是一般的而且包罗一切的，才能作到这样（例如某些国外旅行服务社所发行的旅社及其收費一覽表）。可是广告的本质就在于它并不是包罗一切而是排他的，是专为某种貨品叫喊，而故意轉移对其他貨品的注意力的。在具有同样目的和效力的强制手段里面，还可以划入“包銷合同”、經濟抵制以及各种类型的政治势力。

爭者在这方面决定采取的某种政策有关。^① 正像張伯倫教授所說的：“凡是已經發生了推銷成本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商品都已經承擔了推銷成本——再要用‘競爭的’需求和成本的曲綫來說明價格，那就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在純粹競爭的情況之下，就不會有推銷成本。……需求曲綫的地位跟着總的推銷費用的每一變動而移動。總之，這種包括推銷成本的‘競爭’成本的曲綫是與它的本身相矛盾的，它是無用的，是會引起誤解的，是具有非常有限的意義的。”^②

這裡我們似乎又失掉了可靠的支柱；而且有這樣一種神秘的因變數的複合體的存在，就得出任何確定的結果。古典競爭學說似乎建立在这个基本矛盾上面：如果把競爭具體地解釋為在現實世界所不可避免的那類摩擦之中的活動，那末即使將這種“競爭的平衡”當作近似值來說明這個情況也是不可能的。我們是不是真的好像處在這樣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充分增加推銷費用就可以使價格無限制地上升呢？難道資本主義制度就可以用它自己的手把自己提到無限高么？不錯，如果能在銷售技巧上所支出的費用和這些技巧在改變需求曲綫與擴大增加利潤的機會方面所產生的具體結果之間^③，假定有某種關係，——如果能創造一套關於生產費用與引起摩擦的生產率學說相混合的理論，那也許可以從明顯的混亂之中產生一種秩序。但是這種假定雖然巧妙和細致，可是一应用到實際事實上，似乎

① 參閱佐聖 (Zeuthen) 教授著“壟斷與經濟福利問題”，第 60 頁：“因此壟斷利潤的實際可能性，會促使這些費用成為其他企業的成本。”

② 張伯倫：“壟斷競爭理論”，第 175、176 頁。

③ 同上書，第 130 頁及下文。

就只有有限的正确性了；并且除了在有限范围的孤立问题以外，处处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毫无疑问，在其他工业、其他价格以及其他推销费用都没有变动的相当严格的假定之下，来分析某些市场的某一类的商品，也许是一种有用而且有效的方法。但要想用整个体系的一般平衡来说明有关经济社会的宏观问题，它们的正确性似乎就大有疑问了。要假定某种关系的存在并且假定我们了解它们的性质，这是相当容易的，但要说明这些假定如何变成具体的东西就比较困难了。这里所指的关系本身似乎就是要由这个情况中的许多其他变数来决定的，因此究竟能否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加以广泛的概括而不致陷入矛盾，就不能不引起疑问。比方说，广告方法的大部分效果是由这些方法的差别的性质来决定的，也就是要看竞争者之中有没有使用广告方法的。如果这些方法已经在某一个工业部门之内普遍采用，尤其是在整个工业之内都已经采用，那末，可以推想得到，这些方法中将会有不确定的一部分，它们的效果（如同在人群中向前拥挤一样）只能抵销其他人所用的广告方法的影响。虽然这种推销费用对每一卖主是必要的（如果他要保持在市面上的原有份额的话），也不见得就会给他带来额外利润，和维持现状有什么区别。那末，一定的推销费用对于某一商品的需求所发生的影响，一定是由以下各因素综合起来决定的，这些因素就是：所有其他商品的推销费用的数额和形式；由于这些推销费用而引起的价格变动对于消费者收入的边际效用所发生的影响，以及消费者在这些特殊销售方法面前的“感受性”。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由谁来负担现在已经成为普遍的、因而成为必需的、这些额外的推销成本，它们应该列入哪一笔帐呢？它们会

不会列入現有壟斷利潤里面，当作維持“字號”的一部分成本呢？如果这样的话，結果显然会促使企业家不是减少产量就是减少这种推銷方法的支出或者两方面都减少；除非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希望比他的竞争者多支出推銷費用来获得新的差別利益，同时假定他的竞争者不会也这样做；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就会引起一場新的推銷战。如果推銷費用普遍提高的結果引起产量的下降，那末这个負担将落在社会全体身上而造成消費的限制。实际上所发生的，可能就是这两种情况之一（或两种都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利潤并没有增加或甚至减少，而一部分劳动和其他資源反倒从正常的生产活动轉到非生产性的推銷竞争的活動方面——提供經濟訛詐的武器。另外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企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經增加了他們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剝削，强制后者接受較低的实际收入。換句話說，提高一般利潤的办法就是压低工人願意出卖自己劳动力給雇主的那种价格，不然就是对社会的某些中間阶层加以同样的压力。究竟这是不是最后的結果，如果是的話，它的范围又将达到什么程度，这都要以决定这种类型的剝削能加强到什么程度的社会关系为轉移。

因此，如果要想对整个情况加以概括的話，那末，我們显然又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学所討論的那种类型的决定性关系上面了。这似乎就是現代分析方法取得最大胜利的一个領域！我們好像又不得不回到最初的、比較簡單的系統說明了，正是因为只要我們一承认消費者的选择有可能被卖主的行动所决定，就可以明白，主观价值学說无法为整个体系的、可以精確估計的說明提供穩固的基础。“消費者的欲望”不但构成了价值学說的出

发点,同时还认为它們本身就是“因变数”,可以由生产者的推銷費用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我們現在再回过来用像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那种比較简单的关系來說明問題,当然并不是說可以提出一个魔术的公式,能為我們算出原来无法了解的关于壟断竞争的影响。这种知識不是只凭演繹的方法推出的,而是一种經驗的問題。但是除非我們根据这一类的某些基本关系进行分析,然后把更复杂的原因和这些关系联系起来,我們似乎很难掌握情况的全貌,或者是見树而不見林。

近来人們特別重視預期对于价格构成的影响。如果要給这个趋向找出一个系譜的話,可以說是由两个族系傳下来的。一方面,这似乎是由研究短期問題,特别是关于广泛的固定成本的存在所引起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的更精密的分析,而不是对个别商品的相对价格問題的研究而产生的。我們已經知道,古典政治經濟学趋向于把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看作一个明确的貨幣問題,而与相对交换价值和生产問題的决定无关。由于十九世紀最后 25 年的价格大变动,更由于战时和战后出現的价格現象,注意力便又被吸引到这个問題上面来。其所以引起对这个問題的新的兴趣和新的研究方向,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认为一般的价格水平不会发生变动,除非表现为相对价格(因而影响生产和分配)的变动(至少暂时如此),另一方面认为預期能够成为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动的起因。对前一問題的兴趣,主要是由于約·摩·克拉克的“固定成本經濟学”一书的出版而引起的。这种类型的問題的研究,不仅引起对竞争和壟断作一种新的分析的兴趣,而且对于长期平衡的傳統分析是否正确

和适当也提出了疑問。这种分析在某种形式上是要以成本作为决定因素的。但是凡大部分成本系代表耐久厂房和设备的固定成本的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它們都和价格的决定不发生关系。^① 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以及在任何具体的“短时期”内，价格可以和“正常”水平距离很远。根据两种情况来看，这种短期价格有一部分是由预期来决定的；一种是对未来的预期，这种预期曾经促成对固定厂房设备的最初投资，从而决定它的现有数量；另一种是企业家关于最近将来的价格发展的现时预期，这种预期决定着现有厂房设备在生产当前产量时所能利用的强度。怎么能够肯定，这些短时期的价格分歧最后仍然能回到长期的“正常”水平呢？又怎么能肯定馬夏尔所说的，在背地里活动的、把一切拉回到预定的平衡的那些长期力量本身可以完全不受短期情况的任何相反势力的影响而发生作用呢？是不是这些短期情况的事件，正可以帮助形成最后平衡所依赖的那些因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现实世界就不只是一連串的短期，而这些短期又永远达不到一个长期；但是甚至这些不断竭力活动的长期趋势，也可能为短期的变化所左右，因而只是僕人而不是主人。就好像在听音乐搶椅子^②的游戏当中，只要音乐在继续着，就不仅永远不能有坐椅的平衡，而且允許游戏者可以

① 固定成本*的采用，使得人們对于成本的最基本的经济职能的意义发生了含混和模糊不清的感觉，所以经济学家就“丧失了一个衡量经济健全性的现成尺度”。因此对于“私人企业和私人会计”不能再完全加以信任（約·摩·克拉克的文章，見“約·倍·克拉克紀念論文集”，第64頁）。

② 听音乐搶椅子的游戏：室內放置的椅子比游戏的人数少一个。当音乐一开始，这些游戏者就繞着椅子走，当音乐一停，大家都搶坐自己附近的椅子，其中終有一个人要落空受罰。——譯者

在室內任意移動椅子。如果預期能影響在短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那就也可能影響事物的永久形式。

如果有任何競爭的活動，似乎就要有某些因素來推遲摩擦的影響。就像約·摩·克拉克教授所指出的，在“完全競爭”這個概念裡面，似乎含有一種黑格爾式的矛盾：因為假若競爭發生完全的作用而沒有摩擦的話，那末對賣主來說，削減價格對他是絕不會有好處的，因為他會知道所有競爭者都要立刻仿效，使他喪失削減價格的全部利益。^①但在現實的世界中，競爭當然永遠不會頃刻發生作用。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有遲緩的存在使得個人由於不能確定他的競爭者的行動而對價格的未來發展也不能確定。無論如何，如果他是很多人之中的一个，他自然可以假定他們的行動——因而未來的價格——不會受他自己行動的影響。因此，他當時對產量和銷售量的決定就會根據他對那時市場價格的觀察，再根據他對未來價格發展多少帶着盲目性的推測而加以修正。不管他所決定採取的行動是什麼，對於整個市場的情況來說，只能發生微弱的影响；因此任何單獨個人的預期對於最後的結果不會發生什麼影响。但各個人聯合起來的預期（假定他們都受同樣預期的影响），會發生什麼影响呢？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甚至這也和價格的決定無關，是不是正確呢？

① 約·摩·克拉克：“固定成本經濟學”，第417、460頁。張伯倫教授又補充說：“完全競爭所給的價格似乎會和完全壟斷所給的價格一樣”（“壟斷競爭理論”，第4頁）。如果某人所想像的平衡，是從一個高於壟斷價格的價格達到的，這種說法就是正確的。必須這樣，張伯倫教授所描寫的情況（就是沒有任何人會由於主動削減價格而搶先得到利益）才會阻止價格的削減。但這種情況不會阻止從原來較低的水平來提高價格的那種趨勢，除非是根據一種協議。

很显然，整个市場所共同具有的預期，或一大群买主或卖主所共同具有的預期，是能对当时或最近将来的价格发生影响的。市場上的每一漲落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而且如果某些决定，在长时期以前就产生了結果（比如，在长久的生产时期），或者体现在很耐久的对象里面，特別像有关資本积累和投资的决定，那末，这些預期对于这种情况所发生的影响可以及于长远的未来，达到几年或者甚至几十年之久。但这并不是說，这种影响不是暂时性的，即使这个短暂的时期是相当长的；这也不是說，这种預期一定会改变长期“正常”水平的性质，而交换价值最后也会和这种水平趋于一致。

古典学說认为主观的預期，即使是普遍的，也与长期平衡的决定无关，它所根据的理由就在于这一价值学說的客观性质。决定“正常价值”的因素，并非就是能够被預期或短期价格漲落的后果所影响的那些因素。所以預期不可能引起永久的价值底位移，更不可能引起累积性的位移。“正常价值”代表着，在現有的需求情况和現有的劳动和資源的供給情况之下，对企业家个人构成最有利地位的那种劳动和資源的安排和分配。如果有一个人单独离开这个位置，他就会受到損失（或至少不能得到原来所能得到的那么多的利潤）。如果有离开这个位置的任何普遍的移动，不論是朝着扩张的方向还是朝着縮减的方向，那就不是普遍受到損失，就是会获得不正常的超額利潤；再不然就是某些工业获得反常利潤而其他工业遭受損失，結果某些力量就会发生作用，来扭轉这种縮减或扩张的趋势，使一切再度回到“正常的位置”。假定支配成本的基本生产条件和需求情况都沒有变动，那些不符合客观情况的預期就自动地随着这些預期所产生的价格

变动而被阻止和糾正。^① 由于对一般情况缺乏了解而产生的主观預期，虽然和經濟波动不是沒有关系，可是和每一个这种波动的最后結果无关，而且也和支配着事物长期趋向的平衡趋势无关。

但是很明显，这种观点必須在两个重要方面加以修正。

第一，只要任何支配条件包含有一个傳統习惯的要素，这个要素能被某一階級收入的变动所影响或者在任何其他方式之下由一个集团或一个階級的收入来决定。显然，劳动价值学說中的价值决定因素却是不受这种影响的。但在馬克思所說的生产价格的决定因素中，有某些因素是可能受影响的。例如，只要劳动力的价值有一部分是由包含在必要的生活标准这一概念之中的所謂傳統习惯的或社会的要素来决定，那末由于临时情况而引起的工資变动就可以变更劳动力的供給价格或它的未来的“正常价值”。^② 例如，这种变动可能是在有扩大对工人的需求的时候，由于工会的行动而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失业而引起的工

① 当然，在买主的行动也是以未来价格的預期为根据的情况之下（例如，在一个純粹投机性的市場上），既然他們买进的用意，只是为了卖出，那就可能由于买方或卖方的最初預期，而引起无限期的漲价或落价的变动。但效用的早期理論家，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暗含着否定了在消費者的市場上会有这样的可能，因为照他們的假定，消費者的需求是和效用的微积分有关系的，这种效用的本身并不能被預期的价格变动所影响。当然，即使这样，消費者还是可以在面临一个預期的跌价的时候，推迟他的消費，因而加剧价格的下跌；但也許只是为了想在以后的日期，用同样的价值购进更多的东西而已。在这个体系里面，投机交易的成分愈大，价格的不稳定也就愈甚；这个事实是傳統的投机学說所沒有注意到的，它們主要是致力于替投机买卖作辯护。

② 这种傳統习惯的要素，就是李嘉图所說的“习惯”因素，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决定“劳动力的生产成本”的“社会”要素。

資下降。这种劳动力供給情况的变动，会对事物在后来所要回到平衡地位起反作用：它不但会变更利潤的总额，而且会变更利潤率（对地租也是一样），因而会建立一套新的正常的交换比例。在李嘉图的学說里面，并没有对这个問題作过充分的考虑，大概因为他认为人口規律的力量經過相当时期以后就足以使工資与生活資料水平相符合。但在馬克思的学說里，它却具有更大得多的重要性。正因为工資的变动能改变成为資本主义生产和擴張得以繼續的基础的未来平衡，所以馬克思才把危机和产业后备軍看作有那么大的重要性，认为足以左右資本主义的未來进程。在他看来，社会的运动規律不是一种自然的規律，可以根据一些简单的数据作出机械的推論，然后对一世紀以后的事情进行預測：社会运动規律本身就是由劳資双方的階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变动而形成的。

同样的理由对于資本的供給也可以适用。資本积累的数量，显然是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之下，由資本家階級的收入来决定的。因此，任何短期变动，如果能影响这个階級的收入就会反应到这个时期和随后一个时期內的資本积累的数量：例如，企业家的預期，原来促使他們采取了行动，但实际的结果却造成了損失。^①这在資本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没有类似的东西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因为資本的积累以及連带的技术革新，在資本主义生产上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繼續不断的过程。基本建設工程的数

① 似乎在表面上，对未來的相对价格的預期，也会引起对投資数量的直接和立时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应归到上面那一类情况之中。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意义是不同的。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这一类型的行动也要經過修正，因为事实并不会和預期相符合；而由于所得的变动以及資本“供給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投資的变动却不会經過这种修正。

量以及不同生产部門之間的平衡，不仅是暫時地而且是永久地由資本积累來決定的。^① 我們還會看到，貨幣的變動也可以影響資本的供給，因而使工業的技術情況、各工業部門之間的平衡以及相對價格的形成，永遠和它們原來的情況不同。^②

第二，主觀預期，顯然會影響價格的一般水平，如果這些預期能影響決定這種水平的兩種貨幣因素之一（假定有了商品交易）——即貨幣的數量及其流通的速度。這些預期對貨幣流通數量影響的程度，有一部分是由銀行政策來決定的。但是，只要這些預期的第一個影響可能對現有的貨幣餘額發生作用——在一種情況之下是使得人們將現有的貨幣餘額投入樂觀的預期，或是在另一種情形之下，由於悲觀的預期而將商品銷售的貨款用來擴大閑置的餘額——這些預期就顯然會對現有的貨幣流通速度發生直接和立時的影響。這種預期如果變成普遍的，就會產生正是它所希望或它所擔心的那種價格變動。^③

① 如果我們把奧地利學派所謂“生產的時間結構”看作和時間一起不斷加長，那末，凡是變更投資率的任何短期變動，一定會變更這一加長過程的速度，並使這個“時間結構”在未來的任何一點時間上，都與在另外情況之下的結果不同。資本积累是一個連續過程，這個事實就是經常為那種認為資本是一種最後的生產要素的見解造成困難的一個原因。資本不僅是一個存量，而且也是經常流注於這個存量的增加數；這兩種東西的“供給價格”是不同的。只有其中的一個可以說是等於當時的收益；而且這種供給價格並不是不受資本的增加流量的影響，而是不斷跟着它變動的。參閱阿姆斯特朗著“儲蓄與投資”一書第 247—248 頁和本書第 128 頁。

② 這顯然就是瑞典經濟學家所說的那種現象。他們為了修正魏克賽爾的說法，曾經指出，（由於利息的“自然率”和貨幣率的分歧而產生的）價格的變動可以引起利息“自然率”的變動。參閱林達爾（Lindahl）和密爾達爾（Myrdal）引用湯姆斯（B. Thomas）著“貨幣政策與價格”，第 78、79、85 頁；以及密爾達爾：“貨幣平衡論”。

③ 魏克賽爾：“利息與價格”，第 97 頁。

可是这并不是說，这种价格的变动一定是永久性的，更說不上是連續不断的。这完全要看由于支出的扩大(或縮減)所造成的变动，是符合还是違反原来的預期。如果結果是造成企业家的損失(或者情况相反，带来了特殊的利潤)，那末，这个运动将会自告失敗，而預期的和已實現的利得之間的矛盾将成为一种糾正的力量，使价格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假使在新的位置上，仍然實現了在原先位置上认为是正常的利潤(虽然不是那些反常的利潤或損失，而正是对于这种利潤或損失的預期才促成了最初的运动)，那就不一定会有回复到原来位置的傾向；那只会有一种傾向，就是在达到新的水平以后就停留在那里。但如果最初的运动的結果，产生了正是所預期的利潤(或損失)，——也就是實現的利得与預期的利得相一致——那末，这种运动一經开始就会繼續下去。就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來說，原来的位置是一种稳定的平衡位置；就第二种情况來說，原来的位置新的位置都是中立的平衡位置；就第三种情况來說，原来的位置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位置。

最初运动的結果有可能发生自取失敗的那种情况，也就是人們希望而且要維持他們的货币余額和以前一样大小(照实际价值衡量)。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价格上漲(或下跌)，不仅会有受到制止而且会有扭轉过来的趋势(例如通过利率的提高)。但如果价格变动本身造成一种預期，认为將出現同一个方向的連續不断的影響——这就是魏克賽尔所謂价格上漲“創造了自己的空气”^①的那种过程——那末，这种价格变动不仅會維

① 本句是一个隱喻(The fire creates its own draught)，意思是，火吸入空气，而空气又促进火的燃燒。——譯者

持很久而且会继续下去。

近年来经济学家日益重视照这种方式开始而变成累积性的价格水平变动的可能性，因为价格上涨本身就孕育着继续看涨的预期，而每一次的预期又会产生恰是所预期的上涨。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将呈现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情况。希克斯教授最近曾经指出，这种不稳定是由这样一种事实产生出来的，就是在动态的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再坚持原来的关键性假定：“个人的偏好曲线表，是不以市场所确定的价格为转移的”^①——这就是在本书以前各章曾经提出疑问的，作为所有各派主观价值学说基础的暗含的假定。只要我们承认刚刚过去的价格变动会影响人们心理上对未来所发生的事件的预期，因而影响分散在时间上的偏好，那末这种独立性的假定立刻就会宣告破产，而所有价格的累积的变动——不论是继续上涨或下跌——就都变成可能了。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恰恰和经济学上的传统看法完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的不稳定的程度显然比资本主义制度更甚——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制度的比较大的变动，人们简直无法根据因果关系的预测来判断。它并不像传统所描写的那种具有非常高度稳定性的经济制度，以致很难对商业循环的现象加以解释，除非是根据某些制度以外的破坏平衡的特殊影响来说明。

过去否认这种不稳定的存在的理由大概是根据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相对价格也发生变动，而这种相对价格的移动和引起价格变动的原来的预期正相反。所以离开平衡的移动，势

^① 希克斯：“价值与资本”，第249页。

将自行纠正，因为这种移动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会引起对原来行动的修正。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中，预期对情况发生影响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企业家的预期和行动。因此这种影响将通过投资的变动这一媒介而发生作用；而且既然最初的行动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它就代表企业家对某一类财货的需求的改变。新增加的需求表现为对劳动力、原料和生产器械的需求，而不是首先对消费财货的需求。其结果就是前一类财货的价格趋于上涨（如果存在着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所以最初的价格上涨表现为企业家列为成本的那一类价格的上涨；而且只要这类价格是和企业家的制成品的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两者之间的差额就会缩小，那就不仅不符合他的最近的“不正常的”利润预期，甚至也不符合他的“正常”的利润预期（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等到后来工资收入者和其他人开始花费他们所增加的购买力的时候，制成品的价格也会跟着上涨；这是事实。^①但即使这些价格照同样的绝对数量和成本一起上涨，两者之间的差距按比例也要小于成本和销售价格的较高水平^②；所以后一类财货价格的上涨对企业家来说并不能证明是充分的补偿，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总支出（用货币计算）已经增加了。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个论点，假定有这么一个社会，靴子是那里的唯一产品，同时（把想像力加以扩大）也是当地居民所购

① 应该注意到，我们这里的论点，是不问这种时间上的落后究竟是长是短，也不问根本有没有这种时间上的落后。如果有，那末，本文的论点就更加有力了。

② 如果价格和成本照绝对数量都增加20。假定价格原为100，现在加到120，成本原为50，加到70，那末照比例来说，它们所增加的并不相同，因为前者增加了20%，后者增加了40%。——译者

买的唯一制成品。讓我們再假定这个制靴工业的企业家們有利潤看高的預期，因而促使他們提取貨幣余額，購買更多的皮革和設備來擴大產量。結果是資源（建設材料、勞動力、皮革等等）的新需求與原有的需求發生競爭，因而提高了這些資源的價格。^①最後靴子的價格也會上漲到同樣的程度（當工資等等開始消耗的時候）。換句話說，靴子的銷售收益，將會和成本所增加的数量相等。但照比例來看，收益所增加的比例比較小。同時，資本的支出比以前擴大，擴大到成本上漲的程度；因此，可能實現的利潤和資本支出比起來，在比例上也較小，結果原先投資所根據的預期沒有獲得實現。^②當然，單是這些成本的上漲，就會大大阻

① 如果這些東西還有儲備，那末，價格可以漲得小一點，或者在這些資源的供給有無限彈性的時候，價格根本就不漲。就這個例子來說，靴子總產量的增加，將與貨幣支出的增加成比例，而售價不會提高。這裡利潤率固然不致由於預期所造成的擴大產量而下落；但如果資源的供給缺乏任何彈性，成本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根據制成品的售價而相對地提高（照下面所給的假定）。

② 這個問題可以用下面的形式來說明。工業的投資增加了 x 。為了簡化起見，讓我們撇開一部分投資可能採取經久工廠的形式而假定全部投資都用在皮革上面。那末，投資的增加等於靴子目前成本支出的增加。如果原來的皮革和勞動成本是 X ，銷售靴子的收入是 Y ，而結果所得的利潤是 $Y - X = y$ ，那末，利潤率就是 $\frac{y}{X}$ 。現在 X 和 Y 都增加了 x ，中間的差額仍舊 $= y$ 。但是現在利潤率將 $= \frac{y}{X+x}$ 。

結果好像是一個物物交換的社會里面的情況：一個農民由於預料收穫的增加，所以決定支出更多的谷子來交換勞動，或者和雇工訂立合同，允許他們在收穫以後，可以多得一些谷子。但實際的收穫並不比前一年好，結果由於他訂了一個樂觀的合同，他的情況反而比以前更差，同時雇工在這一年里，消耗了當年產量的更大一部分。

如果增加投資之中的一部分是用在新設的工廠上面（再回到靴子的例子），結果也不會有很大不同。那末，或者機器和設備的價格会上漲（和

碍建立新厂的意图，甚至阻止增购更多的劳动和原料。但正是这种阻碍制止了产量的增加，否则也许会使投资的意图实现它所预期的利润。

当然，预期所引起的向扩张或缩减方面运动的影响也可能由于情况中的某些因素的刚性而有所改变。这种刚性也许是属于货币工资的刚性，在劳动需求增加的情况之下，货币工资也许并未上涨；这种刚性也可能属于用货币来规定的长期契约，例如放款的契约，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最初价格变动的影响可能只是对食利者的一种“压挤”（或者相反地是一种补助金）。只要情况是这种样子，那末，乍看起来，仿佛在涨风中所实现的利润要比未上涨时的利润大些，而在跌风中则与此相反。（的确，传统的见解似乎也是根据这样一种结论，赞成在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时候，采用可塑性的而不是刚性的货币工资率。）但如果这些固定收入集团的支出比较起来小于原来的支出，那就不一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照这样看来，我们对于这一类型的问题，还不能作出一个充分的解答，除非我们了解一些关于消费者本身对于价格上涨的反应情况，而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加以注意。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关于相对价格变动的全部论证是根据这样一个假定：起着积极作用的是企业家的预期，而消费者的行动则始终不受或很少受价格预期的影响。而传统所描绘的一种稳

我们那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之中的皮革和劳动的涨价有相似的影响)，或者如果劳动被抽调到建设的行业方面，以致改变了工业的技术，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就是马克思的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或奥地利学派的“更迂迴的生产”），那末，利润率将因此而下降。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两种现象的混合，就是前一现象的发生促进并导致了后一种现象。

定的制度，显然就是根据一些像这样的假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价格一开始上涨，那些货币收入尚未增加的人（例如那些非工资收入者）就会为了延缓购买而削减眼前的购买。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消费者也同企业家一样，受了涨价的影响而认为这种变动率会有继续下去的趋势，或者至少这种新的较高水平会长期下去^①——那末，消费者就会扩大他们的货币支出，以便购进至少同过去一样多的商品。结果消费品至少将会照同样的比例和成本一起上涨，因此相对价格就不会变动，利润厚度也不会缩小，因而也不一定会使企业家的预期归于失望。消费者既然同企业家一样扩大了他们的货币支出，因而就会引起他们所预期的价格变动，而他们的货币收入，通常也会随着价格以及他们自己的支出一起提高。因此这个运动，将会证明它本身的正确性而不是自取失败。

但如果我们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就是这种制度的正常情况是属于一种失业和利用率不足的情况，那就有另一因素会在投资方面，因而在经济制度的活动和就业人数方面形成高度的不稳定性。这一种考虑所造成的差别就是，如果在这个制度之内存在着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储备，我们不仅需要分析用货币来

① 这就是希克斯教授所说的“预期的弹性”等于或大于一种情况（“价值与资本”，第205页）。这种情况（即非工资收入的消费者的需求相当缺乏弹性的情况），我在本书初版第112页的长注里面（又在213页附注里面），讨论凯恩斯、哈罗德（Harrod）以及楼南（Lerner）的意见的时候，认为是很不可能发生的。我现在相信，这种情况不是我以前所想像的那样不可能，事实上它可以在商业循环的重要阶段上与现实密切吻合。同时，我仍然认为不能非得把它看作一般地与现实符合不可，好像某些作家毫不怀疑地所假定的那样。

表示的企业家投資支出的波动（这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之下只能导致价格的波动），而且也需要分析实际的投資活动（即資本財貨的产量）。这种实际活动的波动会引起一种累积性的因素，它会加强上面的說法。这种累积性的影响表现在这样一种事实上，就是在原有基本设备上所賺到的利潤，将由需求——因而也由活动——的水平来决定，結果更要由投資率本身来决定。投資率的上漲会增加投資的引誘力，因而鼓励投資率的再度提高；而投資率的下降将会降低投資的引誘力，因而促使投資率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第一，銷售价格与边际成本具有某些确定的关系；第二，随着对原有设备的利用程度的加强，使用这种设备的劳动的生产率就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也就提高。这种价格的提高（由于边际成本的提高而引起的）^①将使实际工資下落，^②并造成“利潤的变动”。但这样一种累积的趋势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随着投資的进展，它就导致基本设备的現有实际数量的增加（而馬克思所說的“可变資本”并没有同样地增加），結果使一定利潤量所产生的利潤率下降。^③因此在某一点上，利潤率下降趋势的最后作用，可能会抵銷总利潤的上漲趋势，以致扩大投資的引誘力，最初是趋于延緩，然后又倒

① 應該注意到，这种边际成本的提高与前几頁所讲的，由于企业家的需求的增加，使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而引起的成本的提高是无关的（而且是附加的）。

②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工資收入者要求在他们的貨幣工資上有一种补偿的增加，利潤是否仍有增加的可能性，要看这种貨幣工資的提高是否会造成銷售价格的按比例的上漲，而这又要由我在上一节所讲的情况来决定。我曾在“經濟学杂志”（1939年12月号）上比較詳細地討論过这一点，說明如果在社会主义經濟之下，采用类似資本主义的价格制度，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

轉過來。(在經濟衰落之中，當投資累積地下降的時候，那就會發生相反的情況。)所以這個因素可能產生的現象，是相當大的一種漲落變動，這種向上和向下的運動，最初是加速“創造了本身的空氣”，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之中，又形成了一種相反的影響，終於勝過前一行動，而倒轉了這個運動的方向。

這個分析的結果似乎就是：預期——即便是企業家在商業方面的預期——都在造成價格和工業活動的波動原因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因而能對長期平衡的決定發生重要的、雖然具有嚴格範圍的影響。這對經典理論及其經濟規律的說明是一種重要的修正，這樣就使放任主義的“經濟協調的說法”沒有立足的余地了。特別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它着重在個人主義經濟所固有的那種脫離平衡的趨勢，這正是馬克思所強調的，而與李嘉圖學派所強調的傾向平衡的趨勢恰恰相反；而且更着重在這個事實，就是這種平衡的破壞對未來的發展是起着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作用。因此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制度，和經濟學家傳統所描寫的那種平衡得恰到好處的制度大不相同。事實上，我們和傳統上把經濟運動看作某種機械性的原動力（像資本和人口的增长）的簡單產物的那種觀念已經有很大的距離，而與根據衝突和相互作用來說明經濟運動的那種概念却很相近。

-
- ③ 哈耶克教授曾經強調過另一種影響，他認為這種影響不久將照同樣的方式把這種擴張倒轉過來，——可能會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時期以前；這就是說，實際工資的下跌和利潤的上升，會使人們不願投資在節省勞動的方法上面，而鼓勵人們轉到使用更多勞動的生產方式方面（用他的詞句，就是“縮短”生產的時期；用馬克思的話，就是“降低”資本有機構成）。所以最後，投資還是會減少，因為把資本積壓在費錢和非常經久的設備上面的吸引力已經變得更小（參閱“利潤、利息與投資”）。

照上面看来，古典学說的机械决定論的部分破产，是有一种积极价值的；它澄清我們对于现实的視野。但还有另外一方面。主观經济学既然是要从个人心理行为来解釋經济事物，因此它所看到的是沒有因果关系的一种混乱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几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現。它把預期捧上王位以后，于是自己也受了預期的統治；而且既然預期坐了王位，那末他的喜怒无常的心情就成了法律。它把我們引到一个累积的变动和不稳定的平衡的世界里去，在那里，大規模或长距离的預測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种經济的“夸大欺人的宣傳”运动，不仅可以引起一定的和有限度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引起无限制的影响。

只要我們似乎已經陷入的虛无主义观点——如果成为事实的話——会使經济制度比实际情况更不稳定，我們显然就不能以这样一种情况为滿足。今天的經济学家有时在思想上似乎易于将一种不确定性强加在现实上面，正如同以往的經济学家将自己的机械的平衡概念强加在现实上面一样。我們显然不能用盲目摸索的主观主义来代替古典政治經济学有理由自豪的結構，（照希克斯教授那种慎重的說法）虽然用它来“分析扰乱原因的冲击影响，也許很好，但在分析更远大的影响的时候就不那么可靠，而且在应用到长时期的时候，还可能有使整个方法归于失敗的危險”^①。資本主义制度很显然是处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之中，它那不稳定的确切范圍和性质自然是一个实际的問題，需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研究以及随着情况的改变与不同对各种情况的比較研究来决定。如果根据这个制度已知的一般特征来論

① “經济学杂志”1936年6月号，第241頁。

证的话，那我们决不可能作出超过临时性的答案：尽管如此，这种答案对于实践也许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在缺乏更完全的归纳研究的时候，我们也许只好以这样的推论为已足。我们如果要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信心地作出概括，并从主观经济学要把我们带到那种游移不定的混乱情况中看到一些规律的结构，那我们显然必须跳出交换关系的那个狭窄圈子——跳出今天被狭隘地解释为“经济的”因素的圈子，而目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一般都局限在这个圈子以内。我们与其继续纠缠在预期体系对一大堆价格发生影响的代数学上，似乎不如注意研究个人所处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研究社会制度与阶级的状况，以及社会集团与生产过程的具体关系——研究这些关系所引起的动机和行动，也许会有更大的好处。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似乎显然要发生，而且这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使预期具有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影响的，从而促使这个制度趋向于剧烈变动的，就是个人生产方式的（与社会生产方式的有所不同）社会所特有的那种类型的不确定性。正是在那种为市场而生产的个人生产制度之下的无数个分散的经济决定，才使预期具有了这种支配权力。与上述有连带关系的、对经济学方法论似乎极关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区别：有可能假定具有完全预见的世界底那一类型的规律与在各种形态的不确定性之下发生作用的另一不同类型的规律、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的区别。当然，经济制度的不同，只是在于那些作出支配性决定的人所能具有的预见性的程度；虽然就预见性来讲（就像后面一章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使人有充分理由把它当作本质上的区别来对待。

这里对波动起因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个别企业家——指对控制生产和投资作出决定的人——对于能影响到他自己的最近将来事物的发展的盲目无知。至于经济学家或科学家仿佛站在制度之外，从整个制度来观察并能对未来作出预测，情况是否如此，那又是另一回事。即使这样一个科学观察家，能够根据有关数据预知其结果，那也不能得出推论，认为企业家也能这样做；因为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使他必然不能了解他的竞争者的当时的行动。这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制度之下企业家的本质。既然他是在“摸瞎”之中，他和别人的预期就会发生足以造成涨落的影响——表现决定的形式越持久，波动也就越大，而波动的影响也就越长。因此，这些变动的发生就是个人主义经济的本质的一部分，而不是偶然的产物。我们所遇到的就是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说法。假使企业家能够预见他的竞争者的行动，那末他就不会按照竞争学说对他所假定的那种方式行动，而传统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也就不能成立了。可是正因为存在着这种本质上的盲目性，才使预期有发生影响的机会，才有被这种影响所引起的脱离平衡的现象以及所形成的不确定的因素。传统的市场规律只有凭借每一个人对全体行动的不确定性才能成立；只有借着表面上的自由，才有经济的必然性和自动性；也只有根据每一企业家本质上的盲目性，经济学家才能够对整个情况作出预测。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的“自然规律”是“以有关当事人缺乏自觉意识为根据的”。这种基于“缺乏自觉意识”的“自然规律”的统治，就古典经济学所敢于正视的程度来看，就是后来被捧作像一种具有内在和谐的音乐的那种规律底统治。政治经济学过去所没有看到的東西是：无数分散的个人由于对其他人

的意图缺乏了解而产生了预期的影响，同时通过这种影响造成经济变动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波动不仅对于未来经济制度的形成产生一种有力的推动力量，而且也产生一种重要的改变力量。

第七章

帝国主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国外贸易理论，最初是作为对重商主义的一种批判而激发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从而取得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攻击重商主义这个体系并驳斥它的辩护士的谬论据，这种情绪在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以及李嘉图的著作中都占着主要的地位。重商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颇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于后者竟然很少谈到，甚至把它看作是自己份外的题目，这就更使人感到惊异了。十八世纪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殖民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至少在肤浅的表面上，是常被人提到的（我相信80年代的罗吉士[Rogers]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这种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二者都与殖民制度有关，而且也在于它们所采取的某种类似的壟断作法以及它们在思想上也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形成类似的对照。

早期经济学家对于重商主义并没有什么错误的认识；而且他们的分析很清楚地揭露了它的贸易规章底复杂上层结构所依据的基本关系以及在为它所作的解释和辩护之中所产生的思想意识。他们认识到，它所追求的利益是一种壟断的利益，并且是属于一个范围很小的阶级利益。詹姆斯·穆勒曾经把殖民地描写成“对上层阶级的一个院外救济^①底庞大体系”。他写道：“强

① 贫民救济院对院外贫民的救济，这里是借喻。——译者

迫殖民地 toward 宗主國出售價格比售與其他國家為低的貨物，只是向它勒索貢物而已；固然不是直接的勒索，但并不因為它被掩飾起來而與實際的勒索有所不同。”^① 薩伊把這種制度描寫為“建築在強制、限制和壟斷上的一種制度”。他說：“宗主國可以強迫殖民地向它購買可能購買的每種東西；這種壟斷或獨占特權使宗主國的生產者可以強迫殖民地付出超出商品所值的代價。”^② 亞當·斯密對於這個問題曾經作出歷史上有名的論述，他用這樣的辭句，來抨擊這個制度：“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像重商制度的其他卑鄙和罪惡的手段一樣，抑制了所有其他國家的工業，特別是殖民地的工業，而絲毫沒有增加……殖民地貿易的壟斷正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工業利益而建立起來的。……的確，壟斷組織還提高了商業的利潤率，使商人的利益有所增加。……為了增加某一國家中一小撮人的些微利益，却損害了這個國家中所有其他階級的人以及所有其他國家中所有人的利益。……壟斷必然使收入的一個巨大來源——勞動者的工資——永遠不會像沒有實行壟斷時多。”^③

① “政治經濟學原理”，第3版，第213頁。

② “政治經濟學”，1821年版，第1卷，第322頁；以及“政治經濟學問答”，第129、130頁。也參閱陶倫斯（Torrens）：“財富的生產”，1821年版，第228頁以後。陶倫斯毫不猶豫地用鼓舞人心的強烈詞句，提到“船主和商人的有勢力的黨派是要對殖民地的各項規章負責的，因為他們的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是對立的”（第248頁）。

③ “國富論”，1826年版，第571、572頁。並參考西斯蒙第關於殖民制度的說明。在這種制度之下，“宗主國把壟斷的所有利潤都保留給自己，可是只是在一個非常有限的市場之內如此”——有限到這種程度，以致意味着，最後反而是自由貿易更有利於宗主國和殖民地（“新原理”，1819年版，第1篇，第393頁）。

斯密和李嘉图都談到国外貿易对于利潤率的影响。他們认为它有提高本国利潤率的影响，但两人所提出的理由正相反。亚当·斯密认为，殖民地貿易之所以能提高利潤，是由于把資本轉移到殖民貿易中具有局部壟断性质的那些商业部門，因而那里所获得的利潤就会提高。但是这些資本的轉移，也会使所有其他貿易部門的利潤率提高（由于在这些貿易部門中的資本竞争减少了），結果就会造成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他用这个論点來說明重商主义制度无论对本国和对殖民地都同样有害。^①李嘉图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很可能“对殖民地的貿易規定会是这样，就是比完全自由的貿易对于殖民地更为不利而同时对母国則更为有利。”无论如何，“从对某一国的貿易改为对另一国的貿易，或从国内貿易改为对外貿易，照我的看法，都不会影响利潤率。……总資本和工业的分配会更不适当，因而生产将会减少。……（但）即使它会产生提高利潤的作用，至少不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因为价格既不是根据工資也不是根据利潤来决定的”^②。凭借国外貿易来提高利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丰富而低廉的进口食物对于劳动价格的影响；而这种情形靠实行自由貿易和尽量扩大市場范围来促成的可能性最大。

馬克思把国外貿易包括在阻止利潤率下降趋势的各种因素之内，并指出斯密和李嘉图在这方面的爭論之点。在这个問題上，他似乎是站在斯密的一边，而反对李嘉图（这在他是不平常的）。国外貿易之所以能提高利潤率，不仅是由于它能使生活資料低廉，而且也由于它能使“不变資本各要素的价格下降”。除此

^① “国富論”，第 556—559 頁。

^② “原理”，第 3 版，第 410、413 頁。

之外，投資在國外貿易上的資本，尤其是投資在受管制的殖民地貿易上的資本，還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率；而且“我們看不出來，投在一定部門的資本所提供的並且送回到本國來的較高利潤率，在無獨占從中妨礙時，為什麼不會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均衡，不會相應地，把一般利潤率提高”。“處在有利位置的国家，在交換中將得回較多的勞動，換去較少的勞動，雖然這種差額，這種餘額，是由一定的階級所吮吸。……如利潤率較高是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利潤率一般更高，在它的有利的自然條件下，那就會和較低的商品價格並存着。均衡過程是會發生的，但不是和李嘉圖所想那樣，均衡化為舊水準。”這一種額外利潤，就是他所謂超額利潤，由於資本間的競爭，結果勢必變成本國國內的一般利潤率。他說，這種情況有些類似“一個製造業業主在新發明普遍採用以前，利用這種發明而獲得”^①的一種利益。

我們不很清楚究竟馬克思的意思是否認為這一點適用於如下兩種情況：一種是指兩個國家經濟單位之間的簡單貿易，不管是管制貿易還是不管制貿易；另一種是指它們之間的關係，包括這一方對另一方的資本投資。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情況。似乎關於前一種情況，李嘉圖大部分是正確的：就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國家，從貿易上所獲得的利益不一定会表現為利潤率（也就是價值比例）的提高，因為結果吸收到這個國家的貨幣制度中的黃金可能會發生使所有價格都同樣提高的影響，因此相對價格仍然沒有變動。從貿易中所獲得的利益，只有表現為生活資料或原料和生產工具的跌價，才會使利潤率提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0—282頁。

高。^① 但沒有疑問，馬克思心目中指的是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包括前者對後者的投資；這裡，亞當·斯密的見解看來是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本國的利潤率無疑是會提高的，因為事實上投資的範圍已經擴大。

當然這兩種情況之間，並不能劃出嚴格的界限；倒不如把它們看作國與國之間兩種類型的關係，兩者的影響是在彼此的邊緣上交錯着。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不會不對比較發達國家的食物和原料的跌價發生影響，特別是在工業地區和農業地區之間那種貿易的情況之下；而且在這種程度上，前一國家的投資範圍可以說已經有了擴大。另一方面，如果實際上資本是投資到前一國家以外，那麼這個國家的利潤率很可能會提高，而與利潤率對於相對價格的偶然影響完全無關。所以要嚴格地確定殖民主義所特有的經濟關係是不容易的。在這些問題上，人們得不出可以用嚴格的邏輯界限來區分現象的定義。照馬克思的意義來解釋，兩個生產率不同的國家之間的自由和未加以管制的貿易，似乎也同加以管制的貿易或國外投資一樣可以產生超額利潤；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超額利潤是大部分國際貿易的產物。如果我們要給這種經濟關係以明確的定義，那必須要用比這個更為狹窄的意義來解釋；而關於殖民地和殖民主義的最恰當和最滿意的經濟定義，似乎應當是指兩個國家或區域之間的關係，包括為其中一方的利益而創造超額利潤所採取的辦法，這種辦法或是在它們之間採取某種用壟斷方式來規定的貿易形式，或是

① 這種商業也可能對利潤發生一種影響——這一點在“資本論”裡面並沒有提到——如果它會促使那個國家在具有和以前不同的技術條件，也就是大體上和以前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的生產部門方面實行專業化。

由其中一方以高过它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利潤率对另一方进行投資。这两种类型关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代表一个区域为另一区域所剝削的一种形式（通过貿易或投資），这和两个区域在自由的和未加以管制的貿易基础上所發生的貿易关系是有重大的区别的。^①

重商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間所規定的貿易关系，采取了有利于后者而不利于前者的貿易条件这样一种方式。^②在这个制度之下，对殖民地的投資虽然已經发生，可是似乎只起次要的作用。現代帝国主义重复了这种通过貿易来进行剝削的特点；虽然在帝国主义的初期阶段，这个特点还远沒有像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殖民制度中那样显著，但是到了后期，当表现为帝国单位的“自給自足”的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形式时，它的重要性就大大地增加了。但重商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間，当然存在着資本主义发展的原始阶段与大規模工业技术、工业和金融的

① 不包含任何壟断成份的国外貿易的概念，当然是同国内貿易的“自由竞争”概念一样抽象的，而且也是同样少見的。我們在这里采用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分析的目的。

② 中世紀末叶和“原始积累”时期，在商业資本、小农和手工业者之間所存在的关系是属于最早的与此相类似的关系。商业公会的各种壟断規定，常常得到鎮公所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的支持，它們对周圍郊区的关系，等于一种“殖民主义”，而由此所引起的这种剝削关系构成了原始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錢庄放款制度之下，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最后才达到工业資本剝削无产阶级的成熟的和“純粹的”形式而創造了工业剩余价值（參閱本书作者的“資本主义企业”，第14—16、18—19章）。我們如果注意到下面一件事是很有趣味的，就是在1925年，这一类型的关系曾經构成苏联关于工业和小农經濟关系問題的討論的以及普里奧勃萊任斯基（Preobrajensky）的所謂“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学說的基础。（參閱本书作者的“俄国經濟发展史”，第160頁及下文）

結合以及壟斷組織和政策的最高階段之間的全部區別。所以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輸出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資本財貨的輸出和生產這些財貨的工業的過份擴張，開始起着主導的作用。^①的確，在區別新舊殖民制度的對比中，殖民地投資似乎是主要的一點。這種投資系採取多種多樣的形態，如果把這種投資說成完全是或主要是直接剝削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工業資本的投資，那對實際過程的一種過份簡單化的和錯誤的說法。對殖民地的投資，常常採取大規模貨幣借貸形式或原始生產方式的剝削形式，很像西歐錢莊放款制度時代商業資本所採取的形式。^②而且殖民地投資的主要特點，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享有特權的投資，即投資於附帶有某些特惠和優待條件或實際壟斷性質的事業，採取特許權或規定某種特權的形式。和斯圖亞特時期英國所實行的那種壟斷權和限制措施並沒有什麼不同，它們似乎始終是吸引殖民地投資的一個主要部分，並且是帝國主義作為向廣大地區榨取利潤的制度的基本組成部分。

既然對殖民地地區的投資，代表資本轉移到比較容易獲得半

- ① 1913年英國資本總輸出額，據估計為40億英鎊，其中半數投資在不列顛帝國， $\frac{1}{5}$ 投資在美國， $\frac{1}{5}$ 投資在中美和南美，只有 $\frac{1}{20}$ 投資在歐洲。下面所列的德、英、美三國的合併起來的輸出百分比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資本財貨	消費財貨
1800年	26%	74%
1900年	39%	61%
1913年	46%	54%

(見國際商會出版的“國際經濟建設”，第30—32頁)。

- ② 這方面的例子似乎可以根據非洲尼日爾公司或蘇丹拓殖辛迪加或法屬赤道非洲的許多事實來說明。在這些地區，外國資本通過貿易和放款來剝削原始經濟，而絲毫沒有幫助它工業化的傾向。

壟斷性質的特權的地區，轉移到勞動比較充足而又低廉、“資本有機構成”也較低的地區，因此，這個過程便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影響，來阻止本國利潤率的下降趨勢。^①而且它之所以發生這種影響是有雙重理由的：這不僅意味着向殖民地地區輸出資本，可以比投資在國內獲得更高的利潤率，而且還可以造成一種趨勢，使國內（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利潤率也可以高出它在其他情況之下的利潤率。發生後一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在宗主國國內尋求投資機會的過剩資本已經由於殖民地的有利出路而減少，勞動市場的壓力已經減輕，而資本家也就能夠以較低的价格，來購買本國的勞動力。換句話說，資本的輸出可以看成是靠國外的新辟剝削園地在國內重新創造產業後備軍的手段。資本家因此得到了雙重好處：他既能在國外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又能在國內維持較高的“剩餘價值率”。這種雙重利益，就是勞資雙方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形成根本對立的理由，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具有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動機而社會主義經濟則不會具有這種動機的理由。^②如果我們假定這個過程發展到了極端，我們就可

① 例如，約翰·穆勒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在著作中提出關於資本輸出的這種值得注意的說明：“我相信，這是很多年來阻止英國利潤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原理”，亞齊黎編，第738頁）。

② 關於時常引起人們注意的那種因開發殖民地而造成的廉價進口食物底“補償”，有一位知識淵博的作者最近曾經作了這樣的結論：“工人和資本家之間所潛伏的利害分歧愈來愈顯露出來了。雖然資本家並不是單獨獲得資本輸出的利益，可是工人階級的分潤，多半是出於偶然而不是有意的。這種最有利的冒險，如果能碰巧促成食物和原料價格的不斷下降，那只是很少有的一種利益的一致。”他指出伊斯蘭宮殿的建築，鑽石的開采，戰略鐵道的建造以及軍艦的購買都不意味著這種“補償”。而且，“被開發的新國家越多，地域性的衝突也就越明顯。原來以為國外投資可以降低英國進口

以看出它的重要意义：假定在殖民地地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供人利用（而且也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供人利用），再假定所有資本输出的障碍都已经消除。那末，这一过程的邏輯結果（如果我們願意順着一種純粹抽象的假設路綫推演下去的話），將是使老牌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工資率（至少是“效率工資”）降低到殖民地地区所通行的水平；并且只要还有殖民地地区可以繼續榨取，就会使全世界人民大众的生活維持在这样一种水平上。根据一些具体的理由，这个过程不会达到，甚至不会接近这个抽象的极限（这在表面上似乎牽涉到殖民地的“非殖民地化”和宗主国的部分的非工业化）。但是即使这种趋势受到其他因素的阻碍，也仍然会有一部分繼續存在着。^③

現在时常有一种傾向，把注意力放在重商主义与現代殖民

貨成本的那种可能性正在縮小，而对于和我們自己工业相竞争的那种工业即将成长的恐惧，却比以前更加緊張。……由此可見，国外投資可能会降低生活标准，而不是提高。”（凱恩克勞斯 [Cairncross] 在“經濟研究評論”杂志第 3 卷第 1 期上发表的論文。）

- ③ 这当然不是問題的全部。宗主帝国的工人阶级，可能有若干部分或甚至全部暂时获得偶然的利益。例如，由于未开发地区的开发，它可以从食物进口价格降低而获得好处，或者某一部分工人由于他們这一部分工业的产品有了扩大的市場而获得利益。此外具有坚强組織的工人，也可能从帝国主义的某些壟断措施上分享到一些果实；这将在下面談到。但同奴隶可以从他的主人的富裕程度上得到好处总是有一种严格的相对意义；这并不意味着他作为奴隶或作为自由民的地位的比較，而是意味着他对于較不富裕或較为富裕的主人的两种奴隶地位的比較（显然，这种意义的好处必須永远从屬於他因淪于奴隶地位而遭受的更根本的損失）。所以，如果資本主义在殖民主义上找到了部分的逃避之所，那就是它可以避免对宗主国工人阶级采用它在其他情况之下所不得不采用的那种压迫方式。如果与后一种必須采用的方式比較起来，宗主国无产阶级可以說从帝国主义得到了好处。这与法西斯主义的某一方面特別有关系，关于这点，我們将在下面提到。

主义——指在殖民地进行投资——的对比上，甚至否认重商主义所特有的特殊剥削类型在今天也还存在。因此，就把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影响上面，来和重商主义对它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所起的限制影响对比，从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在殖民地区会再产生一种充分发展的、正常类型的工业资本主义，最后能促使落后国家逐步否定殖民地化。这种看法的产生是由于忽略了我們前面已經讲过的帝国主义与旧殖民制度之間所存在的那些类似的特点，忽略了与壟断組織和壟断政策时代有密切联系的殖民发展的特点。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区发生一种革命影响，它比較重商主义（它主要集中在商业关系和对农业种植园的鼓励方面）所发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事实。^①既然資本是作为工业資本而投到那里，那末必然会形成一个无产階級，如果当地原先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条件的話；这就意味着旧的各种經濟形式，不管是部落的或是半封建的，会由于“原始积累”的过程而解体。作为扩大投资范围的一个条件，帝国主义需要在运输方法上进行部分的革命，需要开发自然富源，而且有时候——虽然不是經常不变地——需要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經濟上达到某种程度的統一。可是这方面是受重大限制的；在殖民地区，这一制度所发生的积极作用，即使在它的初期，似乎也比在原来的工业国家自发的資本主义所发生的作用更受当时可能性的限制。所以常常为了政治的理由，它宁願支持而不願推翻那

① 應該注意，这里所說的殖民地是指帝国主义时代眞正的殖民地。在不列顛帝国构成所謂自治領的各部分，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眞正的殖民地。它們是重商主义时期原来的殖民地，以后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南非由于存在着大量被剝削的土人，所以是另一种特殊情况）。

些反动的社会和政治形式(例如,扶持印度的土邦;使中国长期陷于政治分裂),特别是当它需要从殖民地内外去寻求联盟,来对付敌人的时候。正如同在资本主义初期历史的某些阶段,商业资本曾经与封建或半封建的利益或与法院取得妥协,结成联盟,来反对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一样(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利益也可能在于联合殖民地国家的旧统治阶级残余,来反对当地资产阶级基于加强工业化的利益而作出的各项计划。我们曾经说过,对殖民地的资本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享有特权的投资,附着着半垄断性的权利或限制。而在许多情况之下,它系采取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的剥削形式并使之永世长存;这种趋势正是因为殖民地的贫困和劳动供给的低廉才促成的。再者,如果鼓励殖民地某种类型的生产投资,以致与本国这个工业过去所独享的利益发生了竞争,那又会违反帝国主义国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因此,一种垄断因素就会很快地插进来,阻止殖民地方面可能与帝国主义其他方面的利益相竞争的那些类型的发展,并且这种垄断因素常常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限制在与宗主国的某种类型的生产相辅助而不是相竞争的那种类型的生产上面。^①既然“幼稚的”工业通常需要某一种特别的鼓励,使其发育成长,因此对殖民地工业来说,单是缺少这样一种特别鼓励就已经足以使它的工业化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了。

帝国主义所以有可能很快地步重商主义的后尘而采取类似

① 用抽象的话来表示:为了对宗主国资本家整个阶级有利,就要在投资方面作一个分别对待的垄断者,同时限制对殖民地的投资,以便维持一个较高的利润率而不致与国内投资的产品发生竞争。

的壟斷措施，是由于这个制度的一种特殊和显著的特点而促成的。虽然单是資本輸出，并不需要依靠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間貿易的詳細規定，像重商主义那样的作法，甚至还能够与所謂“門戶開放”的政策并行发展，但它需要对殖民地經濟的内部关系和結構采取大規模的政治控制，而以前各世紀的重商主义則不需要如此。它所以有这种要求，不仅是为了“保护財產”和保证投資利潤不致因政治上的風險而落空，而且也是为了替資本的有利投資实际創造基本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足够提供充足而低廉的劳动供給的无产階級的存在，就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地方，就需要对原来存在的社会形态加以适当的改变（在东非和南非减少部落的保留地和对生活在部落保留地上的土著采用差別稅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①从宗主国对殖民地内部政治所实行的这种更严密的控制之中，似乎可以找到帝国主义的政治邏輯的基础；根据它的历史所揭露的，这种邏輯就是逐步从“經濟侵略”到“势力范围”，从“势力范围”到保护国或間接控制，然后从保护国通过軍事占領达到归并。一旦政治控制成了投資的僕从，壟斷和特惠待遇的机会于是形成；而且如果采用了这种政治控制，可以推想得到，那是用来促进它所代表的特殊利益的。殖民地的投資与經濟发展过程是不会在放任主义的理想的詩情画意的环境中进行的。

帝国主义所表現的这些限制和壟斷，在它的发展后期似乎变得特別显著，而且开始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中的一种重

^① “在每一个热带非洲的領地，白种的居留民和資本家都对本地居民强行剝夺、剝削和进行事实上的奴役；而且除了英屬西非以外，这种剝削和奴役已經达到正要完成的阶段”（伍尔甫 [Woolf]：“經濟的帝国主义”，第 68 頁）。

要因素。最初，当投資区域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而特許权的追逐也还很容易的时候，注意力主要是指向那些近在眼前的机会或者新地区的开辟。这是开創时期，还有多余的地盘可以容納全体殖民者。十九世紀 80 年代，由于当时还有整个大陆摆在面前，非洲的爭夺并不意味着尖銳的斗争。在爭夺尚未完成以前，法紹达事件^①很快就接踵而来，这是未来風暴的預兆。但当时还有多余的地盘，容許在竞争者之間应用“补偿”的原則，例如，英、法在北非斗争的緩和就是根据这个原則。当时也还有未开发的处女地可以填补那批想“瓜分地球”作为独占的“領土”的匪帮的貪婪欲壑。1911年摩洛哥事件^②是一个更严重的預兆。等到英屬东非和德屬东非腹地都已經被开发淨尽，中非潜伏的斗争压力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即使这样，通往 1914 年 8 月的最危险的彈药列車的埋伏地点可能还是在近东，沿着到巴格达、德黑兰及印度这条路綫，而不是在非洲。

可是即使在这个初期阶段，在爭夺投資机会和特許权的时候，也絲毫不存在像古典学說所說的那种自由竞争。各种类型的特惠待遇是角逐的主要目标；而在建立或維持这些特惠待遇之中，政治影响又起着显著的作用。这方面发展的历史充滿着实例，表明在决定某种特殊权利分派給哪一个竞争的国家集团的

① 法紹达(Fashoda)位于白尼罗河西岸，当时是北非英埃苏丹的一个市鎮，設有火車站，在商业上居于樞紐的地位。历史上曾經是英法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地方，冲突的結果，英国胜利，于 1898 年 8 月簽訂协定，由法国將該地让与英国。——譯者

② 摩洛哥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本为北非君主专制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德法竞争之地。1911 年法帝国主义趁摩洛哥內乱出兵，并强迫摩洛哥国王訂約，同意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历史上称为摩洛哥事件。——譯者

时候，政治影响乃是决定因素，像中国、南美、近东、埃及、特立波里和摩洛哥的历史就是这样。^① 这些集团——例如南非公司、英德东非公司、尼日尔公司、苏丹垦殖辛迪加、战前的巴格达铁路公司等（举几个比较显著的例子）——一旦获得特殊权利，就形成了对广大区域的实际壟断。在贷款、建设包工合同和开采特許权方面如此，在商品貿易方面（范围比较小）也是如此，而且随着殖民地开发的进行，这种壟断将会愈益成为殖民地貿易的特点。正如庇古教授所說的：“有种种非常有利的投资机会：可以贷款給軟弱的政府，对它們的官吏行賄或誘騙，可以照有利的条件为这些政府建筑铁路，在开发石油区的自然资源方面进行投資，或在攫自非洲人的土地上用极低工資强制或‘刺激’非洲人劳动来建立橡胶园。当这些文明国家的政府已經对未开发的某一地区实行归并或是进行保护或是建立势力范围的时候，这些代价很高的特許权，即使在未取得正式保留权时，也往往流到本国国籍的金融家的手里。这些金融家大抵是既有錢又有勢的。他們拥有通过报纸傳布他們的声音来影响輿論而对政府施用压力的手段。”^②

根据古典学派国外貿易理論的假定，各国有专门生产对它們比較有利的那些商品的趋势，而貿易的利益将根据有关国家的需求彈性而进行分配（表现在每一国家为获得它所需要輸入的商品而輸出的商品項目中）。如果說今天的实际情况恰恰与

① 参閱下列各书：伍尔甫的“帝国与非洲商业”；欧尔(Earle)的“土耳其、列强与巴格达铁路”；勃萊斯福特(Brailsford)的“鋼铁与黄金的战争”；尼林(Nearing)和弗里曼(Freeman)的“金元外交”；阿佛拉区(Overlach)的“外国对中国的金融控制”。

② “战争的政治经济学”，第21、22頁。

此相反，也不見得不正确，那就是說，每一国家都企图为自己有条件进行生产的那些东西創造或“規定”需求；而經濟霸权也就是指有办法能作到这件事情。向“落后区域”傳播某一国家的文化、习惯和風俗，如果不是为了使前者养成爱好后者所适于生产的因而历史上一向就已經欣賞和需求的東西的話，那末，这方面的經濟意义又指的是什么呢？当然，这个过程是受重要条件的限制的。一个不出煤的国家总无法使它的殖民地养成完全不用煤的嗜好，或者一个不产紡織品的国家也无法强制它的殖民地人民赤身裸体而购买珠寶飾物。但在不列顛帝国影响和管轄下的殖民地似乎有很多理由喜欢雇用英国的工程师和英国的人員，来管理它的工业，而雇用英国職員的企业对使用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式样的东西以及与英国公司訂立建設合同方面，也似乎有一种偏向。在英国殖民地所流行的服装（除非有相反的充足理由），大概偏向于英国的布料和英国的式样这一方面，而在德、法、日的殖民地，則偏向于另一方面。这种影响的后果，当然是，那些金融家，特許权的角逐者、建設承包商、貿易公司等等，比之在沒有特惠条件下和比較完全的竞争市場进行交易的場合下，能够享受到更高的銷售价格和更低的购买价格。換句話說，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条款”将是对前者有利的。常言道：“国旗到那里，貿易就到那里。”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真理：即殖民地主要是控制它們的那个国家集团的利益的“私有市場”，即使是在实行“門戶开放”政策的地方；这是殖民地在国际經濟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資本主义所享受的这些特权的数目和范围，对决定它所能获得的利潤率和它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点來說，消費不足的理論家所謂的“寻

求市場”会有它的独特的意义，即寻求通过貿易的剝削以获得壟断利潤的扩大机会，这和“正常剩余价值”的榨取是有所不同的。

但今天，甚至名义上主張“門戶开放”政策的，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勢力范围的協議与国际卡特尔之間划分市場为定“保留地”的領土协定并行不悖。政治号召被直接利用来影响需求，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康拜因还利用政治偏見，来排斥竞争对方的产品（例如，几年前臭名远揚的抵制苏联石油的运动）。政治和經濟关系是如此糾纏不清，以致单是聞到石油特許权的气味，据说至少就会引起一次各国国际會議的混乱。現行的“自給自足”和經濟民族主义的政策，加上高筑国家单位或帝国单位的关税壁垒以及过多的限額配給办法，这些都不过是要达到更完全形式的有限制的市場和壟断的保留地的目的而已；而目前流行的平衡貿易协定和重彈出口剩余产品的濫調，就是对現代帝国主义中一向隱藏着的那种新重商主义的直认不諱。在这个过程里面，經濟学家所最注意的貨幣的扰乱，似乎表现为結果而不是原因；外汇贬值只是作为出口竞争的一种手段，而各种通貨制度的对立，如黄金集团、英鎊集团和美元集团等等，只是在建立被保护和被隔离的經濟区域之中作为爭取地位的一种策略而已。当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宣傳必須要有殖民地出路的时候，他所真正要求的并不是富足而是限制，并不是为人民謀富裕的途徑，而是为大企业謀壟断的特权而已。

有一个还待解决的重要問題就是，何以这种新殖民主义会出现在它所出現的一个历史的特殊阶段。列宁曾經指出，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在壟断阶段的特征，这个阶段特别是表现在金融和工业的結合，使工业上的决定服从大規模的金融計劃，也就是

希法亭(Hilferding)所謂“金融資本”的那個階段。^①所以帝國主義不僅意味着，對新地區的資本輸出在返老還童以後，又可以按過去投資的經過重演歷史^②，而且也意味着，資本主義是在特殊的情況之下向新地區擴張，結果在這種情況之下便出現了十分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照最近事件所表現的來看（例如在西班牙），這種擴張的野心，不僅是針對着亞洲或非洲的“落後”國家，而且也是針對着經濟控制能產生壟斷利益的鄰近地區。^③因此，認為帝國主義和宗主國的資本主義轉入壟斷階段的情況有密切的聯繫，不僅有抽象的理論假定，同時也有事實可以作為強有力的證明。

在西歐各國同時出現了現代的帝國主義，這是大家都經常提到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使人驚異的是，上一世紀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初期，那些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德國和法國——又不約而同地對殖民地表現出興趣；它們爭先恐後地參加了聲名狼藉的瓜分非洲的運動；在不到十年的時間，整個非洲大陸就被幾個列強瓜分淨盡。^④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和

① 參閱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81頁；希法亭：“金融資本”。

② 資本獲得利潤以後，又投入新的地區，因而成為新的資本，也就是返老還童。資本再度投入生產，獲得利潤，這就是重演它的歷史。——譯者

③ 從已開發的區域取得壟斷控制的果實的確是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未來的資本輸出，很可能會比第一次大戰前發生更小的作用。參閱阿林(Ohlin)教授的評論：“現在的情況和19世紀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所以國際資本的移動會比以前發生更小的作用”（“國際經濟建設”，第75頁）。

④ “在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之間，有五百萬平方哩的非洲領土，包括六千萬以上的人口，已經被歐洲國家占有和統治。同一時期，英國在亞洲吞併了緬甸，並置馬來半島和巴基斯坦於其統治之下，而法國則開始採取步驟，占有越南和東京（印度支那。——譯者），目的在使中國屈服或分裂。在這個時期中，三大強國又在太平洋各島進行了爭奪”（伍爾甫：“經濟的帝國主義”，第33、34頁）。

远东又开始发生了兴趣，而在这个地区和近东的“势力范围”的争夺，很快地就步起非洲的后尘。这种采用新策略的转变不仅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又是突然发生的。这种转变似乎不是预先准备的，而是由原来代表科布登 (Cobden)^① 的国际自由贸易理想的政策逐步后退。三十年以来，英国政策的趋势一直是采取放松不列颠和她在重商主义时期的旧殖民地的联系的方针的。而且对非洲的争夺，是紧接着格拉斯吞 (Gladstone) 在自由贸易方面获得最辉煌的成就以后，也紧跟着一般认为可以标志自由贸易世界的开始的大博览会和一系列的商务条约以后才发生的。似乎仅仅狄士瑞利 (Disraeli) 的辩才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潮流的突然转变。不到几年的时间，就又恢复了以“公平贸易不是自由贸易”为口号的保护贸易的言论。张伯伦 (J. Chamberlain) 不久就领导了和自由党分裂的运动，而法国和德国也同英国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重新发现了殖民地对祖国的价值。意大利的工业革命，在前一世纪发展得比较晚，所以对于北非的兴趣表现得也比较迟缓和。美国由于她本身发展的特殊原因，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走上殖民的道路。^② 最后出现在舞台上面的就是日本，它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以飞快的速度过渡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现在她正在仿效和改进二十五到五十年以前欧美列强所曾采用的政策。

① 科布登 (Cobden, 1804—1865) 是英国政治家，主张国际间实行自由贸易。——译者

② 在上一世纪，虽然美国在大西洋沿岸工业化得比较早，可是在西部和南部，充分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却来得相当晚。我想事实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美国资本主义是致力于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内地的农业区域对东部的大资本起着殖民区域的作用。无论如何，要到上一世纪的末期，美国在国际收支的平衡上才不是制造品的进口者。

历史的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是和一国资本主义成熟到某一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繁荣增长，只能在达到这一阶段以后，而不会在达到这个阶段以前。

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特征似乎可以最恰当地和这种新扩张主义的趋势联系起来：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为“产业后备军”的“外延”招募已经在旧的国境内达到竭尽或接近竭尽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受了前者的推动，技术水平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已经达到基本设备的贸易需要大量发展的程度。这两种互相配合的发展，很可能会连带着使资本利润有相当猛烈的下降趋势，而生产资料的技术发展又会提供资本积聚的基础，同时巨大的垄断集团也会由于资本积聚而产生了出来。用列宁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过度了”，也就是“‘获利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①。如果这些发展确实具有资本收益剧烈下降的特点，那末，这种特点将会成为一个刺激，促使在本国的工业上采取垄断政策，同时又在外国寻求新的投资场所；而巨大垄断集团的成长，尤其是与金融的结合，将使它成为有能力在外国采取大规模经济制胜战略的唯一组织类型。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垄断制度和殖民主义在逻辑上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某一特殊工业或某一类工业的垄断能够使利润率提高，但是一旦利润率的提高已经普及到所有行业，垄断立刻就会失去了力量，除非它能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或者能剥削国内的某些中间的所得阶层。^② 所以为了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唯一的道路就只有扩充它在海外的剥削范围。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

② 见前面第三章最后几页。

上面已經說过，馬克思根本沒有意思要把他对資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变成一些简单的原理，根据这些原理可以机械地推断出这种社会的全部未来。他的主要概念，就是运动是由这个社会的对立成份的冲突而产生的，而这种相互的作用和运动又形成了新的成份和新的关系。有机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規律，不一定能从低级阶段的規律推論出来，至少不是可以一概加以推論的，虽然前者和后者具有一定的关系。列宁对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分析所以具有这样大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清楚地說明了，这个新的阶段在哪几点上修正或轉变了帝国主义前期所特有的关系。这些修正常常被人引用，來說明和馬克思的預測的矛盾。但是帝国主义虽然毫無疑問地导致了在十九世紀中叶人們所未曾和未能預見的那些情况，可是这些情况的特点，最后似乎只会加强馬克思所預測的要点而不是使他的預測归于无效。

新帝国主义的第一个重要結果，就是它对本国階級关系的影响。殖民成功的国家所能得到的超額利潤和新的繁荣，使宗主国的工人階級，至少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有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分享剝削利益，虽然这只是表現在对工資放松上面，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的話，資本家可能早已对工資采用了压力。在劳工組織坚强的地方可能比用其他方式更容易压迫对方让步而取得某种特权的地位。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明英国和北美——而且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說明法国和德国——何以会維持着通常所謂“劳工貴族”的地位，也就是有这样一批劳工，他们比世界上其他部分的无产階級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他們是宗主国的“宮內奴隶”，与帝国周圍的“种植园的奴隶”对比起来，他

們對主人感到有部分的利害一致，因而不願破壞現狀；這個事實明顯地反映在這些國家的勞工運動的整個時期（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的時期）。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二版（1892）的序言里，曾經對英國勞工運動作過以下的名言：“當英國還保持工業壟斷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也分享了這種壟斷的利益。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極不平均：享有特權的少數人拿了絕大部分，但廣大的群眾也偶而得到一些。這就是從歐文主義絕迹以後英國不再有過社會主義的原因。隨着英國工業壟斷的破產，英國工人階級也將喪失自己的特權地位。總有一天，整個英國工人階級，連享有特權並居于領導地位的少數也不例外，會降到其他國家工人所處的水平。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將重新在英國出現。”面對着 1914 年的事件，列寧尖銳地批評“帝國主義（在英國）分裂工人，在他們中間加強機會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造成一時腐化的那種傾向”，正如同“它在十九世紀結束以前所表現的那種情況”，而且他還把社會民主黨在當時的領袖，也就是宗主國那些比較放肆的“宮內奴隸”底領袖，稱作“勞工隊伍中代表資本家的班長”。同時，在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里，又漸漸養成一個巨大而又過份繁殖的所謂“中間階級”，他們的生計直接間接依靠着帝國的關係，這包括從城市機關的職員以至殖民地的行政人員，另外還養成一班到處充斥的食利者分子，他們靠着國外投資的所得而發財致富。

第二，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歷史任務是造成類似在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見到的一種階級結構。作為工業投資的先決條件，它需要農村的、然後城市的一個無產階級，而且隨着工業化的進展，也會產生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逐漸從買辦、經紀人和

重利盤剝者、地產投機者、家庭工業組織者或富裕農民，而變成工業企業家。這個階級由於仇恨外國資本的壟斷特權和遙領業主的勢力，也會不可避免地與帝國主義的利益集團對立起來，正如同十七世紀工業資本暴發戶曾經發起反壟斷運動以致最後引起內戰一樣。在這裡，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就是要取消外國資本的特權並採取一種由國家支持的、發展本地工業的路綫；這種民族主義也就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上歐洲 1789 年、1830 年和 1848 年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特點的翻版。正如重商主義曾經導致了美洲殖民地的革命，帝國主義也同樣地在今天的亞洲——也許明天的非洲——導致了殖民地的革命。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所代表的不只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一種簡單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關係。它並不表明會在殖民地再產生那種“純粹的”工業資本主義，具有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與本國或外國的工業資本家的單純關係。（如果這樣，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就不會有它存在的經濟理由，除非純粹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運動。）它也含有通過對整個殖民地貿易而產生的一種壟斷剝削的關係。因此，殖民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大部分，都有經濟根源使他們投入民族主義的運動，因而殖民地的民族主義也就代表著一個強有力的混合的階級運動。所以二十世紀必然會出現一種新的歷史現象，就是帝國各邦的民族與民主的革命，和馬克思所說的宗主國無產階級革命聯合起來，來動搖資本家統治的支柱。在這個新的時代，很可能發生引力中心的轉移，即決定事物發展的是民族和民主的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

帝國主義在世界經濟事件的形勢上的第三個後果是加深各

个国家和各个区域間的不平衡的发展。十九世紀工业化的进展，在世界的不同部分似乎产生了一种“拉平”的影响。世界市場的成长，無論在商品或資本方面，一般都认为会减少各国間的差異，使不同的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甚至在生活标准上，都会日益趋于一致。对于这种見解經常要作重要的修正，这大概是正确的。但隨着新殖民制度的兴起又出現了某些新的不平衡，它們無論对內部的階級結構和不同的国家集团的內部稳定性都同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壟断似乎可以代表統一、協調和比較高度的有秩序的計劃。就某一壟断控制範圍以內的关系来讲，这种說法也許一部分是正确的。但实质上，壟断总是构成一种特权，而經濟的特权总是会构成限制或排他作用。它必然意味着对別人有优先权，或排斥某些人，而这里不仅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而且也埋下了敌对的种子。在殖民主义政策上最成功的那些强国是能够得到一种新的繁荣(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內)而且加强其內部稳定性的。到了爭夺达到公开冲突的阶段而冲突又变成战争的时候，一个集团要想扩大它的領域就只有牺牲另一集团，正如同在匪党之間的战斗一样，最初是把“地盘”扩充到未开辟的地带，但以后再要扩大就只能从其他敌党手上搶夺地盘了。1914年已經达到了这个阶段，凡尔賽和約的訂立以及把所有殖民地全部从战敗国轉移到战胜国手上，似乎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列宁在他的学說里面，曾經引证帝国主义时期的这种新的不平衡和对立，来支持两个結論：第一是不可能有所謂“超帝国主义”，(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主义，由它們联合起来，和平地剝削全世界)；第二是无产階級对資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最先在老牌資本主义

国家中实现，因为它们在殖民竞赛中最早而又最成功，所以延长了繁荣的寿命，而将最先在那些工业比较不发达、因而构成“最薄弱的环节”的国家中实现，当它们遭到像世界大战那样严重危机的时候，整个结构就会趋于崩溃。在第二个结论上，他为自己俄国所实行的政策找到了一个理由，而且对一再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矛盾”的说法——就是马克思在七十年以前所预言的革命，会首先发生在俄国而不是在西方各国——找到了一个答复。

这个具有潜伏的敌对性和扩张的内在逻辑的帝国主义概念与凯尔尼斯(Cairnes)在他的“奴隶强国”一书里面所作的奴隶经济的分析，正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凯尔尼斯着重指出，在北美的南部各州，唯一的新的投资方式和唯一的利润扩大的来源，就在于获得更多的种植园和更多的奴隶。因此南部各州的艰难的经济不断被一种获得更多的奴隶和向西部扩大种植园制度的要求所推动。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限度以后，终于不得不与北部发生最后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血液里面显然也存在着类似的扩张欲望，而且这也是不可能使它无限制得到满足的一种贪婪的欲望。正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形式的那种抵抗力量，使垄断政策的任何强化都会遇到愈来愈多的障碍，甚至会松弛帝国的团结。所以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殖民主义只能提供一种暂时的喘息时间而已。

如果把战后的经济危机与这种类型的背景加以对比，就可以得到一个和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完全不同的而且更明显的解释。的确，如果我们理解使人迷惑的、梦魇似的最近的事件，如果我们追究原因的原因，而不是仅仅依靠对“直接原因”的

分析所提供的表面現象，这样一个背景似乎是基本的条件。如果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观察，我們战后世界的症状显然要比在傳統的討論上一直占着非常重要地位的、而对很多經濟学家來說甚至好像就是他們視野界限的因素，如“战时生产的失調”、“政府对貿易和企业的限制”、“貨幣的紊乱”以及类似的因素具有更深的根源；而事实上比周期运动更为深刻的“总危机”的清晰輪廓已經开始出現。馬夏尔說过这样的話：“在經濟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既不是已經知道了原因的那些結果，也不是已經看到了最显著后果的那些原因；我們所沒有見到的东西，常常要比我們所見到的东西更值得研究”，特別是在某一个人所关心的“不只是限于局部和临时利害的某些問題”而是屬於“制訂公众利益的长远政策”的时候。^①

关于1929—1930年的事件，罗宾斯教授曾經指出（写于1934年）：“我們不是生活在世界危机的第四年，而是在第十九年。……1929年的蕭条，無論在寬度上或深度上，都超过所有以前的同样性质的变动。……国际劳工局曾經計算过在1933年全世界大約有三千万人失业。在現代經濟史上曾經出現过許多次的蕭条，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說，过去任何一次的蕭条都无法和这一次相比。”^②甚至在1927年，卡赛尔教授就已經发出警告，他认为“成为我們社会的一种經常特点的失业危机似乎比一般所認識到的更为紧急”^③。至少在战争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廢墟已經从經濟界清除以后，不过几年工夫，1929年的新危机就来得

① “原理”，第778頁。

② “大蕭条”，第1、10—11頁。

③ “最近的壟断趋势”，載在“国际联盟調查报告”，1927年。

像被歪曲的回音一样，嘲弄了那些曾經說过危机一定会逐渐減輕的經濟学家們。而且这一次蕭条所以会同帝国主义正在形成时期的危机有那样多的共同点，可能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如果上面所說的一切有正确的地方的話，那末，要对这些事件作更深入的解釋，显然就必須从一个中心的事实出发。这个中心事实就是，有利的投資范围已經比 1914—1918 年的历史分水岭以前要狹窄得多。这种有利的投資范围之所以显然比以前更为狹窄，其原因不是因为殖民地的开发已經接近絕對限度，而是因为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緊張局势强加的一种限度。在战时和战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已經成为强大的力量，而且在值得注意的方向上松弛了帝国的結合或者这种結合至少已經拉长到比以前更为接近爆炸的一点。亚洲和美洲的生产力的惊人扩展是 1925 到 1929 年这五年內世界投資高潮的一个突出現象。美国在 1922 到 1929 年之間，資本財貨的产量增长了 70%，而不經久的消費財貨只增长了 23%；在 1929 年以前的十年內，制造业的每个工人的生产量增加了 43%，而在同一时期內就业人数的增加还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工資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也降低了。^① 亚洲殖民地的本地工业，由于受了保护政策的扶持，已經繁荣了起来，它們从宗主国的工业方面暗暗地收回了殖民地的一部分市場并且推翻了后者的优势，例如，甚至不得不同意給印度一定范围的關稅自主。当西伯利亚的矿产資源已經从資本主义的投資軌道上撤出来的时候，几个老牌帝国就愈来愈受到日本“門罗

① 參閱休琼斯(Hugh-Jones)和拉狄斯(Radice)：“美国的一个实验”，第43—51頁。同时参考国际联盟出版的“世界经济蕭条的进程和状态”，第120—125頁：“这种繁荣与其說是消費的繁荣，不如說是典型的投資的繁荣。”

主义”的排斥而失去染指中国的机会，同时近东的均势，由于民族主义的土耳其和民族主义的波斯的兴起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两个国家都准备和苏联结成联盟；而且也连带受阿拉伯各王国的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就英国来说，要在帝国范围以内，筑起隔离的关税壁垒，这个企图似乎已经遇到阻碍，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帝国组织不够完善，以致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经济单位，而且也是由于帝国单位的内部经济冲突所致。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已经半解放的殖民地，它们的力量足以保证，在“帝国内部商品优惠待遇”的政策上获得经济利益的，很可能就是这些殖民地而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

还有一个事实和限制殖民地超额利润范围有关，就是这种垄断的限制和障碍的增长使未来的投资范围更加狭窄。首先从实行限制所获得的利润，是靠排斥某些资本而得到的，这种资本本来是可以参加到这个投资范围的。所以这种限制的累积影响是使资本涌入其他领域，因而降低了其他领域的利润所得，使它低于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水平。^① 所以从一方面来“解决”这个根本困难的办法就是使这种困难在其他地方更加恶化；这是“使邻居流为乞丐”的一种政策。当然，一部分首当其冲的是与“大企业”相对立的“小企业”，这就是在非垄断或限制较少的区域内的“小资本家”。同时，这对较大的金融资本单位也不会没有影响。而且正是在垄断区域内这种投资范围的缩小，才引起向其他地区输出资本的急切情绪，因为这些资本输出不仅是剩余资本的唯一出路，也是维持垄断统治的必要条件。

① 罗宾斯：“大萧条”，第65—68、131—132页。

1925 到 1929 年的投資高潮不但沒有受到农业危机的影响(这个危机似乎有一部分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且居然还会冲破像这样的基本因素的鋒芒(这些基本因素破坏了利潤水平,而正是在預期这种水平的情况之下才促成这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以劇烈的形式表現了出来。国外和国内投資的突然停止触发了 1930 年和 1931 年的崩潰性的瘫痪。恐慌开始以后,壟断性限制的統治,似乎加重而且延长了这种后果。特别是在这种蕭条之中,純粹的物质浪費增加得很大,蕭条的空前重担以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形式压在工人的身上,这些似乎都要由壟断性的限制来負責。这种限制性的破坏作用,不仅表現在国外貿易的限制造成对外貿易的急剧縮减,同时还阻碍了过去四年中的有限度的恢复,而且还以卡特尔和托辣斯的价格控制的形式来維持資本的利潤率。^①要維持价格就要限制产量,这就使危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轉变成生产力过剩和失业的情况,以致造成人力和机械能力的巨大浪費。

如果靠开发殖民地来扩大投資范围的活动受到阻碍,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阻碍,那末国内的“产业后备軍”問題便又会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来。以前用在国外投資的資本倘非閑置过剩,就是投資到只开发了一部分的領域里面去。前面已經提

① 例如在德国(只有这个国家我們可以获得統計数字),在1929年1月到1932年1月之間,卡特尔貨物(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的价格只下跌 19%,而非卡特尔貨物的价格則下跌 50%。这种情况有一个影响,似乎是这次危机的特征,就是生产用品的跌价,不如消費用品的跌价快。(国际联盟:“世界經濟調查”,1931—32年,第 127—133 頁)

过，壟断資本只有两种办法能用本身的壟断行动来提高一般利潤率；不是降低劳动力价格和剝削国内的某些中間阶层，就是扩大或加深国外所能找到的剝削区域。如果它在后一路綫上受到阻碍，那末除了回到前一路綫以外是别无其他办法的。壟断資本在国外的易如反掌的机会受到阻碍以后，它就只好退而加强国内的壟断政策；这种政策就是維持自己的利潤而牺牲小生产者、小食利者和由于是收入获得者或消費者因而易于受到压榨的“中間階級”分子，并降低劳动力价格——正如最近一位作者所說的，“攻破剛性的最后堡垒即工資率”^①。鉴于所有工业国家都存在着失业大軍，采用后一办法似乎并不会引起严重的問題。但是单靠后备軍的存在是不够的，一定还要使它能达到战略目的。这里我們就碰到目前的情况与十九世紀初期和中叶的古典时期的重大区别。这就是說，今天的工人既然发展了具有抵抗力量的坚强自卫組織，关于“产业后备軍”的旧古典規律就不能单独发生作用。这实在就是自从1920年以来，大多数經濟学家所經常埋怨的中心問題，他們說有必要把“伸縮性”和“可塑性”引到經濟制度的各部分去！尤其是要引到劳动市場里面去。現在要想应用这种办法，就需要采取非常的手段——用来打破十九世紀自由主义所梦想不到的这种抵抗的非常手段。既然沒有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自发的”節約劳动的发明或重新获得殖民地出路的希望，这就是資本主义在愈来愈多的国家之中不得不采

① 弗雷瑟(Fraser)：“大不列顛与金本位制”，第115頁。勃朗(Braun)在“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或失敗”里面指出遭到挫折的殖民主义与加强国内壟断化之間的关系：“为了补足殖民地壟断的不足，金融資本企图在自己的祖国建立起工业的壟断。它在国内要求更多的壟断或額外利潤”(第9—10頁)。

取的另一途徑。

当亚当·斯密的早年門徒开始在大学讲授政治經濟学的时期,据說,如果他們提到像“谷物”和“退稅”等庸俗的东西,就认为是对学术傳統的“褻瀆”,甚至政治經濟学这个名詞也被怀疑是“危險的命題”^①。現在当一个經濟学家坦白地評論当前的政治事件的时候,也常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今天經濟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甚至比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期更为密切,因为政治事件有显著的經濟原因,而經濟預測也要看政治发展的方向。一个經濟学家要想充分并全面了解什么事正在发生和究竟什么事能作,他之不能排斥經濟事件的政治关系正如政治策略家不能忽略政治事件的經濟关系一样。最近几年的某些政治事件和我們所敘述的經濟危机的特征之間似乎有着特別密切的关系。这里,在我們所处的活动范围里面有許多資料还没有經過分析,并且普遍性的原則还是要根据政治发展的特殊来解釋,而这种解釋又要根据我們对于当时事件的看法。就目前來說,这一定仍然是一个判断的問題,要在这里評述作为这种判断所需要的資料,就未免过于冗长累贅,而必須留到后面再談。

近年来有两个运动很明显是从战后資本主义的病态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所謂“中間階級”广大部分底地位的分化。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經濟的民族主义底意識形态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制度,二者之間是有一种明显的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虽然在本质上似乎是很明显而且隨着事物的发展而愈来愈明显,可是即使到現在人

① “斯图亚特自傳”导言,汉密尔顿編,第51—52頁。

們往往还是不能認識清楚。这几年来来的事件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来支持一种見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双重的。第一个任务是破坏和解散工人階級的独立組織，它所以这样作，并不是为了“中間階級”或“小民”的利益，归根到底乃是为了大企业的利益。第二个任务是把整个国家組織起来，不仅在精神上从事深入的宣傳，而且实际上为擴張領土的侵略战争进行軍事准备和建立极权制度。事实上，为了这些目的，特别是为了前一个目的，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急进主义”的煽动宣傳，配合上高度現代化的宣傳机器，企图在符合煽动要求而造成的群众組織中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基础。这的确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明显特征。但是当这种“革命”到来的时候，它至多只是一个“宮內的革命”而已，而且当法西斯国家一旦实现以后，受到軍事管制的是群众而不是資本家，被拋棄的是急进的綱領而不是剩余价值。如果这种公司法团^①的国家，除了作为控制劳动糾紛的手段以外还有其他經濟意义的话，它似乎可以看作是对更完全而严格的工业壟断組織予以国家认可和支持的一种机器。^②

但是法西斯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并不只是后者表现为前者的附带产物而已。这种关系似乎是基本的，它們不仅在結果上有关联，而且也在这一运动的起因和社会根源上有着联系。

①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称自己的国家为“公司法团的国家”，把这个国家比作“公司法团”。——譯者

② 参考下列各书所引的事实：派斯古(R. Pascal)：“国社党的独裁”；法爱南(H. Finer)：“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亨利(E. Henri)：“希特勒統治了欧洲”；达特(R. P. Dutt)：“法西斯主义”；沙尔万米尼(G. Salvemini)：“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以及其他有关各书。

法西斯主义被人称作危机的产儿。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如此，但这个譬語还是太简单。它是一种特殊危机的产儿，是这种危机特征的复合产物：一种壟断資本主义的危机。它的特別引力是由这个事实产生的：这种制度原来要向剝削范围的粗放和更集約^①的发展方面寻找出路，可是现在发现这条出路已經被封鎖了。^②要突破这种限制，新的特殊手段，也就是政治独裁手段，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常規。如果我們要簡短地归納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先决条件，我想我們可以說有三个主要因素：資本家由于投資范围的限制造成了困难，他們找不到正常的解决途徑而感到絕望；大量貧困的“中間階級”或沒落階級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正好被网罗在法西斯信条之下；工人階級虽然已經有充分权利和力量足以抵抗对生活标准的正常压迫，可是很不团結或缺乏階級意識（至少在政治领导方面），以致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軟弱，不能發揮它的力量或抵抗进攻。这些条件之中的第一个，极可能就是已經丧失过去所依靠的殖民果实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显然就是以前直接間接依靠帝国关系的中間阶层最能深切感到这种情况的痛苦；而在以往經濟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又最容易产生一种“劳工貴族”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識形态和政治运动。法西斯的老家所以会产生在殖民野心显然已經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而受挫的两个国家之中，显然不只是一种單純的偶合；同样的趨勢也很可能会首先在英国发生，因为英国是議會民主和工会主义的搖

① “粗放”和“集約”是借用农业上的術語，前者指面积上的扩展而不是技术和設備上的加强，后者指在原有面积上技术和設備的加强。——譯者

② 見本书第四章末。

籃，而同时又首先嚴重地表現出“中間階級的失業”^①以及英國作為金融和輸出中心的地位已在衰落的那種不祥徵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關於法西斯國家的政策要點的实际联系，加強了這種假設。法西斯政策的第一章就是解散工會，第二章包括恢復軍事征服地和占有殖民地。構成法西斯思想意識形態的政治和經濟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帝國單位的和種族優越的民族主義，這是重新建立起來的帝國主義的夢想，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已經被清算了的帝國主義的夢想。

正如我們前面所試着敘述的、帝國主義最成熟的形式那樣，法西斯國家的經濟政策的确代表着帝國主義的本質。在內部經濟方面，把工人階級加以嚴密編制并加強剝削的同時，它又使工業組織達到高度的壟斷程度，同時由國家認可，甚至強迫人民接受并予以支持。對外貿易方面則強力推行重商主義路線，以期貿易條件有利於本國；并且一面用關稅和配額的限制，來提高國內價格水平，一面又常常用公開或隱蔽的方式，來補助出口。同時，法西斯國家還熱衷於領土的擴張，不僅像從前那樣目標對着未開發的區域，而且也擴張到毗鄰的地區，因為這些地區的控制能為宗主國的大企業提供壟斷的利益。而且在這種殖民野心之中占着重要地位甚至唯一地位的，往往就是貪婪那種易如反掌的壟斷利益。因此，意大利攫取非洲，日本攫取東三省和內蒙古，德國攫取摩洛哥和西班牙的礦產同時還覬覦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奧國和巴爾干國家。在領土野心之後接踵而起的就是重整軍備，而隨着軍備的重整就是把國民經濟的組織放在实际

^① 參閱“大學專款委員會報告”，1929—30年至1934—35年，第29—30頁，作為一例。

的战时基础上，实行战时統制和战时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①这个舞台的布景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清楚——甚至可以說幕布已經拉开——这就是匪帮之間瓜分世界的战争。

最近的发展情况已經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結構上引起非常劇烈的影响，以致构成相当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但是这个发展是有它的特点的。我所指的就是最近經濟事件对宗主国經濟的各个中間阶层的分化作用。这些阶层的經濟地位与殖民制度有很多直接間接的联系；而隨着殖民地超額利潤的縮減，这种地位原来享有的很大的特权，現在立刻就失去了保障。但是在国内强化壟断发展的这个新阶段上，蒙受不利影响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阶层，特别是由于这种发展加重了純粹限制性的一面，例如經濟的民族主义和国际貿易的停頓，以及受卡特尔和限制計劃所控制的价格，所以使小生产者和消費者感到的負担特別沉重。在这个所謂“中間階級”之中，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有一大部分正在日益趋于急进，并願和无产階級結成（1848年以来还是

① 一年以前，“經濟学家”杂志从德国“法兰克福新聞”上面引用了德国1932年到1935年經濟指数的变动：生产用品（主要由于受了重整軍备的定貨的刺激）的产量增加113%，而消費用品的产量只增加14%；男工每小时工資率平均降低5%，工資和薪金总額增加21%，而生产总額（用价值計算）增加53%。（“經濟学家”，1936年4月18日）貨幣工資虽然已經表現了降低的趨勢，但1933年到1936年的生活費用却增加了15—20%。（參閱“海外貿易处关于德国的报告”，1936年，第229—231頁；同时參閱“經濟学家”，1935年1月26日及7月13日）加紧重整軍备的活动，約占生产用品工业全部产量的三分之二（1928年只占五分之一），虽然这只有靠金屬的配給，并在一系列的工业上，如紡織、造紙、鋼管、鉛、纖維素、无綫电等方面，禁止新的投資和建設才能作到。（“海外貿易处报告”，第83、84、121頁）

第一次)一个有組織的“左傾的”“人民战綫”;这与他們在目前社会上的經濟地位的根本改变是有关系的。对于这种轉变的暗示,似乎还没有人注意。过去享有特权的阶层轉变到和資本主义实际对立的一种关系,这种形成一个新的、广泛的人民統一战綫来抵抗壟断組織的趨勢,已經被下面的事实所加强,就是人們更加认清資本主义社会机构究竟是什么东西。政治上的温和手段一經放棄,經濟现实立刻就揭穿了幻想者的面紗。这不是容易补救的一种偶然現象。这是因为这种制度的运动方式已經把它的真实动机明显地表露出来。正是它所采取的补救办法日益揭发了它的性质,揭发它是一种“基于强迫、限制和壟断”的制度,而且向世界各国人民勒索貢稅;揭发它是一种“卑鄙和罪恶”的制度,为了“一小撮人的小小利益”而拋棄了工业和社会的进步。

我們如果发现,和罄竹难书的、有关帝国主义真实性质的事实证明对比起来,帝国主义的意識形态只是代表着顛倒过来的现实,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种制度的經濟基础过去曾經被一种政治的理想主义所掩盖,因为这种主义純粹用政治或种族优越感,来代表殖民主义的目的。但是最近几年来,殖民主义的另一方面更常被人所強調。他們說,一国之所以需要殖民地是因为国内有过剩的人口,殖民地可以使本国人民获得迫切需要的土地和資源。这就是今天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突出的擴張主义国家为它們各自的殖民野心所作的辯护。照它們的說法,这种征服的野心所以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壟断权利和投資的特权范围,也不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小小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从这种主义被人很快地接受这一点来看,

这个解释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它經不起比最表面一层稍稍深入一点的事实检查。认为一个国家需要殖民地是因为可以使它获得殖民地的资源，这种辩护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各国都经常（除了战时以外）拒绝将它的殖民地的产品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或者甚至要在卖给他們的时候在价格上造成显著的差别。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們几乎或完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帝国单位所经常征收的不是出口税而是进口税。帝国主义所企图占有的，不是殖民地产品的销售而是市场、租借权和投资的机会。如果争夺殖民地的欲望真可以用本国人口的压力作为理由，那末，我們可以预料，各国所争取的区域应该只是那些无论土壤或气候都适于本国居民移居的区域。但是恰恰相反，它們所最垂涎的殖民地区常常都是最不适于殖民的地区^①；而且帝国主义开拓者首先打算的总是利用土著工人来开采矿山租借地，而不是为本国失业者经营住宅和租地。这样一种解释显然

① 拿非洲的情况来说，伍尔甫曾这样写道：“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在欧洲国家的手中已经有一世纪或者更久的时间了。它們是比任何地方都好的‘白种人的国家’；但在这两个地方，白种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欧洲人在非洲殖民地的完全失败，由欧洲国家在热带非洲殖民地的情况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在1914年，德国的四个非洲殖民地共有930,000平方哩的面积和几乎1,200万人口，但其中白种人只有2万名。如果我们拿四个英属殖民地即东非、尼亚萨兰、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来看，总面积约計700,000平方哩，总人口約2,200万，而其中欧洲人仅占11,000”（見伍尔甫：“經濟的帝国主义”，第54—55頁）。恩吉尔曾經指出，日本过去的两个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朝鮮和台湾，四十年之間“所容纳的日本人总数，还不到日本人口一年的增加数”；在1914年“德国人在巴黎一市謀生的，比全世界所有德国殖民地的德国人还多”；而在意属的厄利特利亚，在占领了五十年之后，根据最后一次的普查，在厄利特利亚最适于欧洲人居住的2,000平方哩的区域内，大約只有400个意大利人”。（“有”和“一无所有”的問題”，第115—117頁）

是把問題顛倒過來了。促使爭奪殖民地的推動力量並不是和資本對比起來的勞動的過剩，而是和勞動力對比起來的資本的過剩。

對於帝國主義還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解釋，也許我們應該提出來作為結論，不僅因為它已經在帝國主義的評論者之中相當流行，而且也因為它和以上所提到的解釋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這就是用國內市場消費過少的理由來解釋資本主義的擴張趨勢。這個見解的主要代表者霍勃生曾經把擴張殖民地的欲望，歸於下面的事實：就是“使整個國家的企業利益集團受某些部分的利益集團的支配，他們奪取了對資源的控制權並為他們的私利而加以利用”。但是他的學說着重在表明這種私人利益在於能獲得國外市場，因為在國內大部分人口的有限消費已經造成了缺乏市場的現象。他在另一地方寫道：“凡是在英國生產的東西都可以在英國消費得了，只要購買商品所必需的收入或能力獲得適當的分配。一個有智慧和進步的社會……能在它所生存的国家範圍內，為無限數量的資本和勞動找到充分利用的機會。”^① 這種見解的含義就是，如果能在國內採取社會改良和提高工資的政策，就可以為這種制度找到一個解決的途徑，來避免為了尋找國外的新市場而需要向外擴張。最近，柯爾曾經發表過一種類似的見解，並用這種見解來說明法西斯主義根本是一個中間階級的运动，它主要是促進中間階級的利益，而企圖使勞資之間獲得協調。他寫道：“資本主義的獨裁者，是不是能克服他們對工人階級要求的那種本能的反抗，因而能始終交出他們

① 霍勃生：“帝國主義”，第76—78頁和以後。

一部分的利潤，來不斷提高那些被擊敗的工人（在法西斯國家內）的收入，為擴張中的工業生產提供所需要的充分出路呢？如果不能，那末，資本主義的原有矛盾還是會重現的。”這一段話的含義大概是，如果資本主義能照柯爾所說的那樣去作，它不但可以消滅經濟危機的原因，而且還可以消滅殖民冒險的需要。

這種解釋顯然大部分要看我們在前一章所討論的、根據消費過少學說來分析經濟危機的作法是否正確。如果它作為說明經濟危機的正確性被人駁倒，那就沒有理由認為可以適用於這個特殊的情況。但是除了要看它作為一個學說所應具備的邏輯一致性以外，決定性的考驗必須還要看它對主要事實的概括能力。凡是有關這種正確性的事實證據，很少能使我們支持這個假設和它的推論的可能性；反之，倒有不少事實證據不利於這種假設的可能性。照公司法團國家或極權國家的最近歷史來看，沒有絲毫事實可以支持柯爾的說法（他現在也許會修正這種說法），卻有許多事實是和他的說法互相矛盾的。對殖民地野心最大而且這種野心發生得最早的似乎並不是工資最低的国家，而且似乎還沒有已經知道的例子可以表明資本家階級的任何重要部分（除了那些製造工人階級消費用品的人），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會把提高國內工資的政策真正看作帝國掌珠的唯一代替物。恰恰相反，不管各国有產階級在別的問題上態度如何不同，他們似乎都有一種日益增長的和驚人的一致性，自動地團結起來，仿佛受了動物本能的沖動那樣，不但壓制對殖民統治的任何嚴重威脅，而且抗拒凡是企圖實際加強他們的工人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任何運動。也許可以說，這是因為所有制的本能對於

本身的最大利益总是盲目的，即使消费过少論者已經一再向他們指明了这种利益。但是要使人能相信在利益和行动之間确实可以有这样普遍而頑强的矛盾，那似乎还需要提出更多的证明。不如說真理似乎是这样：如果別人能付給某一資本家的顧客以优厚的所得，这个資本家固然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但是他自己并不能靠給別人錢，讓他們来购买他自己的貨物而获得好处。而且虽然在某些範圍內可以适用勃拉賽（Lord Brassey）的“高工資經濟”的原理，但是即使最强大的壟断家也不会靠竭尽他所取給的来源而得到好处，壟断利潤的規律是用尽可能少的东西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真理。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經濟里面，用投資和生产的办法来提高国内生活的标准，当然是代替占有殖民地的唯一途徑。对于为社会理想所推动的一种經濟制度來說，国外投資很可能成为一种障碍而不是助力，因为这样就使得資源从国内迫切的建設工作上面分散出去。但是如果把这样一种比拟用到資本主义的經濟上面，那就只会引起混乱，因为在事实上它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社会的理想，而只是为了社会一部分人的利潤。“只要資本主义还是資本主义，过剩的資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落后国家去，借以提高利潤。”^①

① 參閱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頁。

第八章

社会主义經濟的經濟規律問題

社会主义經濟这个概念常常被經濟学家当作一个抽象的比較名詞，用这个名詞来和个人主义經濟的特征作对比，或者用来说明所謂經濟規律的普遍性(这种情形更为常見)。在大战以前^①，这种比較都是一种很抽象的比較，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定义作为根据，而这种定义又是只根据和其他方面无关的二者之間的差別来解釋的。但是現在如果仍然采用这种分析的方式，那就沒有可以原諒理由了。苏維埃經濟在近年来的发展，尤其是在十几年之間保持着不断“高漲”的增长速度的能力，它那已經获得成就的大規模建設事业以及在劳动市場上能用劳动缺乏代替劳动过剩的情况，不仅引起了兴趣、研究和爭論，而且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具体比較的基础。我們研究社会主义經濟，如果要做得具体，那末显然必須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在于通过对有产阶级的剝夺以及土地和資本的社会化，来廢除資本主义生产所依据的阶级关系。从这种所有制基础的轉变，它才获得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比市場影响更为直接的方法使整个制度的組成部分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譯者

获得协作。一个以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固然也可以勉强仿效这种协作，但是由于这种制度的基础是分散成无数个体的财产权，所以永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正如罗宾斯教授所说的，“计划包含集中的控制，而集中控制又排斥个人的支配权”^①。就所谓每一种制度的力学来说（本章主要就是讨论这一方面），这两种经济制度在本质上的区别是：在一种制度之下，统制生产的各种各样的决定之中的每一决定都是在完全不了解所有其他决定的情况之下作出的；而在另一种制度之下，这些决定都是互相配合和统一的。

在战后年代里，面对着资本主义秩序所受的革命威胁，有势力的人士发动了一种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反击。这在欧洲大陆上有过某些影响，而在英国最近也发生了一部分影响，并且引起了许多讨论。这个攻击是相当顽强的。维也纳的密赛斯教授，从以前的著作中搜集了某些有关的含义和暗示，就声言有可能把它们作为经济学说的一种直接推论，演绎地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主义在沒有个人主义市场的各种估价的情况下，经济预测和经济理性的统治就必然会归于消灭。不管它如何炫示它的优越的理性，社会主义结果必然会陷于一团混乱而被无领导的官僚主义的个人喜好所统治。“代替‘无政府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将是一种不合理的机构的无意义的生产。车轮还是会转动的，但是不会有什么效果。……只能在黑暗中摸索。”^② 俄国圣彼得堡的勃鲁茨古斯(Brutzkus)，也在1920年

① “大萧条”，第146页。也参阅伍顿(B. Wootton)：“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第318—321页。

② 密赛斯：“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哈耶克编，第106、110页。

同时发表了类似而較為慎重的意見；而在英国，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也用比較不武断的形式把这个学說复制了出来。^①

是否能认为傳統經濟学說含有这样一种推論，这是曾經引起很大爭論的一个題目。似乎没有什么正确的理由可以假定那最頑强的主观价值学說能够支持这一結論。但在傳統的經濟学說里面却有一种更微妙的含义，这种含义已經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甚至显然毫无疑问地已經被大多数接受了密賽斯教授的大胆挑战的人所采用。这种含义就是，基本上支配資本主义經濟的經濟規律一定也同样支配着社会主义經濟，所以在这两种制度之下，經濟問題必然具有同样的一般形态，并且必然要由类似的机械来处理。他們說，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別只代表一种数据的变动，与嗜好和需求的任何变动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而只是由于每天所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动而引起的程度的不同。这种数据的变动仍然会使方程式本身和决定因素的性质保持不变。至于破坏平衡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只要我們还有自然灾害以及技术发明所不能估計的影响范围，消費者个人爱好的选择还没有受到严格的支配，那末，这种影响的实质也就会一样。这样，“生产問題”和“分配問題”就被抽象地分开，而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和后一問題有关（約翰·穆勒首先作如是說）。作为生产和交換的一种制度，社会主义經濟的活动方式不能和資本主义

① 密賽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經濟計劃”，哈耶克編；勃魯茨古斯：“苏联的經濟計劃”；罗宾斯：“大蕭条”，第145頁以下。在这些著作以后的討論，參閱狄更生：“經濟学杂志”，1933年6月号；樓南：“經濟研究評論”，1934年10月号；兰格：“經濟研究評論”，1936年10月号；端尔平：“經濟学杂志”，1936年12月号；以及其他文獻。

經濟的活動方式相差太多，即使在前一制度之下，組織形式和財產權利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產品分配和生產所服務的社會目的都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抱着這種意見對密賽斯教授進行批判的大多數社會主義批評家，都用不同的論調表明：社會主義能夠避免密賽斯等人對它所預料的那種不合理性，如果它能密切摹仿競爭市場的機械作用，並能接受這個市場所確定的價值的支配。這種見解似乎忽略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區別的充分意義，特別是沒有能認識到計劃經濟的重要意義在於：和資本主義的無數分散的個體對比起來，它能統一所有那些支配着投資和生產的主要決定。這個區別就是在一種制度之下事物的可計劃性和在另一制度之下事務的不可計劃性，因而造成事物發展形勢的不同後果。

當然在一個變動着的世界，要想對未來有完全的把握，這必然還是一種想像的東西，雖然它永遠是理性所努力追求的一種理想標準。最老練的和最有遠見的人所不能預見的事物總是會發生的，以致不得不走彎路，而且只有引起暫時的不平衡以後才能重新加以調整。從形式上看，這種不可預見的變動是屬於我們可以稱為位移學說^①的範圍而並沒有向經濟規律的說明里面引入新的要素。如果這些位移的發生速度比重新調整所能發生的作用更快，那末，這個制度將隨着時間的進展越來越離開了“正常的”路綫，好像仙第^②寫自傳一樣，會隨着他的生活進展而和它的結尾越離越遠。即使這樣，如果這些位移能表現任何發

① “位移”是物理學和力學上的術語，指摩擦因素可能使運動體在前進路綫上發生位移，但在大多數情況之下，摩擦的位移在質的意義上並不能改變力學的規律。——譯者

生的時間範圍的正規性，那就多半可以預先估計到，因而也就可以把未知的和不能預見的東西轉變為或許有的和可以部分地預料到的東西。但這些不可預見的数据的位移，雖然能在它們發生的時候造成失調，卻不一定会引起動蕩或漲落。

無論什麼時候，如果有一個沒有預料到的要素存在，那末，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的預期，當然是在發生位移以前造成具體形勢和在位移以後促成具體形勢的一個因素。但是在前面第六章末段已經提到，那可以稱為利潤預期的學說所以能在個人主義經濟之下具有唯一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在這種經濟機構裏面，那種特殊類型的不確定性構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正如在同一章內所討論的摩擦理論由於個人主義制度的特點而形成特殊形式一樣。認為是競爭市場特殊優點的“自動調節”和“理性統治”都只能在事後通過價格變動的影響而發生作用。每一串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所作的決定是在不了解其他決定的情況之下作出的，因此也是根據對於共同結果的揣測作出的。只有在這些決定體現在行動之中以後，它所造成的價格變動才能作為對整個情況的一個事實的證明，從而提供了一種自動的糾正。^③但是，如果這些決定必須在它們所造成的市場事件的相當

② 仙第(Tristram Shandy)是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斯特恩(L. Sterne)所寫的一本小說中主角的名字，同時也是小說的名稱。他在小說開頭描述仙第的父親開始寫自傳，可是寫的細節太多太慢，因此要用比一天還多的工夫，來描寫一天的生活細節。于是他寫得愈多，他離開自傳的結尾愈遠。——譯者

③ 參閱端爾平在“經濟學雜誌”1935年12月號上發表的文章。在競爭之下，企業家“並不了解他的競爭者對方的供給數量對於價格變動的反應。這種價格的變動，對他和他們來說是共同的。他也不了解他們產量的綜合變動對於市場價格的影響。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可能使工業作出正確的長期的調整”(第704頁)。

时期以前作出——特别是在所有投资的行为上如此，而且以后可能会更是如此——那末，这种对于最后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一时就不能获得纠正，也许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纠正。在这个时期中间，猜测就不得不代替了知识，而错误的决定还是会继续作出同时表现在行动之中。而且一旦作出了决定并表现在一种长期的投资行动之中以后，再要修正这种决定就不可能很快，而错误也就会继续遗留在以后的失调状态之中达几年或几十年之久——例如，铁路的建筑、矿产的开采、城市建设的计划（或缺乏计划），都是事实的证据。这种时间上的迟缓就会使原来的推测有扩大后果的机会，而使具有广大破坏性的波动有机可乘。竞争必然意味着各个决定不仅是分散的而且也是自主的，而正是这些个人自主的各个决定才产生了这种结果。如果可能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让社会主义经济也摹仿这种竞争和它的“自动的”调节，那末，这个制度就必须继承经济无政府主义的产物，也就是继承不平衡和波动的趋势；正如在相反的情况之下，企图把计划的要素移接到资本主义制度上面，并不能克服作为这个制度的主要支柱的基本无政府状态一样，因为这样的“计划”必须尊重个人财产权的独立自主——甚至像目前的经验似乎已经表明的那样，把计划作为当前垄断利益集团的僕役。这样，计划不是意味着压制各个决定的独立自主，就是显然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那些梦想使集体主义与经济无政府主义取得调和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以为这一对奇怪的配偶的后代只继承下来匹配得大有问题的生身父母的优点。

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所指的经济规律必须是对事物在现实世界里面实际活动的概括性的说明。如果这是我们的意思，那

末，立刻就可以明白，所謂支配着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經濟規律的同一性必然是根據一種抽象的類推，它假定有一個具有完全確定性（除了某些客觀的“位移”以外）的放任主義世界，在那里摩擦和預期都不能引起任何值得重視的影響。這種斷定無異於說：有一種不用時間表的鐵路行車制度，每一個火車司機都是獨立自主的，可是它卻運行得同我們所知道的一種有計劃的鐵路行車制度一樣好。在這一種自動行車的情況之下，固然也可以自然出現某種形式的運輸平衡，但是這種運輸平衡只有在事故的发生和車輛擁塞的延誤已經發生影響以後，並且在終得進行最後調整的各種變動和擺動已經充分發揮了作用以後才能作到。在交通擁塞地點爭取中午的更大運輸量之中，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故和擁擠現象以後，很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波動，把暫時調到夜半時間的司機又調回到中午的時間，當時會有兩種想法，認為兩個時間之中總有一個是比較不擁擠的；或者在爭取到蘇格蘭去的運輸或多維爾海峽火車輪渡的運輸以及其他的運輸之中，也會有類似的波動。為了使這種類比更為接近起見，還要假定司機不能在一接到通知的時候就立即改變時間和路綫，但必須像公路上行駛的長途汽車一樣，預告一年或者有時幾年的行車計劃。沒有疑問，最後也會作到某種穩定的運輸分配的，這是一種由經驗所造成並體現在慣例和默契中的自發性的時間表，可是這樣達成的平衡基本上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因為任何需求的轉移、新綫的開辟、舊綫的取消或者機車的能量和速度的變動都會重新產生不確定性的影響和預期的波動後果。^①

企業家關於生產的每一決定，在這個字的一種意義上都是

一种投资的行为。但当人们说到投资行为的时候，如果是作为一方面决定波动的性质和范围、另一方面决定长期发展方向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东西，那末，他所指的是固定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建造经久性的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在利润预期的学说上，由于这些行动的“成熟时间”比较长（用罗伯生[D. H. Robertson]的词句）和结果的持久性，这一点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除了像需求和技术发明的未来发展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以外，这些决定的“正确性”，还是要依以下主要四类事实为转移（在个人主义经济制度之下，作出投资决定的个人对于如下每一类事实都是不完全了解或完全不了解的）：第一类是在同一生产部门中或在互相竞争的生产过程中，正在同时进行或即将进行的平行或敌对的投资行动；第二类是互相补充的过程中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投资行动（例如辅助的或副产品的各种工业，运输或动力上的各种设备等等）；第三类是整个经济体系内当时参加储蓄和投资的数量；第四类是在有关的固定资本底经济生命的时期内，资本积累（因此也关系利率）的未来发展。

对第一类事实缺乏了解的结果是大家相当熟悉的。这种情况就是在繁荣时期的乐观主义之中对某些工业过分投资的那种

-
- ① 有时人们认为个人主义社会的总的“错误”毕竟是不大的，因为各个人的预期会有一种任意的分配，因而大多数会在效果上趋于抵消。但实际上所常见的事实是，由于各种理由，很多人的错误预期不仅会在某一时间内显著地倾向某一方向，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彼此间的影响。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在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地方，虽然平均的预期达到“正确的”地位，比达到其他(n)个可能地位中某一个的可能性大，可是这种平均的预期达到这个正确地位的可能性将比达到(n)个可能地位中的任何一个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要想没有错误，将是一种巧遇和罕有的事。

竞争趋势。在波动的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往往出现一种常被强调指出的适应需求“最高峰”的趋势，以致在工业中造成厂房和设备的积压，其中有些在绝大部分时期内竟是闲置无用的。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在铁路设备方面的那种混乱的重复状态；公用事业中常见的叠床垒架；新市区零售商店和娱乐场所的那种像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至少是零售商店方面），以致造成特别高的商店歇业率。但是这种情况的另一面——就是导致投资过少的影响——也就是第二类缺乏了解的影响，似乎注意的人比较少，而且对它的重要意义也估计得过低。惟恐竞争者插足夺取投资果实的那种心理，可能发生重要的阻止作用，特别是在牵涉到经久性的厂房设备之中具有高昂的最低限度投资单位的地方。对于这种阻止作用的危险，在新的发明方面是根据专利法给予临时专卖权来补救的。但在任何大规模的投资事业之中也可能存在这种危险；而且这些实例无疑会比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不容易被我们注意到，不像投资过多的结果会使我们非注意不可。这方面似乎还是运输和动力设备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有一个特殊的实例，就是铁路公司曾经表示它不愿将伦敦郊区的铁路设备电气化，因为这种投资存在着一种危险：如果某些其他机构铺设并行的交通路线，像电车或地下铁道等等，那就会降低它的投资价值。^①关于第二种类型的影响，我们大概可以在英国找到一个例子，那就是煤炭综合利用过程中的原始发展状态，这种过程有许多是密切依靠着其他补充的发展的。另一个例子是某种工业不能迁移到一个新的、更

① 参阅邦桑培(Ponsonby)：“伦敦旅客运输问题”，第47—48页。

經濟的地点，因为这种工业的每一个公司都不願因为迁移而失去当地輔助工业或加工业的便捷，而这些輔助工业或加工业在这个工业的其余部分都已經迁移以前，却又不敢冒这种移动的危险。互相观望的結果，是什么事也沒作出来。

但是显然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关于我們第三和第四类型所指的那种对于比較普遍性的事实的缺乏了解，而这种重要性是更少为人看到的。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只是在于它們所指的时间；它們在这里所以被分开，只是因为二者虽然都对当前投资的分配有关，但第二种特別和长时期的投資方式有关。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整个情况的了解对某一个人所作的决定是絕對重要的，因为适于每一情况的成本水平和需求水平就是由当时投資与未来投資决定的总数和它們的性质来决定的。为了举例說明这种关系，讓我們假定，根据以下的預期在某一个工业之中已經作出某些投資的决定：在本年和以后几年之間，新的投資总量和大致接近此数的分配，将会与紧接着的前一段时期的总量和分配情况相同。現在再讓我們假定，由于国民总收入增加而且有一种只把較小一部分的所得用于消費的一般趋势，在本年和以后几年的新投資总量实际上是增加了。这样，就会在有关工业的原有投資决定所根据的数据上发生以下四种主要的变动，而这些原有决定現在(大部分)都已經不能收回：第一，由于消費水平的变动，使得所投資的工业产品的需求很可能会比預期的少；第二，由于投資的增加以及后来其他工业的貨物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降低，又会改变对于这些工业的某些产品的需求(也許增加，也許减少)；由于投資和建設的增加对于一般成本水平的影响，在这个工业里面生产成本很可能会比預期的为高；最后，由

于以上这些变动所造成的总结果，所得的分配也就有了变动，因而对于这个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产品需求，也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动。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一问题，他就会更加明白，在许多讨论中占重要地位的需求波动，原来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老搭档，实际上却是改变了的所得分配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就是在个人主义制度中所不能确定的那种类型的波动或变动所产生的。

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特殊例子，是对于建设行业的一切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直接由投资总量决定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波动的需求，因为这种波动的有规律的运动是由整个工业活动有规律的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而且波动的程度比后者大。由于这些工业无法使生产设备适应需求——表现为重复地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所以对于这种需求的大小不能确定，再加上波动的事实，就使这些工业加重了成本。^①最近有人认为，使钢铁工业的“最有利的经济条件”（如果不确定的情况已经估计进去）比“最有利的技术条件”小得多，而且使钢铁厂的建设不能达到最有效率的规模，这就是一个有力的理由。^②一种经常的并能够预知的投资规则可以避免这些需

① 参阅：“在商品产量上由百分之3到6的变动就可以使代表生产基本设备的需要的较小数字增加到百分之40或60”（约·摩·克拉克：“商业循环的关键因素”，第42页）。弗里胥（R. Frisch）教授曾经指出，扩大对建设商品的需求并不一定造成建设用品制造业的生产过剩。（“政治经济学杂志”，1931年，第646页。也参阅富楼尔[Fowler]：“资本的贬值”，第50—52页）但这个修正只能适用于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投资的增加率是受控制的，因此由于新建而使更换原有设备的需求增加，只照这种需求增加的程度而放慢下来——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是不很可能的一种平衡。

求上的波动和不确定的情况。

初看起来，我們第四类事实，也就是在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动，由社会观点来看，也就是由“社会生产”或集体利益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和前次投資正确与否无关，而只与資本家最后所能得到的利潤有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因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社会主义經濟的投資問題才会与另外一种原則符合，这种原則是与支配資本主义經濟的原則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經濟显然是受这样一种目的支配的：就是用相当高的速度扩大它的基本建設，直到基本設備达到“饱和点”，这就是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不会由于使用体现为“积蓄劳动”的劳动^②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到那时候，所需要进行的只是对原有厂房和設備的使用和維修或替換；到那时候，劳动的当年全部純产量就能归屬于劳动者，作为当年消費之用。^④如果完全的預見是可能的話，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在于把投資計劃规划得能使建設的进展和技术的革新都順着有秩序的发展的順利途徑前进，一直到基本建設饱和点的理想目标为止。事实上，完全的預見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如果不能預見的情况发生，任何包括未来的建設规划就难免要經過种种調整。但是只要它能規

② 參閱：“沒有資本家的不列顛”，第382、390頁。有了一個有計劃的投資方案，那末，建設像（苏联）馬格尼托煉鋼廠和庫茲涅茨廠的規模的工廠就可能是經濟的。

③ 指使用劳动去制造机器，这种机器能提高生产其他商品的生产率。——譯者

④ 当然只要繼續有技术发見，这一点在事实上大概是永远不会达到的；但它會繼續是終能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点可以更精确地解釋如下：在这一点上，由于运用了額外的“积蓄劳动”而获得的額外产品等于由于运用了額外的“当时的劳动”而获得的額外产品。

划出未来若干年的投資方案，它就能在这个範圍以內每年大大地修改“投資方式”，这和資本主义社会比較起来完全不同，因为对于后者，既然不能有这样的确定性，就不会有这样一种的投資方式。

要搞清楚这种投資方式的區別，我們必須了解，从社会主义經濟的观点来看，那种在資本主义經濟制度之下表现为儲蓄和投資的問題已經直接地和有意識地表现为不同生产类型之間（每一种类型和不同点的時間有关）的劳动分配的問題了。所謂与某一点的時間有关这意思就是說，所用的劳动会在这一点的時間上最后增加了消費品的产量。一般地來說，这指的是把劳动分配在馬克思所說的生产消費品的工业和生生产資料的工业之間的那种方式。但在生生产資料的工业里面，将会根据正在建造中的生产資料的時間終点而分为各个等級——不管是在第二年就能完成而且安装起来的新的自动織布机，还是建造一种高炉来生产建筑材料，供应要在十年以后才能全部完成和使用的一种新的动力方案的需要。

各种工业既然有不同的技术“水平”（就是“資本有机构成”的不同），这同时就意味着在某一特定時間上生产消費品的不同工业之間以及为这些工业生产机器和設備的各种工业之間的劳动分配。这整个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决定；如果要使这里面的各要素能够彼此配合，它就必須是一个統一的决定；所謂統一的意思就是这种决定必須同时作出，而且（在它最后的形式上）是由某个单一的主管机构作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了解所有其他同时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后作出个别的决定。如果单独作出这些个别的决定，那末必然是在不完全了解所有其他部分

的情况之下作出的，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彼此都是不一致的（除非出于很少见的巧合），这些矛盾只有靠以后发展中的突然的变动来纠正，而且这种突然的变动很可能就是造成涨落的一种突然的变动。换句话说，国民收入当中储蓄所占的百分比，消费用品和建设用品在生产上的百分比，^①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各项工业之间的平衡以及建设工程在和未来时间有关的不同类型的各项方案之间的分配，都是彼此互相密切依赖的；从逻辑方面说，它们是关于生产上劳动分配的单一决定底各方面。如果不了解今后二年、三年、四年或五年内用来增加产量的额外“积蓄劳动”底生产率，就不可能对当前消费用品的产量以及由于这种产量而造成的实际工资水平作出决定；而且如果不了解在未来三年、五年或十年内究竟消费品总产量是多少以及在那些年内预备完成的许多其他方案究竟有多少会在下年度和下下年度开始进行等等，也就不能适当地决定究竟要不要开始进行预定在那些年内最后完成的建设工程。这些东西之所以不能分开来决定，正如一位家庭主妇在她到市场去的时候，必须等她已经看到市场上时价是什么，而摆在她面前的有哪些可以代替的东西，^②才能决

① 这些百分比与国民收入被消耗和储蓄的百分比当然是不相同的，除非投资（和储蓄）是指包括修理和更新在内的总投资的意思。事实上，这里并不含有这种相等的意思，而只是说，这两类决定在较大程度上是彼此依赖的。

②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所以只要“储蓄”（支配消费水平的决定）和“投资”（关系实际建设工程的决定）这两个方面是分开的，而且每一方面是独立决定的——例如，只用贷款的利率联系着，有些人认为这种情形可以在社会主义之下继续存在——那就不能获得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确，如果这种贷款利率能够不断地加以调节，结果也可能在两类决定之间造成某种暂时的平衡，但是这只能是迟缓的，而且只能作为错误和涨落的事后纠正。例如，如果让每一个工业的经理，根据某种贷款利率，尽量争取他认为能用

定她的家用錢究竟有多少可以用在今天，有多少可以用在明天或下一星期。

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似乎存在着一种有力的趨勢，就是把未來的資本積累對於降低利率的影響估計得過低。如果確是這樣，那末在這種程度上就會在產生當時通行利率的那種工業底計劃中經常有過分投資的趨勢；因此這一類型的計劃只能適用於目前而不能適用於最近的將來，而且因為到了將來的時候，既有更富裕的資本，就有能力可以利用更“先進”類型的設備，^③ 所以有一部分設備就變成過時無用了。而且，由於同樣的理由，也會使一個工業家在繁榮的時候，即使知道市場上的存貨已經過多同時價格也會下跌，還要繼續擴張他的生產；這就是說，由於不能確定這種下跌的精確時間，所以就會產生一種可能

在生產上的資本，他可能在不了解其他地方所發生的情況之下而進行建設計劃，而且只有到後來在他和其他人的行動對於貸款利率發生影響之後，他才會發見自己的錯誤。而且如果社會主義經濟也是採取價格制度和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割裂的決定，那就沒有理由為什麼它不會經過第六章末段所討論的同樣的不穩定現象；這種不穩定的發生特別是由於利潤（因此也可以推知對資本的需求）愈加依靠投資率本身來決定的緣故。本書作者在1939年12月的“經濟學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對於這種想法的理由曾經作了更充分的討論。

- ③ 或者就是奧地利學派所說的“較長期的”或“更迂迴的”生產方法。我這裡所說的只是在技術知識的不變狀態下增加資本積累的影響以及因此而使舊的生產方法歸於無用的影響。由於新的技術發見而引起的報廢，那是另一回事。（附帶提及，新的技術發明，最初會回到“較短期的”方法，而不是“較長期的”方法。參閱阿姆斯特朗：“儲蓄與投資”，第164—166頁）但是即使在新的技術發現的問題上，社會主義經濟，由於具有計劃性的工業研究以及破除了秘密的研究和製法等等原因，無疑地也會更好地預測這些發現，而且由於這個原因也應該預先考慮它們的影響；雖然這些發現將會永遠是發展中的一種不可預見的因素。

的想法，认为他可以最先走进市場，再加上一種認識，以为他自己的任何行动对于今后所发生的情况只能引起无足輕重的影响。

这种想法結果就会产生一种趋势：对于某一特殊类型的資本繼續进行投資以致時間拉得太長太晚，超过了一定界限，在这个界限上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正在成长中或在开創过程中的資本量以及实际所得的未来变动）要求过渡到一种利息收入較低的另一种类型的投資上面。当資本积累正在发展并順着連續的投資类型路綫前进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整个情况以及实际所得与利率的未来变动，就会有一种对每一类型进行过分投資的不断趋势。于是結果就使得工厂和設備的报廢和浪費的速度加快，特別明显的是在从一个投資类型轉到另一类型的技术过渡期間，因而导致发展上的突然的变动，而这种突然的变动又会引起过分的漲落。这就是因为比較陈旧的、預备在未来的某一点時間提供产品的工业类型上有了相对的、过多的投資；而在較新的和利息收入較低的那些工业类型，特别是要在未来更远的一点時間才能提供产品的那些类型上有了相应的、过少的投資的結果。^① 因此，发展的速度就会在時間上不断推迟。但是即使資本主义經濟不一定会有一种低估未来利率下落的頑固傾向（而且即使真是如此，这种情况也会一部分被低估新的技术发现的

① 乍一看来，虽然这种情况似乎会不断地阻滯过渡到較新設備的時間，可是它并不会改变旧設備的报廢率。这些旧設備仍然会留着使用，直到有充分的新設備可以代替为止。但是并不会如此，因为对于旧設備的投資是在过高地估計制成品的未来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到后来沒有預料到的投資量表現为高于預料的工資水平和低于預料的产品价格的时候，大部分的旧設備使用起来就无利可圖了。

后果所抵銷), 这样一种經濟由于对于投資和儲蓄的未来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 它一定还是会不断地在不同方向上作出錯誤的投資决定, 这种錯誤必然会带来各种間断和摆动。無論如何, 社会主义經濟由于本质上看得更远, 所以会根据時間上的不同投資方式把投資分配在不同类型的新建設之間, 这是很清楚的。但不一定是說, 它将在任何技术上屬於同一种类的生产部門內同时投資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建設工程上面(“类型”的意义是根据它与未来时期中某一点時間的关系来确定的, 因此也是根据它成长到最后出产成品时期的生产力来确定的); 但它却意味着, 即使在同一种类的生产部門內, 它也可能使用很多不同类型的設備, 尤其是可能同时使用和建造这些类型的設備, 而且它会更早些和更平均地从一个类型的建造和使用轉入第二个类型的建造和使用。^①

这里发生一个重要的問題, 就是社会主义經濟究竟还是同时投資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計劃方案比較合理呢, 还是先在某一时期內投資在适合当时情况的某一类型的建設方案, 然后再逐漸陸續轉入更新和更复杂的方案比較合理呢? 如果把投資分散到适于最近将来的那种类型的方案和适于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不同情况(不同之点在于生产率和收入比較大)的方案, 究竟是不是适当呢?^② 例如, 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劃时

^① 樓南曾經指出, 如果个人主义的經濟能有同样的預見, 就可以借藉长期和短期利率的适当变动, 使投資作到同样的分配。(“經濟研究評論”, 第2卷, 第1期) 假使利率的差別能按照投資時間的長短作充分的分級, 这自然是对的, 但这个假設包含着一种矛盾, 因为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經濟的性质, 所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程度的預見。樓南是假定有一种預期不能发生影响以及波动不会发生的情况, 來說明預期的影响和波动的原因的。

期，主要类型的货运机车已经改用“E”型的引擎，它的牵引力比战前俄国应用最广的引擎增加75%。在第二个五年计划，“E”型机车的出产……正在由“F. D.”型机车的制造来补充，它的牵引力超过“E”型机车30%。^② 那末，是不是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可以决定一种速度，在这种速度上，用“E”型来代替战前类型的机车，并用“F.D.”型来代替“E”型会比较经济呢？究竟是不是应该先投资在“E”型上，直到它已经代替了战前类型以后再建造“F.D.”型呢？或者还是应该反过来，从一开始就同时建造“E”型与“F. D.”型的机车，甚至当时还有某些战前类型也正在建造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有一个一般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不仅要由有关最近的未来和更远的未来的所得的政策来决定，而且也由这种经济所面临的技术情况来决定。如果由于限制最近将来的消费而引起的损失能被今后若干年内劳动生产率上的增长所抵销而有余，那末，这样来革新技术以便在最短的时期内达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政策是适当的；而在某些技术情况之下，即使是在同一类的工业内同时投资在很多不同类型的方案上，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在需要一种比较渐进的劳动生产率的地方，投资政策就可以在投资类型的选择方面采取一种较为熟悉的按照年次的进程，根据整个情况的发展，连续地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可是，对于未来长时期所计划的不同类型的

② 在1933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分配投资的原则是同时进行具有不同利息收益的基本设备的建设（与在任何一点时间的一致利息收益原则适成对比）。现在我确信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但我仍然相信，这在某些情况之下还是正确的，而这些情况绝不是不重要的或不会发生的。

③ “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计划委员会编，第37页。

投資方式是和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不同类型的投資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认为对于这种投資方式的性质只能規定这样简单的定义：就是它能使过渡到較新方法的时间逐渐不断地进行，在每一种情况之下，都是在旧式設備达到自然生命的終結的时候才替換新型設備，而不致使那些仍然保持良好状态的旧設備造成“波浪式”的报廢——由于这种类型的設備已經生产过多而引起的报廢。应该注意的是，只要在后一情况下旧有設備的贬值是由于拖延了过渡到新类型的投資时期而不是由于过渡得太急促，那末，这种贬值就与技术发展上的普遍推迟有关，而不是与技术发展的加速有关。

作一个简单的比方：讓我們假定有一个人将在五年內继承一笔财产。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事实，他可能今天就开始为他自己盖一所房子，可是等他得到遗产以后，这所房子又变成多余了，因为到那时候，他的富裕就可以使他住进大楼。但是，如果他能預料到很快就可以得到一笔财产，那末，显然他就不会进行住宅的建筑，而很可能先用这笔錢替自己盖一所临时用的廉价的平房作为这五年的居住之用，同时开始替他的大楼立下基础，这样就可以在得到遗产的时候，更快地迁入大楼里去。①

我在別的地方曾經用过所謂追踪曲綫的类比，来举例說明

① 这里他几乎一定是在开始大楼奠基以前就把平房盖成；而且大概在这五年之內，他用在盖平房和大楼的总錢数会少于他可能用在原来打算造房子的錢。这种投資的轉移是他預料未来能有較高的收入的双重結果：他知道他到五年完了的时候，他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会更为舒适，因此对錢的需要不会像今天那样迫切；他又知道，根据这个理由，他要造一所大楼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他目前暫時建造比較低廉和比較不舒适的平房，但在其他方面要比在沒有遗产的情况下用得寬裕一些。

适合两种经济类型的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它可以用来作为一般的说明，表示在每一个时刻通过自动反应的媒介对于一种运动情况的适应，这和根据预见以及合理估计而对同一情况的适应可以成一个对比。假定一只狗是在离开它主人骑车的路线有某些距离的地方。它向着它的主人的方向跑去，而且在自动反应的作用之下，它总是对着当时看到它的主人所在的一点跑去。所以它向主人奔驰的路线是一条曲线，它的精确形式是狗与狗主人的速度的函数以及它由起点所走的路线的角度和距离的函数。但是，如果这只狗能根据预见和计算而行动，能知道它自己和它主人的速度，它就可以照着直线跑到它的主人将要沿着路线最后到达的一点，这样可以更快地赶上它的主人，而且还节省了力气。这个比方当然不能过分严格地来看。我们曾经说过，在某些情况之下，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也许是要在最早的一点时间上，达到资本的饱和点而不管在这个时期之内，对于消费标准的限制；而且在技术或在社会过渡中的某些时期，这可能是暂时适于采用的政策。可是作为一个长时期的政策，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可能而且甚至多半是用能维持目前和未来需要的平衡的最大速度，使消费财货的产量逐年慢慢地但是持续地增加。如果我们画一个实际的基本建设曲线图，用一条轴线表示时期的长短，用另一轴线代表资本总量的生产力或其他类似的数量，那末，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路线仍然是一条曲线，但这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曲线，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必然经过波浪式运动的一种间断的曲线。当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是不会达到这种理想的连续曲线的，一部分是由于计划不完全，一部分是由于不能预见的事件而引起的替换。但它总是有一种

接近这样一条曲线的趋势，这在个人主义经济是不会有的。一辆汽车也可能会达不到按照某些理想的效率标准所应有的速度，在某种情况之下，它甚至会比带跨斗的摩托车慢；但没有疑问，作为一种动力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潜力仍然是不同的。

以上所說的是与資本积累的速度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就是对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这种速度——究竟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速度大还是小或是相同——的原则还没有作出任何假定。显然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这是不同的，那末，不但向着資本饱和点的建设发展曲线的倾斜度，就是不同工业之间的平衡和它们之间的劳动分配也都会有进一步的改变。这里不分青红皂白地企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范畴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似乎已经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常常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没有自由放款的市場，所以就沒有方法可以“发现”“自然的利率”，因此也就沒有一定的标准来决定国民收入用于建设事业投资的正确比例，也没有方法可以保证投资政策会符合社会的“实际儲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資本积累的速度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即所得的分配（因为这种所得的分配决定了投资阶级所得的大小）和这个阶级的习惯的消费标准来决定的。所谓“时间偏好”，或社会未来与现在相比的折扣率，主要就是由这些因素来决定。资本家所得的任何增加，都会促使这种时间偏好的降低或对未来的折扣的降低，因此提高了資本积累的速度；而在相反的一方面，他们习惯的消费标准的提高（就是加强对当前所得的果实的欲望）则会促使这种时间偏好的提高。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市場的“自然判断”甚至比其他方面更能直接反映“外界任意加入的”

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因素底影响。虽然資本积累在进行的时候，由于剩余价值量的扩大而促使新投資的不断増加，可是这种趋势却不断地受到富者的消費标准提高的阻碍，而这种消費标准的提高又似乎是相当紧密地跟随着所得的増加的。因此，私人所有制和私人資本积累在以前似乎是加速資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后来却愈益明显地变成資本发展速度的一种阻碍了。而且像我們在論到危机和帝国主义的时候所說的，資本主义制度对于利潤率的急剧下降自然会产生反抗，不管这些反抗是采用对工資的直接压力，还是采用壟断政策或殖民地擴張的方式。無論如何，明确的阻碍影响显然会对任何接近我們所謂資本飽和点的趋势起着反抗作用。要接近这样一点（这可能会使利率下降到零点），显然会使資本主义社会变成一种荒誕可笑的东西。

如果有人要为社会主义經濟規定足以支配資本积累速度的任何原則，来和上面的情况对比，那么似乎很清楚，如果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話，这个原則的性质就在于对現時和未来都采取同样重視的态度——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資本主义所特有的時間偏好。至少这是不致发生前后不符或矛盾的唯—原則。这会意味着比較資本主义經濟有更高的資本积累速度，而且（特别是在发展的較高阶段）是处在更快地接近資本飽和点的一种发展途徑上。但是我們已經說过，这意思并不一定指目的是要在最早的時間內达到这样的基本建設速度；因为如果邏輯地加以应用，这会包含一种荒謬的情况，就是要把国民收入的100%投資到基本建設上面，把社会的全部劳动力立刻全部用来建造当时最进步的（指具有最大生产力量的）机械器材和设备。这种情况（或者接近这种情况的任何情况）事实上就是重視未来比重視現

在大——重視未来目标而对現在打一个折扣。但它很可能意味着要在最早的时间內达到最高限度的生产率，而同时又能在这些年内提供某些最低限度的所得水平。无论如何，这显然意味着，和我们所熟习的个人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未来会更为重視而且进步得更快。^①

当然可能会发生使这一原則必須加以修正的那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各种理由（特别是由于过去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人民需要的忽視），为了在最近的将来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較緩慢的发展途徑，而不投資到基本設備上，甚至要在更遙远的将来使基本設備的增长慢一些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环境可能使人們在这个原則和要在最短期間使生产力达到更高发展水平的另一个原則之間不得不采取一些折衷的办法。例如，在工业化較低的一种經濟中，过渡时期就很可能这样，因为某种水平的工业化是使社会主义得以順利进行、对私人企业和私人資本家进行清算（就像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的情况）或經受某些复杂和大規模的工业轉变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发展途徑就会更加直接和迅速，而当前投資的进行也就会“分布”到各种类型的建設上面，把这种情况比作一条有理智的狗会順着直綫跑向它的主人的未来地点是很恰当的。

适合这种发展計劃的資源分配决不会是那种必須根据利率——而这是要由市場数据来决定的东西——来估計的分配。关于究竟要用多少社会劳动力投到某一类型的建設工程上面的决定、在各项生产部門之間的最后平衡以及实际工資的水平，都

^① 参閱阿姆斯特朗：“儲蓄与投資”，第21頁以下；兰賽(F.P.Ramsey)在“經濟学杂志”1928年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是同一个决定的几个方面。这个决定的本身就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对于现时所得和未来所得的态度——它们也就是在现时生产和未来生产之间劳动分配的不同方面。当然，在这个决定的各方面之间需要有内在的一贯性。但是使这种决定具体化所必需的数据，主要包括欲望和欲望的扩大满足底某种数量比例、各种类型设备的生产率、这些设备的建造成本和時間以及可資利用的資源。关于这些項目，沒有一种是需要依賴“資本市場”的供应所指示的价值的。^①

我們已經知道，密賽斯教授和他的学派的論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缺乏在竞争市場上所指示的价值，所以除了以十分武断的估計作为在各种用途之間分配生产資源的基础以外，是沒有力量作出任何正确的估計的。既然缺乏对于价值的任何估价，也就不会有对于成本的任何量度。韦勃夫妇所夸張的“量度和計算”以及列宁所要求的严格的“经济會計”，都不会有数量的根据。因此，对于两种对崎的生产方法就不可能說出哪一种更为经济，因为不可能根据它們的价值生产率作出任何成本的比

① 例如，修伯特（Hubbard）在評論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时候，說道：“政府不能用科学的精确性來說明，究竟一吨小麦……是在国内消費有利还是出口换取外国貨物有利”（“苏联貨幣和金融”，第289頁）。但是沒有自由市場能对这个問題提供任何“科学的”答案。国家輸出小麦来购买拖拉机，以便在下年度生产更多的小麦。国家显然需要知道，这种拖拉机在将来所生产的小麦，是否大于一部拖拉机的小麦价格。但究竟这笔交易是否有利，完全要看国家本身对于目前的損失与未来利益的估价，可以推想得到，决定进行这笔交易的本身就是这种估价的表现（除非这种决定完全是違反理性的）。的确，如果所作的選擇是在小麦出口和茶叶进口之間，則小麦与茶叶的相对市場价格（只須国内价格就够了）就可以成为它們的相对重要性的某些指标，但并不一定是最后的或是“科学的”标准。

較。鑒于放任主義自由市場的各种價值所具有的極端武斷性，這種說法即使合于事實，可是如果用來攻擊社會主義經濟，說它不如資本主義經濟合理就沒有什麼力量了。但是這種說法的滋長似乎只是出于誤解。當然，為了對於經濟數量作出比較，要把性質不同的貨物的區別化為數目項目這是對的。換句話說，要比較皮靴和麵包，或絲和薩克管就必須給它們規定一些數量并把它們相對的重要性用數量表示出來。但是第一層，為了要做到這一點，不管怎樣決定的任何優先等級表都可以達到目的，那就是說都可以作出量的計算。這樣一種優先等級表可以用各種方式構成，其中若干種所得出的結果可以比放任主義世界的市場價值等級表的“自發的”結構所表現的更不武斷。它可以採取權威的方式，正如醫生為病人開出的膳食單一一樣；或者可以根據問題表征詢意見^①；也可以根據合作社所供給的資料；或者把這些方法合并起來使用。這些方法可以安排得只要是群眾愛好的意見，都可以充分表達出來；雖然如果單是依靠這些方法確實有一種使決定過於官僚主義化的嚴重危險，而且用問題表征詢的方法也不易產生高度精確性或精密性的結果。但是第二層，沒有理由可以假定，能表明消費者的愛好的消費者自由市場，除了在例外的過渡時期或嚴重的缺貨時期以外，就不能在社會主義經濟之下存在。的確，馬克思曾經說過，在“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階段，所得的分配，將採取“按需分配”的方式，而不必通過價格制度的干預。但是他又謹慎地說，這個階段并

① 蘇聯服裝和木器工業托拉斯所用的一種方法，特別是關於新的設計式樣，就是舉行模型展覽，要求參觀的人寫下他們的意見；究竟在各種展覽品之間，他們所愛好的次序是什麼。

不能向天上祈禱得來，它將根據“生產力的統治力”足以克服貧乏問題的程度而向前發展。“公平合理決不能超越社會的經濟條件以及受這些條件所支配的文化發展”。但是在他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第一或低級階段”上，貨幣工資將要根據所做工作的質量和數量按比例支付，而由這裡所作的邏輯推論自然會有一個消費這種貨幣所得的消費者的自由市場。^①

可是又有人斷定，單是有了消費者市場，來規定消費財貨的市價還是不夠的。如果沒有中間財貨和生產要素的市場，消費財貨的價值就不能確定，因而就沒有表示成本的基础。^②但是這種論點又似乎是由于誤解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性質而產生的。在個人主義經濟中，市場規律通過價格運動（包括企業家所購買的生產要素和中間貨物的價格運動）的壓力，強使每一個自主的企業家符合整個情況的需要。如果後者不經過競爭定價的過程，企業家就沒有辦法“一致看齊”，也不能使“成本原理”發生作用。但是這裡的成本運動也不過是在適于由無數分散個體作出生產決定的情況下的一種居間工具而已。它是更基本的物資分配問題所賴以解決的一種媒介物。對於在個人主義經濟中的企業家來說，它必然表現為成本問題。對於研究整個情況的人來說，它則表現為一個物資的分配問題，因此也是在不同用途之間的相對生產率的問題。而在計劃經濟之下，這就是基本上成為問題的東西。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了一定數量的可用物資和成品的相對價值以後，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就是這些物資在應用到各項

① 參閱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② 參閱哈爾姆教授(G. Halm)：“集體主義經濟計劃”，第150—151頁；密賽斯：“集體主義經濟計劃”，第119頁。

用途上的时候的实际生产率；而且这是一些属于技术性质的具体资料，并不需要市场的干预来发现或反映。这并不是先找出究竟成本是多少，然后再和相对的生产率比较，来解决分配的问题。只有根据这些有关的相对生产率的数据，才能正确地决定“成本”；而且当这些数据已经有了以后，物资的分配问题事实上就算解决了。的确，在个人主义经济中，有了市场，例如资本市场，就可以用价格形式使这些数据一般化，而且通过这种价格的媒介，就可以使物资“自动地”分配在各企业家之间。在这样一种经济里面，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工具。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各工厂经理既已确定了关于生产率的必要数据之后，还必须再应用这些数据到市场上去玩那套争取资本的复杂游戏，而不把数据直接转报给某些计划主管当局，那是卡通画家鲁宾逊(Heath Robinson)^①式的作法，很难使人认真地来看待。而且玩弄这样一种游戏，还有一种绝对的害处，那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对于在其他地方同时作出的决定，还是和今天的私人企业家一样地“茫无所知”，因而必然会碰到同样程度的竞争的不确定性。

只要能使相对生产率的数据一般化，并把任何用到各个部分的一般性决定分层下放，那末计划当局关于这种物资分配的决定也并不一定会特别地复杂，例如，在计划当局面前大概会有这样一些数据：如果再对纺织工业增拨 x 镑资本，就会使它的生产计划增加 y 码布，而增拨 x 镑资本给皮鞋工业，就会使它的生产计划增加 z 双皮鞋，其余类推。也许对于最后决定所必需的

^① 鲁宾逊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杂志卡通画家。他擅长用非常复杂而细致的手法来表现简单的动作。这里用来比喻一种画蛇添足的作法。——译者

数据还要比这个复杂一些，这就是可能还要一种数据，如果同时能得到数量如 z 的额外劳动，那末，纺织工业的 x 镑资本便能生产 y 码布，但如果不能得到额外劳动，那就只能生产 $y-n$ 码布；或者这也許是在这个工业之中几种可以采用的建设类型之间的选择问题，其中一种类型要配给 A 种原料 x_1 吨，另一类型要配给 B 种原料 x_2 吨，又一种类型要配给 C 种原料 x_3 吨。但如果这几种对比的建设方法的相对生产率能够加以估计，那末这个计划机关要想用这种估计和 A、B、C 三种材料的可能采用的用途的数据作一比较，然后根据下列原则选择其中的一种，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分配每种原料的用途的时候，凡是能够发挥它的最大的纯生产率的就优先予以采用。至于这种工业中的每一个工厂的详细资料，那可能是纺织工业所应该了解的东西；而配给它的物资，究竟怎样在这种工业中的各工厂或各部分来分配最好，也就应该由这个工业本身去决定。可以料想得到，关于这个工业中的资本生产率的最初的一般化说明就是根据这些详细数据作出的，但是各个部分的详细数字不一定要去麻烦更高级的计划当局。换句话说，只有大批的配给才需要由中央机构决定；至于这些大批配给的详细分配，那就可以下放到掌握详细资料的基层机构。应该注意的是，高级计划机构并没有必要把在各种可能情况之下每一个可以想像得到的组合之中的相对生产率的数据，——也就是哈耶克和罗宾斯两教授这样蔑视地称作“千千万万的平衡公式”——放在它的面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期，问题的发生总是以一种运动的形式由原来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而人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在接近这种开始情况的前后相对生产率的变动；这些也就是在任何制度之下所能知道的一切。

計劃當局不會比今天私人企業家更需要知道每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資源組合底生產率，來決定究竟要不要把物資從一種用途轉移到另一種用途。

所以在資源（包括勞動力）分配的每一細節都是有計劃的那種經濟中，以會計為目的的成本計算方法，似乎已經沒有什麼重要性了。要決定究竟各項資源是否在別的地方可以運用得比原來的地方更好，人們所需要知道的就是這些資源在這裡和別的地方的相對生產率。要比較效率差的管理與效率高的管理，他只需知道配給這些工廠的資源數量和產品數量，並把所得的結果與某些類似的工廠作一比較，或者把產品和過去經驗或原有估計加以比較。為了便利這種比較，這些比例無疑地是要用貨幣的形式來表示的；但是只要各種東西換算成貨幣的制度是劃一的，那末可以假定，任何換算制度都可以使類似的東西互相比較。當然，事實上要把資源的每一項目都按一個統一的計劃進行配給，那是相當麻煩而且不必要的。按統一計劃配給基本設備、基本原料和動力資源，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來說無疑是重要的；但是關於次要的必需品的購買和使用，那就可以讓工業經理自己去決定。大概勞動的使用也會屬於後一種範疇（但要受某些條件的限制）。只要各企業是用“計劃以外”（例如一個工廠自己主動地直接和農場或另一個工廠訂立合同）的分權方式取得這些東西，這些貨物的“定價”問題就會又成為決定它的使用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正如同它也會成為以後計算這些活動是否有效率的基礎一樣。但是在這些情況之下，如果這種辦法是普遍的，那末，對於這些貨物的某種形式的競爭市場在事實上也會存在。

所以根据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工資（包括維修設備的工資成本）來計算貨物的貨幣成本，實際上無疑地會在社會主義會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常有人認為，如果由稀少而經久的生產要素而產生的地租或利息不包括在計算之內，這还是很不完全的。但是根據大家所熟悉的經濟原理，一旦這些經久的物資（例如建築或設備）已經指撥並確定以後——像我們所假定的，它們是會通過以可比生產率的估計為根據的有計劃的決定，而不是通過“利率的考驗”來指撥的——那末，為它們計算的“經常費用”就與它們現時的使用沒有關係了；而且只有產量能達到產品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一點的時候，也惟有達到這一點的時候，才能滿足最高限度的生產率的要求。即使對於那些由某種市場關係的形式來決定分配用途的而且不包括在計劃之內的东西，像原料一類的流動生產資料，如果它們的價格在任何生產階段都是等於邊際勞動成本，那就足以滿足最大的生產率的要求。的確，試圖把像“經常費用”這樣一種項目包括在預算裏面的作法，常常會妨礙工廠和設備的最經濟的使用，因而限制了对它們的加強利用。這是浪費性限制的一種形式，在今天它所具有的規模無疑地是不能算小的。^①

① 參閱本書作者著的“俄國經濟發展史”，第176—180頁。關於蘇維埃經濟的“計劃成本”和“會計價格”要想有一個啟發性的敘述，可以參閱雷達偉（W.B. Reddaway）著的“蘇聯財政制度”。這是所用的“經常費用”這一名詞必然是不很嚴格的。按照所說的原則，在任一個短時期的情況之下，除了單純的利息和地租以外，許多其他項目也不應該考慮進去。例如，在一半空着的火車裏面載運額外的旅客，這時甚至司機和火夫的工資也沒有包括在所收的車費裏面；或者一個旅館裏面還有空餘的房間，而對於傍晚來定這些房間的旅客，只收洗被單的費用。所以這一原則的充分和邏輯的應用很難與價格制度相符合，至少是不能與任何統一而穩定的價格制度相

消費者市場的存在給自由消費者提供了一個選擇的範圍，並為這種選擇提供了影響生產的一種方法，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經濟就一定承認這種選擇具有無條件的統治。雖然消費者的市場可能提供最最重要的一種基礎來確定各種貨物之間的相對價值——確定它們在對滿足人類欲望方面相對的社會重

符合。可是由上面所引的例子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只要能用這樣低的车價招徠旅客乘車，甚至就是不夠支付司機和火夫的工資，這列火車也應該整年地繼續開行下去。在工廠里的類似的實例就是辦公室職員的薪金和輔助工人的工資；就某一批產品來說，這些大概可以當作“經常費用”。所以要劃定任何一條分界線就必然是武斷的分界線。而且如果要定出一條一般的規則，最滿意的折衷方式似乎就是上面所提出的，把工資和薪水包括在成本的估計之內，而不包括地租和利息。

端爾平曾經提出過工廠和設備的維修問題（“經濟學雜誌”，1936年12月）。的確，這個問題包含有會計上的特殊困難。但我不相信，這會構成他所認為的關鍵性的問題。照他的說法，這個問題就是不能把維修費用從這一批產品的可變成本中分離出來。如果不能，那末正當的途徑似乎就是把它和其他半經常費用一起（如輔助工人的工資）估計在邊際成本中，而把折舊從利息費用內分離出來。如果產品的售價包括這些維修費用，那末就可以假定這種設備是值得維修的。他所說的認為這將妨礙工廠改變為規模較小、花錢較少的工廠，以致結果造成廠子很大但出產很少的那種情況，我覺得不會太多，因為任何大規模和持久性設備的改建是可以和當時的可變成本區別開來的，而且作出關於這種改變的決定，其方式會和作出關於新投資的決定是一樣的。無論如何，這種不嚴重的浪費多半要比今天各公司在一種不完全的市場里面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資本收益而受到的限制要小得多。這一點我想端爾平先生是充分承認的。但我想這也會證明，由於要使價格包括端爾平先生的“正常利潤”而使設備的利用受到不應有的限制，因而造成的浪費，和這種情形比起來，前者的浪費要小得多。

應該注意，在決定工廠和設備的利用強度時只計算邊際成本的問題，不僅對一個只具有單一工廠的生產部門適用（例如霍爾[R. L. Hall]在他著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一書中就有這種含義），而且也對任何情況適用，只要這些設備的供給並不完全和當時的需求相適應，這在需求經常變動和漲落的世界裏只會成為慣例而不會是例外。

要性的等級表——这并不是說它不会被其他标准所改变，甚至經常地被拋棄掉。^① 在产生新的欲望以及发展新的貨物品种和质量的情况之下，除了在它們已經被創造出来以后，市場并不能提供直接的指导；而这里必然就会受权威主义的統治。通过市場所表現的消費者的选择，必然而且永远是限于可供选择的商品范围以內的选择，除非在市場制度之外，有一种特別的方法，使消費者在这个問題上能表示一些主动的意見，那末，这种主动必然首先来自生产者这方面，因为事实上今天这种特別方法并不存在。^② 市場的事后判断，在这个問題上也不是有决定性的；而且市場的沒有决定性还引起一个更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可供选择的商品。商品投入了市場，被消費者购买以后，又能抵偿它在生产上的費用，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种商品就是消費者所喜爱的商品，因此社会資源應該用在生产这些商品上面。他們也会买这种商品，就像消費者购买劣质牛乳、或馬馬虎虎烹調的飯菜，或偷工减料的房屋一样，只是因为沒有別的东西可买的緣故。假定有A、B、C三种可以选择的商品投入市場，如果拿来測驗消費者的話，他們也許最喜欢C。但既然主动权在生产者而他們只供給了A，所以消費者只能把錢用在A上面，从而使它有了

① 哈耶克教授曾經把本书作者說成是要完全取消消費者的选择，而代以軍隊配給的制度（“集体主义經濟計劃”，第215頁），因为我认为：（1）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消費者的选择并不自由；（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表現在零售市場上的个人貨幣需求的趋向并不一定是对生产的最好的向导，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向导。哈耶克教授的解釋似乎不很合理，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解釋。

② 參閱郝特雷：“他們的选择常常是完全限于待售的东西，而在这些待售的东西中間，又限于那些可以通过市場获得消息的东西”（“經濟問題”，第203頁）。

商业上的成功纪录，这是因为消费者没有方法表示他们对C的更大爱好的缘故。同消费者想作的选择（如果可以获得所需要的选择品的話）来比較，市場上所纪录的大多数的被选择的物品很可能事实上就是次一级的爱好品。

但是除了新欲望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表明消费者从个人主义观点通过市場所表示的选择并不能使人相信它是社会效用的适当标准。第一，在个人的选择里面，显然有他的不可避免的近视性，因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他必然只能在空间和时间的有限角度上，去观察他可能获得的选择品的范围。这种时间上的限制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而且认为是个人对于未来的“望远机能”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于一个理想上合乎理性的人来说大概是不会有。①但是这种视力上的缺陷似乎可以同样应用到空间上的遥远机会，正如同它可以应用到时间上的遥远机会一样；既然每一个消费者在眼前可以选择的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东西——接近他的目力所及并且刺激着他的感官，或者至少能因为它们近在眼前而产生一种就遥远的选择品底想像来说是很难产生的确实性——那末，个人的爱好势必被某种程度的近视性和无理性所损害。的确，正是这种事实才使售货员可以这样方便地利用来在他强使消费者注意到的目的物上制造一种偏好。也就是这种事实才使内行的人或团体在购买的时候能有代作选择的机会，而个人后来会承认这种选择比自己所能作出的选择好，例如，俱乐部或飯店所准备的菜单能比个人自己出主意选择的東西更令人滿意。在这种程度上，集体选择显

① 参閱庇古：“福利经济学”，第24—67頁。

然就有用某种形式改变个人所表示的消费者的选择的余地。

第二，照市場上无数分散个体所表明的，有一大类的东西，消费者在取得这些东西的时候，个人利益就与社会或集体的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至少发生分歧）。这包括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就不能不同时使别人得到好处的东西，^① 因此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好处就无法分开估计。这一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种连续性的服务而不是个别的商品，其中有許多即使在个人主义经济中一般也都承认是属于集体供应的范围，并且是根据市場原理以外的原理的，例如卫生、教育、研究、街道维修和照明、防火和防止犯罪等等。但这一范畴并不限于这些服务，也很可能包括許多通常是市場銷售对象的商品，它們的供給也是受个人主义的需求支配的，例如，屋主的购置灭火器是为了防止他自己房屋的火災，但也可以使他的邻居的房屋免遭火災；还有汽車的灭音器；又如某些房子的外表能改善或損害其他市民的环境。而且可以适用于卫生或教育等服务业务的也很可能适用于某种商品的供給，例如人民群众的主要必需品或具有教育或相反意义的奢侈品。列入这一范畴的其他例子还有一些东西，当这些东西的供給量增加的时候，成本就随之降低，这或者因为还有不可分割的巨大設備单位尚未充分利用，或者因为大規模的生产而导致了经济上的专业化。^② 在这些情况之下——而这些情况是

① 自然这种好处不仅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

② 严格地说，这个論点不一定对所有这些实例都适用，而只对那些在产量扩大而成本随着降低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实例适用。如果一切生产部門都要在同样的和連續的程度上受降低成本的影响，那末任何一个部門的扩大都不会有社会利益可言，因为这样做，只会从其他生产部門把劳动和資源移轉过来，以致后者所提高的成本等于前者所减少的成本。

既多而又普遍——一个人的购买增加就等于附带地把利益分給別人，使他們获得更廉价的供应（例如，交通設備、电灯或动力的使用，或者反过来像道路或疗养胜地的使用，每增加一个使用者都会由于拥挤而增加別人的費用）。

如果我們詳細分析这些情况，并且加上那些类似的情况——就是个人要获得某一个物品的欲望大部分都是由于习惯的关系，同时要看別人是否也想获得这个东西——那末，这些情况就会比通常所想像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可能包括消費者的大部分支出。但是在这个总的情况里面，有两个特别的例子具有广泛的重要性，由于它們常常为人所忽視，所以似乎值得詳加討論。这就是需要商品品种多而且常常变换，在这两方面，分別在市場上所纪录的个人利益是容易和消費者的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在变换的需求方面，由于无从确定可以指望什么需求水平，因而不能用最經濟的方式使供給和生产設備与之适应，这种变换势必使生产者增加了額外成本。同样，消費者喜欢品种多，这就使得商品生产比标准化的生产成本高，因为要由許多部門和許多类型的設備而不是几个部門和几个类型的設備来生产这些东西。每一个消費者在表明他对某一个新品种的需求的时候，他只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他爱好某一品种甚于另一品种，这种爱好的程度是否等于新品种和旧品种在价格上的差別。他不会这样考虑：他的行动由于阻碍了生产标准化达到它可能达到的程度，他就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也为別人提高了这种或其他种生产的一般成本。同样，如果变换能給他任何好处（只要各种不同品种的价格相同），他还会随时改变他的需求，从这一品种改为另一品种。他不会把这种利益来和那种由于他改变主意而为整个工业带来

的額外成本——这种額外成本最后会影响他自己和别人——加以衡量比較。由于这个理由，个人主义消費者市場似乎比集体利益所要求的偏于更多的变换和更多的品种。当然，这并不是說，集体的干預会廢除或應該廢除各种变换或不同品种；这只是說，如果要把它們限制在消費者的真实利益所要求的范圍以內，集体就必須比市場的評决具有更高的权威。

似乎沒有疑問，效用学說影响了經濟学家对于整个問題的研究方向，造成它在事实上已經造成的那种假定，认为需求的根源是在最后所得到的滿足，而自由市場的价值就是这种滿足的最“圓滿的”表現。結果就是使“适应需求”的問題在我們思想上具有一种远远大于它所应有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任何形式的市場制度之下，要使供給能对不同消費品所产生的福利性质作調整，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粗略的近似法，因此給我們一种启示，倒不如牺牲一些这种細致的調整，使供給一般地能增加得更快，这反而会比应用各种方法使任何产品都能對市場上所表現的任何需求作細致的調整，以致妨碍了供給的一般的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并不是說，細致的調整是沒有某些重要性的，而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像在战壕中罐頭牛肉的連續供应的情况）是有很大的重要性的。这只是說，它的数量的重要性也許是过分夸大了。使人們有各种不同品种的商品可以从中選擇，并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作各种選擇，这确实是重要的；而且有某几大类的商品，使消費者的消費能有某些一定的比例，例如，肉类对于蔬菜和粮食的比例；房間、家具和娱乐对于食物的比例，这也都是重要的。如果这些比例受到严重的破坏，人們就会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說，如果这些大类之中的

不同項目或品種——其中大部分都是彼此相近的代用品——不照最初的愛好精確地供給數量，那末消費者就會受到重大的損害。可是當經濟學家說到適應需求問題的複雜性的時候，他們常常是指主要幾組消費品以內的這些細致的適應。如果一般肉類缺乏，或者如果每天只能吃到豬肉，雖然我也一定會表示不滿，可是如果我的管家婦對我供應豬肉的次數比我自己點菜時可能選擇的次數多，而供應牛羊肉的次數比較少，那我就很難提出意見。也許這是因為我知道重視她的經濟的選擇比我高明，但無論如何，我決不會認為由於她的配給和我的理想選擇有分歧，就認為我的福利已經大為減少。換句話說，在需求缺乏彈性的情況之下，不能按所希望的比例得到滿足，那會是一個重要的失敗。但在事實上對於這些必需品或廣泛類型的貨物的需求是最容易計算的，而且一般說來不僅缺乏彈性而且還相當穩定，所以根據經驗就可以很快地調整它們的供給。另一方面對於奢侈品和在每大类消費品中的許多不同品種，要估計它們的需求和需求的變動雖然一般都認為是比較困難的問題，但是正是這些東西才具有彈性的需求的特徵，所以如果供給量的調整使消費者一種東西得的太多，而另一種東西又得的太少，那末所引起的損失是比較小的。因此在供給對於偏好的適應比較重要的地方，也就是這種適應比較容易的地方，而在這種適應較為困難的地方，也正是它的重要性比較小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結論似乎是：支配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在主要各點上與支配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有所不同，理由是，根據假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負責作出主要決定的、人所不知道的或不能知道的因素，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却是可能知道的；而在資本主義

經濟中表現為因變數，因此也表現為一定數據所決定的行動和事件的那一部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卻變成受控制的和受有意識的決定的東西，並且由於這個理由也列入決定這個問題的數據之中。那末，這是不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就沒有可以假定的經濟規律呢？是不是說那里的事物都會出於武斷的決定，而且任何能夠想像的東西都會出現呢？這是否意味着單靠預期就可以作出顯然不可能的事情來呢？顯然這是不會有的事情。當恩格斯說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的過渡是從“必然的王國過渡到自由的王國”時，顯然他並不把它看作是無限制的自由選擇底永久王國。可以假定，他的意思是說，在前一個王國內，個人的意志是盲目的，而人們就是市場客觀規律的無意識的代理人；而在後一個王國內，人由於集體地掌握着自己命運的工具，他就會意識到束縛着他的規律，因此就會自覺地使他的行動與目的相適應。

那末，這種限制着經濟事物的規律的，而且認識它們以後又可以對事物更完全地加以控制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顯然，這不能用演繹的方法而只能用類比的方法來答復。可是這種方法因為過分一般化和抽象，所以用處非常有限。這些規律的最具體的形式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只能由計劃經濟的實際問題中以及由這些問題所提供的經驗底分類和分析中引伸出來。但是我們總可以說出一些關於這些規律所具有的一般輪廓，並且根據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要素的認識，還可以說明其中必然包含着的某些關係。在個人主義經濟制度下，經濟規律的表述形式是：有了自然和技術的某些條件以及消費者的某些喜好，作為生產者的人就會依某種方式來行動，而這種行動就表現在一

定价值关系上面。在社会主义經濟制度下，它們的表述形式却是这样：有了一定目的以后，由于各种物质对象之間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以及这些物质对象与人类組織之間所存在的关系的性质，用确定的、可以估計的行动方針就会达到这个目的。虽然我們所知道的政治經濟学是要假定人类行动的确定的、可以估計的方式（有了关于这种情况的一定数据以后），但是社会主义經濟中的規律，可以推想得到，是关于人所掌握的物质資料的活动方式，因为决定人的力量与（有了一定目的）人的行动的就是这些物质資料。我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們才可以說，控制經濟活动的决定性关系主要是屬於技术性质的。

初看起来，好像剛才所表明的那种区别是屬於形式而不是屬於实质的；而且先假定了目的，然后再去找产生这种目的的物质情况，簡直就是倒轉了先研究情况然后再演繹出各种物质情况所产生的結果的那种程序。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这是对的；而且有一点确定是重要的，就是應該記住，當我們說到“目的”的时候，不能把它意識为某些可以任意假定的东西，而只能看作这种“目的”的本身也要被它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情况所限制和选定。但是如果只以这样一种了解为限，那就会否认人类行为和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这种情况的組成部分，也就是否认它們对事物有任何独立的影响。实际上，我們所讲到的規律的两种說明的次序，不是一个單純的形式問題；如果說它們是相同的，那就会忽略它們在說明上的次序的不同意味着事实上的真正差別；这就是說，社会主义經濟中的某些新的关系，因此也就是某些新的可能性，将要以一种新型的社会組織的形态出現。这种說明先从目的开始，然后进一步假定适合这种情况的行动，正是这

个事实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使集体目的有了新的意义。这样一种差别，也许可以比作两种行程的计算问题：一种是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只被委弃的破旧船壳的行程计算问题；另一种是配备着船长和船员正在行驶中的一只帆船的行程计算问题。在前一个例子之中，如果有了关于风和水流的数据，它的行程是一定的。即使有遭难的人在这个船壳上，意志或目的的任何概念也都不发生关系。在后一个例子里，关于风和水流的数据仍然是重要的，但目的和它所用的仪表却不再是没有关系了。然而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有了一定的数据，很多目的仍然是不可达到的，还有其他的目的也会由于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被放弃。^① 但是以这种方式而成为一个有关因素的目的，是由人与自然要素之间所存在的新的关系以及新事件的出现的可能性（例如“转篷”逆风航行的可能性）来决定的；而且一方面既然有了一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已经知道风和海的性质，再有了船和帆的一定类型，那末就可以算出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那个目的的确定的行动方针。这样就会有一种航海科学，这种科学不仅是风和潮水的规律而已。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计划是一种表示目的的方案呢，还是单纯的一种科学的预测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它兼有这两种性质。人们常常忘记，计划所根据的那种预测必须在它的数据里包括一种事实，即计划本身也将会成为决定以某种形式出现的一系列事物的一个影响。

① 当然，如果把目标规定得充分精确，例如在一定日期的一定钟点到达某一个港口，不迟也不早，那末在任何情况之下，至多也只能达到一个目标，而且能达到的情况既经给定，行动和目标也就可以确定地计算出来。

也許有人會說，這一類的規律不應該屬於經濟學的范围，而應該屬於技術的范围。似乎沒有很好的理由來支持這個觀點。顯然有一類問題是不能和一般所認為的技術問題等同起來的，這一類問題的最适宜的稱稱，也許可以說是經濟統計學。現在已經有不少關於某些問題的研究可以作為這種更完全的科學的一種雛型。我所指的就是關於營養和家庭預算、人口以及生產能力的研究，這些研究已經日趨重要並且已經從純粹敘述的階段走到建立初步概括的階段，足以成為一種未來科學的萌芽。可以料想得到，社會主義經濟不僅需要而且大大地促進了這些研究的開展，研究的方向就是搜集和綜合規劃的數據，找出在一定情況下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制定原則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什麼是能夠做到的、什麼是不能做到的，以及在一定情況下必須有什麼樣的行動方式才能產生一定的結果。如果經濟規律是指對於某種情況的動態所作的概括，那末它們就會從有關這些情況本身的具体研究方面發展起來。關於如何計劃的知識，會由實際計劃的系統經驗里面發展起來，而不可能從其他途徑發展起來。想推測這些規律可能是什麼，或者想一知半解地和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情况作類比，根據這些類比武斷地制訂規律，那就不但不會產生什麼結果反而會引起誤解。

如果要問，我們所知道的作為一種價值學說的政治經濟學究竟起着什麼作用，我的答复是，它的作用可能很小或者根本沒有，而且無論如何也是在急劇地下降之中。這裡，在正面的說明上，武斷的說法固然是不明智的，就是在反面的說明上，武斷的說法也是不明智的。但在這本書的前面某些部分，有一個主要的論點，就是傳統的价值學說是企圖用因果決定論的方式描繪個人

主义經濟的行为，而且要依靠对于个人主义制度的某些特殊数据所作的假設來說明这个学說。它叙述了从某一情况所产生的“必要”关系，这些关系是作为市場上許多独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自动”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有意識地計劃出来的。价值学說是作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学說而产生出来的；虽然后来曾經加以修正，以便留有补充壟断成分的余地，但它所提出的决定性的說明的正确性还是要看这种經濟制度内部是否存在着相当大的竞争范围（指分散和独立的决定）。^① 但是社会主义經濟的实质在于支配投資和生产的主要决定都是互相配合的、統一的，而不再分散在許多独立自主的个人之間。固然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仍可能有竞争的場所：一方面消費者在零售市場上可以自由购买，另一方面工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又受到工資差别的刺激。但是显著的差别在于这些竞争的場所都是在作出主要决定——关于这个經濟制度的最重要的問題——的机构以外：这些主要决定，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表现为企业家的决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則为經濟計劃的組成部分。我們有时候忘記了所有关于价值規律的最重要的假設都和企业家的行动方式有关——像租稅或成本轉移和需求轉移一类的一定的变动对他們的行动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們的作为生产調节者的行动以及他們的行动对于各生产要素的份額的影响，一直就是大家注意的中心。正是在这方面，价值学說不可能告訴我們关于社会主义經濟的任何最

① 即使在罗宾逊夫人所假定的“壟断世界”內，也还是有各种工业的壟断者之間的竞争（“不完全竞争的經濟学”，第309頁）。照爱奇华斯（Edgeworth）的意見，即使在竞争的壟断者的数目很少的情况之下，这些数据也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參閱：“論文集”，第1卷，第136—138頁）。

重要的东西，即使关于计划机构在那里发生作用的环境还有某些可以讨论的东西。如果有人假定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所有企业家的决定都已经熔合成一个，而所有生产也已经被一个巨大的垄断者所控制（尤其是如果假定它也是一切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所有者），那末，这个怪物除了尽量从我们全体榨去产品而只付最低的报酬，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分别按我们的嗜好和厌恶的变换、我们的所得和体格的不同，来进行交易作为达到上述目标的最好方法以外，是否今天这种经济学还会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①

我在这里所谈的价值学说并不是仅仅作为人类选择的代数学，或作为所有理性行动的一种类型。这个学说所能说明的东西，似乎在任何形式的社会里都是很少的；而且它所能有的预测能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同在今天一样小，如果不是更小的话。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学家所用的某些工具（如弹性和生产函数等），仍会作为概括底结构的一部分而加以利用。这种工具在性质上是形式的，是由数学那里借用来的而不是经济事物特意创造出来的。真正构成规律的而且决定这一规律与另一规律的差别的，不在这种结构而在于它的实际内容。也不一定要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任何关系都能用简单的演绎和类比作出假定。我想有些关系也许已经能够加以叙述。我想要说的只是，这些假定还不过是初步的概述，只能作为今后研究的引论。它们只能

① 罗宾逊夫人作出结论说，如果在她的“垄断世界”里各垄断者形成了一个共同纲领或主张，“那末，垄断者的权力就太大了，只有引起革命的恐惧才会使他们抑制这些权力的应用，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可能作精确分析的”（“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第326页）。

在我們据以確定問題的不同範疇之間確定一致性的條件。這些假定作為預測整個制度的活動方式還是不夠的。假定一致性的條件只是意味著這個制度的各部分是互相依存的，而且這種相互的依存含有特殊的特徵。即使這樣，這一類的說明也必須看作是嘗試性的，因為進一步的認識可能會使我們發現，原來用以確定這種情況的範疇是不實在的或不完全的。

這些假定的第一種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就是製成的消費品的總的貨幣價值必須等於在某一時期內的總的貨幣所得（假定工資是個人貨幣所得的唯一形式，而且個人所得之中沒有一部分是自願儲存起來的）。如果這種相等沒有成立，那末，消費者的市場必然會在一種情況之下積累起未售出的存貨，或者在另一種情況之下會受某種配給形式的限制，以致強迫沒有用去的所得餘額變成積累。這可以用下面的式子來表示：

$$x = I - G,$$

在這裏面， G 代表消費品的價值， I 代表總的工資所得，而 x 如果是正的，它將代表積累起來而未用去的所得餘額，如果是負的，它將代表未售出的存貨的積累。由此可以推知，在 $I = G$ 時，如果各人自願地決定儲存一部分所得（用 $\frac{y}{I}$ 代表，例如儲蓄銀行存款的增加數），那末，或者 G 的一部分將成為未售出的存貨的積累，或者貨物的價格必然會減去一個等於 $\frac{y}{G}$ ($= \frac{y}{I}$) 的平均數。

如果仍然保持原來的假定，就是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工資（包括運輸、管理、分配）是個人貨幣所得的唯一形式，那就可以看到， I 將是全部勞動力 (L) 數量的一個簡單函數，也就是工資水平 (w)（不論是根據計件工資還是計時工資）以及每一個一

般工人(我們写作 k)在每一单位時間內的工作量的函数。如果勞力的一部分 ϕ , 用于新的建設工程, 或用于增加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的存貨, 那末結果是, 一般的工业在将当时产品中所付出的工資和当时設備維修的工資費用算作成本以后, 就会获得一个等于 ϕG 的利潤。換句話說, 在这时期內所有生产出来的全部制成品的成本对于收入的比例将由轉移到新的建設上的那部分劳动力来决定, 或者由用来增加尚未达到成品形式而在制造过程中的貨物流量的那部分劳动力来决定。^① 在 ϕ 为零的地方(即在未从事資本积累的地方), 工业不可能提供收入超过成本的剩余; 而且工业的收入必須正好等于在这个时期內已經售出的貨物的工資成本加上也同样是照維修的工資成本估計的設備折旧。可是收入和成本的相等只能对整个工业适用; 这也就是說, 它只对每一个个别工业适用, 假定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技术是充分一致的, 因而能容許資本有机构成的一致性(即資本对劳动或积蓄劳动对現時劳动的比例的一致性)。如果不同的工业有不同的技术常数, 那末, 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数的工业就会根据这种不同的程度表现出收入超过成本的剩余, 而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数的工业就会相应地表现出差額。^②

① 收入将等于 $G=I$ 。如果 k 和 ω 在全部工业中都是一致的, 在所有制成品上所耗費的成本将等于 $\omega kL - \phi \omega kL = I - \phi I$, 收入-成本= ϕI 。

② 所以这就是像卡賽尔那些人的陈述里面的真理成分。他們說, 利息即一种資本租金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将作为成本的一个范畴而存在。在技术系数相異的各工业之間, 作为一个差别的要素, 它确实是存在的; 但不是作为对价格的一种淨增加額, 因而也不是作为对工資的减除額, 表现为从工資中减除的东西只是資本积累的程度, 这对于作为工业間一种差别数量的“資本租金”并没有直接关系。一位最近的作者曾經說过, 如果在計劃經濟中, “含

上面这个結論又由第二个假定来决定。这个假定就是，如果資源分配(不管是机器、建設設備或原料)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以便在使用上获得最高限度的生产率(根据价值来衡量)，那末就会造成在資本有机构成較高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比在資本有机构成較低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相对地高；这种在相对价格方面的影响是和这种經濟对于我所說的“資本飽和点”的距离成比例的。这里所謂“距离”的衡量标准，就是新增劳动作为积蓄劳动而用于資本方案^③所达到的物质生产率超过新增劳动作为现时劳动而用于当前生产所达到的物质生产率的程度。当“資本飽和”的状态已經达到的时候(只有这种状态才可以說是社会主义經濟的“平衡”状态)，不同工业的不同技术条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同的“有机构成”就不再对相对价格发生影响。換句話說，由于任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按照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来分配資本資源的一种經濟計劃必然会产生类似馬克思的“生产价格”的那种价格制度。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平衡的状态。隨着資本积累的进行和社会生产設備的扩充，价格背离劳动价值的現象就会趋于消失。到了这个最后的状态，价格就会符合劳动价值，而且各工业就会达到平衡，这时，它們的收入也就可足以抵偿当时的工資成本

有很多資本的那些商品底购买者，要对积累这种資本的成本負担适当的份額，那就需要把利息費用包括在成本和价格里面”(勃劳斯 [R. Burrows]: “經濟計劃的問題与实践”，第 51 頁)。但是利率絕不是測量資本积累——利率就是为这笔資本而定的——所需的費用(不管資本积累的费用指的是什么东西)底“适当”尺度；而且对所有貨物的价格加上一个數額——比提供新的資本积累所必需的高，那只会造成貨物的滯銷。

③ 即投資計劃。——譯者

(照上面所下的定义)。^①

其中的理由可以申述如下：根据劳动被投在某些用途——就是当作积蓄劳动来使用的用途——上的不足的程度而在这些工业产品上所造成的缺乏(相对地说)，就会使价格提高，因此可以推知，凡是比其他产品含有更多积蓄劳动的产品就会表现出最强烈的涨价趋势。但这个假定的更直接的证明还可以用下面的形式来表示。照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来分配任何种类的資源意味着，这些資源如果在任何用途上多添一分，那末因此增加的产品(用价值来计算)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相等的。这只是说明我們所指的“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的含义的一个方法：如果在某一用途上所增加的資源比在另外一种用途上生产得更多(例如假定一个人花在一块土地上的时间，用在馬鈴薯上的每一額外小时就会比用在洋白菜上的每一額外小时产量大)，那末，把資源从一个用途移轉到另一用途(例如，把生产洋白菜的劳动时间轉移到生产馬鈴薯上面)，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照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分配資源的办法还是没有作到。根据假设，在任何情况之下，积蓄劳动所得到的这个数量(就是新增資源所生产的产品)总是大于使用现时劳动所得到的数量：这个差额在所有的工业中都是一律的，因为这两个数量的本身在所有情况之下都是一样的。因此，当各工业所使用的积蓄劳动比它們所使用的现时劳动的比例高的时候，它們的产品对生产上所用的劳

① 新的技术发明的出现，由于开辟了“积蓄劳动”的新形式，当然就会不断地使这种经济从这种最后的状态中偏离出去，以致实际上永远不能达到这种状态，或者维持很久。这里所说的只是，在没有技术发明的时候，或在技术阶段的间隔时期，可能达到这种状态的趋势依然会继续下去。

动(包括积蓄的和现时的)的比例也会同样地比较高,如果这些产品都是按当时市价计算价值的話。①可是随着积蓄劳动和现时劳动比起来相对地日益充足的时候,这种新增的积蓄劳动和新增的现时劳动在产量上所存在的差别就会趋于缩小。到了这种差别消失以后,积蓄劳动与现时劳动的配合比例在各工业之間(如果每一种工业都是根据它們最有生产成效的方式来分配)的分歧对此就不发生影响了;而各种工业的产品,按当时市价计算,就会和生产它們时所耗用的(积蓄的和现时的)劳动成比例。

第三类的假定关系到生产活动在不同生产阶段之間的必要“平衡”;这里所謂阶段是指一个成品所必須經過的一段时期內的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如果这些阶段都属于一个工厂之內,或属于一群互相关联的工厂(例如高炉、炼鋼厂和軋鋼厂)之內,那末,这个問題只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技术問題,也就是作到一种“平衡的过程”,以便維持一个繼續不断的产品的川流,而不致在任何阶段上因为有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而造成浪费。但是如果不同的工厂或甚至不同的工业是一个生产过程中一系列連

- ① 根据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假定,就可以得到这个結果。如果把积蓄劳动的新增产品写作 $\frac{dp}{dx}$,又把现时劳动所生产的写作 $\frac{dp}{dy}$,再把所使用的积蓄劳动量和现时劳动量分别写作 x 和 y ;那末,根据下面的假定(按数学上的欧拉 Euler 定理,如果我們把其他生产要素加以抽象分离),即总产

量 $=x \cdot \frac{dp}{dx} + y \cdot \frac{dp}{dy}$,結果 $x:y$ 的比例越大, $\frac{x \cdot \frac{dp}{dx} + y \cdot \frac{dp}{dy}}{x+y}$ 的数量也

就越大,如果 $\frac{dp}{dx} > \frac{dp}{dy}$ 。当 $\frac{dp}{dx} = \frac{dp}{dy}$ 的时候,任何工业中的 $x:y$ 的比例

都不会影响到 $\frac{x \cdot \frac{dp}{dx} + y \cdot \frac{dp}{dy}}{x+y}$ 的大小,而且这对于所有工业都是相等的。

續階段的組成部分（例如煉鋼廠——製造紡織機械的機器製造廠——紡織工廠），那末，這個問題就成了各工廠之間和各工業之間的勞動與資源分配是否有正確的比例，來保持它們之間的平衡的問題了。在生產過程較長和資本積累正在進行的經濟之中，有某些相當複雜的關係必須加以注意，而且在運動情況下和這樣一種平衡有關係的時間因素尤其有特殊的重要性。支配這些關係的原則就牽涉到本章以前所討論過的那種意見。假定有了某種關於投資和建設的經濟政策，那末可以推知，根據現有資源和技術條件的數據，從一個類型的建設方案轉到另一個類型的建設方案，以及勞動從舊的技術方法轉到新的建設方法上去，自然是有一定的發展程序的。如果能作到在生產成品的貨流上沒有急劇和不規則的跳動或漲落，而且沒有因為在某些階段上有了過剩的生產能力或由於舊的技術方法撤換得過快而引起的浪費，那末，一旦給以數據，各生產階段之間自然會有一定的關係，而建設發展的進行和新式生產過程的創立也就會有一定的時間程序。換句話說，當勞動以任何具體形式積蓄起來的時候，它必然會與未來成品制成時的某點時間有關。反過來說，今天成品的供給系依現時生產上可資使用的設備供應為轉移，而這又依據着過去對於這種設備的最初建造所作的決定。要做到有一個持續不斷的貨流（或不斷增加的貨流），必須使這些最初的投資決定能符合在一定時期內的某種投資方式，否則某一年——假定明年——所需要的那一類型的設備也許會太多，因而造成生產過剩，而在另一時間——假定是後年或五年以後——卻又發生缺乏所需要的那一類型的設備的現象，因而引起那個時期的生產不足。

但是这样一种平衡学說所具有的一般性质也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资源貧乏的社会可能认为立刻开始建造一些完工快但是不坚固的木板房屋（像美国在开創时期的中西部和現在西伯利亚某些新兴市鎮所采用的办法），准备在以后一些时期再用磚建筑物来代替，然后等到再晚一些时期，在社会生产能力更为发达，资源更为丰富的时候，用更复杂、更寬大的鋼骨水泥建筑来代替，是最符合不断改进生活标准的要求的。所以有了这个社会的一定资源和资源增加的速度，又有了这个社会的其他需要，像食物和服装等等，每一个过渡阶段显然就会有一个“最好的”时期，也会有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最好的”建設数量和速度。如果一时建筑了很大而又很多的木板房屋，而又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內繼續地建筑下去，到了后来由于质量更好的磚房突然大規模地兴建起来，来代替这些木板房屋，以致它們都在物质寿命还没有完結的时候，就变成廢棄无用的东西，那就是一件不經濟的事情了。而且隨着建設计划的进行和形式的改变，也就一定会发生劳动和资源的适当轉移；可能（虽然不一定）^①会有更大部分的社会劳动力用到建設工程上面。要使这件事成为可能而不致减少当时所生产的消费品，就必须使这种轉移的时间能符合消费品制造业由于应用新的技术設備而增长的生产率。还有，在一种建筑方法过渡到另一种建筑方法之前的某些时候，又必須在生产建筑材料的工业中也做到一种类似的有秩序的过渡。建筑磚房的时期一經开始，对木材的需求就会

① 如果某种新建筑方法的发明——假定說——可以减少一半的建筑時間，那就当然值得立刻采用；結果——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势必把比过去小的一部分社会劳动力用在建筑上面（除非对房屋的需要是富有彈性的）。

改成对磚块的需求,再到后来,对磚块的需求又会改成对水泥和鋼材的需求了。除非在这个过渡的前一些时候,就停止对木材工业設備的投資,而在更早一些时候,停止对制造这种設備的机械制造公司的投資,而将这种投資轉移到生产制磚的設備方面,否則,当过渡到来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在木材工业以及它的附屬工业上发生过剩的工厂和剩余的生产能力,而在另一方面又由于磚业的有限生产力量而延緩了磚房的建筑。應該注意,并不是在这些决定作出以前先要假設和“利率”有某种关系。它們所依靠的是关于某种数据的了解,而这些数据的根据又是在計算利率之前所必須决定的。的确,后者的定义如果只是現時所得与未来所得之間的一种关系,它就不过是这些决定底集合体的一种抽象表現而已;它依靠着作出的这些决定,而不是这些决定依靠着它,因此它在邏輯上是在作出这些决定以后产生的,而不是在这以前产生的。

在这里所做的分析主要是限于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經濟和資本主义經濟之間的差别的机械作用,它是由这两种制度之間的差别的一面来决定的;也就是集体計劃的生产制度与通过无数分散个体的市場制度的作用来調节生产的一种对比。关于另一方面,就是階級关系的差别,并没有清楚地加以說明。可是事实上正是这种差别才是更基本的,因为它正是决定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也决定着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和动机、冲突和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应当分离的;而且以上所說的,有很大一部分是絕對由这个更基本的因素来决定的。形成这两个制度的机械作用的决定性数据是由作为生产者的人們之間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例如,决定資本主义所以会以利潤——剩余价值

的增殖——作它的主导思想的原因，就是它的阶级本质。因此结果必然是，凡是能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政策和趋势就一定会与这个制度的繁荣结合在一起，而且势必继续保持下去，而不利于这个目的的政策和趋势就一定会看作是矛盾的和非经济的而加以抗拒，而且会引起制度内部的冲突。我们已知，由于这个理由，国外投资、工资上涨、“产业后备军”以及市场上某些摩擦的存在才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与特殊的后果联系在一起。我曾在本章和以前各章的许多地方提过，资本的积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发展在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是会受到特殊限制的，这种限制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滞了它的发展。这个决定性的限制似乎在于这种制度对于劳动市场接近充分就业的趋势所加的抵抗，使工资不致提高到足以促成剩余价值的急剧下降，因而改变了原有资本和新增投资的价值。这种情况表现得这样可怕和不自然，以致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削弱劳工的活动能力，甚至在劳动市场的劳动缺乏情况有变成持久现象的时候，用像战时的“离职证”的办法，来减低竞争力量的正常作用。有一种意见现在似乎正在日益流行，就是如果能消除这种限制，那就用不了几十年的、略微提高的资本积累率就足以在工业发达而人口稳定的国家里面使已知的资本用途达到饱和，以致利率永远降到很低的一个数目，甚至接近零点。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改变了半个大陆，这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十年之内用紧张的建设活动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经济面貌。甚至在前一世纪的中叶，约翰·穆勒就已经说过，没有外国投资，没有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的政府贷款，没有资本使用上的浪费，“单是继续目前资本的逐年增长，就足以在几年之内使纯利润率降低到百分之

一”^①。但是在我們所知道的階級社會里面，是不是有人真能想像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使工資急劇提高以致造成有產階級的貧困呢？是不是我們不會更容易想像到，就會有一種運動發動起來，來遏制或破壞工會的囂張力量，或者開始某些新的殖民地的冒險，作為過剩資金的有利出路呢？這樣一種結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絕對會有的，因為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財產不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占有這種利益就等於在撲克牌遊戲中獲得制勝所必需的王牌。加強這種抗拒是現行制度的經常趨勢，這種趨勢在目前主要係被一種維持資本收益的願望所推動，是被限制勞動以及工廠和設備的利用的願望所推動——只要這種限制能獲得更高的利潤。因為凡是在產量政策由於考慮“固定成本”而受到影響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限制——這也就是說，不論什麼時候，因為目的要使價格和平均成本而不是邊際成本相抵，而沒有更加緊地利用設備——單是這個原因在生產力方面所造成的長期利用不足的数量就很可能比一般所認識的要大得多。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似乎有各種理由使利害關係勝過理性思想，甚至勝過“思想的逐步侵入”，而且有充分事實可以證明確是這樣。

對比起來，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利潤作為一種所得的範疇，已經不再具有一種經濟刺激或形成和限制政策的一種利害關係的任何意義，因為它已經不再作為一種個人收益而存在。而且既然各種各樣的工資已經成為所得的唯一形式，社會的刺激就

^① “原理”，亞胥黎編，第 731 頁。參閱魏克賽爾的意見。他說：“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比現在的個人主義社會可以為資本的迅速積累提供一個更好得多的保證。”他又說：“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會歡迎對資本的一切破壞性的措施”，而“集體主義國家就不致因為這種利率的降低而受到很大影響”（“講演集”，第 1 卷，第 212 頁）。

会完全和劳动联系在一起，而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可以料想得到，就是用最大的速度来提高工资。和普通的意见相反，似乎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怀疑，刺激生产的力量相形之下会由于这种变动而大大地增加起来。现在占国民收入几及一半的财产和特权的所得已经日益成为对产量或市价的限制作法底结果，因而也是限制作法的推动力；甚至和生产劳动成比例的劳动所得也丧失了作为刺激的大部分力量，这是因为劳动和财产比较起来在社会上并不受人重视，也是因为不平等的机会所造成的不公平的意识和嫉妒的怨恨挫折了他们的进取心，使他们失去了生动活泼的精神。另一方面，解除了这些消极因素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有力量可以调动尚未利用的集体积极性的潜力，这在以个人主义和僕人受主人支配为基础的社会里只能当作梦想而已。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工资的迅速增加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那末，它对资本积累和投资的一切问题自然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了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增加工资所得的唯一限制就只能是现有生产能力和对未来生产设备的考虑。由于消灭了要保留不加利用的资源的动机，由于在不同时期中基本设备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又由于改变了对现时和未来所得的态度，我们就有各种理由来假定，生产能力与工资所得的增加速度和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常见的比起来，可能达到完全不同的程度。萨伊在比较奴隶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时候所说的几句话，现在不必经过修改就可以适用在现代的场合。他说：“在劳动由一个下等的社会阶级来实行的地方，它就永远不能是光荣的，或者甚至不会受到尊重。主人对奴隶的那种强制的和不自然的优越地位，表现为好逸恶劳和养尊处优的作风；他们的思想能力也同样退化

了；智識的地位已經被暴力和兽性所侵占。奴隶和奴隶主都是墜落的人。……两个生产階級中的一个靠着压迫其余的一个而得到利益；如果不是說，这种紊乱秩序所造成的罪恶的生产制度抗拒接受一种更好的工业計劃的話，那么上面的情况就足以代表一切。”^①

有时候人們会这样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某种既得利益集团还是会繼續存在，来損害社会利益而拒絕理智的指示。就算会这样，利益集团的力量总是会削弱的，至少因为已經消除了現在社会內最有力量、最有害于人类幸福、最爱掠夺的一种权益集团——这就是财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利益集团的力量就会削弱。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这种对比，确实是既簡單而又非常重要的：在前一种經濟中，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财产的权益，人类的利益只是次要的或者甚至不重要的；而在后一种經濟中，人类生活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财产价值的維持才是不值得重視的东西。馬克思所說的“把人类劳动力可耻地浪費在最可鄙的目的上面”（由于劳动力的低廉）只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使人类处于从屬地位的一个方面。这种区别的两种后果是富有說服力的，但是很少有人能認識到它們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經濟中，因为利潤既已經不再是对生产和投資的一种刺激，所以就不会像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大家所熟悉的矛盾那样热心削減工資，来解决普遍的失业和一般的生产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关心的一直是提高工資。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經濟會計方面，資本的“固定成本”尤其是“字號”和“專賣權利”的“固定成本”就

① “政治經濟学”，1821年版，第1卷，第319—320頁。

不会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以后也仍然不会被重视（至少在工厂成立以后）；但是人的维护——这一向是最被人忽视的一种投资——就会变成一种主要的费用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缺乏证据，而且有惊人的证据，来表明在经济会计上没有地位的就是这种对人和人的安全的维护，而最关心的却是保护资本的价值；这种关心到了这样深切的程度——根据现代所发生的事件来看——居然不惜用阻滞发明和荒废生产资源的方法以及使欧洲“巴尔干化”、恢复中世纪的精神、维持现有剥削区域并用武力征服新的地区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今天人类的斗争，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为了要根除一种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使这种利益集团所维护的“卑鄙而又凶恶的”制度归于消灭，而采取无保留的一面倒的立场所展开的强烈斗争，是同样的甚至规模更大的一场斗争。当利益阻碍着理智的时候，宣传理智是徒劳的，除非所宣传的就是要推翻这种利益。那时是新兴工业资本家反对地主利益集团和贸易垄断者的斗争。今天这个世界则被无产阶级群众对垄断资本的侵占力量的斗争所分裂。如果既要从实践中吸取真理，也要用实践来启发真理，那末，经济学家无论作为经济学家或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都不能超然于这个问题。要使抽象概念具有生命，就我看来，经济学家必须不仅要走出修道院，到这个世界的市场上去逛逛，而且必须加入战斗行列，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算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属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不是要出卖经济学家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最优良的传统。无论如何，如果他不这样做，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和他的修道院一起倒塌在他的眼前。